史家名著书系

丛日云 主编

牛津欧洲史 II

FROM THE OLD REGIME TO THE AGE OF REVOLUTION

[美] 罗宾·W. 温克 [美] 托马斯·E. 凯泽 著

赵闯 译 孙洁琬 储智勇 郑红 校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第二卷

1648-1815

从旧制度到革命时代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07-176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牛津欧洲史.第2卷，1648～1815年：从旧制度到革命时代／（美）温克（Winks,R.W.），（美）凯泽（Kaiser,T.E.）著；丛日云主编；赵闯译.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1

ISBN 978-7-80762-872-9

Ⅰ.牛…　Ⅱ.①温…②凯…③丛…④赵…　Ⅲ.欧洲－近代史－1648～1815　Ⅳ.K50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03580号

书　　名：牛津欧洲史（第2卷）
著　　者：［美］罗宾·W.温克　托马斯·E.凯泽
主　　编：丛日云
译　　者：赵　闯
出 品 人：周殿富
总 策 划：崔文辉
策划编辑：曹海军
责任编辑：王　莹
封面设计：刘友丽
装帧设计：郭孟楠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 × 980mm　1/16
印　　张：21.25
版　　次：2009年4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发　　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7-80762-872-9
定　　价：42.00元

导论

欧洲，1648—1815年

“秩序和进步”是纹饰在巴西国旗上的箴言，但正好能够用来引出从1648年到1815年的欧洲历史。我们可以将这段历史想象为前后相继的两次运动的产物，每次运动都实现了作为其中心目的的普遍目标中的一个或另一个。

1648年至1750年左右的这段时期，由于在先前的世纪中经历了痛苦的变革，许多人恐惧社会迅速解体会陷入混乱，因此欧洲的精英们全力以赴，恢复秩序。在宗教实践领域，中世纪晚期的宗教纷争和宗教改革曾迫使欧洲人——从社会的最上层到最下层——在天主教与新教惨烈、血腥的冲突中做出选择。到1648年，这种冲突却产生了双方都不想要的僵局。从此，两方都不得不学会同“异端们”共处，要么就得面临国内外战争无休无止的前景。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发轫于中世纪的强有力的资本主义运动开始使农村的社会关系解体，导致西欧的农奴制几近消失以及更为庞大的城市商人阶层的形成。更便捷的运输方

式的出现使得进入国外市场更加容易,从而促进了经济的专业化和基于货币的经济增长,为发财致富提供了新的机会。但是,这些改变也威胁和腐蚀着古老的生活方式。富裕的资产阶级正涌入有较多特权的阶层,贵族们看到他们的特权受到威胁,农民们的生计更加依赖变动不居的市场。在政治上,欧洲正面临着中等规模的国家体系的出现,而这些国家首先被设计用来作为战争的机器。早期的现代国家虽然吸收着较大规模经济所带来的不断增加的财富,但仍旧处在"军事革命"的阵痛当中,这使它们以纪律败坏的军队投入到代价日益高昂的冲突之中。随着战争规模的提升和战场的扩大,国王和他们的大臣不得不制定涵盖整个欧洲大陆的外交政策。在国内,君主政府日益庞大,并企图使自身的权力"绝对化",即事实上不受任何人的挑战。虽然君主攫取权力是为了安定社会,但却激起了在 1648 年达到高峰的反抗浪潮。在知识方面,科学革命已经开始侵蚀过去有关宇宙的信念,正如发现和抢掠新世界揭示了两个世纪前不为人知的种族、文化甚至大陆的存在。

应付所有这些变化是欧洲权力掮客的任务,他们将新旧权力工具和权威象征融合起来,结果产生了一种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历史学家称其为"旧制度"(Old Regime)。尽管旧制度确实可以在不同国家背景中具有不同形式,但从 17 世纪中叶到 18 世纪中叶,欧洲精英们始终在为许多相同的计划而奋斗着。宗教分裂与僵化的宗教正统观念——包括新教教义——背道而驰,正统的宗教力量已经在做出新的努力来迫使反对者转变信仰。全球的商业化催生了重商主义政策,通过重商主义政策,君主们力图规范和改变商品、劳动力和货币的无政府主义的流通方式,以使其有利于他们自己和他们所统治的国家。民族国家

都在致力于更有效地训练它们建立的规模庞大而桀骜不驯的军队,同时制定均势战略来稳定国际关系。官僚制度和委任制(patronage systems)出现了。它们的目的不在于打破贵族阶级的权力,因为面对来自国王军事机器不可抗拒的竞争,贵族阶级正在逐渐解散他们的军队,而在于使贵族作为合伙人加入到正在扩张的民族国家中来,从而复兴特权结构。"君权神授"(Devine-right)的思想体系被阐释为支持国王的权威。国家发展出复杂的审查程序来管制表达方式,同时宫廷和皇家学院对艺术、科学,甚至精英的言论、服饰和书面语言的正确政治形式制定了详细的指南。简言之,欧洲的统治者开始花费大量的气力来巩固等级制,强化团结,以防止分裂和不稳定因素的产生。

尽管这些得到加强的制度看起来坚如磐石,不可动摇,但那些削弱了其基础的妥协和矛盾最终导致了旧制度的瓦解,到1750年,对秩序的寻求开始让位于对进步的追求。自相矛盾的是,这一切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因为旧制度的许多成功。由于危机感已不复存在,旧制度的权威主义特征逐渐看起来没那么必要了。1750年之后,欧洲人在"启蒙运动"中,更自由地批判旧制度的失败和无能。在比较平静的年代,旧制度所采取的严厉方法愈加为人们所憎恨,因为当"绝对主义"(absolutism)的面相和"专制主义"(despotism)的面相混合为一的时候,这个制度的特征就被视为无法无天。在整个18世纪军队变得更有纪律,形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均势策略依然运作良好,足以防止任何单一国家成为欧洲主宰。然而,均势政策也助长了对外扩张,因为一个主要国家的领土征服会引发另一些国家对其他领土的吞并。因此,东欧的国王们瓜分了像波兰这样的弱国,而西欧人则竞相贩运非洲奴隶,紧跟着在美洲建立庞大、辽阔的殖民帝国。

结果引发了一系列战争,即使这些战争没有像“三十年战争”给欧洲平民带来的那样大的灾难,但为此付出的代价仍足以使所有的欧洲国家背负沉重的财政负担。如此,寻求改革,寻求“进步”的动力不仅来自于智识氛围的改变,也来自于国家运转的需要。

在国家尽力使官僚机构现代化和提高岁入的同时,欧洲不知不觉地走向了工业革命。这种生产方式的变革源于不断增长的人口的持续需要、更好的交通运输条件、更有效率的农业生产、充足的投资资本,以及将新的科学原理应用于生产的意愿。尽管工业革命的影响在19世纪才被感受到,但那些促使其发生的因素在18世纪就已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正如事实所证明的那样:一个更加庞大的中产阶级出现了,对能够使生活更为舒适而价格适当的工业品的需求在增长,识字率在不断提高。由于书籍、报纸、音乐会和艺术展览的激增,高层文化大众化了,这帮助扩大了关注政治与艺术的公众规模。“公共舆论”这种长期以来为领导者所恐惧的模糊力量正在获得巨大的权威,甚至君主和国王也认为,他们必须尊重它,至少口头上是如此。

这些发展影响了欧洲所有国家,但没有哪个国家如法兰西那样表现得如此具有戏剧性。在1789年,法兰西经历了现代早期最有爆炸性、影响最为深远的政治与社会革命。法国大革命横扫了许多旧制度的权力设施和特权,奠定了现代政治社会的基础,其中包括了法律面前的平等、民主和立宪政府(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这次革命的影响超出了法兰西的国界,因为它的许多制度和观念被拿破仑传播至欧洲的四面八方,这样,它催生了一个现代社会,在这个新时代中对秩序和进步的探求将再度开始。

目 录

地图与案例小品

地图

案例小品



第一章

神权君主制问题

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结束了“三十年战争”,也标志着欧洲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终结。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时代结束了,那个时代的战争既是宗教战争,又是王朝战争,对稳定的国际平衡的威胁主要来自于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家族、好战的德意志、尼德兰与斯堪的纳维亚新教徒。在 1648 年之后,虽然宗教在法兰西和不列颠群岛仍旧是引起摩擦的主要根源,但在其他地方它已不再是主要的国际争端。在西欧,大多数的国际冲突都集中在抑制法兰西向周边领土扩张的努力上。法国在 72 年(1643—1714)的时间里都处于一位君主的统治之下,这位君主就是在 4 岁时就继承了王位的路易十四(Louis XIV)。

路易是现代早期绝对王权(royal absolutism)形式即神权君主制的代表,是王室傲慢、高雅和奢华的化身。对法国人来说,路易十四是大帝(le grand monarque)。一个伟大的世纪(le

grand Siècle)在他的长期统治之后结束了,那个伟大的世纪开始于路易即位前20年的枢机主教黎塞留时期,以法国在军事和外交上的国际性胜利为标志,甚至还以法国的写作、建筑,服饰和饮食方式——法国上层阶级的整个生活方式——在国际上的成功为标志,法兰西自诩为伟大的国家(la grande nation)。

正当法国文化不断走向成功的时候,路易十四争夺政治霸权的目标却最终受到了遏制。在路易最后的两次战争中,英格兰是他的死敌。英格兰在欧洲事务中扮演了一个多世纪的配角后,在路易统治的末期成为一个一流强国。英格兰在国外的成就部分是其成功地解决了国内冲突的结果,其国内冲突一方面来自于斯图亚特家族王权的力量同英国国教高教会派(High Church Anglicanism)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来自于议会的力量同清教徒的力量之间的冲突。经过了数十年的暴力对抗与变革之后,一个有利于议会的妥协成为最终的解决结果,一位英国国王被处死,而另外一位国王则被迫流亡。当法兰西一片安定的时候,英格兰却经受着革命和动荡的折磨。

英格兰和法兰西之所以获得稳定,是因为他们在广泛的领域里努力解决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普遍存在于欧洲大陆,只是在方式和程度上有所不同。宗教分歧、民间冲突、经济增长的衰退和战争引起的社会混乱都是困难处境的最普遍根源。作为对这种混乱趋势的反应,民族国家成长起来。尽管它们的制度模式各不相同,但是,法兰西、英格兰与其他国家一样,在17世纪末建立了比17世纪初更强有力的法律和秩序。依靠扩大的政府税收和更多的政府借款所得收入的供养,更大规模、更有纪律的军队能够更有效地保护农村和城市的安定。国家提供抚恤金、特权、荣誉和政府职位给社会精英,以便阻止贵族的谋反,

特别是在庞大的军队中更是如此。恰当地说，17 世纪可以被认为是国王的时代，也可以被认为是贵族的时代。

在 17 世纪的欧洲，文化也在慢慢地转变。这些变化部分是为了满足国家和上层阶级的需要和利益，上层阶级追求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知识趣味，以使他们区别于基本上属于文盲的社会大众，从而巩固他们的特权地位。王室法院，特别是法国的法院，详细阐述了有关贵族礼节的新法规，并为艺术表现提供了样板。国家还通过建立重要的科学院来资助新科学研究。许多 17 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如培根、笛卡尔、牛顿、莱布尼茨，都为欧洲的君主和国王工作。不管这种国家资助有多少不利影响，历史学家发现这段时期有着如此丰富的智力创造，于是将这个时期称为“天才的世纪”。

一、波旁王朝时期的法兰西

1610 年，有才能的、深受爱戴的亨利四世(Henry IV)在其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却被一个疯子刺死，有人认为这个疯子当时正在为耶稣会工作，但这是一个无证据的指控。新国王是年仅 9 岁的路易十三(1610—1643 年在位)，太后玛丽·德·梅第奇(Marie de Medici)成为摄政者，但她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政治才能。她的意大利亲信和法国贵族，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胡格诺教徒，都在进行狂热的争夺，极有可能葬送亨利四世取得的一切。在动乱期间，作为法国代议机构的三级会议(Estates General)在 1614 年召开，而这次会议注定是直到 1789 年为止召开的最后一次三级会议。值得注意的是，会议由于第二等级的贵族代表与第三等级的中产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而陷于瘫痪。

期间,路易十三虽然刚刚十几岁,但已开始设法确立他的个人权威,削弱他母亲的影响。由于缺乏良好的教育,身体虚弱,同时具有自虐行为和易于消沉的性格,路易需要专家的帮助。

1. 路易十三与黎塞留(1610—1643)

路易十三幸运地得到了具有卓越才能的黎塞留公爵(duc de Richelieu,1585—1642)的辅助。黎塞留在担任遥远的奥顿(Autun)主教区的主教时,就是一位颇有能力的管理者。由于厌倦了外省的生活,黎塞留移居到了巴黎,并在混乱的摄政统治期间表现出了无所不能的政治操纵技巧。他所扮演的角色是国王与他母亲之间的和解人,并因此而获得了奖赏,首先是成为枢机主教,然后在1624年,被路易选为首席大臣。尽管国王始终非常关心国事,但黎塞留却是之后18年间法兰西的实际统治者。尽管黎塞留的残忍足以使其成为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但他却坚信他的政策与他的基督教信念是相一致的。

为了巩固路易十三对法兰西的统治,黎塞留有四个目标:铲除作为一种有效政治势力的胡格诺教派;使贵族们记住他们是臣属国王的;使整个法兰西感受到民族的伟大;最后,通过这些措施,使君主制真正的而不仅仅是理论上的绝对化。国家至上(raison d'état)最先毁灭了胡格诺教派,胡格诺教派通过《南特敕令》(*the Edict of Nantes*)得到的政治特权使他们成为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主要障碍。他们所控制的上百个设防城镇是一个国中之国,它们地处西南,是上百个潜在的叛乱中心。胡格诺教派感到恐慌于是发动了叛乱。拉罗切利(La Rochelle)——胡格诺教派的主要据点——在1628年的陷落和黎塞留出人意料的

仁慈方式帮助黎塞留制住了胡格诺教派，这种方式就是废除《南特敕令》中的政治和军事条款，而保留部分的宗教宽容。

因为法国没有名副其实的海军，对拉罗切利的围攻才遭拖延。在之后的十年间，黎塞留建造了一支大西洋舰队和一支由欧洲的奴隶充当船员的地中海舰队。其间，他在三十年战争中熟练地引领法兰西，只有当可能收获实在的利益时才动用法国的资源，并通过向《法国公报》(*Gazette de France*)夸大法国的胜利而确保了好名声。

之后，黎塞留强令毁掉一些贵族的堡垒并禁止私人决斗，以设法使贵族变得驯服，不过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而更有效的办法是，黎塞留利用被称作“监督官”的王室官员来控制贵族和忠诚度可疑的官员。监督官的职位不可以世袭，也不可以买卖。这些王室官员早就存在，但未曾起到多大作用，如今，他们在司法、治安和税收方面的权力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强。

通过缔造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黎塞留使路易十四有可能建立起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所推行的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官僚政治，因为大多数国家官员的官职是从国家那里买来的，从而迫切要求所需的岁入和一定的忠诚度。此种“受贿”系统对国家的不利之处在于，大臣不能对他们的大多数职员施以高质量的控制，也不能在不偿还买官钱的情况下解雇无能的官员，这几乎是一个国家从来都负担不起的奢侈。而且，对于政府长期的国库空虚，特别是征税上的腐败和反复出现的财政赤字，黎塞留几乎未作任何补救。他对国家至上原则的执著使他对臣民冷酷无情，但国家的实力却依赖于臣民对自己责任的忠诚履行。他相信艰苦的劳作可以最有效地使民众处于驯服状态，而闲暇则会导致灾祸，平民应该引以为荣的是君主的荣耀、法国文化

的成就和对君主敌人的胜利。为了国家的荣誉,个人的苦难,特别对较低阶层的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这种接受是构成民族主义的应有成分。

2. 马萨林

黎塞留和路易十三分别在1642年和1643年去世,又一个幼主即位,而他的令人憎恨的母后,奥地利的安妮(实际上她来自于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室,在那里的王朝被称为奥地利王朝),开始摄政统治,所有这一切似乎预示着,曾经在亨利四世死后发生的危机会再次出现。这场新的危机被一位新的首席大臣化解了,这个人就是朱尔斯·马萨林(1602—1661)。马萨林是一个西西里人,曾由黎塞留亲自遴选和授教,并与安妮异常地亲近。马萨林也是一位枢机主教(尽管不像黎塞留一样曾经做过司铎),同时也是相信国家至上的典型代表。马萨林同样不关心法国的财政状况,他像黎塞留一样在职业生涯中积累起一笔巨大的财富。他同两个派系的法国贵族都相作对:佩剑贵族和封建权贵的后裔;穿袍贵族(这里的长袍是指法官和其他官员的官袍)和已经买到政府官位的平民的后代。前者由于被一个外国人的摄政统治排斥于权力中心之外而感到怨恨;后者由于已经对公债券进行了大量投资,对马萨林借钱来满足战争开支而后又忽视偿还亏欠国家持券官员利息的随意方式而尤感嫌恶。

1648年,不满引发了"投石党"(Fronde)运动(它的名字来自于一种投石工具,巴黎的孩子用其向马车中的富人投掷小石头),这是17世纪中期在欧洲爆发的几个叛乱之一。一些暴乱涉及了乡村的农民和巴黎平民,他们由于经济萧条和与之相伴的



这幅插图来自于亚伯拉罕·伯斯(Abraham Bosse)的《王宫》(*Le Palais Royal*,1640),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有关法国时尚和品位的精美图画。伯斯对蚀刻画有着特殊的兴趣,那些画作着力刻画了上层中产阶级的穿着。家具也发展了新的式样来适合新的衣饰。(New York Public Library Picture Collection)

"三十年战争"的后期战役而贫苦不堪,并经历了1648年到1651年大饥荒的深重灾难。但是,"投石党"运动则基本属于贵族的反叛,开始由来自巴黎议会的法官领导,巴黎是穿袍贵族的据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后,则由从"三十年战争"中归来的贵族官员所领导。令人不解的是,诸多"皇族"(王室的亲戚)都带着私人军队前来干预。尽管马萨林不得不两次逃离法兰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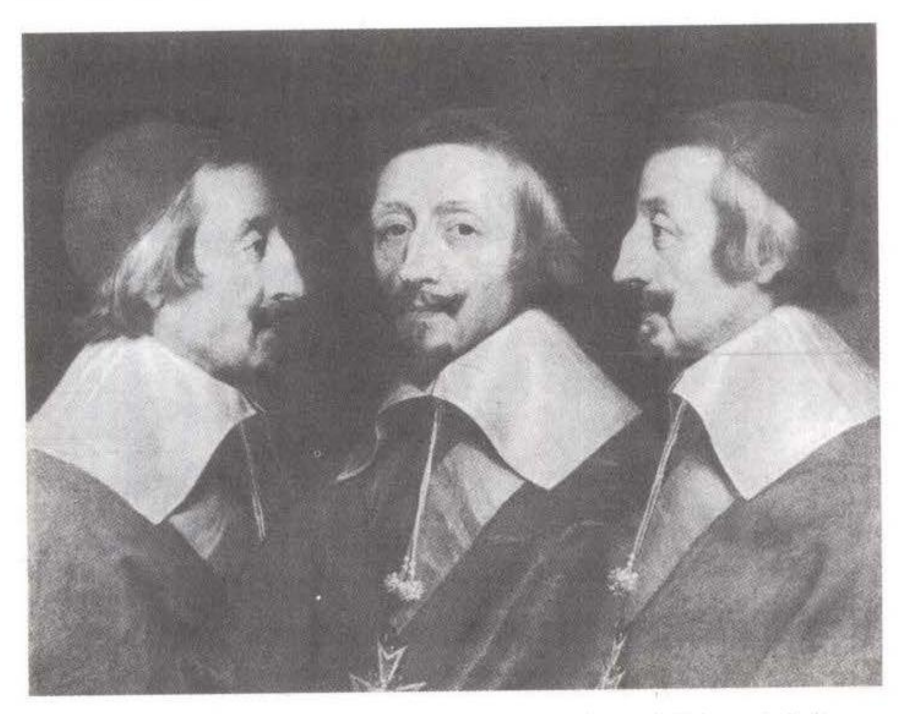
而出外流亡,尽管王军必须围攻巴黎,尽管马萨林迫于压力而做出让步,但是,这场实际由议会和贵族所发动的两次叛乱的最终结果是议会和贵族都遭到了削弱。

当太后和她的儿子于 1652 年 10 月成功回国的时候,大多数的巴黎平民都支持他们,“投石党”人也准备接受路易十四的个人统治。从根本上来讲,“投石党”运动的失败是因为它在乡村没有真正的根基,甚至也未获得各城市正处在上升阶段的中产阶级的真正支持。更确切地说,这在本质上是一场权力争斗,是马萨林和他的新官僚同两个享有特权的贵族群体的直接对抗,而这两个贵族群体的每一方都不信任另一方。马萨林所必须做的就是施用古老的罗马格言:“分而治之”。

3. 路易十四(1643—1714)

马萨林在 1661 年去世,路易十四开始了他的个人统治。在投石党运动期间,当暴徒闯进他的卧室时,路易十四曾受到严重惊吓,因此,他决定镇压敢于对其权威发出的任何挑战,如果可能,使用说服和欺骗,如果必要,就使用武力。在 1660 年,出于政治原因,他与一位西班牙公主成婚。在拥有了一个接一个的情妇之后,他在 1685 年与她们中的一个结了婚。这个女人是德·曼特农夫人(Madame de Maintenon),她是路易十四私生子的女家庭教师,曾是一个虔诚的胡格诺教徒。在路易十四以后的统治中,她在宫廷做了许多努力来保证有尊严的虔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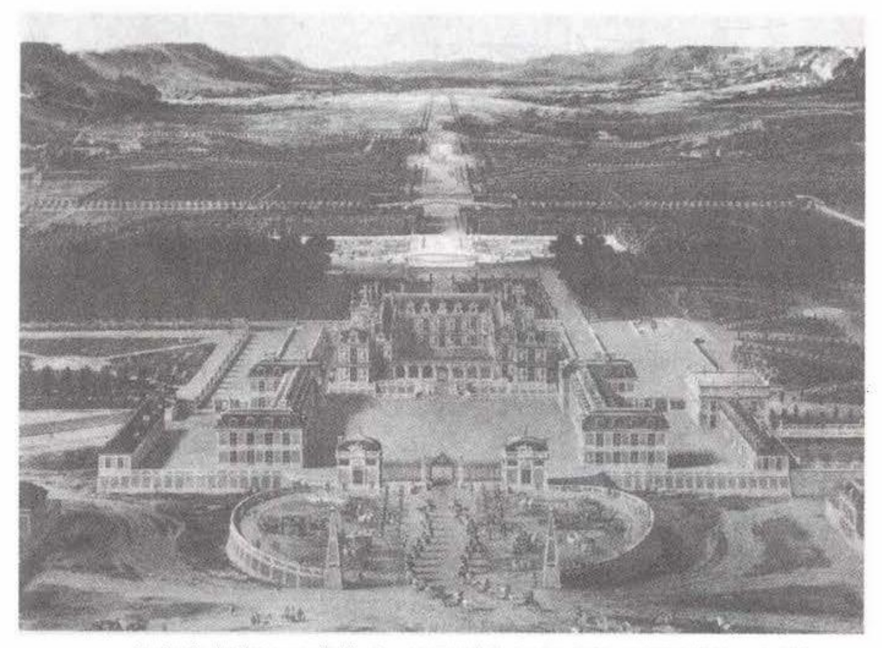
路易十四,太阳王(the Sun King),他作为大帝是成功的,因为就教育、气质和体魄来说,他都是适合这个角色的理想人选。他具有令人羡慕的自律、坚韧和持久力。他从未当众发过脾气,



这个时期的官方的画像很少能够保存下来，但路易十三和黎塞留的肖像画是完全可信的。菲利普·德·尚帕涅(Philippe de Champaigne,1602—1674)经常给黎塞留画像，在这幅由三个角度的黎塞留肖像组合起来的绘画中，他试图强调那个时代的理性主义。(National Gallery, London)

承受着长时间的日常政务会议，并总是精力充沛地，甚至充满享受地精心制定礼仪，其幽默感的显著缺乏也许有助于这一切的形成。他拥有钢铁一般的体质，这使得他能够经受住密集的日程安排，不受炎热和寒冷的影响，并使得他能够在当时低劣的医疗水平之下，一生过度进食而仍能活下来。

他身高 5 英尺 5 英寸(一个在那时让人一看就印象深刻的



凡尔赛宫位于巴黎城外,逐渐形成了极为浩大的规模。凡尔赛宫是为路易十四即太阳王所建,它的建造,从 1668 年到 1711 年,耗时 43 年。其中枢部分是路易·勒沃(Louis LeVau,1612—1670)的杰作,后来,由安德列·勒·诺特(André Le Nôtre,1613—1700)设计了花园。这幅来自凡尔赛博物馆的早期绘画,展示了这个城堡 1668 年时更为适度的原始风貌。(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Art resource, NY)

身材),高高的红色鞋跟更增加了他的高度。他甚至在年轻的时候就决定要"完美地做好所有事情",不在任何事情上失败。为了给作为太阳王的自己提供一个合适的环境,为了通过不间断的仪式和宫廷生活的小阴谋,孤立傲慢的贵族,达到在政治上压制他们的目的,也为了使在巴黎暴徒闯入他卧室的事件不再重演,他把首都从巴黎移到了 12 英里以外的凡尔赛。从 1668 年

到 1711 年，他在那里建造了一座 500 多米长的巨大宫殿，宫殿被置于一个极为广大、整齐匀称的花园之中，显示了对自然的控制力，花园里有 1400 座喷泉，喷泉的水必须从塞纳河抽调而来，花费巨大。凡尔赛宫主要是一些狭窄、不舒服和不卫生的地方，一个容纳一万人的宫廷，其中包括各类家眷和仆人。这是以展示奇观来自我陶醉的政府，它会被任何能够负担得起的君主所模仿，还有一些负担不起的君主也会去这样做。

4. 神权君主制

凡尔赛宫是法国的象征，路易十四是法国的化身，令人十分羡慕并意欲效仿的法国也是历史上神权君主制的最好范例。也许路易从未真正说过："L'état c'est moi"（"朕即国家"），但是，这句话清晰地概括出路易对自己角色的确信。在理论上，路易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或至少在法兰西是这样。他不是由法国人选出的，也不是通过武力获得王位的。确切地说，上帝在他出生之时就给他指定了一个位置，成为在 10 世纪统治法国的国王休·卡佩（Hugh Capet）的合法男性继承人。作为上帝的代理者，他的话就是最终决定，挑战它就是挑战上帝的安排，违抗它是一种宗教冒犯，也是一种政治过错。因此，神授权利的起源是高卢主义（Gallicanism）的一种逻辑延伸，这种主义寻求将罗马教皇对法国教会的干涉限制在纯粹教义之事上。

在某些方面，为神权君主制辩护的理论可回溯到中世纪，它认为政府的正确决定不是通过试验和讨论取得的，而是通过"发现"存在于上帝对万物安排中的权威答案来取得的。在其他方面，这个理论是"现代的"，或者说是具有前瞻性的，因为它来源

于对忠诚于民族和增加民族主义感的期望。亨利四世、黎塞留和路易十四设法将所有的法兰西居民融合成一个单一的民族体。但是,那个时候的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精英事务,精英的意见在国家事务中独具价值。因此,尽管宫廷和法兰西学院创作了一种精炼的法语来替代贵族所说的方言大杂烩,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路易十四在意农民说何种语言。虽然如此,国王的大臣们还是试图将国王塑造成法国共性的象征。国王征税、增加军队,并千方百计地影响臣民的生活。法国人必须相信国王有权做所有这些事情,他正在做的事情是为了他们,而不是针对他们。

神权君主制包含着臣民无条件服从的必然推论,因此,它是现代中央集权民族国家成长中的一个要素。它是一种诉诸古老的神学思想的制度,如《圣经》中对人们要服从统治者的忠告:"统治者是上帝的指命。"但是,它也受到较新思想的启发,这种思想将人们共同束缚在一个生产性的、有效率的、可靠的国家之中。很自然地,这个制度在实际中并非完全对应于它的理论。路易十四并不就是法国国家(French State),他的统治在那个词语的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绝对的。简单地说,他不具有严密控制其臣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的物质手段,但他的政策会带来相应的繁荣或苦难、和平或战争,从而影响臣民的日常生活。路易十四凭借他个人的权威,会尽力将那些如雅克·波舒哀(Jacques Bossuet,1627—1704)主教一样的人的理论付诸行动,这位主教为论证君权神授理论正当性的世界历史(universal history)提供了知识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这种思想的主要力量不是来自于各种宗教信仰,而是来自于贵族,所以法兰西和英格兰的贵族统治

在 17 世纪都出现了危机。贵族阶级被整合进新的国家机器中的程度在现代欧洲的发展中是极为重要的。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西班牙和中欧领地，古老的贵族阶级一般接受国王的新力量，但维持着许多特权和所有旧时的高贵身份。在普鲁士，他们被比较成功地整合进新秩序，成为国王的仆人，但具有完全高于中产阶级官僚的社会地位。在英格兰，贵族阶级同国王达成了一项独有的妥协。在法兰西，佩剑贵族丧失了大多数主要的政治作用，但是，他们被允许保留社会和经济特权，以及国王军队中重要的军官角色。

削弱旧的法国贵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力的过程，早在 12 世纪就已开始了，并由于 16 世纪的宗教战争和内战而大大加速。在 16 世纪晚期，大量的贵族，也许差不多半数的人，主要由于完全反对国王，已经成为新教徒，尽管许多贵族不久又改信天主教。在黎塞留和路易十四的统治时期，增加对平民的任用来管理国家，所任命的职位从国家的主要大臣到监督官，再下至地方行政官和法官，从而完成了这一过程。这些平民通常被提升为穿袍贵族，起初没有佩剑贵族的社会声望。但投石党运动已经表明，这些新贵族不能被看成国王的忠诚拥护者，在旧的贵族中，他们引起了鄙视性的妒忌。尽管有的时候贵族能够团结起来，但在路易十四统治期间，他们未给国王造成严重威胁。

教会也同样如此。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法国神职人员继续拥有重要的特权；他们不向王朝纳税，但自愿捐出一笔钱，数量的多少由他们在自己的集会上投票决定。尽管天主教徒被君主政体牢牢地控制着，国王还是谨慎地推动国家的高卢教派的发展。在 1682 年，王座和圣坛的高卢式联合达到高潮，一次法国神职人员的集会草拟了《高卢自由权宣言》(*Declaration of Gallican*



当亚森特·里戈(Hyacinthe Rigaud,1659—1743)绘制这幅肖像画时,路易十四正值63岁,处于权力的巅峰,画中的路易摆出一副明显是装腔作势的样子。在这个背景之下,亚森特使人们回想起另一个伟大帝国罗马,他用飘拂的长袍,象征权力的仪式佩剑和装饰性的假发套,表现出路易的力量和优雅气质。这幅画像悬挂在巴黎的卢浮宫。(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Art resource, NY)

Liberties)，有效地声称，"被法兰西和高卢教派所容许的教规和惯例"同教皇的传统权威同等重要。路易十四随后将其宗教政策的目标定为施用一句法国格言，即 un roi, une loi, une foi（单一国王、单一法律、单一信仰）。

黎塞留所打击的只是胡格诺教派的政治特权，路易则在1685年打击了他们基本的宽容权利，并于1685年最终废除了《南特敕令》。5万个胡格诺教派的家庭逃向国外，主要逃往普鲁士、荷兰、荷兰在南非的殖民地、英格兰和英属北美。流亡者的实践技能和知识能力加强了接受他们的地域的实力，勤劳的工人和数千名经验丰富的水手、士兵、官员的离开削弱了法国。一些胡格诺教徒留在了法国，尽管有迫害，但仍旧秘密地进行礼拜。另一些胡格诺教徒逃到新教国家，在那里他们致力于反路易十四的连续宣传。

在天主教会内部，路易试图压制他所反对的两个运动。虽然两个群体继续留在天主教会内，但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反对"反宗教改革"的人。寂静主义者，一群由珍妮·玛丽·盖恩(Jeanne Marie Guyon，1648—1717)夫人领导的宗教狂热者，寻求一种更加神秘和情绪化的宗教信仰，相信上帝的直接启示和与上帝的完美结合，因此，神甫就是没有必要的。但是，他们自我表现和自以为是的倾向，以及他们对宣传的热衷，暴露了他们名称的虚伪性，并冒犯了国王的礼仪观念。詹森主义者(Jansenists)，有时被称为天主教会的清教徒，他们是一个品格高尚的群体，其最著名的代言人是身为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布莱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2—1662)。詹森主义者得名于伊珀尔(Ypres)主教科尼利厄斯·詹森(Cornelius Jansen，1585—1638)，在宿命论上，采取几乎是加尔文主义的立场。他们强调

需要服从的是上帝而不是人，无论这个特定的人的身份有多么尊贵。他们因此置疑国王和教皇的权威，并攻击教皇的代理人耶稣会士。在统治末期，路易对詹森主义者越来越感到愤怒。1709 年他拆毁了詹森主义者在皇家港（Port-Royal）的据点，1713 年他得到了来自罗马的教皇训令《克雷芒通谕》（*Unigenitus*），通谕谴责了据称包含于一篇神学论文中的詹森主义原则。路易死后所留下的全部有害遗产中，《克雷芒通谕》也许是最致命的。后半个世纪，关于《克雷芒通谕 》的政治争论一再爆发。詹森主义者对君主制强迫做法的抵制将最终侵蚀法国君主制的真正基础。

5. 王室的管理

当然，在像法兰西这样广大和复杂的国家中，即使是不知疲倦的路易所能做的，也只是进行大体上的监督管理。每周路易都要在凡尔赛宫同他的大臣们进行三次长时间的会议，这些大臣主管作战部、财政部、外交部和内务部。国王将这种高层行政管理限制在亲信当中，他通常只同时任用四位大臣，并给予他们事实上的终身职位。简·考伯特（Jean Colbert，1619—1683）担任主计长一职 18 年；米歇尔·勒·泰利埃（Michel Le Tellier，1603—1685）担任负责军事的国务大臣达 34 年，这一职位后来又委任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被封为德·卢夫瓦（de Louvois，1639—1691）侯爵。在路易个人统治的 54 年当中，总共只任用了 16 个大臣。然而，王室的管理在实际中充满了困难和矛盾，存在着很多相抵触的司法权和封建制的残存物。30 个重要的地方行政官即监督官是王权的代理者，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各行其是，即使从一个行政区调任到另一个行政区，也是如此。

潜在的大麻烦存在于那些大理院之中，它们是各地区受理上诉的最高法院。巴黎的大理院由于其在首都的地位和对几乎半个法兰西的区域司法权，而享有特别的威望和权力。在这些法院任职的法官领导着穿袍贵族，拥有自己的职位，国王无法辞退他们。除了法院受理上诉的日常工作之外，大理院还要在王室布告生效之前对这些法令进行登记。大理院于是声称如果认为一项法令与国家或地区的更高一级法律相抵触的话，它们就有权驳回这项法令。虽然对这项权利的要求否定了理论上的专制王权，但路易通过运用另一项古老的制度"lit de justice"(它的字面意思是"公平之榻")在自己一生的统治中规避了它，在这项制度中，他可以在正式开庭时召集巴黎大理院到其面前，命令法官登记一项法令。据此发生的一个实例是，他以这种方式强制执行了反对詹森主义的举措，而詹森主义在法官中是拥有强大势力的。不过，大理院还是继续令其 18 世纪的继承人苦恼不已。

重商主义和考伯特　神权君主制并不是法国所独有的，当然，也不是只有路易十四的法兰西实行了重商主义。但是，犹如君权神授的统治一样，重商主义在太阳王统治时期特别繁盛。重商主义对于现代早期建造强大、有效的政治单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重商主义者力求使他们的国家尽可能地自给自足和不依赖于从他们的竞争者和敌对国家那里进口商品。重商主义者认为一个国家的生产应该为辛勤劳作的全体人口提供全部的生活必需品，还要提供战斗和赢取战争所需的力量。他们相信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来自国家上层的计划和控制，包括对行会的控制。但是，不像支持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后来所主张的那样，他们认为人们不可以为了致富而任意行事。与此相反，重商主

义者通过保护性关税、政府补助、垄断的准予,通过直接由政府来经营的工业,以及科学和应用研究,来引导国家的经济努力。

重商主义者将海外财产看做法兰西一个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认为这些财产应该由本国的强大政府来管理。许多食品和原材料在海外要比在欧洲更容易得到。因此,殖民地应该被鼓励提供必需品,这样母国就不必从竞争者那里进口它们了。反过来,母国将向殖民地供给工业产品和垄断殖民地的贸易。这种重商主义的对待殖民地的手段不仅为法兰西和西班牙所用,也为更少绝对主义性质的英格兰和荷兰政府所用。

法国伟大的重商主义实践者是考伯特,他在马萨林的手下充当学徒,在路易个人统治的早期迅速晋升为主计长。他从未获得黎塞留和马萨林所达到的至高地位。他是路易十四的协作者,而非他的指挥者,尽管其他的主要大臣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取得了至高地位,特别是掌管军务的卢夫瓦。然而,考伯特在所有关系法国经济的事务上都具有影响力,他特别致力于对外贸易和殖民地事务,因此也对商船队和海军尤为感兴趣。发明创造、技术教育、设计和建造轮船、吸引外国专家到法兰西定居,他的手伸向所有事情。

在工业中,考伯特鼓励对来自殖民地的糖、巧克力和烟草的加工;铸铁厂和纺织厂对军需用品的生产;以及法国不久便以之闻名的奢侈品的制造。巴黎15世纪的哥白林壁饰挂毯企业被国家接管,它的产品扩大到讲究的家具,而国王就是它的一个重要主顾。尽管威尼斯共和国竭尽全力来对其颇具价值的技巧进行保密,但吹玻璃的人和花边制造者还是被从威尼斯吸引过来。在一次对法国的竞争者的打击中,考伯特对一些荷兰和英国的产品施以重税。他向贸易公司提供资金,以促进对殖民地,以及

波罗的海和地中海的贸易,但只有法属印度公司最终获得成功。

在国内,考伯特鼓励重新造林,这样可以使铸铁厂获得充足的木炭(当时为冶炼所必需)供应;他还促进桑树的种植,以便提供对纺织品生产非常重要的桑蚕。他甚至试图控制产品质量,命令将有缺陷的产品大张旗鼓地当众展示,并同时展示有过错的生产者的名字,如果该生产者的产品第三次出了问题,他就会被带到公众面前曝光,但他的做法结果被证明是徒劳的。他还努力打破国内自由贸易的壁垒,比如各省、市的征税,或在法兰西各地区之间运输谷物的限制,但是,其中大部分的努力再次成为徒劳的。然而,他成功发起了对重要道路和运河的建造,南运河(Canal du Midi)就是其中之一,它把大西洋上的波尔图港和地中海上的纳尔榜港连接起来,减少了两海之间运费的四分之三,南运河被描述为自罗马时期以来最伟大的工程。

我们不清楚考伯特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还是阻碍了法国经济的增长。一般来说,欧洲的 17 世纪后期并不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扩张时代,也不是法兰西的经济繁荣时期。英国经济增长非常显著,部分要归因于人口相对的大量增加所产生的刺激。英格兰引入了新的大功率机器生产方式,并集中于便宜商品的大规模生产,而法兰西则坚持考伯特规定的政策,偏爱奢侈品和其他消费品的小规模生产。但是,法兰西和英格兰工业上的不同也是一种国家能量会聚点的不同。在那个时候,英格兰集中于国内的经济发展,而法兰西同其之前的西班牙一样把异常多的国民产值耗费在了战争方面。

6. 法国的扩张

法兰西是"三十年战争"的真正赢家,它获得了其东北边境

上的土地。作为主要冲突的后续，法兰西继续与西班牙作战，直到 1659 年签订《比利牛斯条约》（*Treaty of the Pyrenees*），确保了增加的领土。由于经济上的繁荣，当年轻且野心勃勃的路易十四在 1661 年开始他的个人统治之时，法兰西已经为进一步的扩张做好了准备。路易希望巩固 1648 年和 1659 年的收获，并确保法国沿莱茵河和阿尔卑斯山的边境安全。随着信心的增强，路易发动了一次针对法国的主要经济竞争者荷兰和英格兰的重商主义战争。当然，路易乐于在外交事务上施加法国的压力，极其愿意向他的敌人施以军事恐怖。他经常希望别人赞赏他使敌人战栗的能力，他对自己所进行的武力征服十分得意，委托制作并大张旗鼓地展示了许多赞美这种征服的艺术品。但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误解这些好斗倾向。无论它在多大程度上冒犯了现代人的感受，在路易的时代，通过征服而赢得荣耀是令人尊敬的。如果其他的国王在这方面不能胜过路易，那只是因为他们缺少路易的智谋。没有证据表明，路易如他的敌人所断言的那样，有意识地寻求在欧洲建立“大帝国”。而且，尽管他沉迷于战争和天性好战，但路易也寻求通过以传播法语和法国文化为主的非军事方式来扩展法国在国外的影响。

路易十四及其有才能的专家构造了华丽的工具来支持这种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在 1661 年，整个外交部由六个人组成，半个世纪之后，外交部就由大量的职员所组成，他们有办事员、档案保管员、保密信息的编码员（和解码员）、保密代理人，以及赋予重要的大使馆以威严的大贵族和高级教士。法国军队的扩大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由和平时期的 2 万人增加到战争时期几乎 20 倍大的规模。路易和他的副手们几乎彻底改革了法兰西战斗部队的特征。在作战部，勒·泰利埃和卢夫瓦这对父子将团

合并成旅，由一位将军领导，使军队处于更加严密的控制之下。他们还引入了两个新军衔，少校和中校，以便给予有才能的平民以更多的机会。这种新的委任仅仅通过军功来奖励，不像上校或上尉的军衔可以用钱来购买。由于军衔越多，购买就越经常化，所以，这对父子在努力清除懒惰。步兵总监，吉恩·马提奈(Jean Martinet，卒于 1672 年)在操练和训练时非常严格，以致他的名字成为现代词汇当中的一个词。军队在炮兵、工程兵以及围攻技巧上表现出独有的力量，这一切在军队移动笨重的年代里都是重要的，在浸满水的低地国家作战时发挥了巨大的战斗力。法国以一名天才工程师而自豪，他是马歇尔·德·沃邦(Marshal de Vauban，1633—1707)，据说一座由他来围攻的城市是无法防守的，而一座由他来防守的城市是无法被攻占的。而且，尽管军队医疗服务仍旧是粗糙和大略的，但是，一个大型老兵医院——荣军院(Hôtel des Invalides)——在巴黎建成。

(1)路易十四进行的前两次战争　这次巨大努力的攻击方向在东北面，朝向低地国家和德意志。路易十四也设法使西班牙有一个法国人的统治者，以确保西班牙成为法国的附属国。最后，法国在北美和印度的海外投入推动他试图在欧洲之外建立一个伟大的法兰西帝国，与其竞争对手英格兰和荷兰进行对抗。

路易十四进行的第一场战争是与西班牙进行的一次小规模的战争，这场战争随着 1668 年的《亚琛和约》(*Aix-la-Chapelle, peace of*)的签订而很快地结束了。因为荷兰人的经济优势、加尔文主义和共和主义，路易对荷兰人极为愤怒，他决心教训一下荷兰人，以惩罚其加入英格兰和瑞典的联盟来反对他。他收买了瑞典和英格兰，便在 1672 年侵入荷兰。恐惧的荷兰求助于年

轻的奥兰治的威廉三世(William III of Orange,1650—1702),他是为取得荷兰独立的殉国英雄沉默威廉(William the Silent)的曾孙。但是,法国军队停止进军只是因为荷兰采取了决堤的极端手段。

随后,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和勃兰登堡—普鲁士加入进来,对抗法国及其盟国。法国通过外交以 1678 年到 1679 年的 6 份尼木维根(Nijmegen 或 Nimwegen)条约,分化了这个不起作用的联盟。荷兰以许诺保持中立为代价而被完好地保留下来,法国放弃了考伯特对荷兰商品征收的关税;西班牙将法兰斯—孔太(勃艮第自由伯国,哈布斯堡家族的勃艮第遗产),以及比利时的一些城镇让与法兰西。普鲁士在菲尔贝林(Fehrbellin)于 1675 年打败了路易的盟国瑞典,但迫于法国的压力归还了在德意志的瑞典领土。当时,法兰西的权力和威望达到了顶点,它统治着全欧洲,特别是成为弱小的德意志王宫的主人,力图复制凡尔赛宫的标准。

(2)后两次战争 但是,在路易统治的最后 30 年,其大部分的资产都消耗殆尽。路易不满意自己在早先的两次战争中所赢得的威望,开始与大部分的西方世界相较量,似乎在努力摧毁荷兰和西德意志大部分地区的独立,并使伊比利亚半岛处于法国的统治之下。作为新一轮军事侵略的序幕,法国在 17 世纪 80 年代早期成立了特别法庭,即"和解议院",以便清理上一代人签订和平协议所带来的那些不牢固的结果。在法兰西的北部和东部边界,存在着大量的不牢固结果,那是一个充满政治分裂和令人困惑的封建残余的地区,其中的许多部分在名义上处于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在对有争议判例的文件进行检查之后,和解议院将许多块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土与法兰西控制的领地"重新合

并”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作为阿尔萨斯首府的前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自由市转由法国控制。

由于法国想继续其对西德意志的蚕食，以及路易坚持王朝所宣称的对德意志选侯巴拉丁伯爵大部分领地的要求，路易开始了他的第三次战争，奥古斯堡联盟战争(War of the League of Augsburg，1688—1697)。这次反对路易的联盟是由他的夙敌奥兰治的威廉所召集的，在1688年后，奥兰治的威廉与他的妻子玛丽即詹姆斯二世的女儿共享英格兰王位。此后英格兰开始彻底地反对路易。联盟还包括了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和萨伏依公国，萨伏依公国的参加是由于路易重新合并的策略对其构成了威胁。1692年，英国海军在拉霍格角(Cape La Hogue)获得了一次重大胜利，但是，威廉却在低地国家的陆地上屡遭败绩，尽管从没有被决定性地摧毁。在爱尔兰，法国曾设法恢复被废黜的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但这个企图在1690年的博恩战役中被挫败。法兰西和英格兰的争斗还在印度、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殖民地上进行，那里的殖民者称此冲突为国王威廉的战争(King William's War)。《里斯维克和约》(*Treaty of Ryswick*)的签订结束了战争，得到了一个没有胜利者的和平，虽然路易不得不放弃他所获得的部分领土。

1701年，路易十四迈出了他所发动的最后一次，也是最剧烈的战争的一步，即发动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1701—1714)。西班牙哈布斯堡国王、路易的内弟查理二世在1700年去世，没有直接继承人。几年来，外交官一直在努力商定继承权，避免将王位置于一个法国波旁家族的人或者一个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人的控制之下。尽管外交官都同意由一位巴伐利亚王储继承王位，但这位王储在1699

年去世了,于是便打算在哈布斯堡家族和波旁家族之间划分西班牙遗产。查理二世将他的领地完好无损地留给了路易十四的孙子安茹的菲利普。路易十四代表菲利普接受了它,尽管他已经签订了划分领土的条约。这种对均势的威胁被一个心满意足的法国人在评论中简洁地概括为“比利牛斯山将不复存在”。英格兰、荷兰、萨伏依、神圣罗马帝国和许多德意志的邦国组成大同盟(the Grand Alliance)来保护一个被分割开的西班牙。

在随之而来的血腥战争中,法国人逐渐耗尽了能量。在北美,英格兰获得了他们的新斯科舍殖民地(Nova Scotia),在欧洲,从 1704 年的布伦亨(Blenheim)战役开始,到 1709 年的马尔普拉奎特(Malplaquet)战役结束为止,同盟在四次主要的战役中击败了法国人。同盟军队由两位伟大的将军指挥,一位是出生于法国、萨伏依的尤金亲王(Prince Eugene,1663—1736),另一位是英格兰的首位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1650—1722)。但是,法军并没有被消灭,而且,同盟在马尔普拉奎特战役中有 2 万人的严重伤亡,这个数字至少与法军的伤亡数差不多。法国竭尽人力和财力,设法使法军继续留在阵地上。

而且,大同盟正在被削弱。由于英国人的政策是阻止任何单一的大陆力量获得过于强大的地位,所以,他们渴望防止法兰西和西班牙统一在波旁家族的统治之下,与此相同,他们也渴望防止奥地利和西班牙统一在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之下。在国内,他们面临着王位继承可能引发的一场争议,并且,商人阶层对一场有损贸易和不可能带来补偿的战争表示厌恶。在 1710 年,赞成和平的党派赢得议会多数而开始谈判,谈判以 1713 年在乌德勒支(Utrecht)签订一系列条约而告终。

《乌德勒支条约》是一份典型的力量均衡的和约，法兰西没有在其中遭到羞辱。英格兰获得法兰西丢掉的纽芬兰、新斯科舍和哈得逊湾的领土，而法兰西保住了魁北克、路易斯安那和他的加勒比海诸岛。在一定意义上，路易获得了发动战争所要获得的东西，因为安茹的菲利普被正式确立为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五世，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也得到了确保。然而，法国和西班牙的王权再也不会由一个人所执掌，所以，同盟也赢得了他们想要的。而且，英格兰从西班牙手中获得了地中海的梅诺卡岛和控制大西洋进入地中海的要隘直布罗陀巨岩（Rock of Gibraltar）。英国人还得到了阿西恩托，获得了向西班牙殖民地运送奴隶的权利，这种权利也同时使其获得了走私的机会。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所得到的补偿是，获得了比利时和原属西班牙的领地米兰与那不勒斯。在比利时（当时是奥属尼德兰），荷兰被给予权利可以驻军在某些设防的城镇即“边界要塞”，以便更好地防御法国可能发动的侵略。由于其对大同盟的忠诚，萨伏伊公爵最后获得了撒丁岛作为奖赏，并得到国王头衔。勃兰登堡选侯也获得了奖赏，被给予了仅在神圣罗马帝国之外有效的王室头衔，成为在普鲁士的国王（不是普鲁士国王）。

然而，在法兰西与英格兰之间为建立海外帝国所进行的对抗并未减少。《乌德勒支条约》签订之后，在印度，如同在北美一样，每个国家都继续设法在领土和贸易上取代其他的国家。在欧洲，荷兰并没有从防备法国中获得安全感，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查理六世（1711—1740）从未放弃成为西班牙“查理三世”的希望。对意大利领土的分配没有使任何人得到满足，无论是意大利人，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在后来的 20 年中充满了有关意大利的恶毒谈判。简言之，和平存在着致命的裂纹。

7. 法国的侵略

认为欧洲在17世纪遭受到一场严重危机的人,都可以从路易的侵略所导致的恐怖中找到许多证据。路易的战争对人的生命和经济资源的整体损耗非常巨大,特别是法国在奥格斯堡联盟战争中对德意志帕拉廷城的故意毁坏上。马尔普拉奎特战役在1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造成了4万人的死伤,其血腥场面直到一个世纪之后拿破仑发动的俄国战役,还没有其他战役可及。在战壕工事背后还有许多苦难,特别是在1693年到1694年对法兰西造成打击的大饥荒。马尔普拉奎特战役(1709年)那年,是法国现代历史上最可怕的年头之一,非常寒冷的天气、谷物歉收、饥荒、暴涨的价格,再加上无情的政府为了延迟崩溃而征收更多的税收,造成了普遍的不幸。巴黎人在嘲讽性的主祷文中痛苦地抱怨道:“我们在凡尔赛宫的父,你的名不再神圣,你的国不再伟大,你的意愿不再将于地上和水上实现,赐予我们今日之食,那是我们到处所缺。”

路易将自己塑造成天主教的斗士,在1685年《南特敕令》被废弃后更是如此,而奥兰治的威廉则被拥护为新教的斗士。然而,路易在侵略上不像他的前辈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他并不真的希望扑灭荷兰的新教。威廉在博恩的胜利给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带来了新的苦难,法国人在英格兰和新英格兰遭到憎恨,因为他们是天主教徒。但是,在最后,反对路易的大同盟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复杂混合体,宗教在其中扮演了一个相对次要的角色。路易十四没有为欧洲或法兰西取得永久的稳定,他的权威随着他的去世而消失。当他的送葬队伍经过巴黎的街道,得到

的是众人的嘲笑，尽管他仍旧是占法兰西人口多数的乡村民众崇拜的偶像。

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英格兰

英国政府利用了15和16世纪发展起来的新的专业化管理方法，以至于它有可能像任何神权君主制国家一样的专制。不过代议制政府的缓慢成长阻止了这种可能性，并产生了一套经政府一般程序不易改变的规则。这些规则也许是成文的，也许是不成文的，但都是对某些传统的共识。这些规则被认为不仅对国王的权威，甚至对由多数人选出的政府的权威都有限制作用，这是保证个人，即使在当局那里得不到批准，也会拥有"公民权"，并能够实施某些行为。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则和宪政的习惯，没有支持个体的这种强有力的和普遍的人性化规定，英国的议会制政府系统也会像任何其他政府一样冷酷地专制化。

法国国王和大臣能够在没有三级会议的情况下进行统治。然而，在英格兰，统治了11年而没有召开议会的国王查理一世，在1640年感到不得不召集议会，尽管当议会拒绝听从他的命令时，他立即解散了它，但同年国王又不得不再次召集议会。这就是长期议会(Long Parliament)，伴随着人事变动和一些间断，它运作了20年，由于它的召开而产生了革命，结束了英格兰神权君主专制统治的威胁。

查理最终被迫召集议会是出于两个源于中世纪的基本原因。第一，在英国议会中，下议院代表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这两个群体在其他地方是不会走到一起的：郡的贵族骑士和镇与城市的自由民。下院的力量在于两个群体实际是携手合作的，

他们彼此相当自由地通婚,并不顾经济和社会压力,倾向于组成一个单独的统治阶级,其成员资格对较低阶层中有才干和有能力的人是开放的。第二,地方政府继续由不直接受制于王权的地方行政官来管理。确实,英格兰的官僚、职员和官员由王室付酬,但在法兰西和其他大陆国家,新官僚倾向于接管几乎所有的政府事务,尤其是财政和司法事务,而在英格兰,士绅们和较高的贵族阶级继续管理重要的地方事务。1601 年伊丽莎白女王的《济贫法》(*the Poor Law*)使处理贫困问题不是由任何国家部门,而是直接由最小的地方单元(教区)来负责,那里的决定最终是由从地方士绅中征募的非专业人士,即不取报酬的治安法官做出的。简而言之,特权阶级并未被领受报酬的中央政府代理人推到一旁,也没有像在普鲁士那样,成为王权的代理人。相反,他们保住了地方政府和下院中的稳固地位。当查理一世设法在未经这些特权阶级同意的情况下来统治国家的时候,当他设法从他们及其属员那里筹款来运行一个官僚政府的时候,他们在制度和传统上拥有一个牢固的基础来抵制他的非常要求。

因为伊丽莎白一世没有子嗣,所以她的王位在 1603 年由苏格兰玛丽女王的儿子所继承,玛丽女王是伊丽莎白一世的表妹和夙敌。詹姆斯·斯图亚特,已经是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又成为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1603—1625),这样便将两个在法律上仍旧是分开的国家归于一个人的统治之下。詹姆斯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究式人物,他自负,最重要的是确信他的统治来自于神授。作为一个来自苏格兰的外国人,他是一个不受他的英国臣民信任的人。他完全不具备都铎王室的热心和机智,以及使人民拥护他的天赋。他的儿子查理一世(1625—1649)作为君主比他的父亲拥有更多的社交魅力,但他也无法延续都铎王

朝的统治,君权神授的实践在他的儿子查理的统治中走向终结。虽然他与他的父亲一样坚信,是上帝叫其来统治英格兰的,但他既没有做出都铎王朝所曾做出的妥协,也没有恢复对民众的广泛吸引力。因此,在英格兰,一种人格上的偶然性对于形成君权神授理论的结果也是重要的。

国家事务在规模上逐步扩展,花费也在不断增加。斯图亚特王朝与波旁王朝、哈布斯堡王朝及所有的君主一样都需要金钱,这些金钱不仅被用来支撑王室的奢华生活和维持食客随从的生计,也被用来运作一个开始承担许多新功能的政府。例如,对外关系正开始呈现出现代模式,设置了中央的外交部、大使、办事员、差旅补助等,这些都需要更多的金钱和人员。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没能获得他们所需的金钱,因为他们试图从其身上得到金钱的那些人即统治阶级,已经成功地通过议会至上原则将金钱的筹集和开销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赢得至上权威的议会是统治阶级的委员会,而不是一个民主的立法机构,因为只有一小部分人口可以投票选举下院的议员。

在国王和议会的斗争中,宗教促使双方都成为具有内聚力的战斗群体。权力争斗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统一英格兰礼拜仪式的斗争。保王党人的目标与英国国教高教会派相一致,即与主教们和一种使这种目标成为一种圣事信仰的圣餐礼与神学相一致,这种神圣信仰相对排除了左翼新教徒苦行的影响。议会的目标起初得到许多温和的英国国教低教会派的支持,它也吸引了坚定的清教徒或加尔文教徒,后来,它处于长老会教徒的控制之下,再之后又处于极端的清教徒——公理会教徒中的独立派——的控制之下。在17世纪的英格兰,"清教主义"一词是令人费解的,因为它涵盖了广泛的宗教团体,从温和的且热衷于传

道的英国国教徒一直到微不足道的教派。但是,清教主义的核心部分要回溯到茨温利(Zwingli)和加尔文(Calvin),回溯到对天主教圣事信仰的否定,对大部分音乐和教会装饰品的拒绝。它强调布道、教堂内外的朴素以及“净化”礼拜者与上帝之间的联系。若要理解这个背景,就必须追溯到斯图亚特王室的最初统治。

1. 詹姆斯一世(1603—1625)

在詹姆斯一世混乱的统治中,有三个主要的争论点:金钱、外交政策和宗教信仰。在全部三个问题上,国王与他的反对派都设法引导宪政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在筹款一事上,詹姆斯设法获得大部分无需议会批准的岁入;议会则通过坚持任何新税的征收必须经其同意的原则,来设法拥有对钱袋的大部分控制权。当詹姆斯征收一种未经议会批准的进口税的时候,一位葡萄干进口商拒绝缴纳,案件经财政法院(Court of Exchequer)裁决,得出有利于国王的判决,这个判决引来广泛关注,因为法官大体上支持了王权的绝对化。而后,王室对一种普遍“善行”——强行要求个人捐款的一种委婉说法——的请求,由于首席法官爱德华·柯克(Edward Coke,1552—1634)爵士的反对而遭抗拒。詹姆斯因为柯克对司法独立的宣称,立刻将其解职,于是,他对王室特权的露骨使用再一次引起关注。

都铎王朝时代的人认为外交事务完全是国王的事情。例如,伊丽莎白一世婚姻的微妙问题已经使议会和公众感到忧虑,但议会并未试图指定一个婚姻,伊丽莎白则在其试探性的谈判中谨慎地不去冒犯她的臣民。在另一方面,当詹姆斯一世公然

寻求可恶的西班牙的一名公主来作为他儿子查理的妻子时，下院在 1621 年公开请愿反对这桩西班牙婚姻。詹姆斯斥责他们多管闲事，他们便起草了《大声明》（*the Great Protestation*），这是英国革命的第一份重要文件，他们在文件中利用他们所宣称的议会的历史性特权来声称一种实质上的新要求，即议会对外交事务的控制。詹姆斯的反应是解散了议会，监禁了领导者中的四个人。这桩西班牙婚姻成为泡影，但是，查理 1624 年与法国公主亨莉埃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路易十三的妹妹，也是一位天主教徒）的婚约，也几乎未受到英国民众的更多欢迎。

虽然伊丽莎白不允许天主教徒和清教徒担任公职，但她认可国教教会内部的各种做法。詹姆斯用一个短语概括了他的政策："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通过这个短语他所要表达的是，坚持主教在宗教方面的权威是维持王权的基本条件。詹姆斯立即采取措施，抵制他所认为的清教徒不信奉国教的行为。他召集国教的主教和清教的领袖于 1604 年在汉普顿宫（Hampton Court）举行了一次会议，他亲自主持会议，并用其学识上的全部威力来反对清教徒。会议没有形成任何真正的共同意见就解散了，在这次会议之后，王室的政策继续支持反清教的高教会派。

尽管詹姆斯没有在臣民中成功地完成任何类似于宗教协定的事情，但是，他的统治对英语语系的人民来说是基督教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在 1611 年，经过 7 年的努力，一个由他授权的、由 47 名大臣组成的委员会完成了对《圣经》的英语翻译工作，这部《圣经》英译本仍旧是得到最广泛使用的《圣经》版本之一。国王詹姆斯的《圣经》译本是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散文体的杰作，它也许是一个委员会曾经取得的最卓越的文学成就。

2. 查理一世(1625—1642)

在詹姆斯之子查理一世统治时期,詹姆斯统治时的所有困难都迅速地达到紧急的关头。英格兰陷入一场反对西班牙的小规模战争之中,尽管议会议员憎恨西班牙,但他们很不情愿批准查理供养英国军队的专款。同时,查理不顾他的法国王妃,卷入与法兰西的战争中,他的战费部分是从比较富有的臣民那里强行贷款所得,还有就是使军队住在私宅中而由房主承担损失。他的财政状况非常糟糕,正如一位法国观察家所评论的:"他们希望与天地开战,但却没有办法同所有人开战。"自 1588 年以后,军备最为庞大,那时存在一个可见的敌人,在 1626 年到 1628 年间,查理的臣民不认为有必要补充额外的军备。结果在 1628 年,议会通过了《权利请愿书》(*the Petition of Right*),它是"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大宪章(Magna Carta)",第一次明确陈述了现代立宪政府的一些最基本的规则: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征税;军队不得宿营在私人住宅中;和平时期不得发布戒严令;除非出于特别指控和受到常规法律程序的保护,否则不得监禁。所有这些都是对王权的限制。

查理对《权利请愿书》表示同意,以确保议会批准新的拨款。但是,他还在征收未经议会批准的税款,议会随即不仅抗议他未经批准的征税行为,也抗议他的有关高教会派的政策。于是国王的态度由安抚变为强硬。在 1629 年,他逮捕了那些议案的提议者,并一起逮捕了其他八个议员。然后,他解散了议会,部分是因为议会拒绝投票给予他物资,部分是因为他感到议会在越权干涉宗教事务,还有就是因为那些被逮捕者越过国王而诉诸

国民的力量。

之后的11年,从1629年到1640年,查理进行着没有议会的统治。他从不需要议会批准的王室税收中压榨出所能得到的每一分钱,他从未由于征收全新的税款而严重地破坏惯例,但他对惯例的滥用超出了其反对者所认为的合理限度。例如,以前,造船费是由国王征收的,但只是在战时向沿海村镇征收来用作海军费;此时,查理即向内地区域征税,且是在和平时期。一位来自白金汉郡的富有议员约翰·汉普登(John Hampden)拒绝缴纳此税。他丢掉了议会席位(1637年),却因为挑战国王的财政支出而获得了广泛的公众支持。

在宗教事务上,查理得到一个信仰坚定的高教会派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指导,这位大主教是威廉·劳德(William Laud),他系统地强化了对英国国教的遵奉,同时剥夺了甚至是温和的清教教士的神职。清教徒有时被带到星法院(Star Chamber)受审,这是一个否认被告受到习惯法保护的行政性法庭。在民事事务上,查理依仗一个保守派的机会主义者托马斯·温特沃斯(Thomas Wentworth),他是第一个斯特拉福德伯爵(1593—1641),他放弃了对议会的支持而成为爱尔兰的总督。

在这些年表面平静的个人统治之下,英格兰激荡着被压抑的政治与宗教情绪。可是,从可资利用的不完全统计来看,触怒那么多英国人的税赋相对来说要轻于大陆国家(英国的赋税比任何一个现代的西方国家都要轻得多)。使用武力来反对国王的那些议员不是遭蹂躏和为穷困所迫的绝望的反抗者,而是自我伸张的人,他们捍卫自己的公民权观念和礼拜形式,同时为自己寻求力量和财富。

那么,为什么会有一场革命?历史学家尤为不同意有关英

国革命者的经济动机的说法。有证据表明资本主义特征较明显的乡绅即乡村资产阶级支持清教徒,但是,其他学者认为支持清教徒的乡绅们都是那些看到自己的经济份额正在下降的人,他们经济规模缩小的原因在于物价飞涨、牧羊的农业公共用地被围以及旧时修道院土地的新的世俗所有者的竞争。这种对于乡绅的性质和作用的争论说明了历史学家所面临的两个问题:第一,是定义的问题,因为争论部分地取决于如何定义社会各阶层,或社会各阶层过去是如何定义自己的;第二,是解释的问题,即使两位历史学家所研究的证据相同,或者所研究的证据有某些重叠之处,他们也可能对那个证据的含义得出不同的结论。英国革命是由绝望所引起的吗?一个正在衰落的乡绅阶层寻求让时钟倒转,所以革命的目标实际上是保守的?或者,革命的发生是由于领悟到需要现代化,使政府制度变得更加理性和有效率,即它是脱离封建主义的长期运动的最后阶段吗?"乡绅"甚至是导致那个世纪中叶的危机的重要因素吗?

事实上,英国革命并未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英国的面貌。贫困的劳动者在革命中几乎没有扮演任何角色。各阶级的妇女除了幕后活动外,几乎也未发挥任何作用,这与一个多世纪后的法国革命有所不同。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先例被确立,国王被审判,并被处决,他的机构被废除;国教被从政治中分离出去,财产被没收;不再更多地强调顺从。后来,所有这些又被取消,君主制和国教又恢复了。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认识到,如果做出选择的话,人类会改变他们的世界,许多人也看到了政治过程的重要性。他们看到在国家财政的各个方面,在政府的信用上,在用于不道德意图的不合适税金上,在将政府财政利益置于政府的社会责任之上的事情上,国王既不是理性的,也不是可靠

的。因此，宗教、经济和政治被证明是不可分离的，是彼此相连的因果链。

如果不是被迫与苏格兰人进行争斗，查理一世也许会渡过他的财政难关。劳德强化英国高教会仪式和组织的企图遭到了传承三代的苏格兰长老会的阻拦。在 1638 年，一个《庄严盟约和圣约》(*Solemn League and Convenant*)将苏格兰教会的成员集合起来，如果需要便以武力反抗查理。查理进军北方同苏格兰人作战，在 1639 年同他们达成妥协。但是，甚至这次规模不大的战役对国库来说都太过沉重了，在 1640 年查理不得不召回议会来开会。这个短期议会(Short Parliament)不给查理一分钱，除非对他和他父亲的众多抱怨能够得到解决，它几乎立即被解散了。之后，苏格兰人又再次开战，查理在一场小规模的战斗中被打败，于是，查理对苏格兰人进行收买活动，许诺每天给他们的军队 850 英镑，直至和平到来。由于筹不到钱，他不得不召集另一次议会，这次议会成为带来革命的长期议会。

因为在没有得到查理许诺的金钱之前，苏格兰军队不会解散，所以，长期议会有了一根悬在查理头上的大棒，借此通过了一系列冲击王权要害的改革。议会废除了造船费和其他有争议的税收，解散了不受欢迎的王室行政法院，比如已经成为斯图亚特王朝绝对主义象征的星法院。到那时为止，议会的召开和解散要看国王的心情，1640 年的《三年法案》(*the Triennial Act*)要求议会每三年召集一次，即使国王不希望这样做，也要如此。议会还抨击查理不情愿丢弃的王室亲信，大主教劳德被免职，斯特拉福德被宣布犯有叛国罪，后者于 1641 年 5 月遭处决。

期间，斯特拉福德对爱尔兰人的残酷政策引发了叛乱，这场叛乱等于是一场爱尔兰天主教徒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但它中



安东尼·凡·戴克(Anthony Van Dyck,1599—1641)爵士绘制的狩猎中的查理一世国王肖像画。也许完成于1638年,现存放于卢浮宫,这幅画像表现了穿着便装,刚刚下马的国王。画像中的查理一世,一手放于髋部,一手拄着藤棍,这是自中世纪时期以来代表贵族阶级的傲慢姿势。与里戈所绘制的路易十四的画像在服饰和姿势上形成鲜明对照。(Erich Lessing/Art Resource, NY)

文献记载

妻子的屈从

在1632年，一个叫托马斯·埃德伽(Thomas Edgar)的人(在讨论关于妇女权利的法律适用时，他的署名是T.E.)概括了他对这种情形的理解。他以《圣经》(《创世纪》第三章16节)为权威依据，隐约谈到许多上层或者中产阶级的已婚妇女可以在结婚时通过一份授产契约来保障财产权。

现在的男人和女人是一体的

看看这里的原因……妇女在议会上没有发言权，她们不能制定法律，不能同意，也不能废除什么。所有的妇女都被看成是已婚的或将要结婚的，她们的愿望(是?)服从于她们的丈夫。我没有看到任何补救，尽管一些妇女能够很好地转变它。习惯法在这里同神的权威相一致……

当男人和女人彼此结合，在婚姻的纽带下很快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照一般的说法，他们就是……配偶，在两个人共同参与的情况下，他们必须平等地拥有全部的财产。然而，法律给予他们的空间不像社会那么大……而是肯定他们是一体的，在许多方面将其认做是一个不可分的实体……

想要结婚的女子改变名字、尊严等

妻子必须使用其丈夫的名字，艾丽丝·格林变成艾丽丝·马斯格雷夫。她，早晨时是艳阳天，到晚上时也许就是彩虹或晴转阴的女主人；去教堂时的甜心，回家时被扛起的砖头。

丈夫所拥有的都是他自己的

但是,丈夫的特权在其对外面事情的控制上可以清晰地被辨识出,妻子则由于双方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对外面事情的适当参与而依赖其丈夫,在这方面,各处的实际情况都与法律的意见相一致,这就必然迫使妇女屈从于上述做法的影响。无论丈夫在结婚(承担保护妻子的法律责任)之前有什么动产或不动产,都绝对是其个人的,妻子根本不能依法占有其哪怕一点。如果他结婚时有所得,那么他都可以确定无疑地自己独占……

……男子给予其妻子的全部动产仍旧是他自己的,她的项链、她的手镯、她的衣服都是男主人的动产。

……无论她多么华丽,妻子只能在丈夫的财富中闪光,就如同月亮不能发光,它的光亮来自于太阳……

As quoted in Nitti Keeble, ed.,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Seveteenth-Century Woman* (London: Routledge, 1994), p. 146.

途夭折,并使北爱尔兰阿尔斯特区 3 万新教徒惨遭屠杀。由于不愿相信查理凭借军队能够平息叛乱,议会在 1641 年草拟了概述了它的所有抱怨的《大抗议书》(*Grand Remonstrance*)。查理做出最后的努力,再次使用了在 1629 年曾经发挥作用的策略。1642 年初,他下令逮捕下院反对派领导人中的 5 位,其中包括造船费案中的汉普登。这 5 个人避难到伦敦金融城享有特权的政治避难所,国王不能到那里逮捕他们。查理向北离去,于 1642 年夏在诺丁山重整了一支军队。议会完全接管了中央政

府，内战开始了。

在这些年的政治角逐中，已经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英格兰和议会中的强大群体所要的不仅仅是回到都铎王朝时期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平衡、宗教的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的平衡，他们要得更多。在政治上，议会于 1642 年 6 月提交给国王的十九条建议确立了议会对于军队、王室行政机构、教会，甚至王室子女培养的最高权威。查理驳回了建议，这些建议便成为议会在随后的战争中的立场。

3. 内战(1642—1649)

英格兰在几条阵线上形成分裂，部分是种族和领土的，部分是社会和经济的，部分是宗教的。保王派的力量大部分在北部和西部，其城市化和繁荣程度都要逊色于其他地区，主要由忠诚于王权和教权的乡绅所控制。

议会的力量主要在南部和东部，特别是伦敦和东英吉利亚，在那里，新教得到广泛的支持。苏格兰人对双方都是一个威胁，他们不相信英国议会，也同样不相信曾将主教强加于他们教会之上的国王。

在战场上，战争形势起初并不明朗。保王党人，或者骑士，都是从习惯于骑马的阶级中征募而来，他们是优良的骑兵，因此，具备初期的骑兵优势。使平衡倒向议会一边的是一支特殊军队的组建，这支部队从东部各郡的热诚的清教徒中征募兵员，他们在严格纪律的约束之下逐渐被铸造成铁甲军。他们的领袖是一位清教徒，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他于 1644 年在马斯顿荒原(Marston Moor) 取得了一场关键性

战役的胜利。议会军队重组为新模范军(New Model Army),并以在宗教和政治上的激进分子为补充者,成为对抗保王党的圆颅党(来自于他们的短平头)。在1645年的纳斯比(Naseby)战役中,新模范军大获全胜,绝望中的查理向苏格兰军队寻求庇护,而苏格兰人将其转交给了英国议会,作为回报,他们得到了40万英镑的欠款。

当时出现的情形将会在1792年的法国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重演,只是时空不同而已。开始这场革命和控制长期议会的温和派面临控制新模范军的更为激进派别的对抗。在宗教方面,温和派是长老会教徒或国教低教会派教徒,他们寻求保留某种教会的教规和仪式;在政治方面,他们是君主立宪主义者。激进派是独立派教徒或公理会教徒,他们反对教会受到中央组织的规制,他们已经对查理失去任何信任,所以,正在考虑一个采用共和政体的英格兰。这种局势由于长老会的苏格兰教徒将圆颅党视为宗教无政府主义者而进一步复杂化。

在1645年之后的几年中,充满了令人厌烦的谈判,期间,查理等到时机获得了苏格兰人的帮助。在1648年,克伦威尔在普雷斯顿打败了入侵的苏格兰人,他的军队抓住了国王。议会仍旧掌握在温和派的手中,它那时拒绝做军队想要做的事情,即废黜查理。于是,圆颅党领袖命令陆军上校托马斯·普赖德(Thomas Pride,卒于1658年)用武力将96名长老会议员清除出下院。上校在1648年12月所做的这一切,无任何合法性借口。在"普赖德清洗"(Pride's Purge)之后,长期议会原500多名议员,仅有约60名的激进派留了下来,这个残余物因此被称为残余议会(the Rump Parliament)。残余议会在激进派特设的高级法院对查理做出审判,其中59人判他死刑。在1649年1

月 30 日，查理被斩首。直到最后，他还坚持：国王不受世间任何上级司法权所审判，他的理由是英格兰人民的理由，如果他被压制而沉默，所有其他人也将这样。欧洲的君主们如今有了一位殉道者，在许多英格兰人的眼中，议会为一个明显的非法举动所玷污。

4. 克伦威尔和空位期(1649—1660)

之后的 11 年被称为空位期，即两位君主统治的间隔期。英格兰当时是一个共和国，处在一个被认为是联邦的政府的统治之下。激进派不敢召集一次几乎必定与他们不利的自由选举，残余议会继续存在着。所以，从一开始，联邦就是一个通过新模范军的严密组织而上台的激进少数派的独裁。也是从一开始，克伦威尔就凌驾于新政府之上。虽然克伦威尔是一个在宗教上热切而真诚的独立派教徒，一个爱国的英格兰人，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一个顽固的人，一个即使一时为权力而疯狂也决不愿妥协的人，但他也是一个被他的地位所监禁的囚徒。

克伦威尔面对着一个分裂的英格兰，在那里，大多数人在内心里都是保王党的，他们必定厌恶战斗、资产充公和过去十年中令人感到混乱的无休止的变动。克伦威尔还面对着一个敌对的苏格兰和一个甚至更加敌对的爱尔兰，在那里，英格兰的无序状态已经促成了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在 1649 年的又一次叛乱。在 1650 年，被杀害的查理一世的长子查理二世到达苏格兰，他接受了盟约(由此将长老会信仰确立为既定苏格兰教会的信仰)，率领一支苏格兰军队来对抗英军。英军再一次证明自己是不可战胜的，年轻的查理化装出逃，避难于欧洲大陆。克伦威尔接下



奥利弗·克伦威尔总是被刻画成严厉而勇于献身之人,他专注于未来。这幅画像由罗勃·哈钦森(Rober Hutchinson)所绘,之前塞缪尔·库珀(Samuel Cooper,1609—1672)也曾给克伦威尔绘制了一幅画像。哈钦森擅长于联邦和复辟时期人物的小型画像,这幅画像完全聚焦于头部,省去了背景或分散注意力的细节,借此强调了克伦威尔的力量感。(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来面临着与荷兰的一场战争(1652—1654),战争由1651年的《航海条例》(*the Navigation Act*)所引发,《条例》规定除非使用英国船只,或者生产输入货物的国家的船只,否则,禁止向英格兰和殖民地输入货物,因此打击了荷兰的转口贸易。



到 1651 年,下院被刻在共和国所使用的英格兰国玺上,这是克伦威尔给予议会以象征意义的证据。这个场景是荷兰人再现 1653 年克伦威尔解散议会的表演。猫头鹰和看起来像狗的小狮子意指对争论和解散的讽刺性评论。(New York Public Library Picture Collection)

克伦威尔及时征服了几乎所有的敌人。他亲临爱尔兰,以极端血腥的方式镇压了那里的反叛。他以所谓的克伦威尔式和解(1652—1654),逐出了倾向于新教徒的反叛的爱尔兰土地拥有者,获得了爱尔兰的秩序,但没有实现和平。在 1654 年,他胜利结束了同荷兰的海战。之后,克伦威尔还发动了一次对西班牙人的侵略战争(1656—1658),从西班牙手中得到了加勒比海地区盛产蔗糖的牙买加岛。不列颠帝国甚至在困难的时期,仍旧在

扩大。

然而,克伦威尔无法控制残余议会,议会对他所提出的增加成员和改革程序的建议表示漠视。1653年4月,他带着一群士兵出现在议会,迫使议会解散。在11月,他走出决定性的一步,开始了保护国的政体形式,自己成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主,制定了一部不列颠曾经拥有的唯一一部成文宪法:《政府约法》(*the Instrument of Government*)。它规定设立拥有460名议员的一院制议会,因为没有保王党人敢于投票,所以,议员只能由清教的支持者们选出。虽然如此,护国主与他的议会之间还是麻烦不断,1657年克伦威尔迫于压力做出让步,修改了《约法》,在议会中设立了第二个院,对护国主的权力作出了限制。同时,为了维持秩序,克伦威尔将国家分成12个军区,每个军区由一名少将指挥。

奥利弗·克伦威尔在1658年去世,他儿子理查德(Richard)继承了护国主之位。军队不久就夺取了控制权,其中的一些领导者将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视为结束长期政治动荡的最好方式。为了确保行动的合法性,保护国在苏格兰的军事指挥官乔治·蒙克(George Monck,1608—1670)将军召回了残余议会,并重新接纳被普赖德清洗所逐出的幸存的议员。这个部分重建的长期议会制定了复辟的正式程序,1660年查理·斯图亚特接到一份邀请,结束荷兰的流亡生活回到英格兰,作为查理二世进行统治。

5. 对革命的回顾

在17世纪50年代早期的清教徒统治的鼎盛时期,一些清

教徒曾设法将他们理想中的简朴生活强加于所有人。这种强制采用了“蓝法”(blue laws)形式:禁止赛马、赌博、斗鸡、逗熊、在草地上跳舞、化装舞会、戏剧演出和许多日常的普通娱乐。然而,这种给道德立法的尝试,对于现代的宣传技巧和统治技巧来说来得太早,并未完全发挥作用。尽管被正式地“抢劫了”(指被剥夺了生活的方式),许多国教教士还是继续在私人住所中做礼拜,许多斗鸡活动也在隐蔽的场所继续着。可是,严厉的法规就放在那里,坚定不移的人在努力地执行它,无法和解的敌对者在反抗它。

不列颠在1640—1660年间所发生的事件,在西方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君主第一次受到了政治上积极的个体公民所发起的大规模反抗的挑战。尽管斯图亚特王朝最终复辟了,但没有一位国王能够再希望无议会的统治,或者恢复星法院,或者收取造船费、善行款和其他有争议的税款。因此,在一个有限君主制中,议会保留了立法机构的重要武器,通过定期的征税审批,控制公共资金。

另一种基本自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种英国经验。言论自由是清教徒的一个基本信条,尽管在其权力鼎盛期清教徒自身没有遵守它。诗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于1644年在他的《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中,对此项自由作出了经典表述。虽然弥尔顿主要是为知识和道德精英而捍卫自由言论,但他的论点之一却具有务实和英国式的特点,即抑制自由表达的尝试是不会成功的。

大动乱时期的前几年,多卷本文学小册子是自由言论在实践上的生动表现。激进少数派的意外出现预示了现代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一种这样的群体,平均主义者,在革命的军队中

史海钩沉

奥利弗·克伦威尔

甚至在今天，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性格仍是许多辩论的主题。通过对克伦威尔的动机、行为和政策的评价，多少可以形成一些对英国内战的看法。今天他的支持者和诽谤者与克伦威尔时期的那些人一样，坚定地忠于各自立场，在大不列颠尤为如此，那里甚至现在还在争论君主的角色。一些评论者以为克伦威尔作为护国主，只是取代了国王，其他人则认为他从根本上改变了英格兰，尽管最终君主制复辟了。最有趣的评论之一来自于他的同时代人，诗人（也是克伦威尔政府的官员）约翰·弥尔顿。1654年，弥尔顿在《再为英国人民声辩》(*Second Defense of the People of England*)中，写下了为克伦威尔所进行的最具影响的辩护之一，标题为：《因为你，我们国家才得到自由》：

整个大英帝国的版图都是**克伦威尔**功绩的场景和他胜利的舞台……他像人们曾做过那样，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征募了数量庞大、装备精良的军队；这支军队对他的命令忠贞不渝，受到市民的爱戴；这支军队在战场上令敌人畏惧，但对放下武器的人从不残暴；这支军队从不非法劫掠人或者居民的财物。在将他们的行为与保王党人的骚动、放纵、不敬和不忠相对比时，人们倾向于称他们为朋友，把他们视为客人。他们给善带来援助，给恶带来恐惧，他们是施行美德与虔诚的最热情的拥护者。

但是，当你看到**管理王国**的事务被巧妙地拖延，每一个人都更专注于自己的私利，而不是公共利益，看到人们抱怨所经历的失望，抱怨被虚妄的诺言所欺骗，看到他们是为少数专横之

人所蒙骗的人,你就不会再受他们的支配。

当我们被孤寂所笼罩时,你,奥·克伦威尔独自坚持领导着政府,挽救了国家。我们中的极少数人,他们极欲获得他们没有能力承受的荣耀,嫉妒那些被授予荣耀的比他们更杰出的人,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最令上帝愉快、最为理性的赞同、最具政治正义,或者最具广泛好处的事情,就是最高权力应被赋予最适合和最英明的人,而除了这些人,我们所有人都情愿将统治权的棕榈叶让与你至高无上的能力和美德。奥·克伦威尔,你是众望所归……

但是,如果你,迄今已经是自由的保护者和守护神;如果你,在正义、虔诚和美德上,不为任何人所超越,你就应该侵犯你所捍卫的自由,你的行为必须是极其有效的,不仅会违反自由的目的,也会违反一般意义上的虔诚和美德。你的正直和美德将似乎消失,你对宗教的信仰将似乎成为次要的,你留给后人的人格将变得无关紧要,这样才能够平息一场危害人类幸福的最具破坏性的风暴。*

* As reprinted in Perry M. Rogers, ed., *Aspect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Problems and Sources in History*, 2n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92), II, pp. 32—33.

找到许多同情者,他们提出了一套规划,后来由移民带到了美洲殖民地。他们倡导政治民主、普选权、定期召开的议会、累进税、政教分离和保护个人免遭任意逮捕。其中甚至还有少量经济平等的内容,那时这是一个与《圣经》的思想紧密相连的目标。例如,掘地派就是一个鼓吹在一种共产主义的模式下来分享俗世

物品的小教派。为了进行社会改革,他们提倡耕种遍及英格兰的公地和荒地,而不管土地的所有权。喧骚派教徒(Ranter)攻击"可敬"的信条,认为原罪几乎是不存在的,行为上的革新将消除来自于贵族和乡绅的压迫。第五王国派、千年论者和一些其他的激进派鼓吹基督再临(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和在人世间实现乌托邦。

更加重要的是,从英国革命中产生了宗教宽容的观念,它甚至比欧洲大陆宗教战争中出现的这种观念还要清晰。独立派,当他们是反对派的时候,坚决支持宗教团体有依自己意愿礼拜上帝的权利。虽然在短暂的掌权期间,独立派表现出擅于使用迫害手段,但他们的执政从未牢固得足以将英格兰变成17世纪的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的日内瓦城。至少有一个派别,由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1624—1691)所领导的贵格会,认为宗教宽容的思想和实践是一种积极的善。贵格会谴责世俗世界所有的虚假外表,甚至认为纽扣都是一种虚饰。他们发现:表示时间的日(days)和月(months)的名称是粗鄙的异教徒的玩意,单数"你"(you)的敬称是一种社会伪善,进行法律宣誓是无信仰的。所以,他们称集会礼拜的时间是第一日,而不是称为太阳神的日子;他们称彼此为"汝"(thee)或"尔"(thou);他们对信徒依据新教教义所拥有的教士身份看得非常重要,以致他们取消了正式牧师的职位。在教友派(the Religious Society of Friends)中,正如为人们所熟知的,任何体验到精神感动的礼拜者都可以表白,即其他教派所说的布道。教友派尤为深刻地感到,不可能以自己的意愿强迫任何人理解"内心之光",也因此无法迫使人们接受他们的信仰。他们愿完全禁绝武力,特别是战争,他们愿以基督教的和平方式走自己的路。

在贵格会中，妇女的宗教权利达到了新的高度，由于男人在伊甸国的堕落，妇女沦为男人的附属物，但妇女的屈从命运随着救世主的牺牲而终结。任何教友都可以发言和预言。福克斯宣称妇女是牧师，基督是男性和女性的合体。因此，妇女在贵格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 1671 年，妇女开始主持妇女大会，这使她们可以分享对教会的管理。内战中的各派都给予妇女以重要的角色，即使还不是平等的角色，挑战了排斥妇女担当教会职务的正统论点。各教派经常将注意力集中在家庭和家庭伦理及道德作用上。当把这些想法同宗教宽容的传播联系起来时，就导致了对父权思想的某种削弱和对母权可能统治的领域的界定。

6. 复辟(1660—1688)

1660 年的复辟保留了在本质上具有最高权威的议会，但却试图消除某些革命的成果。尽管英国国教不再是苏格兰的国教，但在英格兰和爱尔兰却得到恢复。不接受恢复的英格兰教会的新教教徒被称做不信奉国教者。尽管他们受到了许多法律上的限制，不信奉国教者的数量仍旧很多，特别是在技工和中产阶级的商人中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变得强大起来，非国教教徒的良知成为英国公共生活中的主要因素。的确，在三个世纪的时间内，这些非国教的新教教徒称谓的发展显示了他们地位的提升：具有敌意的称呼"反对者"(dissenter)变为 19 世纪的"不顺从者"(nonconformist)，到 20 世纪的"自由教士"(free churchman)。

复辟同样是一次针对清教徒生活方式的剧变。查理二世(1660—1685 年在位)的统治时期以道德的松弛、活跃的宫廷生

活、粗俗风趣的复辟闹剧和至少是上层阶级对享乐的公开追求为特征。

但是,新的斯图亚特王朝在公共关系方面并不像都铎王朝时期那样老练。由于奉行一种对于爱国的英国人来说过于屈从于路易十四的外交政策,查理二世几乎耗尽了人们对他的亲善储备,而他正是因为这种善意而开始其政权的。然而,在 1670 年,查理与路易的联盟的确消除了荷兰对于英国海军力量的任何威胁,从而巩固了英国一个重要的获得物,即在 1666 年到 1667 年英荷战争(the Anglo-Dutch War)中首次获得的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也就是现在的纽约。

真正破坏了后来的斯图亚特王朝和证明了它的政治无能的事情是天主教问题。查理二世已经通过他的法国母亲受到了天主教的影响,也许在 1685 年去世之前,他已经成为一名天主教徒。因为他没有留下任何合法的子女,王位被传于他的弟弟詹姆斯二世(1685—1688),当时他已是一个公开的天主教徒。

为了使不信奉国教者支持对天主教徒的宽容,詹姆斯二世在 1687 年发布了《宽赦宣言》(*Declaration of Indulgence*),将礼拜自由给予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所有教派。虽然,在理论上,这是朝向完全宗教自由所迈出的令人钦佩的一步,但对于大多数的英国人来说,天主教似乎仍旧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对教皇制度以及西班牙与法兰西这样的天主教国家的忧虑,总是可能将他们的情绪激发到不理性的顶点。实际上,到 17 世纪末,大多数仅存的英国天主教徒乐于接受不信奉国教者的身份,他们对于一个新教徒占压倒性优势的国家没有真正的危险。然而,在爱尔兰,天主教徒仍旧是无法压制的大多数,爱尔兰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威胁。

文献记载

布莱克斯通论法律

到18世纪，英国人认识到一部独一无二的宪法已自内战时期逐渐发展出来。这部基本上不成文的、植根于习惯法的宪法促成了一段非凡的政治稳定期。在1765年，一位英国法理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1723—1780)，对英国的法律准备了一套冗长的评论，在评论中，根据制衡理论描述了为英国革命所显著推进的法律进程：

这里的确是英国政府真正的优点所在，其所有的部分都在彼此之间形成了相互的制约。在立法机构中，人民是对贵族的一种制约，贵族是对人民的一种制约，相互之间都拥有特权拒绝另一方所决议之事。而国王是对双方的制约，保护执行权免受侵占。同时这个执行权由于两院的存在，又被制约和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因为两院拥有特权调查、控告和惩罚国王的邪恶顾问的行为(这些行为实际上不是国王的行为，它们虽然对公众更有利，但破坏了国王在宪法上的独立地位)。因此，我们国内政治组织的每个分支同其他部分一起构成了支持与被支持，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就像力学中三种截然不同的动力，他们一起朝着一个方向来推动政府这部机器，这个方向不同于任何一个动力想要独自推动的方向……这个方向构成了自由的真正路线和共同体的幸福。

William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15th ed. (London: A. Stralan, 1809), I,153.

这时的政治形势非常像查理一世统治时期的形势:国王有一个目标,议会则有另一个目标。尽管詹姆斯二世没有试图解散议会或逮捕议员,但是,他通过发布一些基于他所谓的"豁免权"的法令而凌驾于议会之上。在统治初期,他就以查理二世的私生子蒙默思郡公爵的一次小叛乱为借口,实施两个恐吓政策。第一,他的法官惩罚了可疑的叛乱支持者,其严酷的方式似乎超出了避免叛乱蔓延的程度。第二,他建立了一支3万人的常备军,部分驻扎在伦敦附近,看上去有威胁首都的企图。对于同一时代的人来说,詹姆斯似乎正在策划将天主教和神权君主制强加于不情愿的英格兰。

7. 光荣革命及其后果(1688—1714)

结果是爆发了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这次军事政变最初由一群詹姆斯的议会反对派所发动,他们被称为辉格党人,与倾向于至少支持后期斯图亚王朝某些政策的托利党人相对立。辉格党人是长期议会中温和派的后继者,他们代表了大贵族与富足的伦敦商人的联盟。

詹姆斯二世有两次婚姻。在第一次婚姻中,他有两个女儿,她们是玛丽和安妮,两个人都是新教徒,玛丽嫁给了路易十四的荷兰反对者奥兰治的威廉。在1688年,詹姆斯的信奉天主教的第二任妻子为其生了一个儿子,这样,王位显然要传于信奉天主教的继承人。辉格党领袖以宣传活动作出反应,包括制造谣言说王后从未怀孕,一个婴儿被放在温暖的盘子内送进她的房间,才会有了一个天主教的继承人。然后,辉格党人和一些托利党人与奥兰治的威廉(也就是威廉三世,荷兰和里兰的总督)达成

协议，后者很难拒绝一个在他与路易十四进行争斗之时能够为其带来雄厚的英格兰权力资产的提议。威廉接受了继任王位的邀请，他将和他的妻子分享这个王位，这对夫妇在位时被称作威廉三世(1689—1702 年在位)和玛丽二世(1689—1694 年在位)。在 1688 年 11 月 5 日，威廉率领约 1.4 万名士兵在德文郡海岸的托培登陆。詹姆斯听说这个消息之后，设法在国家的西南部召集拥护者，但是，所有地方的大贵族，甚至一般的保守派乡绅，都站在了新教继位者一边。詹姆斯于 1688 年 11 月从英格兰逃到法兰西，使威廉获得了一个几乎没有流血的胜利。

在 1689 年初，议会(在技术上是一个惯例，因为没有君主来召集)正式将王位献给威廉。随后，颁布了《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这份文件总结了议会自 1628 年《权利请愿书》以来一直在探索的宪法实践，实际上，它几乎是一部简略的成文宪法。它提出了议会至上的一些实质原则：对财力的控制，对王室豁免权的禁止，议会的经常召开。

在 1689 年后，英格兰逐步向议会民主制国家转化，国王集中表现为纯粹的忠诚爱国的象征性的中心，对于这种转变，有三个主要的步骤是必要的。它们是：第一，18 世纪到 19 世纪初期，在议会中实现了多数党委员会的执行管理的集中化，也就是说，形成了一个由首相领导的内阁；第二，19 世纪到 20 世纪，确立了普选权，对下院议员给予报酬；第三，20 世纪早期，废除了上院否决或严重阻碍下院通过的法律的权力。所以，在 1689 年距离民主制仍旧有很长的一段路，威廉和玛丽是实际的统治者，拥有控制政策的权力。

由于没有子女，玛丽的妹妹安妮(1702—1714 年在位)继承了他们的王位，他们的子女不是生下来已经死了，就是在孩童时

期夭折了。然而,流亡在外信奉天主教的斯图亚特王室在这方面却要好一些,詹姆斯二世于1688年得的小儿子在巴黎近郊接受培养,长大后成为有名的"老僭君"(Old Pretender)。在1701年,议会通过了《王位继承法》(*Act of Settlement*),由于安妮没有继承人,生病的威廉三世也没有推定的继承人,《王位继承法》决定不将王位授予天主教的王位觊觎者,而授予信奉新教的汉诺威的索菲亚或者她的后嗣。索菲亚是詹姆斯一世的孙女和帕拉廷的腓特烈的女儿,后者是三十年战争中波希米亚的"冬季之王"(Winter King)。1714年安妮死后,王位传于索菲亚之子乔治,他是汉诺威家族的第一位国王。这次王位授予表明,英格兰的国王由议会来安排,而不是由神命的最年长的直系男性来继任。

为了确保汉诺威人可以同时继承斯图亚特王室统治的苏格兰和英格兰王国,这两个部分在1707年被正式合并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苏格兰放弃了自己的议会,派代表进入设在威斯敏斯特的联合王国议会。尽管联合王国受到英国人和苏格兰人的一些反对,但是,总体上进行的还算顺利,而这时新教徒最担忧的就是信奉天主教的斯图亚特王朝会东山再起。

然而,光荣革命并没有解决另一个长期的问题,爱尔兰。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起来支持流亡的詹姆斯二世,但在1690年的博恩战役中被镇压下去,这场战役直到今天仍旧为信奉新教的爱尔兰人所纪念。之后,威廉试图温和地对待爱尔兰,但是,新教徒不久便迫使他回到克伦威尔式的政策上来。尽管天主教的礼拜仪式没有被实际地禁止,但许多难堪的限制都被强加到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身上,包括禁止天主教学校的存在。而且,因为爱尔兰的贸易处于严格的重商主义规则之下,宗教迫害中也

加入了经济迫害。这就是当时的爱尔兰，它的深重苦难激发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提出了一个具有讽刺性的“小建议”，即建议贫困的爱尔兰人将他们的孩子作为各种商品卖掉。斯威夫特残忍的建议突出了这时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的贫困。今天的人们很难知道宗派战争究竟具有多大的破坏性：在 1641 年，一定有 6 万名统一党党员和阿尔斯特的新教徒为天主教徒所屠杀(尽管新教徒在那时坚持和非常相信有 20 万名以上的受害者)。克伦威尔自己的总医师估计在 1641 年到 1652 年双方死亡了 61.6 万人。到 17 世纪 90 年代，新教徒的数量从人口的 5%增加到 20%，在那时占有 85%的土地。到了 18 世纪，爱尔兰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的、矛盾丛生的英国殖民地。

英国的经验有力地抑制了欧洲所有主要国家的绝对主义。尽管英国君主继续发挥着相当大的政治影响，但是，没有议会的支持，君主不能发挥作用。作为结果，英国贵族可以重新获得他们在都铎王朝时期失去的一些权力。的确，议会至上地位的确立使贵族的权力制度化，直到 19 世纪末期民主制的来临。结果不是产生了更小的民族国家，而是产生了更大的民族国家。在威廉与玛丽以及安妮的统治时期，英格兰同法兰西进了两次战争，为英国贵族扩张保护势力提供了理想的机会。在 18 世纪时期，对富人福利做出分配的方法因为两党制的发展变得更加规则化了。在英格兰每人承担的税负要比在法兰西更沉重一些，英格兰银行的建立将国家的借贷能力组织起来，为进一步扩大政府支出提供了一种相对廉价和有效的方式。增长的经济和刚刚确立的政治稳定使英格兰能够对欧洲事务施以前所未有的影响。

三、天才的世纪与常人的世纪

在 17 世纪,欧洲的文化霸权,也包括政治霸权,从意大利和西班牙转移到荷兰、法兰西和英格兰。特别是在文学上,通过高乃依(Corneille)、拉辛(Racine)、莫里哀(Molière)、波舒哀(Bossuet)和其他一些人,伟大世纪时期的法国将自己的古典风格铭刻在了西方的历史上。然而,那些对现代文化施以最为巨大影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并不都是法国人。他们的争论表现在政治和经济构想当中,这些构想证明或抨击了这个时期的传统智慧。在知识进取的所有领域,17 世纪见证了这样一个非凡的繁荣时期,历史学家称之为"天才的世纪"。

1. 进步和悲观主义

在整个西方的受教育者的头脑中,科学家和理性主义者极大地促进了两种互补观念的形成,这两种观念将构成 18 世纪启蒙运动的基石:第一个是"自然"秩序观念,解释了日常缺乏思考之人所感觉到的宇宙的无序与混乱;第二个是人类的能力观念,最适合被称做理性观念,它在大多数人那里是模糊的,但是,通过良好的(合理的)理解力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这两个观念至少都可以在回溯到古希腊的某种西方传统形式中找到。它们之所以在 17 世纪末表现得新奇和有力,在于它们正被整合成为进步论,这种学说相信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俗世的幸福与完满状态,而这种状态到那时为止通常被认为只有在蒙受恩典并死后进入天堂的情形下才可能实现。

不是 17 世纪所有伟大的头脑都持有这种对进步和理性无谬误的乐观主义信念。例如，通过对在英国革命中出版的两部政治学著作进行对比，可以明显看到这个天才世纪遗产的多面性，这两部著作是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Leviathan*)和约翰·洛克的《政府论下篇》(*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利维坦》出版于 1651 年，深受英国内战所造成的社会无序的影响，沉浸在马基雅维利关于人类固有罪孽的悲观主义之中。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即人类无政府的生活状态，是一种战争状态，在那里，人们彼此掠夺，人类的生命是“孤独的、可怜的、污秽的、粗野的和短暂的”。人们唯一可以求助的就是在他们之间达成协议而同意绝对服从利维坦——一个将和平强加于人类的全能国家。

霍布斯(1588—1679)通过让人们同意放弃他们的所有自由，从上到下完全颠倒了关于政府的契约理论；洛克(1632—1704)则再次将契约论正确地颠倒过来。洛克同领导光荣革命的辉格党领袖是关系密切的志同道合者。《政府论下篇》作为对他们行为的辩护在 1690 年出版，洛克在其中描绘了一幅普遍乐观的自然状态画面，在这里只是由于缺少一个公平的司法权威而产生不便。为了获得这样一个权威，人们之间订立契约接受一个尊重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政府，而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利维坦，如果一个国王通过强加未经授权的税收来夺取财产，那么，他的臣民推翻他们的君主就是正当的。洛克的相对乐观主义和对立宪政府的热情滋养了下个世纪的主流政治思潮，他的思想被整合进一些北美殖民地的原则之中。这些思想在美国和法国革命中达到顶峰。但是，1789 年之后的事件使霍布斯式的悲观和权威主义再次浮出水面。



这是霍布斯《利维坦》书名页上的插图。尽管它展现了对国家具有绝对控制权的统治者,但是,他的身体象征性地由所有个人组成。这些个人的自我利益的实现,来自于他们对为了共同福利而接受国家集体统治的同意。所有人都注视着他,每个人都失去了个体性,但是,民众却由单独的个体所构成。这张书名页被认为是一个杰作,仅凭一张插图就概括了一个哲学家的观点。《约伯书》中的拉丁文引语解释为:"世上无与伦比。"(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Yale University)

同时,较古老的基督教传统的代表者仍旧活跃在欧洲大陆。一个例子就是布莱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他集天才世纪的复杂性于一身。由于在空气压力和真空领域中的研究,以及在实践方面发明了计算的机器和创设了巴黎的第一

条马车(horse-drawn)公交路线，他在数学和物理学的历史上赢得了重要的位置。然而，他也极为专注于精神世界而成为高傲的清教徒式的詹森主义者的代言人，他利用自己的技能和热诚来捍卫这种教义。他认为把上帝仅仅当作高明的几何学家和机械师是毫无价值的，他所寻找的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和《旧约》的先知。他拥护慈善行为，特别是那些有钱和有地位的人的慈善行为，因为上帝无限的爱使他们有义务照看贫弱者。1654 年 11 月的一个晚上，他经历了一次重大的神秘体验，确定无疑地感觉到上帝和基督的存在。他将生命的最后几年用在了宗教的沉思冥想之中。在 1670 年出版的遗著《默想录》(*Pensées* 或 *Thoughts*)中，他提到了在信仰和科学之间可能的冲突，提出生命是一种偏爱信仰的赌博：如果上帝存在，信者赢得永生；如果上帝不存在，信者也不比不信者情况更差。

另一个例子是这个世纪最具争议的思想家巴鲁克·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1632—1677)，他是阿姆斯特丹犹太商人的儿子。斯宾诺莎努力调和科学的上帝和《圣经》的上帝。他构建了一套伦理原则体系，其严格的笛卡尔式的特点和逻辑性，犹如一系列的数学命题。通过宣称上帝存在于所有地方和所有事物之中，他也设法将笛卡尔认为相互对立的物质和意志、身体和灵魂重新统一起来。他的泛神论受到荷兰犹太教徒(他的同一民族)和基督徒的反对而使他遭到驱逐，他们认为他是一个无神论者，而他对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拒绝也冒犯了知识分子。赞美斯宾诺莎人的很少，直到一个世纪之后发生了浪漫主义对启蒙运动的抽象化概念和过度简单化的反抗，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2. 文学

就如同亨利四世、黎塞留和路易十四给经历了16世纪内战和宗教混乱的法国政治带来了伟大秩序一样,17世纪的作家给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天才——如拉伯雷(Rabelais)——的放纵的法国文风带来了高贵的修养。这是一个古典主义的时代,坚持遵从细致的规则,坚持经典的古老范式的权威,坚持使用更加文雅、程式化的词汇。17世纪初,在举止和言谈上更加文雅的范例来自于一个交际圈,这个交际圈在巴黎一个贵族女主人朗布耶(Rambouillet,1588—1665)侯爵夫人举办的**沙龙**中来聚会。后来,得体的行为通过凡尔赛宫的宫廷礼仪规定下来,得体的词汇由一本杰出的法国语言字典规定下来,这本字典由黎塞留所创立的学院的专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劳动,在17世纪90年代汇编而成。那时的首席文学评论家尼古拉斯·波瓦洛(Nicholas Boileau,1636—1711)用他的笛卡尔式的意见为诗的写作设定了规则,"如果你希望写得好,就要思考好。"夸张性的得体观念将"吐痰"和"呕吐"一类词语的法语对应词排除于文雅用法之外,迫使作者寻找委婉的说法来表示许多普通的行动。的确,我们对于哪类词是粗俗或污秽的许多观念都来自于这个时期,尽管后来在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过分拘谨和上流阶层对"雅致"的关注加强了这些观念。在宫廷的古典法语言谈与普通法国人较简单、粗糙的语言之间所存在的巨大鸿沟中,已经出现了导致1789年革命的社会分裂。

文献记载

论宗教宽容

在其1689年到1693年所写作的《论宗教宽容书简》中，约翰·洛克论述了教会与国家相分离的问题。

对于那些在宗教问题上持有异见的人实行宽容，这与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人类的理智本来完全一致，有些人对于如此透彻精辟的见解，竟如此愚盲，无视它的必要性和优越性，真是令人吃惊。这里，我不愿对一些人的傲慢和野心，或另一些人的偏激和狂热多作指摘。这些也许是人类难以完全避免的过错。然而，有些人虽然在反常情绪的支配下干下了这些劣迹，却没有一个人不想用虚伪的色彩把自己掩饰起来，骗取别人的赞许，免于承担罪责。但是，为了使一些人不得以关心公众福利和维护法律为名来掩饰其反基督教的残忍和迫害他人的真意；为了使另一些人也不得以宗教的名义为其自由主义和放荡行为寻求赦免——一句话，为了使谁都不得以效忠于君王或竭诚礼拜上帝为幌子，欺骗自己，或欺骗他人。我以为下述这点是高于一切的，即必须严格区分公民政府的事务与宗教事务，并正确规定二者之间的界限。如果做不到这点，那么那种经常性的争端，即以那些关心或至少是自认为关心人的灵魂的人为一方，和以那些关心国家利益的人为另一方的双方争端，便不可能告一结束。

在我看来，国家是由人们组成的一个社会，人们组成这个社会仅仅是为了谋求、维护和增进公民们自己的利益。

所谓公民利益，我指的是生命、自由、健康和疾病以及对诸如金钱、土地、房屋、家具等外在物的占有权。

官长的职责是：公正无私地行使平等的法律，总体上保护

所有的人并具体地保护每一个公民属于今生的对这些东西的所有权。如果有谁敢于违犯旨在维护上述所有权的、公正和平等的法律,其不法企图将会因为慑于惩罚而受到限制。惩罚包括剥夺或限制他的公民权利或财产,亦即在正常情况下,他原本可以而且应当享受的那些权益。但是,鉴于任何人都不愿遭受被剥夺其任何一部分财产的惩罚,更不愿意丧失自由和生命,所以官长是以他的全体臣民的力量为后盾,去惩罚那些侵犯任何他人权利的人。

既然官长的全部权力仅限于上述公民事务,而且其全部民事的权力、权利和辖制权仅限于关怀与增进这些公民权利,它不能也不应当以任何方式扩及灵魂拯救。因此,我以为下述各点理由是可以充分确证的。

首先,谁也没有责成官长比他人更多地来掌管灵魂的事。我可以用上帝的名义说,并未授予他这种权力。因为看来上帝从未把一个人高于另一个人的权威赐予任何人,致使他有权强迫任何人笃信他的宗教。也不能说人民赞同把这种权力交与了官长,因为谁都不会对自己的灵魂拯救弃之不问而把它盲目地交由他人来决定取舍,无论他是国王,抑或是臣民,都不能由他来决定应该遵从何种信仰和礼拜。这是因为,谁都不能使自己的信仰屈从于他人的指令,即便他想这样做也罢。真正的宗教的全部生命和动力,只在于内在的心灵里的确信,没有这种确信,信仰就不成其为信仰。不论我们表示相信什么样的信仰,遵从什么样的外部礼拜形式,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内心里不是充分确信前者为纯正的信仰,后者为上帝所喜悦,这样的表白和礼拜便毫无裨益,而且注定会成为我们灵魂拯救的巨大障碍。因为这样做,不仅没有通过礼拜赎免我们原有的罪过,反倒因为我们用看来会触犯上帝的方式去礼拜

全能之主而增添了新罪，这就是对神圣陛下伪善和蔑视之罪。

其次，掌管灵魂的事不可能属于民事官长，因为他的权力仅限于外部力量，而纯真的和救世的宗教则存在于心灵内部的信仰，舍此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为上帝所接受。悟性的本质就在于，它不可能因外力的原因而被迫去信仰任何东西。监禁、酷刑和没收财产，所有这类性质的东西都不能改变人们已经形成的关于事物的内在判断……

第三，灵魂拯救的事不可能属于官长掌管，因为即令法律和刑罚的威力能够说服和改变人的思想，却全然无助于拯救灵魂。因为真理只有一个，到天国之路只有一条。如果人们除法庭规定的宗教外别无其他可循，而又不得不放弃自己理性的启示，违背自己良心的指示，盲目地逢迎统治者的旨意，去屈从于在其出生国中或因迷信或因愚昧和野心而偶然建立起来的教会，又怎能指望把更多的人引进天国呢？在关于宗教的众说纷纭、互相矛盾的看法上，世上的君主们也像他们在世俗利益上那样，分裂为许多派，于是到天国的狭窄之路变得更难寻找了。其结果，将会只有一国走的是正道，世界其他国家的臣民，便都不得不跟着他们各自的君王走向毁灭之途了。而且，人们究竟是享受永生的幸福，还是蒙受无尽的苦难，似乎都要靠出生地来决定，这就更加荒唐和不合神意了。

虽然仍可以列举出其他一些理由来说明我们的论点，但是我以为，仅据上述理由便足以得出结论：公民政府的全部权力仅与人们的公民利益有关，并且仅限于掌管今生的事情，而与来世毫不相干。①

---

① 译文引自[英]洛克：《论宗教宽容》，吴云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译注

另一方面,17 世纪宫廷的语言标准也给文学带来了实质性的益处。如果没有那些规定,法语不会由于它的清晰和优雅而赢得独特的声誉。伟大世纪的主要悲剧作家没有使古典的语言规则本身走到末路,而是使它成为一种对人类性格的无限变化进行深入探索的方式。皮埃尔·高乃依(1606—1684)和让·拉辛(1639—1699)创作出动人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或者持有崇高的荣誉观念,或者由于无法抑制的情感而扭曲。17 世纪的法国悲剧是公元前 5 世纪希腊戏剧的杰出继承者,这不仅是因为它们的古典形式,也是因为它们强有力的修辞、复杂的结构、对心理的洞察力和清晰的表达。

作为一个喜剧作家,让·巴蒂斯特·波克兰(Jean Baptiste Poquelin),为人熟悉的名字是莫里哀(1622—1673),是那个时代另一位伟大的法国戏剧家,他很少受到高贵的词汇和古典主义规则的束缚。他的讽刺喜剧的主要特点不仅在于尖锐地反映人的性格,也尖锐地反映社会的特性,如沙龙中过分卖弄学问的女士、《伪君子》(*Tartuffe*, 1664)中的伪君子、《贵人迷》(*Le Bourgeois Gentilhomme*, 1670)中愚昧和自负的新贵。莫里哀的作品和所有好的讽刺文学一样,有很多的道德教化。说教的意味也表现在伟大世纪时期另两部典型的作品中:让·德·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 1621—1695)的《寓言集》以生动的形式改写了古代传说;德·拉罗什福柯公爵(Duc de La Rochefoucauld, 1613—1680)的《格言集》甚至更加清醒地评价了人性。“由大多数的反应来判断,爱更近于仇恨,而非友情。”“如果人们不相互欺骗,他们就无法在社会上长期融洽相处。”“一般来说,我们给予赞美,只是为了得到。”但是,拉罗什福柯也写到,“完美的气概意味着,即使无人注目,也如同全世界都在注视着

你一样去尽力行事。""伟人的名声应该总是通过他获得名声的方式来得到评价。" *

17 世纪的英国文学中也有愤世嫉俗者，著名的有威廉·威彻利(William Wycherley，约 1640—1716 年)、威廉·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1670—1729)和其他写作滑稽、淫秽、幻灭的复辟时期喜剧的剧作家。在查理二世和他的继承者的统治时期，公众品位和道德的动摇使得对世纪中期清教徒的反应发生了特别剧烈的摇摆，清教徒那时已经关闭了作为罪孽根源的剧院。作为清教徒的约翰·弥尔顿(1608—1674)，曾为国家会议秘书，在失明后创作出他的主要文学作品《失乐园》(*Paradise Lost*，1667)，这是唯一一部宏大的英国史诗，至今仍旧吸引着许多读者。尽管弥尔顿是一位博学的古典学者，但是，他通常的复杂风格和对基督教人文主义的深刻信念使他成为早期文学时代一位迟来的代表者，英国文艺复兴的最后一位伟大作家。

为迎接英国文学规范时代的到来，需要使英国语言现代化，消减细致的华丽辞藻，规范混乱的拼写和消除伊丽莎白时期和 17 世纪初散文的冗长的修辞特性。在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的影响下，英国开始效仿法国，采用一种简单明了的文字顺序、相对简短的句子，以及法国学派的精炼、简洁和清晰。英国文学正在进入持续到 18 世纪上半段之后的"奥古斯都时代"。

---

* *The Maxims of La Rochefoucauld*, trans. Louis Kronenberger(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9), maxims 72, 87, 146, 216, 157.

3. 巴洛克时期

“巴洛克”,这一标签通常指17世纪的艺术,也许来自葡萄牙语“barroco”,“不规则或畸形的珍珠”。一些评论家利用由畸形产生的联想来批评:17世纪的艺术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纯洁性相比是不纯洁的。特别在新教徒中间,巴洛克的声名被贬损,因为它与反宗教改革密切相关,它的许多最重要的艺术家都是罗马的宣传者。许多观察者也厌恶巴洛克式作品的华丽。

在特兰托公会议(Council of Trent)后的世纪中,巴洛克艺术同耶稣会士、西班牙菲利普二世的后继者,最重要的是同罗马有着密切的关系。天主教改革者利用这门艺术来传播信仰,对它付出极大的热情。但并非所有的巴洛克名家都是天主教徒,例如,伦勃朗(Rembrandt)是一位孟诺派教徒,克里斯托夫·雷恩(Christopher Wren)爵士是一位英国国教徒,它的所有支持者也并非都是天主教的高级教士和显贵。信奉新教的英格兰查理一世的画像给凡·戴克带来了名望和财富。在荷兰共和国,加尔文教教会不赞成任何装饰,绘画者则从商业共同体赢得支持,有时他们自己就成为事业兴旺的商人。

一些艺术家空前的高经济收入是巴洛克时期的显著特点之一。与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一类杰出者的简朴生活相比,鲁宾斯、凡·戴克和雷恩生活得像个贵族。第二个特点是巴洛克风格对于纯粹规模的强调,例如鲁宾斯的巨幅油画,广大无边的凡尔赛宫,贝尼尼设计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主祭坛上面的装饰顶篷。第三个特点是戏剧风格,绘画者强化鲜亮的幻觉,将人物置于画布的直接背景之中来吸引观看者进入这

个布景。最后一个特点是对许多不同的人性的现实主义刻画:小丑、乞丐、吉普赛人、打牌作弊者、跛子和侏儒,以及祈求、发笑和吃东西时的普通人。例如,在法兰西,乔治·德·拉图尔(Georges de La Tour,1593—1652)选取了日常生活中的主题和人们,并把它们置于能够进行强烈明暗对比的夜幕之下,如脱衣服时捉跳蚤的妇女、弹四弦琴的人和17世纪高潮时所绘的玛利亚·抹大拉虔诚地礼拜,最后这幅画描绘了抹大拉沉思时凝视着一个蜡烛的情景。

(1)绘画 最拘谨的巴洛克式画家也许是蒂埃哥·委拉斯开兹(Diego Velásquez,1599—1660),他在西班牙菲利普四世的宫廷中度过了34年。委拉斯开兹需要运用所有的技能来减弱哈布斯堡家族靠后的下巴和大嘴巴,还要使他所绘的菲利普四世和王室家族的画像能够立即为人们所辨认出来。《宫娥》(*The Maids of Honor*)是他的技艺超群的最伟大杰作。一个小公主正在被画像,宠物狗、侏儒和侍者围在左右。此时,场景中的国王和王后正在观看,但在房间后边的镜子中只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当委拉斯开兹转过来问候他们和注视着观看者的时候,后者才意识到他正站在他们必须站的地方。由于它对镜子的灵活使用,《宫娥》是巴洛克时期尝试使观看者成为一个积极参与者的杰出范例。

不像高贵的委拉斯开兹,弗兰芒人彼得·保罗·鲁宾斯(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是与文艺复兴时期博学多才之人极为相似的巴洛克时期的人物。作为外交官、语言学家、古代文物和考古学的研究者,他从他的绘画中积聚了一笔财富,聚集了令人难忘的荣耀。例如,被英格兰查理一世授予爵位和被西班牙国王提升为贵族。鲁宾斯使他的画室成为艺术工厂,



蒂埃哥·委拉斯开兹为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绘制了许多画像,但《宫娥》也许是他最著名的绘画。画里面是年仅 4 岁的马格丽特公主,穿戴着适时和适合身份的服装。她的身边有两个年轻的贵妇、宫廷小丑、一个女侏儒等人。孩子正被送上一杯冷冰冰的、有着香味的饮用水。(Erich Lessing/Art Resource, NY)

里面有200个学徒。据估计,他自己绘制了2000幅画,画旨从简单的画像到野心勃勃的政治主题。受法兰西亨利四世的遗孀玛丽·德·梅第奇的委托,他完成了一系列颂扬亨利和玛丽本人的油画。作为拥有神圣王权的君主,亨利和玛丽更多地被描绘成神话人物,而不只是凡人。

安东尼·凡·戴克(Anthony Van Dyck,1599—1641)是鲁宾斯的学生和弗兰芒同乡,他的查理一世画像抓住了斯图亚特君主不经意的高雅与自信的权威。尽管宫廷式的风格不为弗兰芒人的北方邻居尼德兰人所高度赞赏。但是,荷兰的城市守卫军官、行会理事会和荷兰其他重要的商业组织都希望给后人留下画像。荷兰的中产阶级家庭喜爱小巧的、令人愉快的绘画,更喜欢其中表现这些辛苦劳作的人们所希望拥有的悠然自得的活动的绘画。结果产生了艺术品产量的真正爆炸性增长,这与这个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内荷兰的繁荣全盛期是相符合的。随着17世纪70年代法国的闯入,荷兰的经济和艺术霸权开始衰落。

17世纪的荷兰画家为人们所羡慕,是因为他们对景物光线与颜色的精细刻画和他们对荷兰房屋内部的现实主义表现,房屋内有着非常光亮与干净的地板和强烈的明暗对比。尼德兰为人熟知的巴洛克风格的画家是弗朗斯·哈尔斯(Frans Hals,约1580—1666年)和伦勃朗·凡·里因(Rembrandt Van Rijin,1606—1669)。哈尔斯用轮廓鲜明的画法来描绘城市守卫队兴高采烈的偶然瞬间、微笑的音乐家和酒馆的醉汉。然而,在80多岁的时候,他贫困潦倒,与别人同住在一所救济院中,在这里他绘制了最为著名的巴洛克风格的群像——《哈勒姆救济院的女董事》(*The Women Regents of the Haarlem Hospital*),阴



伦勃朗利用光线和画中人物的面部表情与位置捕捉到一种心理上的真实感受。《蒂尔普教授的解剖课》是他在1632年从莱顿移居到阿姆斯特丹后所完成的第一幅订制画作,在画里,他展现了那时最主要的解剖学教授所做的示范。教授周围的那些人是外科医生行会的成员。每个人物的特点都可以被体会到,正如伦勃朗对正在发展的解剖科学的关注。(Erich Lessing/Art Resource, NY)

沉、可畏和衰老的女管事都带着加尔文教徒的严肃。伦勃朗也是在早些时候获得声誉而后滑向孤僻和贫穷;他在一系列动人的自画像中记录了自己的苦恼。他也完成了著名的群像《夜巡》(*The Night Watch*)和《布商行会的理事》(*The Syndics of the Draper's Guild*)。伦勃朗绘制了一个稀有的科学主题,《蒂尔

普教授的解剖课》(*The Anatomy Lesson of Dr. Tulp*)。在画中，一名医生正在通过一名被处决的罪犯——解剖学家可以利用的唯一一类尸体——的手臂来讲解血管和肌腱的结构。到了20世纪的时候，伦勃朗成为空前的最有声望的艺术家。

(2)建筑和生活艺术　罗马的巴洛克式建筑和城市规划最为富丽堂皇，在那里乌尔班八世(1623—1644)和其他的教皇是建造教堂、宫殿、花园、喷泉、大街和广场的发起者，他们决心使他们的首都再次成为欧洲最为盛大壮观的城市。除去米开朗基罗的圆顶，圣·彼得大教堂是一件巴洛克时期而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遗产。

在这个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路易十四统治的法兰西引领了营建学、风景园林、城镇规划和家具设计的走向，特别是在凡尔赛宫和巴黎。维也纳、慕尼黑、马德里、华沙和布拉格也成为主要的巴洛克风格的城市，尽管它们的风格有模仿意大利或法兰西城市的趋向。伟大的营建工艺有时延续两代或者更长，1630年之后的时期(被认为是巴洛克时期的高潮)以不断营造建筑物为标志，甚至在较小的城市也是如此，如维尔茨堡或德累斯顿。

在英格兰，巴洛克式的建筑风格被古典主义冲淡很多。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首席建筑师是克里斯托夫·雷恩(1632—1723)，他是一个有才能的工程师和天文学教授，在1666年伦敦城的许多地方被一场大火焚毁之后，他被委派很多的任务。特别是对于圣·保罗大教堂，雷恩仅仅在火灾前一个星期刚刚为其草拟了一个新的设计计划，凭借着他的才能，圣·保罗大教堂将各种风格融合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大火毁坏了88座教堂，雷恩监督重建了53座，在这个城市上深深地刻下了自己的烙印。

尽管在1600年到1700年之间，由于疾病和饥荒的肆虐，欧

洲一些地区的人口减少了,但在17世纪,描绘富足生活的艺术还是得到了真正的发展。欧洲的海外扩张使得欧洲国家可以获得新的咖啡饮料、茶饮料和可可饮料,还有新的棉织物以及奢侈品,如中国的瓷器和漆器。异国的热带木材被用来镶嵌和装饰家具。整体来说,家具正在变得更加专门化:吃饭用的椅子替代了长凳;椅子要么有两个把手,要么都没有——适应有裙撑的裙子;餐巾开始使用;个人用的盘子和水杯代替了共用的碗和酒杯。中等收入的家庭能够支付起这些变革,还包括茶壶、罐壶和成套的素色餐具,因此参与了一场家庭布置方面的革命。

(3)音乐　巴洛克风格的作曲家,特别是在意大利,沿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前辈所铺设的道路继续向前。在威尼斯,克劳迪奥·蒙特威尔第(Claudio Monteverdi,1567—1643)写作了第一部重要的歌剧。这部歌剧是典型的音乐与戏剧的巴洛克式混合物,受到观众极大的欢迎,以至于威尼斯不久就有了16座歌剧院,这些歌剧院将注意力集中于首席演唱家身上,而不是配唱者和管弦乐队的整体音色。明星体系在那不勒斯达到高峰,那里的音乐学校(最初是"收留"有天赋的孤儿的机构)专攻发声训练。许多那不勒斯歌剧都是被设计用来炫耀个别明星才华的松散的歌曲集。歌剧的演出有某种惯例,男人的角色由女人来演唱,一些女人的角色则由阉人歌手来演唱,后者是指为了防止青春期的影响和声音变粗在童年时便被阉割的男高音,这种惯例增强了歌剧不切实际的虚幻效果。

在英格兰,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风琴演奏者亨利·普塞尔(Henry Purcell,约1659—1695年)为一所女校的毕业典礼仪式创作了一部杰作,优美动人的《黛多与埃涅厄斯》(*Dido and Aeneas*)。路易十四欣赏舞蹈和歌剧在提升宫廷辉煌效果上的

显著价值，从意大利请来了有才华的让-巴蒂斯特·卢利(Jean-Baptiste Lully，1632—1687)。在歌剧中，卢利将法国和意大利的歌剧、舞蹈艺术和文学传统结合在一起，替代了宫廷芭蕾舞给人们带来的矫饰、华美和影响。尽管人民可能从远处羡慕宫廷的威严，但从人民的关注来看，没有哪个艺术家更具代表性，也没有哪个艺术家离人们更远，人民根本不知道其中的角色，普通人即使能够明白艺术和营建学，也知之甚少，他们不读文学，不听巴洛克时期上层社会的音乐。

4. 社会的趋向

(1)经济衰退和家庭　17 世纪时期的大部分人都陷入到似乎是没有穷尽的贫困、疾病、暴力和死亡的循环当中。绝大多数的人生活在乡村，依靠农业为生，他们没有足够的土地来维持家庭所需，所以，不得不租用土地，做佃农耕种土地，或者用部分时间为他人工作。农民面对瘟疫和天气变化是脆弱的，它们能够轻易毁坏整个地区的农作物，由此导致面包价格的上涨、普遍不幸的产生和饥饿前景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购买食物，农民经常不得不卖掉他们的土地，这是他们仅有的实际资产。这意味着，他们卖掉的不仅是家庭存在的物质基础，而且是家庭在村子中的社会身份。一旦一个家庭出卖了它的土地，就可能被迫行乞和导致家庭破裂。

农业的逐渐商业化是农作物的生产和销售逐渐依赖于市场的过程，它制造了新的危险，因为它意味着依赖于一种经常变化的可能崩溃的需求。土壤侵蚀、战争和传染病加剧了农民的苦难，税赋也同样加剧了这种状况，17 世纪时许多国家的税赋都

增加了许多倍。尽管王权在不断增长,封建领主仍旧具有对农民进行绝对统治的能力。东欧的国王授权贵族可以更自由地支配佃农,而作为回报,贵族要服务于国王,贵族便因此残酷地将农民人口变为奴隶。这个在时机成熟时将最终改善农民命运的过程——实现经济增长和治保国家(law-and-order)——也许会使农民的命运变得更好一点,而在某些领域情况也许会使其变得更坏。

从人口上来看,17 世纪表现为一种减缓的趋势。虽然欧洲总人口在 16 世纪已经增长了 2000 万,但在下一个世纪里,人口仅仅增加了 700 万,在一些国家,特别是西班牙和德国,人口急速下降。正如这个世纪面包价格下降的事实所表明的,这种相对的停滞也许不是来自于一种"马尔萨斯危机",即一种不能生产足够的食物以供给人口需要的危机情形。它更多的来自于疾病、寒冷的天气、战争、经济混乱和(令人非常感兴趣的)故意的选择。虽然人口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认为前现代家庭很少控制家庭的大小,因为直到后来避孕工具才为人所知或可以得到,但是,我们现在知道 17 世纪的欧洲家庭在面对紧缩的经济状况时的确有意设法节育。一种方法是性交中断法,在射精之前拔出,但使用频率无从知晓。毫无疑问,更重要的是相当于人口的10%到 15%的人不结婚,剩下的人都是晚婚,在晚婚的妇女中,每个人只生一个或两个孩子,这似乎降低了人口出生率。西欧人口结婚的平均年龄由 1600 年的男女双方都 20 岁刚出头上升到1700 年的男子近 30 岁、女子 25 岁左右,这个岁数对于只有少数人能够活到 50 岁的人口来说是非常高的。

推迟结婚具有更广泛的含义。首先,它意味着人们将性交推迟到相对的生命后期,正如有关事实所表明的那样,推迟结婚

并未导致私生子率有所上升。我们不清楚人们是如何处理性阻碍的，但商业性的性行为有时是有用的。然而，卖淫不能解释大多数的私生子，私生子通常来自于婚前性行为，而不是婚外性行为。另一个含义是，以两代人为核心的家庭成为正常而不是反常的现象。考虑到较晚的平均结婚年龄和较早的平均死亡年龄，大多数人都不能在活着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孙子女，这就意味着直系父母对家庭财富拥有完全的控制权。最后，限制生育的努力包含了一种在照顾子女方面改进了的态度。在这一时期可能约有 40%的子女在青春期死亡，作为对不断增加的婴儿和儿童死亡率的反应，父母将他们的稀缺资源集中在数量较少的孩子身上，设法增加维持家系繁衍的机会。

(2)性别与巫术　很难知道是何种冲突恶化了性角色的境况，这种情况在 17 世纪也许并没有大的改变。如果有的话，那就是这个时代的经济无序和其他的无序性趋向于巩固男性的统治，这种巩固在总体上是加强传统权威运动的一部分。法国历史学家已经注意到了一种“家国契约”的演变，即一种在国王和父亲之间订立的相互加强各自权威领域的隐含协议。他们一起发挥作用来制定和执行法律，这些法律以强烈的男性语言来定义主权，并增加父权对于家庭财产和子女婚配选择的控制。

我们可以在其他地方发现这种进展的证据。例如，在由著名的英国保王党人罗伯特·菲尔麦(Robert Filmer，约 1589—1653 年)写作的、以恰当的《父权制》(遗著，1680 年出版)为书名的著作中便可以找得到。以普遍被援引的王国与家庭的类比为依据，菲尔麦认为国王作为第一位父亲亚当的文字上或象征性的后代，他对臣民负有的责任与普通的父亲对家人负有的责任差不多。这种论点对于妇女的含义是清楚的。除了偶然出现的强大

的女性君主的统治,女性权力在大多数国家都被以本性脆弱和无能的观念来进行描述。那些在幕后实施权力的女性,最显著的就是王室的女主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为人们所惧怕、憎恨和贬低,因为她们越过了传统女性角色的界限。因此,路易十四的最后一个情妇德·曼特农夫人在大街上被诽谤为女巫、魔鬼和娼妓。

这种对妇女的看法在传播中并非没有受到挑战。对男人和女人相对能力的有学识的、古老的争论仍旧继续着,有一些人大声称赞女性和她们的才能。而且,尽管妇女从前更多地受到低报酬、低身份的工作的限制,并被拒绝与男人接受同等的教育,但是,就人们承认了她们的社会立场和才略来说,一些妇女的确设法规避了经济机会的限制。通过能够参与的各种活动,从助产学到写作,一种职业感在妇女中发展起来。法国教会的一项研究表明法国教会已经变得日益女性化,因为它吸收了大量的妇女在教会学校和慈善团体中工作。简言之,公然的压制遇到了通常平静,但却是坚决的反抗。

尽管肯定有其他的根源,但经济压力和妇女有争议的社会角色促使了巫术指控的出现,它是 16 和 17 世纪研究最为集中,争论最为激烈的事情之一。对治病术士和巫师神秘力量的信仰是多个世纪以来欧洲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在中世纪末期,这种大众信仰在欧洲许多地区被与更加优越的、精细的魔鬼仪式融合在一起。在宗教改革期间,巫术也变得同异教徒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越来越受到天主教阵营和新教阵营的关注,双方都在对基督教的正统看法作极其严格的规定。在选择被告人方面,经济压力的作用和对女性厌恶的增长也许是最为明显的影响因素。大约 80%被以巫术为名控告的人是女性(经常由女性指控),其中的大多数经常是来自于社会中较贫困阶层的妇女。

文献记载

给妇女的建议

到光荣革命时期，有关妻子责任的观念已经出现了许多微妙的转变，特别是在富人中间。“伴侣式婚姻”的想法已经产生，削弱了那种坚决压制妻子的看法，新教徒的言论逐渐将妻子说成是伙伴，而不是仆人。乔治·萨维尔(George Savile,1633—1695)——哈利法克斯子爵——是请求威廉和玛丽接受王位的人之一，他在1688年写了《给妇女的建议》(1700年收入合集出版)。

对你们下一步的思想有所挑战的，是如何与丈夫一起生活……

你们性别的不利之处之一是年轻的妇女很少被允许自己做出选择，她们朋友的关心和经验被认为是比她们自己的想法更可靠的指导，她们的端庄经常禁止她们拒绝父母的劝告，尽管她们内心并不完全同意。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努力使关涉其命运的情况宽松一些之外，她们什么也做不了……

你们必须首先在大体上建立一个基础，那就是，在性别上存在不平等，而且，因为世界更好的经济状况，男人——他们将是立法者——使自己具有更多的理性。以这种方式看来，对你们的性别来说，准备顺从是更好的，顺从是更好地履行那些似乎最合适地分配给女性的责任所必需的。乍看起来，这有一点无礼，但是，根据检验我们会发现大自然远不是对你们不公正，她是偏爱你们的。相对于第一次分配表面上的不公正，她已经通过其他的优势使你们获得如此大的改善——对我们(男性)抱怨的权利。你们的力量不仅能够解放自己，还能征服你们的主人，无需通过暴力而将他们的自然和法律权威置于你们的脚

下。男性与女性的性情不同,能够相互弥补缺点也许会更好一些:你们需要我们的理性来引导你们,需要我们的力量来保护你们;我们需要你们的温柔来使我们得到平静和快乐。我们生命的第一个部分是在保育室中对你们的无限依从,在那里你们的统治无人可比,由此,你们拥有给予第一印象的有利条件。后来,你们拥有更强的影响,这种影响得到很好的运用,它对你们自己所产生的威力要大于我们所有的特权和司法权施加在你们身上的力量。你们的外表比我们的法律具有更大的力量,你们的眼泪也比我们的辩论更有效果。

婚姻法对你们性别来说比较苛刻,这是事实。服从是一个无礼的词语,由于婚约文字中这样冷酷的特征,它更难以被容忍,它也非常不适于通常在其之前表述的过多的优良举止。此外,规则的普遍适用似乎是一件不平之事,使杰出的妇女不受普通规则的限制,消除反对普遍平等的错误措施的异议,似乎才是合理的……

但是,简单来说,答案就是:婚姻制度过于神圣了,它不允许有反对它的自由;对你们是较脆弱的性别的假定,毫无疑问具有一个合适的依据,而使得女性从属于男性的统治成为合理的事情;没有规则完美得不允许某些例外。但是,法律在这里假设几乎没有发现任何人享有获得特权的充分权利,以致在极少数的例子中默许一些不公正,要比破坏一部人类社会确实十分依赖的法典更安全些。

所以,你们要尽最大的努力通过法律和习惯来解决事情,而不是徒劳地想象情况会因你们的目的而改变。

As quoted in Nitti Keeble, ed., *Seventeenth-Century Woman* (London: Routledge, 1994), pp. 167—168.

巫术指控是一种可以有多种解释的复杂现象。它主要是压制离经叛道的女性,压制她们之中反抗新的束缚的那些人的一种方式吗?是较富裕的阶级管理穷人的一种机制吗?是解决和转变经济困境的一种孤注一掷的努力吗?还是对抵制异教徒控诉的势力的一种保护?最可能的是,这些要点一起在发挥着作用,正如这些指控的影响因时因地而异一样,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是如此。可以确定的是它的巨大规模:从 1580 年到 1650 年,在整个欧洲被起诉的巫术案件有 10 万件。甚至在普通法禁止刑讯逼供的英格兰也有 1000 多起巫术审讯。

巫术指控在 18 世纪早期开始减少,与此同时,对于魔鬼的注意力也在降低,如果说巫术指控产生的原因仍旧是混沌不清的话,那么,巫术指控减少的原因也是如此。法律上难于取证也许起到一定的作用,起诉异端兴趣的减少和经济困境的减轻或许也对此有所影响。另外,这个时候的欧洲精英正在培养一种使其区别于普通人的优雅的生活方式,他们采用了科学的观点,从而使他们不再相信女巫和其他超自然的现象。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这种情况的出现更多的是因为对超自然现象的相信打击了过多的大众文化,而不是由于这种信念在智识上与新科学的发现和方法不一致。甚至在精英看来,自然与超自然的界限仍旧是极其模糊的。18 世纪的上层阶级也许尊重牛顿物理学,但是,他们也沉迷于伪科学的狂热之中,比如催眠术,这种流行于沙龙中的狂热,在古怪的环境下,通过“万能流体”的输入(实际上是轻微的电击)来提供医学治疗。

(3)富人的问题　尽管经济衰退对穷人的蹂躏一定远甚于其他阶级,但是,富人也不得不通过有效的投资和成功的婚姻来谨慎地经营家族的财富。成功的婚姻通常意味着至少选择一个

拥有同等身份和财富的配偶，尽管不对称的联姻也可能是合意的，例如，贫穷的贵族使带有爵位的儿子迎娶带有丰厚财礼的商人的女儿。当然，这种考虑在最贫穷的阶级的婚姻当中是不存在的，由于不能给予爵位和财产，父母几乎无法控制他们子女对配偶的选择。至少在这一个方面，贫穷比富裕提供了更多的自由。

由于大多数家族的主要目的是永久地延续下去和一代代地积累声望和财富，得到计划中的理想数量的继承人是关键的。过少的继承者意味着一个家族会逐渐消失，这在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交错攀高的年代经常出现。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英格兰的安妮女王，她生了 17 个孩子，却没有一个存活下来。但是，过多的继承人意味着财富可能被分成许多小的份额，每个继承者所分得的财富就会减少，他或她的家族分支也会受到损害。为了避免这种可能性，一些国家，最有名的就是英格兰，实行了长子继承制，也就是说，贵族头衔和不动产只能转让给最年长的儿子。当然，这种制度也产生了如何供养年纪较小的兄弟姐妹的问题。

特别是在实行长子继承制的国家中，对于富人来说，国家作为福利的提供者变得逐渐有用起来，而在不实行这种制度的国家中，情况也是如此。陆军和海军中的委任、有报酬职位的任命、商业合同和完全的退休金在数量上随着国家的扩大而增加，因此为处于危机中的贵族家庭提供了额外的收入机会和来源。国家也提供有息借款的机会。如果这种借款不总是支付高额利息，它们通常为家族财富提供了极大的安全保障。此外，国家为穷人提供了治安。飞涨的面包价格经常激起城镇和乡村平民的暴乱，因而中断了有利可图的粮食贸易，威胁到其他私有利益。



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建于1673年到1710年，它成为19世纪许多公建的建筑模型。在这里所看到的大教堂是由乔凡尼·安东尼奥·卡纳莱托(Giovanni Antonio Canaletto,1697—1768)所绘制的图画。(Giraudon/Art Resource, NY)

尽管大多数国家制定政策的目的是使粮食价格保持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但是，当出现动荡局面的时候，他们会动用，并的确动用了可怕的武装力量平息粮食暴乱。一些法律得到通过，以便确保穷人不会在富人的地产上偷猎，如果犯罪者被抓住，威胁处以严厉的惩罚。

当从这种视角而不是从纯粹宪政的角度来看的时候，绝对主义的统治(如法兰西的统治)和非绝对主义的统治(如英格兰的统治)之间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差异。1689之后，英国议会成为国家保护富人的主要渠道，而在法兰西，法院对此是主要的管

理者。但是,在这两个国家中,国家的建立和精英家庭的建立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过往是一种异质的国家:那里人们的行事方式迥然不同。”* 对于现在的时代来说,在这一卷中概括不多的过去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异质国家。不论语言和技术所造成的距离,只是由于时间的间隔,过去的国家之间就比现代的国家之间差别更大。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于 1513 年已经在《君主论》中写道:“再没有比率先引入新的制度处理起来更加困难、指挥起来更加危险、成败更加不确定的了。”不久,随着已知历史——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于当代的理解的有记载的事件——显著加快的步伐,这种新制度的引入成为经常性的事情,甚至似乎变得平常无奇。正如 19 世纪早期的英国诗人拜伦勋爵所写:行走在过去的尘埃之上,是在感受等候于地下的地震。

四、本章小结

17 世纪是由法兰西所主宰的。在路易十三统治时期,枢机主教黎塞留创建了一个有效率的中央集权国家。他消除了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胡格诺教派,使贵族从属于国王,并使君主制绝对化。路易十四在这些功绩的基础之上开始自己的长期统治。他将首都从动荡的巴黎迁至凡尔赛,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宫殿,设立了精细的宫廷仪式,进一步限制了贵族的权力。

从凡尔赛宫,太阳王要求臣民绝对服从他,将自己看做是上帝在尘世上的代表,依靠神权来统治。在宗教上,路易十四鼓励

---

* From the twentieth-century English novelist L. P. Hartley, *The Go-Between* (London: Harnish Hamilton, 1953), P. 9.

高卢主义教派的发展。在 1685 年，他废除《南特敕令》，结束了对胡格诺教派的宗教宽容。由考伯特所实行的重商主义是法国经济政策的核心。考伯特的政策促进了对外贸易和工业的扩展。

因为希望将法兰西扩张到它的"自然边界"，路易十四实行一种侵略性的外交政策而使国家卷入众多的战争之中。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1701—1714)，英格兰、荷兰、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诸国联合阻止西班牙和法兰西的合并。乌德勒支条约维持了欧洲的力量平衡，但是，却留下了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

在英格兰，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违反了限制王权、保护个人权利的传统。他们设法进行的无议会统治使国王与议员之间的激烈冲突更加麻烦。在国内战争期间(1640—1649)，英格兰分裂为保王派和议会派。在清教领袖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指挥下，新模范军决定性地击败了国王。残余议会的激进主义者想方设法在 1649 年判处国王死刑。

在空位期间，英格兰是由奥利弗·克伦威尔和清教徒统治的共和国。他们面临着国内外的反对。1660 年，君主制复辟。但是，空位期标志着政治上积极的公民对君主的第一次成功挑战。而且，国内战争这一事件确认了一部植根于英国普通法的不成文宪法的存在。言论自由和宗教宽容的信念也出现在这个时期。

在复辟期间，议会具有至上的地位。詹姆斯二世对天主教的支持极大地疏远了他的臣民，以致被 1688 年的光荣革命所推翻，奥兰治的威廉和玛丽被推上王位。随后，议会制定了 1689 年的《权利法案》，表达了议会至上的原则。在接下来的两百年间，英格兰将发展成为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

17世纪是由法兰西、荷兰和英格兰的知识骚动所支配的年代。两种观念构成了思想的基础:自然秩序观念和理性的重要性。在英格兰,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1651年)中,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下篇》(1690年)中,论述了关于政府的思想和将会对政治思想产生巨大影响的人性理论。在欧洲大陆,帕斯卡和斯宾诺莎对西方思想做出了同样重要的贡献。

在古典主义时代,法国的剧作家,如高乃依、莫里哀和拉辛,主宰着文学领域,就如同路易十四的宫廷对于整个欧洲的影响。在《失乐园》中,约翰·弥尔顿将古典学识和深奥的基督教信仰结合在一起。

巴洛克风格的大师们创造出华丽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强调规模和表演性。包括鲁宾斯、伦勃朗和凡·戴克在内的弗兰德与荷兰画家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家庭通过限制生育、加强父亲的权威以及在可能时寻求国家的帮助,来设法解决他们的困难。



第二章

旧制度

"旧制度"(Old Regime)这个术语被用来描述1789年之前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盛行的制度。18世纪的"旧制度"是相对于法国大革命所开启的"新制度"而言的。尽管将要改变现代欧洲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力量已经在发挥作用,然而在表面上,旧制度仍然延续着中世纪的模式。可以肯定的是,经济仍旧主要是农业经济,因为大多数欧洲人生活在农村,保留着农民的地方观念。

旧制度的社会基础有赖于中世纪社会阶层的划分:第一等级是教士;第二等级是贵族;第三等级是平民,平民包括了城市中产阶级和工人以及农民。在第三等级内部,只有那些处于最上层的人才能发挥重要的政治影响,他们是英格兰和荷兰富有的商业领袖、法国的律师或者拥有足以购买政府职位的财富的商人、嫁得不错或者能够让参加其沙龙的重要人物听取她们意见的女人。欧洲的每个政府往往都只代表着少数人,而不是多

史海钩沉

咖啡馆

繁荣的海上贸易改变了公众嗜好,因为它为英国和欧陆市场带来了各种新产品。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咖啡馆和家庭饮茶现象的出现。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咖啡馆被称为"便士大学",因为咖啡馆的入场费是一便士(再付两便士可喝咖啡),付了这一便士,就可以进入一间屋子,在那里可以读到每天的报纸,并且会有热烈的政治讨论。土耳其人称咖啡馆为"聪明人的学校"(schools of the wise),而且咖啡馆往往会成为颠覆活动的中心,这使得俄国人试图查禁它们。

1675年,英格兰的查理二世试图关闭咖啡馆,借口是咖啡有害健康,正如一本小册子(《妇女禁止咖啡的陈情书》这本小册子提请公众考虑一下,过度地使用烘干和衰减的液体对他们的性欲所造成的大麻烦)曾经认为的那样。事实上,正像他的公告所表明的,查理更关心的是"在这些咖啡馆中……策划和广泛传播了种种错误、虚假和诽谤性的谣言,中伤了政府的权威,扰乱了王国的和平和安宁。"11天之后,国王以"王室的悲悯之心"为由,收回了禁令。直到早期乔治家族的统治末期,咖啡馆,至少在伦敦,仍旧是一个男性社会活动中心,安妮女王在位时期,这样的咖啡馆有500个。

1706年,内得·沃德(Ned Ward)不无嘲讽地在《富有的店主》一书中描述了一个辉格党人的一天:

5点钟起床;在帐房中待到8点;然后进早餐:吃烤面包片和柴郡干酪;在他的店里待上2个小时,然后到附近的咖啡馆聊聊新闻;回到店里,12点在家(店铺上面)进午餐:吃"极大的一块肉";1点换装;3点,去劳埃德咖啡馆谈论商业;1个小时

候后回到商店；然后，到另一个咖啡馆（不是劳埃德）消遣，"打烊"后，与熟人喝酒，然后回家用"少许晚餐"；"9 点钟响之前"上床睡觉。

Quoted in G. M. Trevelyan, *Illustrated English Social History*, vol. III.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51), p. 30.

数人的利益。就此而言，无论是像法兰西和普鲁士那样的绝对君主制国家，还是像不列颠那样发展中的立宪君主制国家，或是像荷兰联合省(the Dutch United Provinces)那样的共和国，情况都几乎相同。

随着 18 世纪的进展，政治和社会现状受到知识运动即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越来越多的攻击（见第三章）。旧制度的经济基础被革命性变化的压力所腐蚀，乌德勒支和解所形成的均势被破坏了。路易十四的失败和去世没有结束英格兰与法兰西世界范围的竞争。同时，国际平衡也由于两个重要的新来者的出现而产生了进一步的转变，这两个新来者就是俄国和德意志的勃兰登堡—普鲁士王国(the German state of Brandenburg-Prussia)。

一、经济"革命"

削弱旧制度的那些变化在西欧是非常明显的。从某些方面来说，它们是经济革命。相对于 19 世纪或 20 世纪而言，18 世纪经济变革的步伐要缓慢一些，它没有如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

那样的政治剧变充满戏剧性。然而,从长期来看,经济“革命”的结果与1776年和1789年的政治和社会革命的结果完全具有同样的革命性。

1. 商业和财政(1713—1745)

欧洲许多基本的商业活动机构在1715年之前就已经发展起来,如文艺复兴时期的银行与保险公司,还有16世纪特许的贸易公司。重商主义在菲利普二世时的西班牙、路易十四和考伯特时的法兰西、1651年到18世纪早期时的不列颠就已经发展成熟。由于受到不断增长的人口和食品需求的刺激,海运贸易得到稳步增长,它成为加速商业发展步伐的一个主要力量。

海上贸易的增多加大了对于轮船和货物保险的需求。18世纪之初,伦敦的海上保险经纪人就聚集在伦巴第大街的爱德华·劳埃德咖啡馆里讨论商业、新闻和政治。由此诞生了伦敦的劳埃德公司,一个发展出海上保险政策的标准形式并发行了最早的详细而精确的航运报纸的公司。从咖啡馆这一非正式环境中诞生的另一个伟大的伦敦机构是证券交易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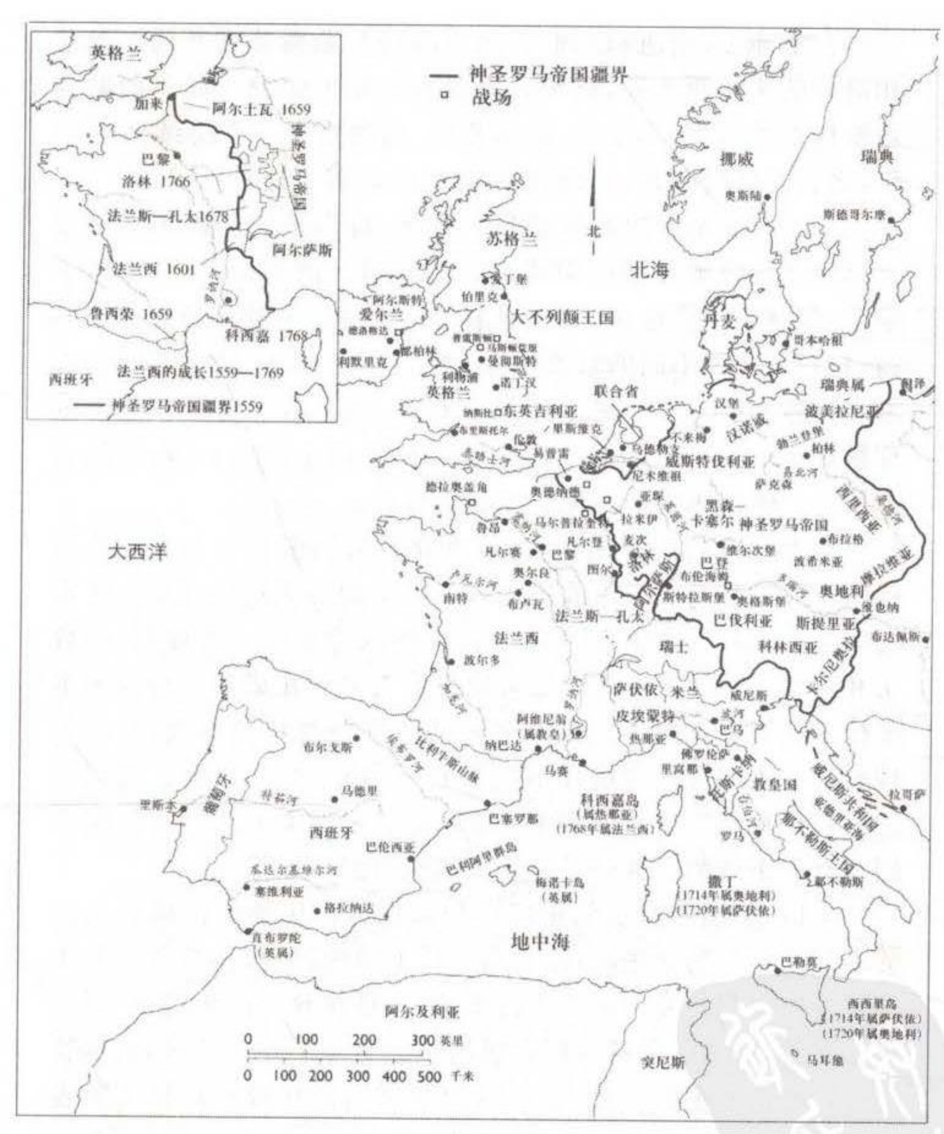
海上保险的繁荣,部分是因为改善了的海图、灯塔与浮标装置使航海更加安全。船长通过使用两种新的工具,能够确定他们在海上的地理方位,这两种工具是六分仪和航海表。六分仪是一种精巧的望远装置,可以测量出正午时分太阳的高度,从而指明轮船所在的纬度。航海表是一种不受轮船运动影响的钟表,能够保持在格林尼治平均时间(穿过伦敦附近格林尼治的子午线的时间)。这两种新工具也使得可能对轮船的经度做出计算。

在陆地上，交通和运输方面的改进开始得非常缓慢。除了相对好的法兰西大路，欧洲几乎没有宽阔的道路。商品的陆路运输仍旧速度慢、不安全、价格昂贵，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750年，之后收费公路和运河的建造才逐渐改善了这种状况。

商人们面临着限制性的行会规章、许多不同的硬币和度量衡以及大量的地方通行费所设置的障碍。例如，瑞典只铸造了铜币，包括一种重达43磅的铜币。巴登是一个较小的德意志邦国，它有112种不同的量度标准，对干货有65种，对液体有123种，对谷物有163种，更不用说还有80种不同的以磅为单位的称量标准。甚至在相对一体化和中央集权化的法兰西，各种地方税和其他的国内贸易障碍也仍旧存在。

地方既得利益的残存表明，重商主义国家在权力上有许多局限。尽管重商主义需要以国家为基础的商业规章，但是18世纪的政府没有一个有能力使全国性的规章生效。奥地利、普鲁士和其他一些德意志邦国努力使重商主义转化成为一种叫做卡麦拉主义（cameralism，此名称来自于罗马教廷的财政部，是处理财政收支的委员会或议事机构）的更加系统的政策。它们的主要目标在于安排国家预算，特别是增加国家岁入。其他国家则通常严重依赖私人公司和个人来执行经济政策。

所以，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在其殖民地禁区内所实行的不仅是一种贸易垄断，而且是实质上的统治权，包括驻军和指挥外交的权利。发明家独自行事，而不是在政府的机构中工作。总体来看，个人首创精神所完成的事情要多于政府所做的，尽管这种首创精神也会失控，正如世纪早期的两次投机性繁荣所表明的那样：法兰西的密西西比投机泡沫（the Mississippi Bubble）和英格兰的南海投机泡沫（the South Sea Bubble）。


神圣罗马帝国疆界
战场
北
英格兰
加来
阿尔土瓦 1659
巴黎
洛林 1766
法兰斯—孔太1678
阿尔萨斯
法兰西 1601
鲁西荣 1659
科西嘉 1768
西班牙
法兰西的成长1559—1769
神圣罗马帝国疆界1559
挪威
瑞典
奥斯陆
斯德哥尔摩
苏格兰
北海
爱丁堡
伯里克
阿尔斯特
爱尔兰
大不列颠王国
丹麦
哥本哈根
都柏林
曼彻斯特
利物浦
诺丁汉
英格兰
瑞典属
波美拉尼亚
联合省
汉堡
东英吉利亚
汉诺威
伦敦
柏林
威斯特伐利亚
萨克森
奥斯坦德
黑森—卡塞尔
神圣罗马帝国
西里西亚
布拉格
鲁昂
凡尔赛
巴黎
维尔次堡
巴登
奥尔良
南特
布卢瓦
斯特拉斯堡
奥格斯堡
奥地利
维也纳
大西洋
法兰斯—孔太
巴伐利亚
斯提里亚
法兰西
瑞士
科林西亚
布达佩斯
波尔多
萨伏依
米兰
威尼斯
皮埃蒙特
热那亚
佛罗伦萨
布尔戈斯
比利牛斯山脉
纳巴达
马赛
葡萄牙
马德里
里斯本
巴塞罗那
科西嘉岛
（属热那亚）
（1768年属法兰西）
教皇国
威尼斯共和国
亚德里亚海
西班牙
巴伦西亚
罗马
那不勒斯王国
巴利阿里群岛
那不勒斯
撒丁
（1714年属奥地利）
（1720年属萨伏依）
塞维利亚
格拉纳达
直布罗陀
（英属）
地中海
巴勒莫
西西里岛
（1714年属萨伏依）
（1720年属奥地利）
阿尔及利亚
突尼斯
马耳他
0 100 200 300 英里
0 100 200 300 400 500 千米

1750 年的欧洲

在 1715 年，几乎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够应付新近的战争中所累积起来的巨额债务。然而，所有的国家不得不找到某种办法来至少支付公债和其他债务每年巨额利息的一部分，否则就会走向崩溃。法兰西和英格兰政府将国家债务转交给股份公司管理，通过贸易特许来奖励他们所承担的风险。正如所希望的，公司的商业贸易被证明获利颇丰，他们的利润可以负担起政府公债的利息。

约翰·劳(John Law，1671—1729)是一个苏格兰数学奇才和金融家，负责法兰西的金融试验。劳断言金银的有限供给使得在任何国家增加金属货币的流通量都是困难的，所以，使得促进商业的发展成为困难的事情。劳的结论是，纸币是解决的办法，它由一个国家在土地和贸易上的财富所支持。

路易十四的去世使劳获得了机会。路易十五时期的摄政者奥尔良公爵允许劳在巴黎开设一家中央银行。劳的银行发行具有稳定值的纸币。商业活动立即增加了。下一步，劳建立了法属印度公司，一般被称为密西西比公司，它垄断了路易斯安那殖民地的商业往来。

劳的体系几乎延伸到法国经济的每一个角落。由于与王室银行合并，他的银行接管了政府债务，并同意通过出售部分密西西比股份来承担政府公债。许多公债持有人都对劳的提议反应热情。然而，劳不得不卖出密西西比的额外股份来为其公司获得充足的运转资金，并吸收他的纸币。为了吸引持现金的购买者，他拉动密西西比股票的繁荣。投资者陷入投机的狂热之中，到 1719 年倒闭时，密西西比股票正在以 40 倍于票面价值的价格出售。

密西西比投机泡沫不久就破灭了。随着密西西比股份上涨得越来越高，谨慎的投资者决定兑现。他们卖掉他们的股份，收

到钞票形式的支付款,然后带着钞票到劳的银行,要求其以金属货币买回。银行用尽了它的金银储备,在1720年2月延缓金属货币的支付。劳在1720年5月被迫辞职,之后不久从法兰西逃走。劳的体系的失败后果延续了很长时间。尽管后来的岁月中,其他的改革者提出储蓄方案以解决政府的财政问题,但是,劳的失败使得不可能建立一个真正的国家银行,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法国大革命。大多数的观察家现在使人们确信:由于专制君主使用他的权力耗尽了银行的资产,所以,他总是缠扰着毁坏了这样一个银行的信用。结果,法国政府不得不比英国政府支付高得多的利息率,这意味着法国可以借的款额更少。这是导致18世纪80年代法国政府崩溃的重要因素,是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催化剂。

在劳辞职后的几个星期,伦敦的南海投机泡沫破灭了。英国政府的债务管理曾经被委派给英格兰银行。英格兰银行作为一个私人机构成立于1694年,在与路易十四的最后战争期间,它发行钞票并为英国政府提供其他服务。但是,在就管理债务的特权进行谈判的过程中,新的南海公司支付给政府一个非常高的金额,由于出价高而取代了英格兰银行。公司可资利用的资源是贫乏的,这些资源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不列颠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末期所获得的贸易特许权。这些特权只限于每年供应西属美洲殖民地4800个奴隶和派一艘轮船到巴拿马进行总贸易。

南海公司诱使政府的债权人将他们的公债转变为公司的股票。公司主管秘密买卖股份来制造一个较为活跃的市场,鼓励仅以10%的现金的低价购买股票,并散播公司远洋货轮即将起航的谣言,而这些航行根本没有发生。投资的公众尽管容易上当,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头脑。南海公司的股票大跌,议会要求进行调

查，而且为了保护公司的债权人，查封了公司主管的不动产，但这些公司主管们在此期间已经毁掉了公司的账簿，逃之夭夭了。

欧洲在探索解决新出现的和令人困惑的财政问题的过程中，两次投机泡沫是其所遭受到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痛苦中最为极端的例子。劳的体系将法国商业从路易十四战败所导致的经济萧条中解脱出来，也同时刺激了路易斯安那的殖民活动。1720年后改组的密西西比公司始终保持着巨额利润。在英格兰，一些最强大的机构安全渡过了南海投机泡沫的崩溃期，东印度公司继续支付着每年5%到10%的红利，英格兰银行再次成为王国的金融支柱。

在尾随投机失败而来的政治重组期间，辉格党政治活动家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1676—1745)以一个将债务作为**国债**来兑现的计划而开始掌权。在大多数国家将它们的债务视为君主的个人债务的时代，这是一个新奇的概念。随后的股票危机都没有达到1720年那一次的规模，此后，英国的银行业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上迅速发展。

在19世纪，英国政府进一步举债，以便为帝国提供资金，而因为利率的低廉，政府只为此付出了相对小的代价。这是其力量的主要来源之一。

2. 农业进步

农业革命——促使现代经济转变的第二股力量——集中在那些能够以更少的农民生产更多农产品的改进措施上。尼德兰是领导者，创造了每英亩的最高产量，同时也是新作物培育的开拓者，如马铃薯、芜菁和苜蓿。芜菁一直到春季放牧季节的开始

都可以为家畜饲养提供食物,因而消除了在冬季肇始大规模宰杀剩余家畜的必要性。苜蓿可以凝固土壤中的氮,而增加土地的肥力,便不再需要让耕地每三年一休耕。家畜饲养也得到了发展。

在英格兰,汤申德(Townshend,1674—1738)勋爵(亦被称为"芜菁"汤绅)开始从事新作物的种植,他的在一块耕地上相继种植芜菁、大麦、苜蓿和小麦的四年轮作计划成为许多英国种植园的耕种标准。杰斯罗·塔尔(Jethro Tull,1674—1741)将法国方法应用到英格兰的粮食耕种上。他用马拉的耕耘机,有规则地一行行将种子深深地种入地中,代替了没有效率的播种习俗。塔尔和汤申德的改进赢得了亚瑟·杨(Arthur Young,1741—1820)的热情赞扬,他发表了长篇报道来记述他穿越不列颠和欧洲大陆农业区的频繁旅行。杨赢得了一批国际性的崇拜者,包括乔治三世、乔治·华盛顿、德·拉法耶特侯爵(de Lafayette)和凯瑟琳大帝。

18世纪的农业革命即使没能阻止再次发生的食物短缺,但却接近于结束欧洲大规模的饥荒。它也标志着大量中世纪时期的自足庄园逐渐向生产专门化农产品的资本主义农场转变的一个重要阶段。"处在上升阶段的地主们"需要大量的不为许多农民所再分和共用的资本和土地。随之而来的要求是,共用耕地被用栅栏隔开,成为单个地主的私有土地。圈地,这一在都铎王朝时期的英格兰被采用来扩大牧羊场的方法,如今被用来设法增加耕地。

圈地产生了大型农场,很好地适应了畦植、马拉的耕作和农作物的轮作,但也导致了社会混乱。大庄园的发展使得许多小农场主或自耕农破产,他们没有公用地的使用权是无法生存的,他们买不起农具,也没有钱设置栅栏。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大农场所雇佣的帮手,或者在扩张的城市中寻找工作。一些人成

为偷猎者，非法猎取大庄园中的动物。1723 年，议会通过了《沃尔瑟姆管制法令》(*the Waltham Black Act*)，目的是控制新出现的犯罪，这些犯罪在社会上被描述为携带武器且黑面出现在森林或被圈起的土地上，这种行为被作为意图偷窃或杀害动物、夺取农作物或木材、对所有者的财产纵火的证据。

3. 殖民地和奴隶制

在为人所熟知的启蒙运动和代表自由的革命时期，却同时发生着对在欧洲跨大西洋殖民地上工作的非洲人的大规模奴役，这是 18 世纪最具讽刺意味的事情之一。奴隶制已经长期存在于非洲的各种环境之下，但是，欧洲人的到来将其变为一种常规的大买卖。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根源在于美洲殖民地劳动力的长期短缺。在 16 世纪抢劫了新世界的金银之后，欧洲人逐渐设法掠夺他们美洲殖民地上的烟草、蔗糖和咖啡之类的物产，这些产品在母国有着越来越广阔的市场。但是，大多数的欧洲人不愿意出国，成百万的美洲土著人又死于欧洲的疾病，这意味着为了开发这些市场，欧洲人不得不到别处去寻找劳动力。17 世纪初，有胆量的欧洲商人开始与非洲酋长缔结互利的协定，酋长们允诺为他们提供奴隶。因此，间接地，非洲也逐渐开始"发现"欧洲。

1700 年之前，大多数非洲奴隶被运往巴西和加勒比海地区，在此之后，被运往北美大陆的奴隶数量有了显著的增长。尽管绝大多数的奴隶在相对温暖的气候下从事耕种，但他们也从事其他的劳务工作。美国革命之时，在远至纽约的北方地域，大约有 15%的人口是奴隶。最惊人的是总数量。到 1850 年，粗略估计，有 1100 万的奴隶被输入到美洲，这个数字不包括死在运

输过程中的奴隶。在奴隶贸易的鼎盛期(18世纪晚期),每年几乎有10万名非洲人被输入到美洲。到这个时候为止,单是在法属圣多明克(Saint Domingue)殖民地(后来的海地)就有将近50万的奴隶在从事蔗糖的种植,他们由大约2万名欧洲人监视着。

欧洲人将非洲人赶离家园而送其到新世界生活的条件,甚至与那些绝大多数远离家乡的欧洲人所处的条件相比,都是骇人听闻的,这些非洲人在生死边缘进行着长时间的劳作。奴隶被烙上印记、刮净胡子、带上枷锁和鞭打,然后被紧紧地塞进船中,经过3个月的旅程横跨大西洋,在此期间,许多人都死去了。一旦他们到达陆地,从横跨大西洋的悲惨经历中幸存的奴隶就被分给种植园主,这些种植园主握有新获得的奴隶的生死权。独占利益要求善待奴隶,但在一个包含了经常性的鞭打、强奸、不足的食物配给和家庭破裂的体系中,更低级地对待受害者和对奴隶施以暴力的意愿经常不顾经济考虑。残忍是这个体系的地方病,正像奴隶们设法尽最大力量推翻这个体系一样,主人们长期生活在担心反抗的恐惧之中。

为了回应偶然出现的批评这种制度的人,主人们和他们的辩护者援引各种理由。有人指出,奴隶制在圣经时代就实行了。约翰·洛克,这位伟大的"自然自由"的捍卫者,将南北卡罗来纳州的奴隶制辩护为胜利者对俘虏的权利的延伸。到了18世纪,逐渐展开的种族主义将非洲人描绘为应该受到奴役的动物。随着反对奴隶制的声音越来越大,反对废除奴隶制的人争论说:奴隶是财产,只有他们的所有者得到补偿,他们才应该获得自由。

4. 工业革命的开端,到1789年

通过提高生产率和促进人口增长,农业革命促成了工业革

命。工业也需要原材料、市场和资本来为工厂的建立和设备提供资金。因此,商业繁荣也滋养了工业的发展。

最早的重要变化是在纺织品加工方面,纱线和布匹的生产长期处于散工制的组织之下,在这种制度中,纺纱工和织工用纺车和织机在家工作。通常情况下,她们不自己买原材料或在市场上交易她们的成品,只是作为领取工资的劳工为某人工作,后者供给原材料和销售成品。然而,在其他工业方面,生产有时在简易的工厂中进行,许多劳工聚集在一个大型的车间一起工作。在由于国家的缘故而要求严密监督的企业中,比如大炮铸造厂,或者因为使用了昂贵的材料,如奢侈布料上的金线或银线,上述类型的工厂是非常普遍的。

工业革命使散工制成为了过去,使早期的制造体系发生了转变。机器取代了手纺车、手织机和其他手工工具,水或蒸汽代替了人力和动物力量成为主要的动力源。因为动力机械通常笨重并复杂,安置它们就需要更大型的工厂。

煤炭开采正在成为一项大的生意,主要因为冶炼铁厂增加的焦炭需求,这些铁厂先前是用木炭来使矿石变为铁的。普通的煤炭不能代替木炭作为冶炼燃料,因为煤炭中的化学物质使铁特别易碎。什罗普郡的达比家族发现了一种方法,能够通过一种将煤炭转变为焦炭的烘烤过程而清除煤炭中的化学杂质。达比家族和其他的私人公司是冶金业的先驱。

纺织品的革命集中于较廉价的棉布生产。飞梭是一种最先在英格兰应用于手织机的技术设备(1733 年),它使得一个织工可以完成先前需要两个人完成的工作。

史海钩沉

法属西印度群岛的奴隶法

一部法典向历史学家讲述了公众的恐惧和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一部法律很少被制定来防备没有发生的行动。《法国黑人法典》揭示了法属西印度殖民地奴隶制的许多事实。这部法典汇集并补充了所有在1685年到1785年间首次公布的相关法律。

第1款:我们渴望和打算在岛上执行已故国王的法令,为此,我们命令我们的官员驱逐所有已经在那里定居的犹太人。由于被宣布为基督教信仰的大敌,我们命令他们在从当前法令公布之日算起的3个月内离开,违者剥夺人身、没收财产。

第2款:岛上的所有奴隶都要受洗,并接受罗马天主教和使徒信仰的教诲。我们命令那些购买了新到黑人的居民,最迟于8天之内告知上述岛屿的总督和监督官,违者处以任意的罚款,官员将给予强制命令,使那些黑人在合理的时间内受洗和接受教诲。

第3款:除了罗马天主教和使徒信仰,禁止公众信仰任何宗教。我们要求违反者被作为叛逆者和不服从我们命令的人得到惩处。我们禁止任何以信奉其他宗教为目的的集会,宣布这些集会是违法和妨碍治安的,参与者遭受同等的处罚,处罚甚至将施用于任何允许其奴隶参与此种集会的主人。

第4款:不允许任何不表明信奉罗马天主教和使徒信仰的人管理黑人。如有违反,从让此类人管理黑人的主人处没收上述黑人,并对此类管理者进行任意的处罚。

第5款:禁止表明信奉新教的臣民对其他臣民和他们的奴隶在自由信奉罗马天主教和使徒信仰方面造成任何麻烦和阻碍,违者以惩戒论处。

第 6 款:我们告诫所有臣民,不论身份和地位,要遵守为我们信奉罗马天主教和使徒信仰的臣民所保留的安息日和斋日。在那些天,从一天的午夜到下一天的午夜,禁止他们工作或让他们的奴隶工作,无论是在耕作土地、加工蔗糖,还是在忙于其他的劳作,如有违反,对主人处以罚款和任意的惩处,并没收所有的蔗糖和在我们的官员进行此项工作时感到惊讶的奴隶。

第 7 款:同样禁止在那些天开放奴隶市场和任何其他的市场,违者给予同样的处罚,没收在市场上发现的任何货物,并对贸易商处以任意的罚金。

第 8 款:我们宣布,那些不信奉罗马天主教和使徒信仰的臣民从此时起不能订立一个合法的婚约。我们宣布由此类婚姻中出生的孩子为私生子,我们要求此类婚姻得到控制,并被认为是真正的非法同居。

第 9 款:与他们的奴隶非法同居而有一个或更多孩子的自由人,连同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主人一起,每人处以 2000 磅蔗糖的罚金。如果他们是奴隶主,与奴隶有了这样的孩子,我们命令除了罚金,剥夺他们的上述奴隶和孩子,都被充公用来作为慈善组织的好处,永远不得释放……

第 12 款:奴隶之间结婚所生的孩子,将是奴隶,如果结婚的奴隶属于不同的主人,孩子将属于女奴的主人,不属于她丈夫的主人。

第 13 款:我们要求如果一个奴隶娶了一位自由妇女,孩子将是自由人,跟随母亲的社会身份,而不论父亲的奴隶身份;如果父亲是自由人而母亲是奴隶,孩子将同样是奴隶。

第 14 款:主人将在神圣之地,即在为此目的而建的墓地之中,埋葬他们受过洗的奴隶。至于那些死亡的没有受洗恩惠的奴隶,他们将在夜间被埋葬于靠近他们死亡之地的旷野。

第 15 款:禁止奴隶携带任何攻击性武器或长棍,违者处以鞭打,没收的武器奖励给在奴隶所有物中发现武器之人。唯一的例外是那些被主人派去狩猎和以它们为符号或风俗习惯中识别标记的奴隶。

第 16 款:我们同样禁止属于不同主人的奴隶以婚礼或任何其他事情为借口,于白天或夜间在他们主人的住处或其他地方聚集在一起,在大路和偏远地方就更不允许,违者处以不轻于鞭打或烙记的肉体惩罚;如若为惯犯或更加严重的情况,他们可能被处以死刑,这由法官来决定。我们嘱托所有臣民,要追击违反者,逮捕他们,将他们送进监狱,即使你不是官员,也没有法令命令你这样做……

第 18 款:禁止奴隶在任何情况下出卖甘蔗,甚至在有主人许可的情况下也不可以……

第 19 款:没有主人以便条或可识别标记为形式的明确许可,禁止奴隶在市场从事售卖或携带任何形式的供应品到私人住宅出售,包括水果、蔬菜、火柴、食用植物、给蔗糖工厂动物的食物……

第 21 款:我们准许所有居住在岛屿上的臣民,没收他们在奴隶所有物中所发现的任何没有其主人所提供的记号或可识别标记的东西……

第 22 款:主人应该负责他们年满 10 岁及以上年龄奴隶的生计,每星期向他们提供两罐半(按当地标准)的木薯粉,或 3 个木薯,每个至少重 2.5 磅,或者相等同地,提供 3 磅咸牛肉或鱼,或相称的其他食物;对于孩子,从断奶起到 10 岁,提供上面规定食物的半数。

第 23 款:禁止主人供给奴隶蒸馏过的甘蔗酒,以代替上一

款中所规定的维持生活的食物……

第 25 款：主人将被要求每年提供给每个奴隶两件麻衣，或者 4 厄尔的亚麻布，随主人的心愿而定……

第 27 款：因疾病、年龄或其他原因衰弱的奴隶，不论疾病是否能治愈，都由他们的主人供给食物和维持生活；如果他们被抛弃，上述奴隶将被交托给慈善组织，主人将被处罚，每天向慈善组织支付 6 个苏，以承担每个奴隶的食物和生活……

第 33 款：殴打他的主人、主人的妻子、情妇以及其孩子的面部，或造成淤伤的奴隶将被处死。

第 34 款：奴隶对自由人犯罪和施暴，将得到严厉惩罚，如果需要，甚至可以处以死刑。

第 35 款：犯有重大盗窃罪和偷盗马匹、母驴、骡子、母牛和公牛的奴隶或被解放的奴隶，将被处以肉体惩罚，如有需要，甚至可以被处死。

第 36 款：偷窃绵羊、山羊、猪、鸡类、甘蔗、豌豆、木薯或其他蔬菜的奴隶，将根据盗窃罪的轻重予以惩处；如果应得，法官可以判处他受高等法官执行人的鞭笞，并在肩头烙上鸢尾花形的印记……

第 38 款：逃跑的奴隶，从他的主人告知当局之日算起，不见一个月以上，将被割耳，并在一个肩头烙上鸢尾花形的印记；如果再犯，不见又一个月，同样由告示之日算起，他将被挑断腿筋，并在另一个肩头烙上鸢尾花形的印记；第三次，这个奴隶将被处以死刑。

第 39 款：被解放的奴隶在住所窝藏逃犯，将根据窝藏时间被处以每天 300 磅蔗糖的惩罚，蔗糖将支付给逃犯的主人。

第 40 款：任何因为其主人（没有涉罪）的报告或告发而被

判死刑的奴隶，将由法官选定的两位岛上的重要居民估价，奴隶的价值将被付给主人。为了支付这种成本，监督官将对每个黑人征税，这项税是应付的……

第 42 款：认为他们的奴隶应该受到惩罚的主人可以将他们锁起来，用竹竿和绳子抽打他们；禁止主人对他们的奴隶施以酷刑，或者使其肢体伤残，违者没收奴隶，并对主人提起额外的诉讼程序。

第 43 款：我们命令官员起诉任何杀死其管理和指挥下的奴隶的主人或监工，对他们的惩罚将根据犯罪的严重性而定；如果情有可原，我们允许我们官员给予上述主人或监工以同情，无需从我们这里获得赦免函。

第 44 款：我们宣布，在因死亡或依遗嘱处置财产时，奴隶是动产和家族财产的一部分，不适用于抵押诉讼程序，在共同继承者之间平等分配，无优先权或长子继承权；奴隶不从属于习惯的遗产授予，不能用于封地的或家族的取得权利、重新占用，不属于封地的或领主的应得物，不受制于正式法令，不消减五分之四。

第 45 款：不过，我们无意由此剥夺臣民宣称奴隶是其个人或家族财产的权利，在臣民一方，这就如同处理金钱和其他可移动的商品一样……

第 55 款：大于 20 岁的主人，即使不到 25 岁，可以通过合法行为解放他们的奴隶，不必就解放奴隶进行任何解释，无需征求亲戚的同意和意见……

第 57 款：我们宣布在我们岛屿上的解放应相当于在这些岛屿出生，被解放的奴隶不需要从我们这里取得国籍证书，就可以享有出生在我们的王国、服从于我们的领地和国家的臣

民特权，即使他们出生在国外。

第 58 款：我们命令被解放的奴隶对他们的前主人、前主人的遗孀和孩子保持特别的尊重，被解放的奴隶对他们所犯的任何过错，都要比对其他人所犯过错而得到的惩罚更加严重……

第 59 款：我们给予被解放的奴隶与出生时自由的人一样的特权、权利和豁免权；我们希望他们应该与他们所获得的自由相称，希望在尊重他们的人民和他们的财产的被解放的奴隶身上会产生同样的影响，即自然自由的恩赐将给予我们所有其他的臣民……

As quoted and translated in Geoffrey Symcox, ed., War, Diplomacy, and Imperialism 1618—1763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pp. 309—318.

装有飞梭的织布机很快地用完了手织机的线量，以致一个私人组织——伦敦艺术、制造与商业促进会（London Society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Arts, Manufacturers and Commerce）——为改进纺纱过程提供了一项奖金。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卒于 1778 年）在 1764 年凭借他的珍妮纺纱机赢得此奖，一系列的纺轮被组装在一起来同时织八股线。不久，珍妮纺纱机被配备了水力，它的产量立即增加到可以同时纺出 100 多根棉线。18 世纪 60 年代，苏格兰人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1736—1819）采用了蒸汽机，预示了工业从对不可靠的水力的依赖中获得了最终的解放。

尽管不列颠在 1789 年拥有近 150 家纺织厂，但毛纺品和许多其他的基本日用品仍由手工制作。直到运河和铁路允许廉价



詹姆斯·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纱机彻底改革了纺织工业。1764年左右投入使用后,就迅速增加了棉纱的产量。它也确保了妇女在劳动力中占有一席之地,将她们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她们的工资起初对于负担沉重的家庭是一种实惠。(Culver Pictures, Inc.)

的重货运输,直到资本与熟练劳动力的短缺得到克服,全面的工业发展才会开始。由于在精确加工瓦特蒸汽机的零部件方面存在困难,瓦特蒸汽机的大批量生产被延迟了。尽管18世纪在工业革命上迈出了许多的第一步,但是,它们仍旧需要等到下个世纪才能在一种真正革命性的规模上得到运用。

二、已有的强国

西班牙和法兰西分别是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后期占统治

地位的欧洲强国。荷兰也曾经在17世纪经历了一段贸易与财富的黄金时代。在18世纪,欧洲国家更加势均力敌。一些在17世纪已经失势的国家重新回升,如西班牙和奥地利,而法兰西尽管仍旧是欧洲大陆上最强的国家,却在缓慢地衰落。力量的中心由欧洲腹地移向东、西的边缘。在东面,俄国首次在欧洲事务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普鲁士尽管国家还小,经济基础尚显薄弱,但到18世纪中叶已经表现为一个主要的参与者。在北面,信奉新教的瑞典失势于俄国。在西面,不列颠进行着竞争,并在海上胜过了法兰西,因而对欧洲大陆施加着它之前从未有过的影响。

1. 不列颠(1714—1760)

在18世纪,英国商人将贸易上的老对手荷兰人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并逐渐超过了新的竞争者法国人,处于领先的位置。从重商主义的标准即商业、殖民地和海外实力来判断,不列颠是欧洲最强的国家。然而,在最完全的意义上,不列颠的殖民帝国并不是一个重商主义的事业。同业公会负责对殖民地的监督,它奉行一种"有益的疏忽"的政策。从长远来说,有益的疏忽没有使殖民者满意,他们发现英国的政策既不是有益的,也不是疏忽的,但是,从短期来说,这种政策促进了殖民者的成功和自力更生。

皇家海军拥有受过训练的军官团和比任何其他强国都要多的舰船。未来的舰长在16岁的时候或者更早就出航了,并在接受任务之前经过长期的实践训练。不列颠的军舰数量是法国的2倍,商船数量是法国的6倍,熟练的水手、商人和海军的总数量是法国的10倍。在战时,舰队可以利用商船队来获得额外的水手和补给船。

相反,英国陆军既不多也不令人注意。它的军官被认为是欧洲最差的,它的许多士兵都是来自于德意志黑森—卡塞尔邦国的雇佣兵,或者是黑森人。对陆军的忽略是一种故意的决定。英国的岛屿在防止入侵上是相对安全的,而且,英国人民担心一支常备的陆军会成为潜在的专制主义的工具。

光荣革命极大地确定了对陆军的不信任,也确定了议会的最高权威。议会批准威廉和玛丽即位,取代詹姆斯二世。当安妮——玛丽的妹妹和最后一位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在1714年去世的时候,议会已经安排汉诺威王室继位。

在新王室的头两位国王乔治一世(1714—1727年在位)和乔治二世(1727—1760年在位)的统治时期,内阁只是开始获得权威。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决不会放弃所有古老的王室特权。他们经常插手来指挥战争和外交。他们从辉格党中选择内阁部长,然后控制下院。然而,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被要求这样做,而是因为这适宜于他们的利益,因为他们不信任托利党人,一些托利党人被牵涉进复辟詹姆斯二世后代王位的詹姆斯党人的密谋之中。(詹姆斯党人的名称来自于"詹姆斯一世时的一种铸制金币"一词,拉丁文指"詹姆斯"。)

从1721年到1742年,领导下院辉格党人的罗伯特·沃波尔是内阁首脑,他实际上是首相(或者首席部长),尽管头衔还是非官方的。沃波尔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他通过熟练的操纵技巧在下院保持着多数票。工作并不简单,因为党纪还不存在。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名词指的是易变的利益群体,而不是正式意义上的党派。

在开始的两个乔治的统治时期,辉格党人是一个由拥有土地和"资金"的士绅们,即由来自于乡村的贵族与乡绅,以及来自于伦敦与省城的商人与专业人士所组成的联盟。辉格党人于是

重建了一个政治同盟，它最早出现在中世纪较晚的时候，郡的骑士在那时已经加入市民组成了下院。家庭纽带、共同的政治目标和对财产的共同关心使乡村和城市的辉格党人走到了一起。

关于18世纪社会阶级，像士绅和乡绅这种词语隐含了哪些意思？历史学家一般同意，他们指的是仅仅处于有头衔的贵族之下的阶级。士绅的等级包括贵族较小的儿子，理论上来说他们不是贵族，因为上院的席位只传给最年长的儿子。这一等级也包括其他拥有地产的业主，对所有这些人的口头称呼是“先生”(sir)，书面称呼是“大人”(Esquire)。在历史上，士绅依靠地产的收入生活，但到了18世纪，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在商业上占了一份。成功的商人有时购买乡村的房产，自己当上了绅士。但是，近来的研究表明，在英格兰成功商人向贵族的变化是有限的，在法兰西则受到更少的限制，在那里贪污腐化为将财富转化成贵族身份提供了机制。

在社会和政治结构方面，沃波尔时候的不列颠不是民主的。只有绅士可以希望升职和成为陆军与海军军官、律师、牧师和内科医生。在地方事务上，治安官只从拥有土地的士绅中产生，他们主持法庭，决定工资等级，监管对穷人的救济，维修桥梁与公路和保护有产阶级。直到18世纪40年代，只有绅士有权选举议员。在许多选区，有少数选民怂恿腐败，特别是在“腐烂的”和“口袋”自治市镇，这些市镇选民很少，某个富有地主的“口袋”就可以控制选票，他们很容易通过行贿来达到目的。

所以，统治阶级管理着通常没有投票权的民众。伦敦已经大得足以容纳贫民窟、暴力犯罪和交通阻塞，同时伴随着几乎完全缺乏的治安与消防。孩子一般在8岁时就开始工作。然而，不列颠的统治阶级尽管通常是自私和狭隘的，但在情况最好的

时候还是会对较不幸的人有一种公益感和公德心。而且,克伦威尔反叛的记忆和圈地运动所导致的周期性的食品骚乱,也强烈地刺激着贵族要维持政治控制。

2. 法兰西(1715—1774)

尽管英格兰在18世纪时期只有相对少的商人和不多的专业人士上升为拥有土地的贵族,但中产阶级的规模和影响却得到相当大的增长。在法兰西,与此相反,虽然通过购买高级的政府官位而比较容易获得贵族头衔,但中产阶级的数量却较少。法国的中产阶级较少,部分原因在于商业扩展的大部分利润都去了沿海城市,而在英格兰同样的利润却得到更广泛的分布。尽管法国殖民政策不鼓励法国人移民到新世界,但是,出产蔗糖的法属加勒比海殖民地激增的贸易,导致港口城市在规模和财富上得到相当大的增长。

法国海军需要更多的资源和更好的领导。因为荷兰和英国的船只承担了许多法国的商业贸易,法国的商船队规模很小。法国的海军军官都在教室里接受严格的训练,缺少一生都在海上航行的舰长所具有的实践经验。

法国统治者偏爱陆军而忽视海军,因为法兰西毕竟是一个陆上强国,其脆弱的东北边界会招致入侵。然而,军队训练拙劣,组织力量分布不均,这里的军官指挥15个人,相比之下,在有效率的普鲁士陆军中一个军官指挥35个人。许多贵族军官都将一次任务视做增加他们个人财富的捷径。

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被击败之后,法兰西对海军和陆军都进行了改革。增加了许多战舰,裁减了陆军军官团中许多冗

员，引入了更具攻击性的军事战略。这些改进措施部分地解释了法兰西在美国革命战争中和自身革命的军事战役中的优秀表现。然而，它们来得太晚了，无法挽救旧制度正在消失的威望。

法国政府的一个主要弱点在于路易十四为法兰西国王创造了一个如此崇高的角色，以致他的继承者无人能够完全承担它。路易十五在 1715 年继承王位时只有 5 岁，直到 1743 年，他仍依赖于摄政王和首席大臣的继任来统治。尽管他是一个聪慧和勤勉的国王，但他孤僻的个性和长期的间接统治给人们的印象是，他更关心他的私人享乐，而不是公共事务和臣民的福祉。在 18 世纪 40 年代，他有着一长串的情妇，其中非常有名的是德·蓬巴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1721—1764）。她的坚强个性、智慧和宫廷影响力使人们普遍认为，她是王位后面的真正力量。路易十五是一个非常隐秘的统治者，以至于在他的统治后期，他通过代理人来操纵一个对外政策时，这些代理人的真正使命竟不为他自己的外交大臣所知。他许多次突然的政策转变和高层政府任命的变化强烈地表明他缺少路易十四始终如一的坚强意志，这在一个如此严重依赖国王自己的政府体系中是一个致命的缺陷。

后来变得无法控制的一些问题，在奥尔良公爵 1715 年的摄政统治之下就已经浮出水面了。首先，政府内部对国王的反对正在增长，特别是在巴黎大理院当中。大理院是最高王室法庭，其中的人员由任现职的贵族成员充任，这些贵族掌握着对王室法令生效前进行“登记”（就是正式记录在案）的权利。因为摄政者的权威受到反对，奥尔良公爵与大理院做了一笔交易：大理院支持了奥尔良公爵依靠僭取的权力而进行的摄政统治，作为交换，他重新确立了大理院在登记法令之前对法令的抗议权利，这是大理院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曾失去的权利。



德·蓬巴杜夫人,美丽、聪慧而有野心,是路易十五最有权势的情妇。这幅画像由弗朗索瓦·布歇(Francois Boucher,1703—1770)所绘,是一幅洛可可风格的杰作,为历史学家提供了有价值的细节,涉及衣服、发式、装饰和家具。(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the Trustees of The Wallace Collection, London, England)



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尤以他对英国人政治与社会习惯的讽刺性见解而闻名。他意图成为一个银匠,但却成为一个为出版人提供讽刺性印刷物的雕刻师。他于是将作品扩展到日常生活的道德评论上。他的《选举》组画表现了一个讽刺画家杰出的刻画技术和技巧。在这里,它表现了一个正在进行中的选举活动——拉票。(Memorial Art Gallery of the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gift of Mr. and Mrs. Herman Cohn)

尽管这项权利后来受到限制,但大理院已经有效地重获了对王室动议权进行挑战的权威,并且,几乎立即就使用了它。两个议题是这些喧闹的争议焦点。首先,是前任统治遗留下来的财政危机,摄政者最终通过约翰·劳的冒险的体系来设法解决它(如第一章所述)。由于怀疑劳的意图,大理院甚至在体系崩

溃之前就反对它,这是稍后大理院反对王室财政政策的前奏。第二个主要议题是1713年公布的教皇训令《克雷芒通谕》,它谴责了詹森主义论述中所声称的观点。大理院对于其中的强制尤为敏感,部分因为大理院中詹森主义官员的少数派声音,部分因为大理院声称对法国教会拥有司法权和不满教皇的干预(詹森主义修女也管理着多所有影响的学校)。尽管奥尔良公爵努力缓和冲突,但大理院拒绝妥协。由于不断遭到阻挠,奥尔良公爵在1720年命令从巴黎驱逐大理院,这是王室后来在类似的冲突中所使用的一种武器。不久达成一项临时解决方案,但事情几乎没有得到断然解决。詹森主义仍旧是19世纪法国政治中的一个主要争论点。同等重要的是,詹森主义者的游说团体通过发行上百本的小册子,有效地诉诸了公共舆论,并在1728年,开办了谴责政府"专制"政策的地下报纸。

枢机主教弗勒里(Fleury)在1726年任首席大臣,在其任职期间,对詹森主义的主要论争于1730年到1732年间爆发,但是,国家的其他方面反倒要比奥尔良公爵摄政的骚乱时期更加安宁。弗勒里本人赞成《克雷芒通谕》,监禁了许多兜售詹森主义文学的小贩,但是,他在这方面的目的是为了减少争论。他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恢复法国经济和王室财政的健康状态,主要方法是避免昂贵的国外军事冲突。在他的管理之下,政府在现存的记忆中第一次近乎平衡了预算,可以暂时避免人们对税款潜在的强烈质疑。然而,在1743年弗勒里死后,国家再次进入到一段被延迟了的冲突时期,它对政府的偿付能力和权威发出了新一轮的极为致命的威胁。

3. 西欧的其他国家

在西欧的其他国家中，西班牙是唯一可能要求强国地位的国家。瑞典和荷兰共和国已无法维持它们在17世纪时所担当的主要国际角色。大北方战争(the Great Northern War)已经使瑞典的波罗的海帝国开始衰退。荷兰则由于同路易十四的战争而耗尽资财，不能支付起一支庞大的海军或有力的对外政策。尽管如此，荷兰的海运贸易仍旧保持着实力，并且，共和国专注于相对繁荣的生活而减少对国际问题的关注。

相比较来看，西班牙只从18世纪早期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遭受到不大的损失。在1713年乌德勒支和解中，西班牙损失了比利时和意大利的部分地区，但这种损失使得难于处理的西班牙领地减小为更加适合管理的规模，而且，波旁王朝在西班牙的第一位君主菲利普五世(1700—1746年在位)为国家的传统制度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菲利普和他的顾问们消减了西班牙管理中的过多礼节和长时间的拖延，重新宣称了君主对贵族和牧师的权威，改进了税制、鼓励工业、建立海军，并强化了美洲西班牙帝国的战略据点。

然而，这种新式管理并未抓住西班牙衰落的根本原因。统治者的贪婪和重商主义的限制仍旧阻碍着殖民地的发展。母国仍然处于贫困潦倒的状态，背负着贵族和教士等级制度，并为资源不足所牵制。菲利普五世本人有些神经质，被他意志坚定的第二任妻子伊丽莎白·凡尼斯(Elizabeth Farnese)所操纵。由于菲利普第一次婚姻所得的儿子将继承西班牙王位，伊丽莎白决心为自己的两个儿子找到王位，因此，她坚持设法确保他们得到意大利的邦国，从而再次威胁到欧洲的和平。

在这段时期,西班牙也完全控制了意大利的时局。到1715年,意大利诸国已经失去了许多在文艺复兴时期曾经拥有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海外新大陆的开放和大西洋力量的上升已经减小了地中海的重要性。在地中海本地,奥斯曼土耳其人及其北非的追随者长期威胁意大利的航运和贸易。而且,自从1494年法国的入侵开始,意大利诸国就生活在恐惧之中,唯恐被任何一个新的民族君主国所征服。

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完成了这次征服。用了几乎两个世纪的时间,他们直接统治了米兰、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并占领了半岛的其他地区。到1720年,奥地利在伦巴底稳固地建立起来,其侧面是正在衰落的威尼斯与热那亚的商业共和国。在山脉的西北方,是较小却在成长之中的皮埃蒙特—萨伏依(Piedmont-Savoy,从理论上来说,在1720年吞并了撒丁岛之后是撒丁王国)。沿半岛向下深入,是托斯卡纳(Tuscany)大公国(之前是佛罗伦萨共和国)、教皇国、那不勒斯王国和西西里王国。所有这些国家都只不过拥有较小的实力。

然而,在18世纪,意大利不能被看做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力量。罗马仍旧是天主教的首都,威尼斯仍然培养出优秀的画家,那不勒斯依然是欧洲音乐家的学校。伦巴底、托斯卡纳和那不勒斯都对这个世纪的经济与知识进步做出了贡献。

18世纪30年代,一系列的交换之后,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归给伊丽莎白较年长的儿子,而奥地利人获得权利继任梅第奇家族最后的托斯卡纳大公。1768年,热那亚将科西嘉岛卖给法兰西。在古老的用语中,意大利只是"一种地理表述",不是单一的政治体,而是由半岛之外野心勃勃的王朝君主和帝国缔造者所控制的一系列地区。

在某些方面，德意志甚至更应该被称做一种地理表述。因为它分成300个国家。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增强了单个德意志国家的主权权利，取消了他们名义上的最高君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威。然而，不像意大利，德意志确实包括两个相当重要的力量：一个是已经长期确立的奥地利；一个是近期出现的普鲁士。

在1715年之前的20年中，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赢得了一系列的军事与外交胜利。在1699年，通过《卡罗维茨和约》(*Peace of Carlovitz*)，他们从奥斯曼土耳其人那里收回了许多匈牙利领土。在1713年，尽管他们没能阻止西班牙古老的哈布斯堡家族的王位落入波旁王室菲利普五世的手中，但他们得到了西班牙的比利时和意大利领地作为补偿，并于1718年获得匈牙利的其余部分。

查理六世(1711—1740年在位)统治时期的许多时间都被用来劝说他自己的贵族臣民批准《国事诏书》，这个宪法协定确立了将分散的家族领地连接在一起的原则，由此在没有儿子的时候，查理的女儿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a，1717—1780)将继承他全部的领地，在1724年，完成了继承。然而，为了巩固哈布斯堡家族对全部领地的统治，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做，因为这些领地代表了许多不同的民族，并且永远也无法被锻造成一个单一的民族君主国。在三个主要的民族区域，即德意志人的奥地利、捷克人的波希米亚和马扎尔人的匈牙利，贵族仍旧保留着大部分的中世纪特权，并通过控制地方阶层和议会，支配征税许可和官员任命。当查理六世在1740年去世的时候，国库几乎完全空虚，军队和文职官员的薪水拖延了两年多，这突显了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财政与军事弱点。巴伐利亚选侯于是要求代表他的妻子继任，挑战玛丽亚·特蕾西亚。

文献记载

礼仪时代

1729年,一本法国出版的关于"文明基督徒"的行为指南包括了如下的一些主题,如言语、餐桌礼仪、身体反应、擤鼻涕和卧室行为。经过1774年,这本良好礼仪指南附带更多复杂的建议而再次发行,尽管重点发生很大变化,如某种行为(将鼻涕擤在一块方巾上。这时方巾已经不围在脖子上,如今是拿在手上,所以叫手帕)成为可以接受的,其他的行为则要更细致地遵守。这些指导强调了阶级差别,指出一个人在其社会下等阶级的人面前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行为,将要在其同等的社会等级或较高社会等级的人面前避免。

除了头和手,庄重和端庄还涉及身体的所有部分。你应该小心……不要赤手接触身体上任何未经保护的部分……你应该习惯于忍受微小的不适而不去扭曲、揉搓或抓搔……触碰或注视另一个人,特别是异性,都距庄重和礼节相去甚远,甚至在天堂是不允许你看你自己的。当你需要解手时,应该总是退到某个很少有人的地方。进行其他自然行为时要在不能被别人看到的地方才是合适的(甚至对孩子也是)。当有人在身旁时,无论从上面还是下面放出身体里的气流都是不礼貌的,即使这样做的时候没有发出响声……谈论应该被隐藏的身体部分从来都是不合适的,自然使我们受制于它们的某些身体要件也是一样,甚至不能提及它们……当你擤鼻涕时,应避免发出声响……在擤鼻涕之前,用很长时间取出你的手帕是不礼貌的。在不同的地方打开手帕,看什么时候能用到它,是对你身边的人缺少尊敬。

Sieur La Salle, *Les Règles de la bienséance et de la civilité Chrétienne* (Rouen, 1729), quoted in Norbert Elias, *The History of Manners*, vol. I: *The Civilizing Process*, trans. Edmund Jephcott (New York: Pantheon, 1982), pp. 132, 156.

三、新来者

1. 普鲁士和霍亨索伦家族(1715—1740)

普鲁士的领土从莱茵河以西到波兰以东，散落于北德意志。这些领土由完好的沙地和沼泽组成，自然资源匮乏，支撑着相对小规模的贸易。在1715年，普鲁士的人口不到300万，在欧洲国家中位居第12位。它的首都城市柏林几乎没有君士坦丁堡、巴黎、伦敦和其他有影响的首都所拥有的显著的地理优势。霍亨索伦家族自从15世纪就被确立为勃兰登堡选侯，领地位于易北河和奥德河之间。在1618年，当东普鲁士归于霍亨索伦家族时，由于波兰统治的西普鲁士，它同勃兰登堡是分隔开的，在名义上仍是波兰国王统治的封地。与此同时，在西德意志，霍亨索伦家族已经取得(1614年)克莱沃、马克和一些位于较低的易北河谷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小块土地。因此，当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Frederick William，1640—1688年在位)继承霍亨索伦家族遗产的时候，他的领地以勃兰登堡为核心包括了向东和向西分离的边远地区。凭借非凡的坚持，勃兰登堡—普鲁士的统治者在之后的200年间，投身于打造一块稳固的领地而摆脱领土零散状态的任务之中。

大选帝侯赢得了波兰的承认，获得普鲁士的完整主权。他也努力将瑞典人从波美拉尼亚领土上驱逐出去，但只取得较小的成功，波美拉尼亚是瑞典在1648年获得的位于勃兰登堡和波罗的海地区之间的地区。在国内政策上，他的成就更具实质性。

他发现他的领地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为战争、荒废的农田、消减过半的人口和蜕变为几千名无法无天的乌合之众的军队所毁坏。大选帝侯彻底补救了损失。为了增加人口，他鼓励波兰的犹太人和其他遭到宗教迫害的难民移民到那里。他建立了一支有效的小规模常备军。在和平时期，他指派士兵进行公共工程的建设，包括修建易北河和奥德河之间的运河。

大选帝侯开创了霍亨索伦家族的军事化绝对主义模式。在继承遗产的时候，他发现在所有的三个领地上，即普鲁士、勃兰登堡和克莱沃—马克，统治者的权威都受到各个社会阶层即代表土地贵族与市民的中世纪集合体的限制。他为了取得至上权威同社会各等级进行斗争，并获得成功，而因此将代议制政府进入霍亨索伦王国的时间推迟了两个世纪。他逐渐将关键性的征税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

像路易十四一样，大选帝侯削弱了贵族的独立性。然而，与路易不同的是，他依靠的不是中产阶级官员，而是与拥有土地的士绅的有效联盟，特别是东普鲁士的容克一族。他巩固了容克地主对地产上农奴的绝对权威和对城镇的支配，并鼓励他们为国家服务，尤其是以成为军官的方式来服务。与其他的君主制相比，霍亨索伦家族的绝对主义甚至更依赖于君主与贵族的合作，而不是他们相互的对抗。

大选帝侯的儿子腓特烈一世（1688—1713 年在位）采用了“普鲁士国王”的称号，并且坚持如果想要他加入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国际上必须承认他的新地位。下一个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1713—1740 年在位），则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经济、绝对主义和军队上。他的节俭使他能够负担起他认为值得的临时计划，例如，资助 1.2 万南德意志的新教教徒向东德意志移民和

开发那里的新农田。

为了加强王室对国家机构的控制,腓特烈·威廉一世设立了一个小型的专家委员会,负责管理中央政府的各部和监督各省。这种安排将省级管理从地方势力中分离出来,使它处于王权更严密的控制之下。

腓特烈·威廉一世加倍了常备军的数量,并建立国家工场来提供枪支和制服。为了在他的人口稀少的国家保证劳动力的强度,他一年给军队休假九个月来务农。他十分谨慎,不采取冒险的对外政策。他所进行的仅有的一次重大军事战役是在大北方战争的最后阶段对瑞典的战役,普鲁士借此在 1720 年获得了瑞典的波美拉尼亚,以及位于奥德河口的重要的波罗的海港口斯德丁。

18 世纪的观察家将腓特烈·威廉统治下的普鲁士恰当地称为军营。国王忽视臣民的教育,很少关注艺术,极端的吝啬而拒绝给士兵的遗孀以抚恤金。然而,在国力上,他的统治极为出色。容克地主对霍亨索伦家族非常忠诚,送出了优秀的军官。军队尽管比法兰西、俄国或奥地利的规模要小,但在欧洲是最为训练有素和纪律严明的军队。

2. 俄国和彼得大帝(1682—1725)

比普鲁士的崛起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俄国在彼得大帝时期(1682—1725 年在位)作为一个主要强国的出现。在 1682 年,当沙皇费尔多·罗曼诺夫(Czar Fëdor Romanov)去世的时候,俄国仍旧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与西方的外交联系不多,对外面世界的了解也非常少。无论俄国人,还是外国人,同时代的人都注意

到了俄国社会各阶级中残忍、放荡、文盲和猥亵的流行。甚至大多数的教士也不识字。

在 1682 年,沙皇费尔多去世时无子,留下一个智力迟钝的兄长伊凡和一个有才能的姐姐索菲娅,二人都是沙皇亚历克西斯(Czar Alexis,1645—1676 年在位)与第一个妻子的孩子。10 岁的彼得是伊凡和索菲娅的同父异母兄弟,他为亚历克西斯第二个妻子所生。在亚历克西斯第一个妻子家族的强烈支持者与其第二个妻子家族的强烈支持者之间,明显而长期的宫廷争斗逐渐展开。起先,古老的俄国代表大会缙绅会议(the Zemski Sobor)选举彼得为沙皇。但是,作为反对派的领导者,索菲娅赢得了近卫军或称"火枪兵"的支持,那是一支特殊的武装力量。这批近卫军没有纪律性,并对他们的军官怀有怒气,对有序的政府是一个威胁。索菲娅怂恿近卫军攻击克里姆林宫,年轻的彼得看到狂怒的军队杀害了他母亲家族的一些成员。另外,他们杀死了许多住在莫斯科的贵族,掠夺了记录农奴身份的档案文件。索菲娅当时成为伊凡和彼得的摄政者,他们被敬称为联合沙皇。然而最终,近卫军遗弃了索菲娅,她在 1689 年被监禁于一个修道院中。在理论上,从那时起直到 1696 年伊凡死去,彼得和他的同父异母兄弟一起统治着俄国。

年轻的彼得几乎 7 英尺高,精力极其充沛。他着迷于战争与军事游戏,还是一个孩子时就建立了一支用来游戏的军团,其中的人员都是成人,他自己作为一个拥有普通军衔(不时提升自己的军衔)的士兵应征,从莫斯科兵工厂定制装备给军团,并以不屈不挠的毅力来训练它。当在一个谷仓中发现一只被遗弃的小船时,他解开了复杂的绳索,并在莫斯科荷兰水手的帮助下开动了它。与密友在一起所进行的演习、航行和休闲使他没有时

间与妻子在一起，彼得在 16 岁时所娶的妻子最后被送进了修道院。他抽烟、酗酒、狂欢作乐，好像几乎没有什么十分在意的。他在各种不同的时间从事木工、制鞋、烹饪、钟表制造、象牙雕刻、铭刻和治牙。彼得让莫斯科人感到震惊，因为他不能维持他们心目中合乎体统的沙皇的形象。当彼得将一位曾经当过许多其他人情妇的姑娘作为自己的情妇时，更进一步地冒犯了社会的道德观念，在她生下两个孩子之后，彼得最后在 1712 年娶了她。这就是皇后凯瑟琳(约 1684—1727 年)，一个充满活力与深情的女人，能够控制她难以共处的丈夫，其他任何人都做不到这一点。

期间，彼得指挥了一次对土耳其人的环黑海战役。在荷兰专家的帮助下，他驾驶一队小船沿顿河往下，于 1696 年在亚述海击败了土耳其人。与西欧国家组成一个反土耳其联盟的计划，在当时给了彼得一个借口，可以作为一个俄国君主开始自基辅时期的第一次外国之旅。西方的技术使他着迷，特别是在海军事务方面，而且，他还计划去荷兰、英格兰和威尼斯。他雇用了 700 名技师在俄国工作，通过出卖俄国烟草销售的垄断权给一个英国贵族而筹集钱款，并在旅行中参观每一种他所能找得到的工厂、博物馆或印刷所。

在彼得到达威尼斯之前，由于获知近卫军再次叛乱的消息而中断了行程。彼得匆忙回国，亲自参与了对他们的骇人听闻的惩罚。尽管许多无辜的人遭到折磨和屠杀，但是，彼得在俄国人的生活中粉碎了近卫军这支力量。他比之前的任何人都更坚决地想要使他的国家现代化，在旅行回国的那天，他召集朝廷弄臣帮助他着手剪掉朝臣的胡须。这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行动，因为东正教教会的传统认为上帝是有胡须的。如果男人是

以上帝的形象而塑造出来的,他也必须长有胡须;如果他剃掉胡须,他就成为将要被诅咒的人。彼得颁布法令,俄国贵族必须剃掉胡须,否则要为保留胡须的特权而交纳一种实质性的税款。彼得还要求世袭贵族(士绅的成员)和全部的城市人口必须放弃带水袖的长袍和高高的烟囱帽,而采用西式装束。传统衣服的制作被规定为非法的,彼得再次拿起剪刀,剪断了穿着那些衣服的人的袖子。

彼得越来越需要支持几乎不间断的战争,而且强烈渴望实现俄国的现代化,只有根据这些,我们才能了解他在国内的政策。由于奥地利和奥斯曼帝国在1699年签订《卡罗维茨和约》,他计划发起的反对土耳其的国际圣战破产了。因为感觉到奥地利已经背叛了俄国,彼得在1700年与土耳其单独和解。到那时,他已经在计划攻打瑞典。在这个计划中,彼得的同盟者是丹麦和波兰。

在查理七世(1697—1718年在位)的带领下,瑞典赢得了大北方战争(1700—1712)的开幕战。查理打垮了曾经强大的丹麦而使其退出战争,挫败了波兰占领波罗的海里加港的企图,在纳尔瓦(1700年)完全击败了数量较多但准备不佳的俄国军队。然而,查理没有长驱直入俄国,而是绕道进入波兰,在那里他用了7年的时间追击波兰国王,后者最终不得不放弃与俄国的联盟以及波兰王位。查理于是确保他的一个被保护人当选为波兰国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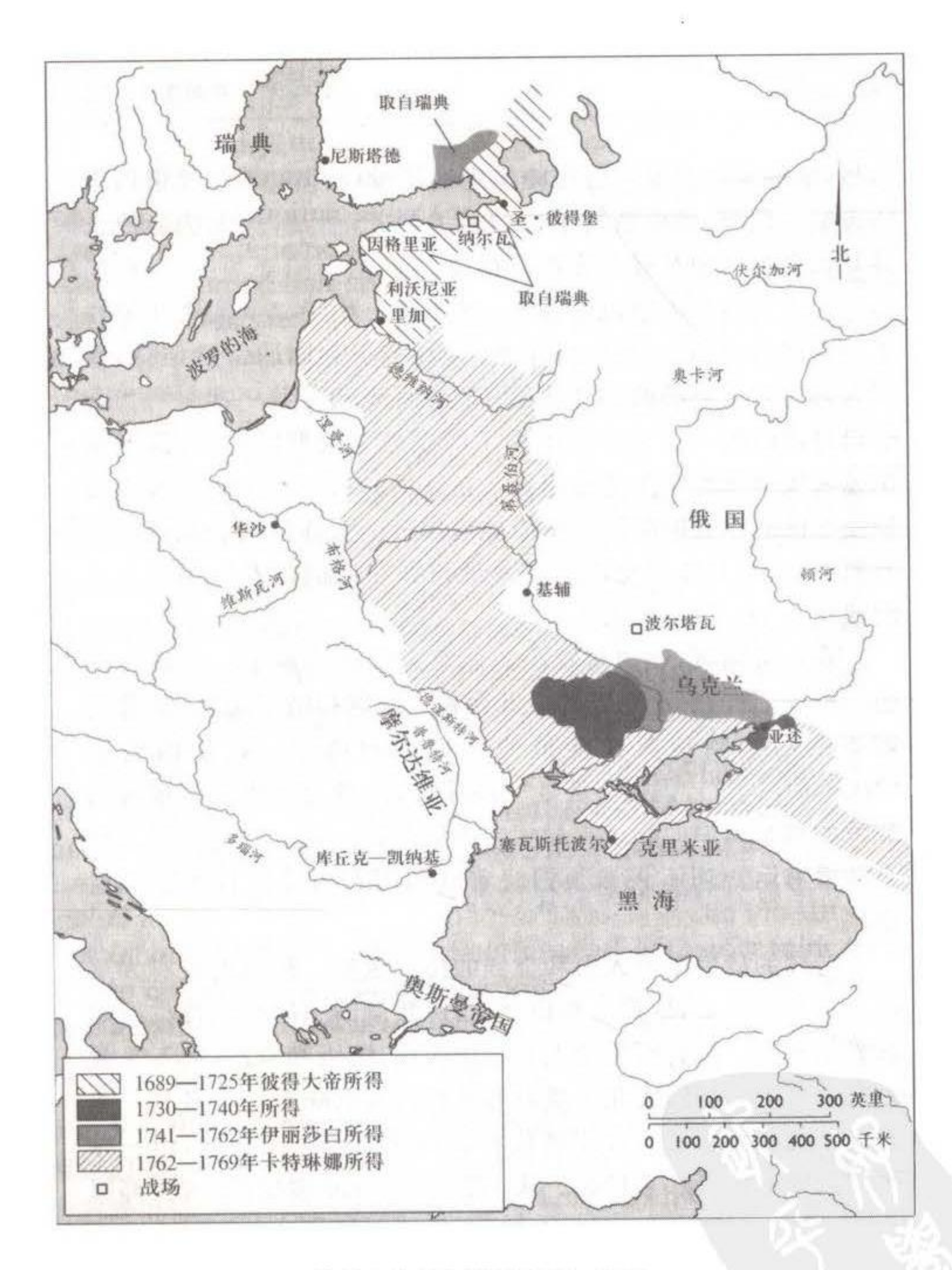
在此期间,彼得重建了军队,从瑞典取得了距离俄国最近的波罗的海省份因格里亚(Ingria)和利沃尼亚(Livonia)。在前者的沼泽地带,他于1703年建成了圣·彼得堡,最后将宫廷从莫斯科移到了那里。在1708年,查理进一步席卷了南面和东面而进入乌克兰,努力与哥萨克人联合作战。由于遭遇严冬而筋疲

力尽，瑞典军队在波尔塔瓦的决定性战役（1709 年）中被俄国军队击败。此刻，彼得恢复了他的波兰国王，但是，他无法迫使土耳其人交出已向其寻求庇护的查理。

为了对这次失败进行报复，查理在土耳其和俄国之间策划了一次战争（1710—1711），在此期间，基于共同的宗教信仰，俄国人向巴尔干半岛的土耳其基督教臣民发出了第一次呼吁。打着以拜占庭第一位皇帝君士坦丁的旗帜为模型的旗帜，俄国军队越入奥斯曼的摩尔达维亚省。在这里，彼得于 1711 年落入奥斯曼军队所设置的陷阱之中而被迫投降。土耳其人表现得出乎意料的宽大，只要求交出亚述海港口和在俄国与奥斯曼领土之间建立一个不设防的无人地带。

在外交领域，俄国与较小的德意志宫廷达成了一系列的同盟。查理七世在 1718 年的去世为和平谈判扫清了道路，尽管还需要俄国登陆瑞典才能迫使他们做出决定。在尼斯塔德（Nystadt，1721），俄国将芬兰归还瑞典，同意为获得之前瑞典沿波罗的海东海岸的领地支付相当大的金额。这一“西窗”的开放意味着海运交通不再必须围绕着欧洲南部边缘航行才能到达俄国。

持续的战争需要人力和金钱的持续供给。彼得的政府发展出一种征兵模式，依据这种模式，指定数量的家庭必须提供指定数量的新兵。尽管更多的人是死于疾病、饥饿和寒冷，而不是死在敌人之手，但是，大北方战争的旷日持久意味着幸存者是一支正规军的坚强核心。彼得抓住机会也建立了一支舰队，但一种俄国的海军传统从未形成。从 1725 年的 800 艘舰船（大多都很小），十年后就减少为不到 20 艘，商船队则根本没有存在过。



俄国在欧洲的扩张(1689—1796)

为了给军队和行政部门提供人员，彼得实行残酷的统治，在他的统治之下，所有的土地所有者都要为国家服役。对于没有登记的人，彼得判决“剥夺公民权终身”，使这些人不受法律的保护，任何人攻击他们都不受到惩罚。为国家服役成为生命中必须要做的，每个服役的贵族阶级的男孩在年满 15 岁的时候，都被在军队、公务部门或宫廷里指派一个未来的职位。当这个阶级的一个成员死亡的时候，他要将遗产完整无缺地传给他的儿子，不必是长子，这样遗产就不会在每一代都重新分割。因此，服役的贵族开始完全依赖于沙皇。这个体系为有才能之人开启了拥有一个辉煌生涯的可能性，因为一个没有财产或头衔的人，只要在任何公共部门中达到某个等级，就可以被自动封为贵族，并得到土地。

为了筹集现金，彼得减少了通货，几乎对每件事情都征税，如销售、租赁、房地产、制革厂、浴场和蜂房，并任命专门的国家岁入发现者来考虑新的税收。政府对多种产品持有垄断权，包括盐、油、棺材和鱼子酱。然而，对每个家庭征收的基本税收不能提供足够的国家收入，部分因为战争和不幸已经导致家庭数量的下降，部分因为家庭正联合起来逃税。彼得政府因此用对每个男性征收人头税的办法来代替原来的征税方式。这次改革需要一次新的人口普查，普查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却无意的社会后果。普查的执行者将许多介于自由人身份和农奴身份之间的人归为农奴。这些人于是发现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被标记为不自由的人，被从一个主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主人手里。

在行政管理方面，首次设立新的部门（特辖制）来集中处理从各种来源获得的资金。为提升军事效率而采用的军区系统导致省的建立。每个省都有自己的地方长官，许多之前由中央政府承担的表现为无效率的功能便被分给地方了。

最终,彼得模仿瑞典的中央部门系统,取代了过去的特辖制,建立了 9 个“院”,分掌外交事务、军队、司法、开支等等,每个院由一个 11 人执行管理委员会所管理。这种安排通过使一个执行管理委员会的每个成员都要受到同僚的制约而阻止了腐败,但是,却导致了在最后决定上的拖延,最终决定只有经过长时间的协商之后才能做出。

为了培养未来的军官,也为了培养许多公务员,彼得建立了海军、军事和炮兵学院。因为仍旧为教会所控制的俄国初等教育发展不充分,便不得不召集国外的学者到学院任教。在较低的水平上,彼得继续进行实践:引入技师和技工,将他们的技巧教给俄国人。沙皇用保护关税和免税来刺激和鼓励制造业。尽管有时雇用了许多劳动力,工业企业还是效率低下。如果农奴被作为与工厂本身是一体的来买卖,工厂主就可以买卖农奴。这种“占有性”的工业农奴制不能为努力工作提供大量的激励。

彼得也将教会纳入到学院体系之中。因为知道教士有多么不喜欢他的新制度,当莫斯科总主教在 1700 年去世的时候,他开始不去任命继承者。在 1721 年,他将教会置于一个代理机构的管理之下,这个机构起初被称为“精神学院”,后来称神圣引领会议(Holy Directing Synod),由一个俗人主管。保守派教士越来越认为彼得本人是反基督者。

彼得的秘密警察的记录中充满了抱怨,这些都是他的手下在到处打听颠覆性言论时所听到的。农民的丈夫和父亲被抓到遥远的战场上作战,或到沼泽地劳动来修建一座只有彼得似乎想要的城市。农奴的数量在增加。服役的人们发现自己被宣告整个一生为沙皇工作,很少能够去看看自己的产业。

较低等级的社会反抗采取农民起义的形式,这些起义遭到

极端残酷的惩罚。农民叛乱者的通常同盟者是哥萨克人，他们被大量处死，并被蛮横地剥夺了传统的独立性。贵族和教士的反对派领袖将他们的希望集中在彼得的儿子亚力克西斯身上。亚力克西斯通过表示与他们的意见相同而煽动他们的希望之火。最后，他逃亡国外，寻求其姐夫奥地利皇帝查理六世的庇护。彼得许诺原谅他，引诱他回国，将其折磨致死在自己的面前。

在许多方面，彼得只是强化既存的俄国制度和特性。他使一个强大的独裁政府甚至更加强大，使一个通用的服役法令甚至更加严厉，使一个农奴更像一个农奴。他的国外之旅、他对外国道路的喜爱、他对先进技术的关注、他的重商主义、他的战争，所有这一切都能够在他统治之前的俄国历史中找到先例。在他对教会动手之前，教会已经被旧礼仪派（Old Believers）的分裂所削弱了。也许彼得真正激进的地方是在日常举止和行为领域。他对胡须、服装和历法（他采用西方从基督出生计算日期的方式）的抨击，他对仪式的憎恶和对体力劳动的喜爱，这些的确都是新出现的，他在行动时所具有的异常的精力和激情也是如此。它们是彼得赢得革命性的声望即彼得大帝的决定性因素。

在外交事务上，俄国发现自己遭受了持久的封锁，甚至被同盟者所封锁。无论俄国什么时候努力进入中欧或西欧，普鲁士或奥地利就会放弃与它的任何联盟。结果，俄国统治者不信任欧洲人的外交而坚持一种实质的防御政策。到 18 世纪中叶，俄国已经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军事强国，在仅仅一年的时间里就把炮兵增加了一倍，并拥有欧洲最好的步兵和最好的射击技术。正如哥萨克人战争中的无纪律本性，缺少重型马匹也抑制了骑兵的发展。但是，到俄国占领东普鲁士的时候（从 1758 年到 1761 年），哥萨克人也因他们的严格风纪而被注意，欧洲君主害怕俄国

的影响,不断进行反对沙皇的宣传,甚至与沙皇结盟时也是这样。

3. 波兰和奥斯曼受害者

到18世纪早期,波兰和奥斯曼帝国在地图上仍旧显得规模庞大而重要,但是,两个国家都受到无能政府和落后经济的困扰,并且出现了大量的民族与宗教少数派。天主教波兰和穆斯林土耳其的东正教基督徒开始向俄国寻求保护。而且,两个国家明显的衰退刺激了强大邻邦的侵略欲望。在这个世纪末来临之前,作为一个独立强国的波兰将消失,它将为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所瓜分。土耳其得以继续维持,但是,已经开始招致"欧洲病夫"的名声。

波兰政府是一个奇特的政治产物。君主制是选任制:每次王座空位时,议会选择一个继承者,继承者通常是提供贿赂最多的那个候选者,有时甚至是一个外国人。一经被选出,国王就几乎是无权的。议会由贵族掌控,自从17世纪50年代就实行"自由否决权",由此议会中任何一个成员通过大叫"我不想要它!"就可以阻止任何提议。这个议会不是我们熟悉的议会,而是一个贵族的集会,每个人行事都以自己获得权力为依归,所以一致同意的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组织松散的国家没有正规军,没有外交机构,没有中央官僚机构。

奥斯曼帝国仍然是一个运作之中的国家,然而,它正越来越远地落后于主要的欧洲强国,特别是在财政稳定性和技术方面。直到19世纪的时候,才出现一个苏丹,他试图对传统进行大规模的抨击,正如彼得大帝所做的那样。在18世纪,苏丹们几乎都沉迷于后宫美色而被俘于后宫的阴谋,很少能够规范那些如

禁卫军——属于精锐的军事等级成员——这样有权势的群体，这些群体利用特权肆意妄为，忽视了士兵的责任。然而，这个棘手的政府至少还在统治，并在战争中表现出相当大的持久力。所谓的波兰和土耳其问题将支配着下半个世纪的国际政治。

四、战争和外交（1713—1763）

18 世纪早期的国际平衡并不稳定。如果强国决定去掠夺弱国，那么这种平衡就会倾覆。大北方战争导致了一种这样的倾覆，使得俄国代替瑞典成为波罗的海地区的统治力量。在 18 世纪大部分的时间里，俄国的扩张继续威胁着国际平衡，主要的受害者是波兰和土耳其。对国际平衡的第二个主要威胁来自于普鲁士的扩张，以奥地利、波兰和瑞典为代价。第三个威胁来自于不列颠、法国和西班牙波旁王朝之间的殖民地与商业竞争。

这些不是那个时候仅存的国际问题。奥地利与法兰西之间的旧的竞争仍旧活跃着。竞争因为西班牙菲利普五世的第二个妻子伊丽莎白・凡尼斯的野心而变得复杂化，她赢得法兰西的支持，威胁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势力。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是精力旺盛的扩张主义者，意图将土耳其人从多瑙河流域驱逐出去而将自己的领地向东南延伸至黑海。

所有这些竞争的相互作用都导致了力量上的不断变化，但是，一种国际平衡却得以普遍地维持。旧制度中的政府所拥有的有限财政资源只允许进行有限的战争。在战场上，将军们不愿意冒失去士兵的危险，因为士兵代表了在训练上的巨额投资，根据惯例，他们喜欢进行围城，这是所有交战国都十分清楚的。在和平谈判中，外交官们不愿意摧毁对手，他们通常寻求被判给

一点领土或者一个不重要的王位,以补偿所付出的较大损失。对波兰和土耳其问题的处理,为正在进行中的传统国际政治提供了清晰的例子。

1. 土耳其和波兰问题(1716—1739)

在1716年,奥斯曼帝国卷入了与奥地利的一次战争,结果签订了《帕萨洛维茨条约》(*Treaty of Passarowitz*,1718),通过这个条约,查理六世收复了仍旧处在土耳其统治下的匈牙利部分,还有奥斯曼在多瑙河谷的其他一些土地。另一场奥地利—土耳其战争(1735—1739)变更了帕萨洛维茨协议。在这次战争中,奥地利与俄国结盟,但是,它们在未来战利品的分配上陷入了争吵。最后,却没有什么可分配的,查理六世不得不将1718年吞并的多瑙河土地归还给土耳其。奥地利与土耳其在1739年通过谈判达成和解,在此期间,法兰西给予奥斯曼帝国以强大的支持。18世纪30年代早期,波旁王室和哈布斯堡王室也在波兰王位危机上选择了相互对立的关系。这个阶段被确定为波兰王位继承战争(War of the Polish Succession,1733—1735),一个波兰竞争者、查理七世的被保护人斯坦尼斯拉斯·勒泽克赞斯基(Stanislas Leszcynski),还有法兰西和西班牙,与一个彼得大帝的被保护人奥古斯都三世处于对立之中,奥古斯都三世同时还得到奥地利的支持。

外交人员迅速设计出一个折中和解方案。这个和解使奥地利和俄国更为满意,奥古斯都三世取得了波兰王位。然而,从法国的立场来看,斯坦尼斯拉斯·勒泽克赞斯基的损失得到了很好的补偿。他获得了法兰西东北边境上的洛林公国,并规定当他死

去的时候，洛林公国将留给他的女儿即法兰西路易十五的妻子玛丽，所以也就留给了法国君主。洛林公国的现任公爵哈布斯堡王朝的女性继承人玛丽亚·特蕾西亚的未来丈夫弗朗西斯被奖给托斯卡纳大公国。最后，作为和解的副产品，伊丽莎白·凡尼斯 20 年的坚持取得了结果，为她较年长的儿子获得了那不勒斯王国。

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似乎像是为一个没有实权的王位所做的杂乱无章的事情，战后和解主要影响了意大利和洛林公国，似乎是一个明显的外交枝节问题。然而，整个波兰危机却巧妙地说明了王朝战争的运作和力量的平衡。政治家将王位看作为外交奖赏，它的归属与所涉及的全体居民的愿望无关。18 世纪 30 年代的复杂安排使几乎每个人都得到了利益而保持了力量平衡。尽管外交人员没有在波兰问题上阻止一场小的战争，但他们的确阻止了它成为一场大战。

2. 奥地利的王位继承(1739—1748)

因为沃波尔和弗勒里都寻求国外的稳定，以便促进国内经济的复苏，所以，不列颠和法兰西在 18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处于合作关系。然而，由于对商业和霸权的争夺，两个大西洋强国之间的合作关系破裂了。无论沃波尔，还是弗勒里，都不能阻止不列颠和波旁君主国之间世界范围的战争，战争爆发于 1739 年，并一直持续到 1815 年拿破仑的最后失败，期间只伴有短暂的和平。实际上，这“第二个百年战争”在半个世纪之前的路易十四时代就已经开始了。1713 年的乌德勒支和解没有完全解决不列颠与法兰西之间的对抗(还包括法兰西波旁王室的合伙人西班牙)。因此，1739 年战争可以看成是一场新争斗的开始，

也可以看成是一场旧争斗的再起。

隐藏于1739年危机之后的细节问题是相对次要的问题,它与不列颠对《贩卖黑奴合同》(*Asiento*)所许特权结果的失望有关。正如南海公司所发现的,《贩卖黑奴合同》只是象征性地让不列颠分享西属美洲殖民地的贸易。英国船长不能合法地获得通过走私得到的东西,而且,西班牙通过在美国水域安排海岸警卫巡逻来进行报复,以挡住走私者。英国商人抱怨西班牙巡逻兵粗暴地对待他们,在1736年他们把一名船长罗伯特·詹金斯(Robert Jenkins,辉煌时期1731—1738年)带到议会上,他声称西班牙人的残酷使他失去了一只耳朵,并及时展示了保存在盐水和棉絮中的耳朵。当被问及失去耳朵的反应时,他回答说:"我将我的灵魂托付给上帝,我将我的事业托付给我的国家。"在10月,到教会钟声欢乐地响起之时,不列颠开始了对西班牙的詹金斯耳朵之战。不列颠舰队失去了加勒比海的开幕战,法兰西完全表现出对西班牙的支持。

在1740年,一连串的事件将殖民地战争同欧洲在奥地利王位继承上的巨大冲突联系到了一起。当1740年查理六世去世时,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传给了他23岁的女儿玛丽亚·特蕾西亚(1740—1780年在位)。德意志亲王不顾保证她继承王位的《国事诏书》而期望分割哈布斯堡家族的遗产。哈布斯堡家族的一个远亲巴伐利亚选侯也希望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然而,第一个发动攻击的德意志亲王却是刚刚继承普鲁士王位的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在1740年12月,腓特烈突然入侵哈布斯堡王朝的西里西亚省。

在继起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中,英格兰和奥地利在同一条阵线上来抵制法兰西、西班牙、普

鲁士和巴伐利亚。普鲁士军队以长时间的夜行军、突然的侧翼攻击和其他的惊人战术——十分不同于通常深思熟虑的围城战——而令欧洲惊讶。然而,腓特烈却对抗他的同盟者,再三地遗弃他们而与奥地利达成一些秘密和平协议。他几乎没有做什么来支持巴伐利亚选侯想做皇帝的渴望,后者作为皇帝查理七世仅仅享有了一段短暂的在位期。

英奥联盟运作得没有法普联盟良好。许多英国人感觉到汉诺威的乔治二世正在使他们卷入奥地利王位继承和其他德意志的问题当中而出卖了他们的利益。然而,当被废黜的詹姆斯二世的孙子漂亮王子查理得到法国的支持并在 1745 年登陆不列颠的时候,显而易见的是,英国人对汉诺威王室的偏爱多于对斯图亚特王室的,对新教教徒的偏爱多于对天主教教徒的。查理只在苏格兰高地地区的人中赢得了相当数量的新兵,在那里于 1746 年兵败卡伦顿(Culloden)。

在中欧,战争在普鲁士崛起而成为一等强国的过程中是一个决定性的步骤。新的西里西亚省不仅使普鲁士的人口大量增加,也带来了一种重要的纺织工业和大量的煤矿与铁矿。玛丽亚·特蕾西亚得到的补偿不能弥补失去西里西亚的损失。尽管她的丈夫弗朗西斯赢得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但她不得不将帕尔马和北意大利的一些其他的小块领土交给伊丽莎白·凡尼斯的第二个儿子菲利普。

1748 年在艾克斯-拉-夏泊尔达成的和约仅仅维持了八年。然后,七年战争(1756—1763)就爆发了,部分原因在于亚琛和约所遗留下的没有解决的老问题,部分原因在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所引发的新的不平。在南印度,英国和法国的东印度公司由于要在本地王子的竞争中做出选择而彼此争斗。到 1751 年,精力

充沛的法国行政官约瑟夫·杜普莱克斯(Joseph Dupleix,1697—1763)赢得了争夺印度次大陆霸权斗争的首轮胜利。之后,由同样精力充沛的罗伯特·克莱夫(Robert Clive,1725—1774)所带领的英国抓住了主动权。1754 年,杜普莱克斯被法国公司的董事们召回国,他们不愿意将昂贵的资源用于他的侵略性政策。

在北美,来自大西洋海岸的英国殖民者已经竖起木桩声称拥有阿巴拉契亚山脉和密西西比河之间肥沃的荒野。但是,法国人同样意图拥有这片地区,他们率先行动,在宾夕法尼亚西部,从普雷斯克岛(Presque Isle,后来的伊利 Erie)南到杜克斯尼堡[Fort Duquesne,后来的匹兹堡(Pittsburgh)]之间建立了一连串的要塞。1754 年,一支弗吉尼亚人的军队在一个年轻人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的指挥之下曾试图将法国人驱逐出杜克斯尼堡,但没有成功,从而开始了一场最终以英国人的胜利为结局的战争。

3. 外交革命和七年战争(1756—1763)

在欧洲,同盟关系的戏剧性变化被称为外交革命,它稍早于七年战争的正式爆发,而那时战争已经在殖民地开始了。不列颠在 18 世纪 40 年代已经加入奥地利来反对普鲁士,如今它却同腓特烈大帝开始合作。在外交革命中最戏剧性的变动是法兰西与其历来的敌人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走到了一起。

1755 年,英国人触发了这次外交革命。为了在提防汉诺威王室的任务中争取第二支力量,他们同俄国缔结了条约,后者曾作为英格兰的盟友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发挥过一点作用。英俄条约使腓特烈大帝警觉起来,在 1756 年 1 月,普鲁士国王同不

列颠缔结了一份使不列颠与俄国分离开的同盟条约。英格兰与普鲁士之间的同盟孤立了法兰西,从而使奥地利首相获得了他一直在等待的机会。奥地利若要对腓特烈进行报复而重获西里西亚,它所需要的正是一个拥有大量军队的盟友,这就要求与法兰西结盟,而不是不列颠。外交革命的最后一幕是俄国加入了法奥联盟。

与之前的战争一样,新的战争实际上是两个分开的战争:一个是大陆战争;另一个是海战和殖民地战争。在七年战争的大陆战役中,腓特烈大帝面对着奥地利、法兰西和俄国的军队,这三国的总人口比普鲁士人口多 15 倍以上。除了不列颠,腓特烈几乎没有盟友,而不列颠只能提供财政援助,很少有实际的军事援助。为了填补军队的职位空缺,他违反国际法,让其较小的邻邦麦克伦堡和萨克森的士兵代表普鲁士军队作战。因为英国的财政援助只能满足他战争费用的一小部分,腓特烈没收了萨克逊人、波兰和俄国的硬币,将它们熔化而为普鲁士所用。

挽救普鲁士的决定性因素是其敌对联盟的动摇。俄国的将军意想不到地胆怯,法兰西和奥地利的将军则表现得无能。而且,法国人这个联盟中最强大的力量不得不在欧洲和海外两线作战,它的财政资源无法供给两方。

在奥地利首相冯·考尼茨亲王(Prince von Kaunitz,1711—1794)所建立的大联盟中,战时同盟的典型特点,即摩擦、猜疑和目标不一致,在不寻常地扩展。实际上,这个联盟是经不起战争的。俄国伊丽莎白(1741—1762 年在位)于 1762 年 1 月去世之后,沙皇彼得三世即位,他是腓特烈大帝的热情崇拜者,立即使俄国军队处于腓特烈的支配之下。尽管他的俄国王位只坐到 7 月,但彼得的统治标志着七年战争的一个决定性转折。在 1763 年,普鲁士赢得了这场战争。

史海钩沉

腓特烈大帝给其将军的指示(1753年)

为什么腓特烈大帝的军队如此有战斗力？部分原因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部分是因为他的思维敏捷，能够准确和迅速地判断一个战术问题；部分原因在于他思考并写下了一名优秀军官所应具备的特质。对腓特烈更多的论述见第三章。

在我的部队编制中，要求指挥官要最为严谨并保持最持久的注意力。永远保持最严格的纪律性，对他们的健康给予最大的关心，他们也应该差不多比欧洲任何军队都得到更好的食物补给。

我们的军团一半是我们自己的人民，一半是为了钱而应征的外国人。后者只是等待一个最好的时机来解除一种服役关系，他们对此没有特别的忠诚。所以，防止叛逃成为一个重要的注意事项。

我们的许多将军都认为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能力都差不多好，设想如果空缺被填上，这个人对整体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你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这个人会被其他军队合适地利用来对付我们自己。

如果一个逃兵被一个同样训练有素和纪律严明的人所替代，这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但是，如果一个服役两年、熟悉了武器和军事训练的士兵逃跑了，代替他的人是一个糟糕的人，或者根本没有人代替，结果一定最终被证明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一些军官对这个细节的疏忽已经发生了，使军团不仅减少了数量，而且也失去了声望。

因为此类事件的发生，在真正最需要我们军队完备化的时期，我们的军队却变得脆弱了，除非这个情况引起最高的重视，否则你将失去你最好的军队，永远无法挽回。

尽管我们的国家住满了人口，但是，有疑问的是许多人是否符合我的士兵的高度。即使对他们没有要求，他们能立即成为受过训练的士兵吗？所以，对于指挥军队或分遣队的将军来说，防止叛逃是一件最基本的职责。下面这些做法将会起到效果。

第一，扎营不能过于接近树林或森林，除非有充分的理由。

第二，每天经常点名。

第三，经常派遣轻骑兵巡逻队，在国家和营地迂回地仔细察看。

第四，夜间要在谷地里安置追击兵，并在黄昏时加倍骑兵岗位，以加强管束。

第五，不允许士兵到处闲逛，并注意每支骑兵部队都由军官带领，定时让马饮水和吃草料。

第六，严惩劫掠行为，因为它产生了各种秩序混乱和违法乱纪。

第七，行军时，哨兵被安排在村庄内，直到军队处于备战状态时再召回他们。

第八，最严厉地禁止任何行军中的士兵放弃他的职位或分工。

第九，避免夜间行军，除非事所必需。

第十，当步兵通过树林时，抓紧将轻骑兵巡逻队置于左右两侧。

第十一，将军官置于隘路的每一终端，而使士兵安于他们的正确位置。

第十二,向士兵隐瞒任何你可能被迫做出的撤退行动,或者对此给予一些似是而非、冠冕堂皇的借口。

第十三,对固定必需的给养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并注意供给军队面包、肉类、啤酒、白兰地酒等。

第十四,当叛逃蔓延至团队或连队中时,调查罪行的根源,查究士兵是否接受了指挥官的宽大和其他根据惯例的赦免,指挥官是否渎职。决不放松纪律性是任何时候都必须的。有人会说上校将处理这项事务,但是,他自己的努力并不够,因为在一支军队中,每一个个体都应该追求完整性,而使得这项工作似乎像是仅仅由一个人来完成的那样。

一支军队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懒惰和消极的,除非将军不断地盯住他们,让他们履行自己的责任,否则这台即使给予最大的关心也不能尽善尽美的人造机器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支离破碎,而只有建立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的直接想法才将继续保留下来。

军队不断地雇佣士兵是必不可少的。采纳这一计划的军官所具有的经验将使他们意识到这个计划的良好效果,他们也将认识到日常的弊端应该予以纠正,那些对此没有察觉的军官,是因为他们过于懒惰而没有努力发现弊端……

战争也许在三个不同的国家展开。或者在我们自己的国土内;或者在中立国的领土内;或是敌对的国家内。

如果荣誉是我唯一的目标,除非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我将决不开战,原因在于它各方面的优势,并且,在那里每个人都充当着密探,敌人每移动一步都会被出卖……

当战争在中立国进行时,优势似乎是均等的,那么所注重的目标就是凭借当地居民的信任和友谊与敌人对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最为严格地服从纪律,严格禁止劫掠和各种

抢劫,触犯者予以严惩,以儆效尤。除此之外,遣责敌人隐藏了一些对这个国家有害的图谋不是错误的事情。

如果我们身在新教国家,我们会佩戴路德教信仰保护者的标志,设法使较低等级的人民成为狂热的信仰者,他们的纯朴保证他们不会不利于我们的谋略。

在天主教国家,我们要宣扬宽容和节制,经常将不同宗教派别之间存在的所有仇恨都诬蔑为教士所造成的,尽管除了一些争论,他们都赞同宗教信仰的物质要义……

在完全敌对的国家,如波希米亚(Bohemia)和摩拉维亚(Moravia),你不可冒任何风险,决不要派遣一组士兵行动,原因已经提到过,因为那里的人民远没有你所看到的那样可信。更大部分的轻装部队要用来护卫,因为你永远也不要希望获得这个国家居民的友爱……

现在留给我们处理的所有事情是狂热,要知道如何去鼓舞一个民族拥有支持宗教自由的热情,并审慎地向他们暗示,他们遭受到他们的大人物和教士多大的压制。也许可以把这说成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竭尽全力……

As quoted in Geoffrey Symcox, ed., War, Diplomacy, and Imperialism, 1618—1763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pp. 190—192, 200—201.

在此期间,腓特烈的英国同伴正在失去海外战场。在一年半的战斗中,英国人几乎在每一条战线上都遭受到挫折。在海上,他们失去了重要的地中海基地,位于巴里阿利群岛的米诺卡。在北美,英国人一再错失战机,但英国最为引人注目的不幸

发生在印度。1756年6月,孟加拉的行政长官——一位法国人的支持者——将加尔各答的146名英国囚犯塞进一间只有两扇窗户的小屋子里。因而发生的事情,正如一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官员所描述的,以"黑洞"为人所知,在这次事件中,英国人利用了公共舆论:

> 那是那年最炎热的季节,夜间罕见地闷热……他们身体之间的过度挤压和门一关上后就蔓延开来的难以忍受的高温,使这些囚犯意识到在这个恐怖的禁闭下,不可能活过这个晚上。于是立即想要强行将门挤开,但是没有奏效,因为门是向里面开的。在2点钟的时候,还有不到50人活着。但是,甚至这个数量对于剩下来的空气来说都太多了,为获得空气和生命的竞争一直持续到日出……
>
> 一个官员……得到命令过来打开禁闭室的大门。死了的人紧紧地挤压在一起,幸存者也几乎没有力气了,所以,幸存者使用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才将挡在门前的尸体移开而清理出一个一次只能允许一个人出去的出口。146个人进去,却只有23个人活着出来。*

威廉·皮特(William Pitt,1708—1778)扭转了局势,使之有利于不列颠。他给腓特烈送去了实质性的政府援助,从而巩固了英普联盟,并将汉诺威的英国军队置于一名有才能的普鲁士司令官的指挥之下。他替换了浮躁的将军和海军上将,并采取积极的措施,扭转了海军和殖民地的战局。

---

* Robert Orme, *A History of the Transactions of the British Nation in Indostan* (London: J. Nourse, 1778), pp. 74, 76.



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1763 年）

在皇家海军最终击败了法国的大西洋和地中海舰队(1759年)之后,不列颠控制了海洋。不列颠因此能够继续进行兴盛的海外贸易,而法国的海外贸易则迅速下降为战前的六分之一。由于被切断了供给和来自母国的增援,并面对着普遍优良的英国军队,法属殖民地很快陷落。在非洲,不列颠夺取了主要的法属贩奴站点,从而使南特的奴隶贩子破了产;在印度,克莱夫和其他人为了报复"黑洞"事件,惩罚了孟加拉的行政长官,并占领了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附近关键的法国据点;在西印度群岛,除了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法国人失去了他们所有的产糖岛屿。在北美,6.5 万名法国人,缺少供给和领导,与受到母国完全支持的上百万的英国殖民者进行着无助的对抗。杜克斯堡被占领,以皮特(Pitt)重新命名,英国人继续在战争中取得其他的胜利,由于法国人与土著的美洲酋长之间的联盟,英国殖民者将这场战争称之为法国和印第安战争(the French and Indian War)。在加拿大,英国将军詹姆斯·沃尔夫(James Wolfe,1727—1759)夺取了路易斯堡(Louisburg,1758)。第二年,他便丢了性命,但却在魁北克亚伯拉罕平原会战(Plains of Abraham)的伟大胜利中赢得了不朽的声望。剩下的法属要塞蒙特利尔于 1760 年陷落。

尽管皮特赢得了战争,但他没有取得和平。乔治三世(1760—1820 年在位)在 1761 年将他解职。在《巴黎和约》(*Peace of Paris*,1763)中,法国人恢复了他们在西印度群岛的岛屿,这些岛屿作为蔗糖产地具有很大的价值。尽管加勒比海地区的英国种植园主的状况得到很大缓解,因为他们的市场在战时曾经充斥着来自于英国所占领的法属岛屿的蔗糖,但是,爱国者似乎被激怒了,因为不列颠好像让重大的战利品从指间溜走了。

然而,法兰西丢失了在北美大陆上的全部占有物。不列颠

确保了加拿大，以及阿巴拉契亚山脉与密西西比河之间有争议的领土。而且，曾在1762年战争已没有希望的时候加入法兰西作战的西班牙将被称为东佛罗里达的半岛和墨西哥湾海岸，直到被称为西佛罗里达的密西西比让与不列颠。作为补偿，法兰西将新奥尔良市和密西西比河以西辽阔的路易斯安那土地给了西班牙。在印度，法兰西恢复了它的领地，条件是不能对它们进行设防。对于不列颠来说，七年战争标志着在印度实质上的完全支配地位的开始，对法兰西来说，这场战争标志着它的“旧帝国”的真正结束。

4. 国际平衡的回顾

胡贝尔图斯堡和巴黎和约结束了将在路易十四之死和法国大革命爆发之间发生的最大的国际危机。新的危机将会出现，但是，它们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平衡，它们只是增强了长久以来一直在进行中的转变。尽管美国独立使不列颠付出了13个殖民地的代价，但是，不列颠在1763年所取得的海上和帝国霸权并未受到严重影响。

因此，在1763年所确立的国际平衡直到1789年仍未有大的改变。在18世纪不停的权力争斗中，获胜的国家是不列颠、普鲁士和俄国。法兰西、西班牙、奥地利、瑞典和土耳其幸存下来，尽管它们遭受到了损失。正如那个世纪早期一位西班牙外交官所观察到的那样，最弱的单元波兰和意大利正在“像那么多的荷兰干酪一样被削掉和切割成分”。

不列颠和波旁帝国之间的世界性争斗为证明重商主义的观点提供了很多依据，重商主义观点从不断地竞争和斗争上来构

想国际关系。根据重商主义的固定贸易总量学说,一个国家只有通过战争或者走私和报复性立法,减少敌对国家所持有的份额,才能扩大自己在即存供给中的份额。由于七年战争中英国保持海外贸易的成功和法国的失败,所有这一切都得到了印证。

经济学不能完全说明那个世纪国际平衡的变化。例如,在腓特烈大帝的胜利中,对普鲁士资源不断提高的有效利用率发挥了作用。但是,他的成功仍旧更多地依赖于他自己的领导、军队的纪律和他所指引的社会。不列颠似乎为商业的至上影响力提供了证据,因为皮特将艰难的国家财政和商业资产转变为实际的优势。然而,不能仅仅用经济学来解释皮特本人,因为他之所以成为首相也许是由于一种政治系统、社会观念和一种实用的发现领导方式,它们使正确的人能够在正确的时间出现。

处于之前的宗教冲突时期和法国大革命所发动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风暴之间的 18 世纪,如果排除战争因素的话,是一个社会比较平静的时间段。例如,七年战争在破坏力上不能与三十年战争相比,这不只是在于战争时间的相对短暂,还表现在更多的方面:在作战者中很少有人具有一种为了某一崇高的事业而战斗的感觉,如天主教、新教或民族独立。与 100 年前比较起来,战斗本身得到更有序的指挥;士兵更加服从纪律,陆军得到更好的供给;军队驻扎在露天,很少和不再对市民的生命和财产构成威胁。战争甚至趋向于反映了启蒙时期秩序和理性的特点。

可是,在相对感到秩序性的现实——理性和妥协、开明的专制君主和明智的,甚至是愤世嫉俗的外交——之下,大量的人口继续生活在债务、疾病、被剥夺和穷困之中。竞争性的国家体系在社会顶端变得越来越有功效,而对社会底层似乎越来越表现为凑合了事。

五、本章小结

旧制度，1789 年之前存在于法兰西和欧洲的这一制度，同时展现出中世纪和现代早期世界的特点。经济还主要是农业经济，但农奴制在西欧已经消失。旧制度的社会基础来自三个等级。在 18 世纪，旧制度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逐渐遭到抨击。

旧制度的经济基础部分地受到了加速的商业步伐的挑战。欧洲国家被强烈逼迫着偿还 17 世纪的战争所积累下来的债务。在法兰西，约翰·劳试图通过发行由国家财富所支持的纸币来恢复货币的稳定性。在法兰西和英格兰，当这些试验导致大规模投机泡沫爆发的时候，管理国债的尝试都引起了混乱。南海公司的失败震动了整个英格兰，但却迫使政府建立一套更加安全的银行系统。

另一个经济革命发生在农业方面。耕作技术的进步和如芜菁等新农作物的利用使农民能够生产更多的粮食。产量的增加结束了欧洲的普遍饥荒。在英格兰，圈地造成了大范围的社会混乱，但却产生了一种新的劳动联营体。

第三个经济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开始，显著地表现在纺织工业上。新机器迅速提高了产量，将单一的制造厂组织起来。新的冶炼技术帮助煤炭开采成为一种重要的商业。

不列颠在这些经济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在最初两个汉诺威国王在位期间，议会拥有至上权威，在沃波尔的领导下内阁体系发展成形。然而，不列颠还不是民主政体，因为只有“绅士”有权投票。对于大众来说，特别是对于伦敦市内正在增加的城市贫民窟中的人民来说，生活极其严酷，但是，统治阶级对此有所回应，意图进行所需要的改变。

在18世纪,法兰西为平庸的领导所拖累。枢机主教弗勒里是个例外。他推行稳定货币制度和鼓励工业的经济政策。尽管路易十五没能成功地开启所需要的改革,但是,法兰西仍旧是一个强国,法国文化支配着整个欧洲。

到18世纪为止,西班牙在欧洲的权力平衡中不再占有优势。西班牙统治者全神贯注于意大利,在那里,他们的要求与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要求发生了冲突。

自从17世纪中叶以来,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的统治者一直在努力增加他们的领地和获得国际承认。他们的努力集中在经济、绝对主义和军队方面。贪婪的腓特烈·威廉一世将普鲁士军队建成为欧洲最精锐的力量。

在彼得大帝的统治下,俄国成为一个强国。由于对西方科技的着迷,彼得将外国专家带到俄国来传授俄国人现代技能。在对外政策上,彼得通过连续地进行战争来使俄国得到扩张。对瑞典的大北方战争(1700—1721)使彼得取得了他的"西窗"。他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加强了专制政治。

俄国和普鲁士的扩张,英格兰与法兰西之间的敌对,以及奥地利与法兰西之间的竞争,经常威胁着18世纪的力量均衡。在18世纪早期,不列颠和法兰西采取外交合作来保持平衡。然而,到了1740年,殖民地和商业对抗使两个强国陷入争执。因此,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39—1748)中,不列颠和奥地利组成联盟来反对法兰西、普鲁士、西班牙和巴伐利亚。

一场外交革命发生在七年战争(1756—1763)前夕,也是在不列颠和普鲁士联合反对法兰西和奥地利——法与奥本为夙敌——之时。在18世纪的权力争斗中,不列颠、普鲁士和俄国是赢家。法兰西、西班牙、奥地利和土耳其受到削弱。

第三章

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是18世纪最有影响和最与众不同的文化运动。它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批判地反省人类的全部知识来将人类从谬误和迷信中解放出来，并通过社会和政治改革解除对人们自由的不必要限制。这两个目标在启蒙运动改革者的头脑中是相互联系的。人类若想获得真正的自由，必须拥有"理性"和对世界的合理认识。因此，在发出了"敢于认知"的挑战之后，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也鼓励他的同时代人从他们强加给自己的政治与社会的传统奴役形式中解放出来。他评论说，如果目前还不是一个开明的时代，那至少是一个启蒙的时代，即一段实验新的可能性的时期。

启蒙运动是各种因素的综合产物。一个因素是人们逐渐认识到正在变化的状况要求采取新的方式来解决欧洲的社会问题。旧制度已经通过扩充王室军队与官僚机构、稳固社会等级制和加强宗教正统观念，缓解了无序性。但是，随着秩序的大体

恢复,特别是在1750年之后,政府机构和社会政策明显需要表现出另一种面貌,因为这些政策的成本在许多方面似乎正在超出它们的收益。要求改革的事实如此有力,以至于到了18世纪中叶“进步”——不要与革命相混淆——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人所公认的目标。最杰出的法国启蒙运动者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讽刺他的同伴杜尔哥(Turgot,1727—1781)时说到,他不知道杜尔哥到底想干什么,但那一定是某些新的和不同的事情。

第二个因素是精英们逐渐相信,科学革命和新的感觉主义认识论——在洛克的《人类理解论》(1690年)中得到最为显著的发展——已使许多欧洲传统的宇宙观和人性观被置于怀疑之中。新科学已经挑战和抛弃了许多传统的自然观念,而在这部著作中,洛克已经提供了更多的努力来“移除知识道路上的一些垃圾”。受到牛顿和洛克的指引,启蒙运动于是设法将这种对普遍接受的思想的批判性再检验延伸到最敏感的有关国家、社会和宗教的观念上来。由于他们广泛的知识探求,启蒙运动的领袖们获得了启蒙思想家(philosophes)的称呼,法语称做“哲学家”(philosophers)。

第三个因素是高雅文化正在变化的背景和受众。从中世纪开始,大多数有关欧洲哲学、神学、历史、科学和艺术的伟大著作都是由在物质和政治上得到教会、国家或富有贵族支持的知识分子所写作出来的。在17世纪,国王和大公们的宫廷吸引着最好和最耀眼的成就,知识分子通常为取悦他们的资助人和国家来创作作品。到了18世纪,这种情形已经改变。当然,国家、王宫和皇家科学院继续是哲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以及艺术家重要的资助来源,贵族仍旧是他们作品的主要买家。然而,西欧中产



这段时期巴黎的沙龙教会了作家要严谨，并将他们带到一起进行文雅、风格化的交谈。沙龙最为经常的集会地是一个巨大的私人住宅的招待室，在那里客人们在女主人的引导下聚集在一起，女主人是来自于贵族阶级或上层中产阶级的贵妇。在沙龙中，有益的交谈活跃起来，新思想得到鼓励。来自沙龙的压力帮助决定了法兰西学院的人选，这一人选的通过在18世纪60年代是由启蒙思想家控制的，因此主持沙龙的妇女经常成为上等鉴赏力的仲裁人。这里所展示的是1764年的沙龙。（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Art Resource, NY）

阶级的成长及其不断增加的财富意义深远地扩大了艺术、音乐、文学、历史、科学和哲学的消费受众。作为反映，在整个18世纪，书业繁荣，同时公共剧院、公共音乐会、公共艺术品展览不断增加。这种“公共性”的扩展激励着高雅文化的创作者更加自由

地批判已有的权威,即使国家资助人和审查制度仍旧在实际上限制着这种自由。公共关注的事情不仅在新闻中,也在咖啡馆、印刷所和沙龙中得到越来越多的讨论和争论,所有这些场所迅速遍及西欧和中欧。(沙龙是知识分子和社会著名人士定期的非正式集会,通常在女主人的家里举办,女主人控制和调整机智谈话的走向和有时是激烈的意见交流。)

随着文化"公共性"的增强,它的评价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尊重。"公共舆论"刚刚还是一个新的词汇,却在18世纪的文化和政治事务上都获得了较大的权威。启蒙思想家当然设法劝告和影响包括国王在内的已有权威,他们有时为了继续获得支持而怯懦地奉承统治者。但是,他们也为塑造新的更加广泛的、有学识的"公共"讨论而创作作品。伏尔泰写道:"见解支配着人类,启蒙思想家将逐渐改变所有人的见解。"启蒙思想家想要改变的见解如此之多,他们势必要经历一场长期的斗争。

一、背景

启蒙思想家被一些历史学家描述成为与政治现实没有多少接触的不切实际的空想家。但实际上,启蒙运动的作家对于他们所支持和批判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知之甚多。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统治者——甚至如俄国的凯瑟琳大帝和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这样顽固的权威主义统治者——愿意资助启蒙思想家,并偶尔听从他们的建议。启蒙思想家就广泛的问题进行写作:教育、健康、经济学、财政(特别是税收)、正义、宗教和科学。他们曾有若干次直接受雇于国家来负责管理它的运作。伏尔泰就曾作为历史学家、宣传员和外交官受雇于法国政府。经济学家杜尔哥

在法国的国家行政部门工作了20多年，其中有两年时间担任君主国的首席财政大臣。

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反映了这种实践性的一面。尽管他们确实发表了一些成体系的哲学论文，但他们大多数的著述所采取的形式是短文、讽刺诗、批判性评论、对话、公开信和短篇小说，这些著述更多的是为特殊需要而写作的辩论性作品，而不是意图成为延续这个时代知识的纪念品。启蒙思想家经常利用讥讽和讽刺性的幽默来使他们的读者看到同时代的许多荒谬和无用的实践与制度。在一些社交圈子中，伏尔泰的讥笑成为一种使人畏惧的力量。不用说，那些被他们讽刺的人和制度一定不欣赏他们的思想和方式。在18世纪结束之前，市场上充斥着反启蒙运动的著作，特别是在南欧和东欧，在那里比较守旧的思想有着更多的支持。

如果启蒙思想家认识到了他们为自己国家尽力的义务，那么他们也感到了一种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文明的责任。因此，他们与国外的志同道合者培养友谊，保持联系，并经常亲自去拜访。一些人获得了外国贵族的资助。伏尔泰拥有普鲁士腓特烈二世和俄国凯瑟琳的支持，并成为许多外国科学院的成员。法国百科全书的编撰者和作者丹尼斯·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也得到凯瑟琳的资助，在其死后，凯瑟琳买下了他的图书馆，并把它搬到了俄国。这样的交际网使启蒙思想家可以将他们自己看作为一种国际“文学界”的公民，这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包含了许多不同国籍和不同宗教信仰的学者，在这里，每个成员都享有批评他人著述和西方社会制度的自由。

启蒙思想家的国际主义视角反映在他们的作品当中。《波

斯人信札》(1721 年)是最初和最著名的启蒙运动小说作品之一,德·孟德斯鸠(de Montesquieu,1689—1755)男爵在其中设想了两个波斯访客是如何理解他们在巴黎所遇到的社会习俗、宗教实践和政治的,从而批评性地影射了法国社会。大约与此同时,一个充满改善社会的独创思想的早期启蒙思想家德·圣-皮埃尔(de Saint-Pierre,1685—1743)神甫提出建立一个维护国际和平的联盟。尽管这个建议被认为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而招致许多嘲笑,但许多启蒙思想家在精神上是与圣-皮埃尔一致的,他们赞美君主对其臣民生活的改善,而不是赞美他们血腥的征服。许多启蒙思想家,包括孟德斯鸠和伏尔泰,都去过英格兰,并称赞它作为一个自由社会的优点,这个自由社会已经产生了弗朗西斯·培根、约翰·洛克和艾萨克·牛顿,他们都是启蒙运动时期的主要人物。出生于瑞士的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在有关波兰未来的辩论中,为其提供了一部宪法。

启蒙运动的支脉遍布许多国家,但它的总部位于法兰西。部分原因在于自从路易十四以来,法国文明就在欧洲其他地区享有文化共鸣。在巴黎是重要的,那么在其他地方也是重要的。许多国外的人民都在阅读有着巴黎人背景的启蒙思想家所撰写的作品,这些作品有时是翻译过来的,但通常是法文的,全欧洲许多有教养的人都已经对此习以为常。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百科全书》,这是一部多卷本的著述,是由多个作者对人类知识所作的纵览和批判性评论。18 世纪 50 年代开始在法兰西出版,销路遍及整个欧洲,成为启蒙运动思想独一无二的最重要推进器。启蒙运动之所以在法兰西取得了十分杰出的发展,还有其他的原因。如同其他欧洲国家,法国政府也建立了一种代价

高昂的国家行政部门，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相当大的干扰。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的有利之处在于，它还发展出一大批阅读人群，他们欣赏并可以买得起那些以自由和公共事业的名义嘲笑明显无能的政府的著述。当政府一再惨败的时候，它使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受到越来越具有活力的公共舆论的批评。那种舆论在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中发现了它的某种声音，启蒙思想家宣称以公共舆论的名义发表言论。旧制度显然成为公共舆论这种似乎无法抵御的力量的坚定不移的攻击目标，它们彼此之间的摩擦产生了激情和启迪。

像其他的作家一样，启蒙思想家不得不应付国家和教会对他们著述的控制，情况因国家而异。例如，印刷品的印刷在英格兰比在法兰西自由得多，在法兰西，所有出版物必须经过政府审查员的批准方可合法出版。印刷和传播未经批准的著述的作者与出版者将被监禁，他们的印刷物和库存书籍将被没收和毁掉。许多启蒙思想家都因为公开发表了被认为对国王不道德、侮辱性的著作或者与教会教义相悖的著述而入过狱，包括伏尔泰和狄德罗。监禁的威胁当然使得作者和出版人对于非法出版著作更加谨慎小心。将著作提交给政府批准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只有一个出版许可才能提供对著作的合法保护，防止其他人再出版他们的著作并获利，换言之，国家批准就是一种最早的版权形式。虽然如此，许多启蒙运动中的著作并没有机会得到正式批准。因为有争议的见解，伏尔泰主要的散文作品没有一本在其有生之年在法兰西得到合法出版。为了逃避政府的审查制度，启蒙思想家经常匿名或以假名来出版著作。他们将更多有争议的手稿寄给国外的出版人，其中大多寄往瑞士和尼德兰，在那里有着相当大的出版自由。一些荷兰和瑞士的出版人专营启

蒙思想家和其他作者所写的违禁书籍,尽管政府试图予以禁止,他们还是成功操纵了法兰西的书籍走私活动。相当比例的禁书是印有流言和丑闻的小报,一些包括启蒙思想家著作在内的畅销书与色情文学的比例差不多。但是,这里也有重要作家所写的主要作品,甚至一些色情书籍也含有重要的政治和哲学信息。总体来说,18 世纪人们所买和所读的大部分书籍和杂志都是违禁作品,由于普遍具有批判倾向,它们促进了启蒙运动的事业。

二、核心观念

启蒙运动从未产生一种为其所有成员都接受的前后连贯的哲学,启蒙思想家彼此之间对许多问题都进行着积极的争论,完全可以与一个经常争斗的封建家族相比。但是,几个共同的主题反复出现在他们的著作当中。

一个是"理性"。由于拒绝了许多关于上帝、自然和社会的普遍见解,启蒙思想家没有寻求建立高度抽象的哲学体系,而是利用"理性"来说明此类见解和体系是如何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的。他们关于"理性"如何起作用的观念大多来自于洛克。正如德·孔狄亚克(de Condillac,1715—1780)神甫对这一过程所作的描述,意识开始时是一块白板,它的所有思想都来自于个体的外部感觉,意识将这些感觉合并在一起组成了精神上的世界画面。在应用"理性"的时候,意识将所有的思想追溯到产生它们的感觉。如果思想不能还原为清晰和明显的感觉的综合,那么最好也不过是混乱的思想,最坏则是完全的谬论。对启蒙思想家来说,一种思想越是以抽象的方式从感觉中得来,它就越不

可能是可靠的。因此,启蒙思想家不相信那些设法用少量的主要原则来解释宇宙的宏大的哲学体系。在上帝的意识中所有真理都可以简约为一个单一的公式,因为上帝能够立即感知一切。但是,人类只拥有一个有限的世界观,这意味着全部的人类知识也不能具有同样精确的简约和高雅。

就像人们经常描绘的,启蒙思想家虽然出名地热爱"理性",但并不是无感情的理性主义者。他们中的许多人与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看到了给予身体和意识以活力所必不可少的情感、甚至热情的关键作用,没有这样的感情,他们认为生命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会是无法承受的。一些启蒙思想家会为感伤性的、闹剧式的小说流泪,甚至亲自写作此类小说,今天的大多数人会因为他们的多愁善感而对此感到可笑。总之,启蒙思想家的观点是,理性应该使热情处于良好的控制之下,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压抑它们。

第二个重要的主题是"进步"。在18世纪之初,一次重要的知识论辩爆发了,辩论的问题是那个时代的文化与传统的古代文化相比孰优孰劣,这场辩论有时被称为"书战"(Battle of the Books)或"古今之争"(Quarrel of the Ancients and Moderns)。如果"古代人"成功地证明了其在高雅艺术方面的优越,那么,"现代人"也更好地证明了其在现代科学上的优势。由于受到"现代人"部分成功的鼓舞,许多启蒙思想家根据"文明"——一个18世纪所铸造的术语——的间断性前进确立了人类历史的概念。他们认为,尽管经历了挫折,文化上的发展,特别是科学和商业上的发展,还是正在逐渐改善人类境遇,使生活更加和平、人道和安乐。这类思想远没有像后来所描述的那样被朴实地表达出来。启蒙思想家不是没有意识到世界的痛苦和苦难,

以及经常存在的暂时的文化倒退的可能性。在其最著名的著作《老实人》(*Candide*)中,伏尔泰针对乐观主义的教条即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进行了批判,而且,他曾一度将历史描述为关于犯罪和邪恶的历史。但是,正如他们同时代的大多数人在历史事件的流走中看到了某种幸运的模式和方向,多数的启蒙思想家也是如此,他们并不固执己见,他们也认为生活已经并能够通过人类精神的培养而得到改善。

第三个突出的主题是"自然"。自中世纪鼎盛时期(High Middle Ages)以来,"自然"就是西方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中心,而它对启蒙思想家具有一种特殊的含义。对他们来说,自然不是野蛮和暴乱的,而是一种理性、有序和优雅的安排,牛顿的太阳系模型及其可预知的行星轨道就是范例。启蒙思想家用这种理性"自然"的概念作为衡量文明成败的标准。为了阐明对文明的滥用,如奴隶制,他们将自己时代的社会条件与假设的普遍存在于一种自由和有美德的"自然状态"——也就是政府和社会制度被创造出来之前的一段时期——下的社会条件作对照。一些作者,最著名的是让-雅克·卢梭,将这个设想推行的非常远,以至于否定了文明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恩惠。卢梭是启蒙运动的成员,也是一名批评家,他没有将文明史描绘为人类进步的历史,而是将其描绘为从自然无罪状态通向渐增的疏远和不平等的道德堕落的历史。

对文明的批判性评论对18世纪的思想具有很大的影响,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大多数启蒙思想家并未将"自然"和"文明"认作为截然对立的。对18世纪"高尚的野蛮人"(未被社会腐化的个人)的理想有多种理解,但在大多数启蒙运动的著述中,这种"野蛮"带有许多文明的外表,包括语言、艺术和政府的原始形

式。卢梭因其羡慕自然状态下的生活而被与有美德的“高尚的野蛮人”相提并论，甚至他也认为人类回归森林之中已经是太迟了。他从未倡导过这样一种回归，也从未认为这是值得追求的。因为即使卢梭拒绝接受人类是自然喜好社交的普遍观点，但他依然同意启蒙思想家的看法，即人类在社会状态中才能感到完全的满足，而且，他与他们分享着改革社会的目标，而不是摧毁社会。

第四个重要的主题是“自由”。让-雅克·卢梭断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狄德罗写道：“没有人从自然中获得统治他人的权利。”“自由是众神的礼物，只要有理性，人类的每个人都有权利享有它。”这些影响深远的陈述有几点重要的含义。一个含义是：自由不是某些国家的主权统治者给予一些有特权的人们的权利。它是所有成年人的自然状态，不论他们的国籍或者社会地位。到18世纪中期，自由已经与“自然权利”观念具有习惯性的联系，如同它在约翰·洛克的著作里所说的那样。在大多数启蒙思想家看来，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是不可转让的，也就是说，它们决不会被失去或放弃，并且，政府的角色是保护和保持这些权利。仍旧不清楚的事情是，为了得到一个好的政府，这些权利可以或不得不受到多大的限制。

另一个含义是：没有人生来就有统治他人的权利。尽管不是特别明确，但这些陈述清晰地指出，政治权威最终来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最后，这些陈述断言，行使自由权的基本要求是“理性”。启蒙思想家认为，当由“理性”指导的时候，个人会表现得具有社会责任性，因为他们会把自我利益放在整体的社会善中来认识。如果没有“理性”，个人将不能做出负责任的选择，必须受到其他人的监督。所以，孩子不能被允许自己做出决定，直

到他们到达“理性的年龄”。在18世纪,妇女是否拥有与男人一样的理性能力,她们是否应该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仍旧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尽管一些启蒙思想家认可能力平等,但多数认为妇女绝不能与男人充当同样重要的政治角色,因为家庭责任要求她们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私人领域而不是公共领域。

三、规划

1. 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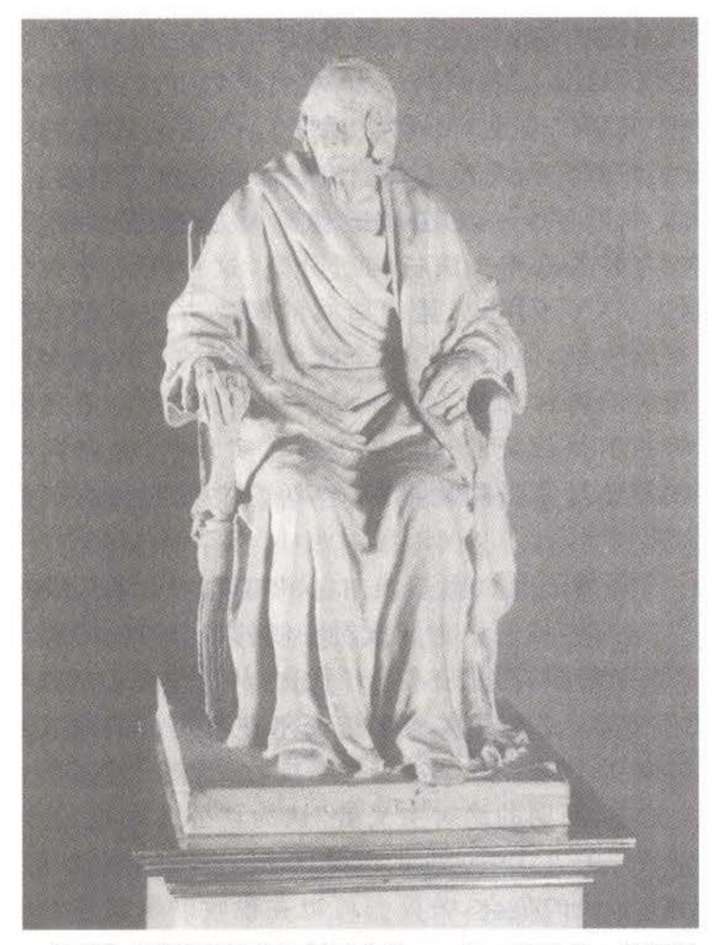
启蒙思想家信奉自由并不必需信奉平等或民主。尽管启蒙思想家相信所有的人都应该享有基本的公民权,即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但是,他们不赞成取消贵族阶级或实行社会所有阶级和财富的平等化。启蒙思想家与大多数精英成员一样,认为人民大众永远注定是农业劳动力,他们非常的不可靠和无知,不能委托他们进行投票。直到法国大革命,他们还认为君主制是应该保留的。启蒙运动的真正目标是使君主制为了共同的善而更有效地运作。

启蒙思想家最关注的事情之一是君主制蜕变为“专制”的倾向,即蜕变成统治者以个人的心血来潮而不是根据法律和人民的利益来行事的国家。奥斯曼帝国常被当作“专制主义”的例子,随着政府在18世纪的成长,人们害怕以奥斯曼为模式的东方“专制主义”也会扎根于西方。为了防止“专制主义”并保护自由,启蒙思想家提供了不同的处方。

阻止“专制主义”出现的较保守的规划之一是由德·孟德斯鸠男爵在其著名的《论法的精神》(*Spirit of the Laws*,1748)中

提出的。孟德斯鸠的解决方法是巩固所有社会阶级或多或少所享有的传统特权。孟德斯鸠认为，尽管世界上大多数的政府都是“专制主义”的，但是，西欧被赋予自中世纪就有的法律准则，保证了特权并因此使主权统治者的行为有所节制。而且，在某些欧洲国家——在这里孟德斯鸠主要想到的是英格兰——权力为国王和立法机构所分享，这种权力分立也防止了“专制主义”。不用说，孟德斯鸠的解决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诉诸于贵族阶级，他们在几乎全欧洲国家的代议制会议中都拥有着最大的特权和最大的影响。同时，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孟德斯鸠并不是传统的盲目捍卫者。实际上，他对同时代的许多实践都进行了强烈地批判，包括奴隶贸易和对宗教少数派的迫害。

另一个规划是由如圣-皮埃尔、伏尔泰和杜尔哥一类的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他们认为驯服君主制的最好方式不是划分权力或保护传统特权，而是使政府现代化，从而使它们运作得更有理性、更有效率。因此，德·圣-皮埃尔神甫建议消除政府部门的贪污腐化，而代之以内部的选举系统，意图提升国家行政官员的品质。这些“开明的绝对主义者”认为，“公共舆论”会开导一个国王以最好的方式来为他的臣民尽力。杜尔哥提议君主制应该建立地方公民的集会，公民们可以在税收和道路建设等类似事情上为国王提供建议，而不必行使他们自己的直接权力。附着在这样的解决方法上的首要问题是，通过使政府的运作现代化，政府是否会在事实上变得更加“专制”，这是开明的绝对主义者经常遭到指责的地方。



伏尔泰是这个时期的知识巨人之一。让·安东尼·乌东(Jean Antoine Houdon,1741—1828)在非凡的雕像中捕捉到了他沉思的、困惑的怀疑主义。乌东周游各地,于1785年去了美国,为乔治·华盛顿创作了一座最著名的半身雕像。(Giraudon/Art Resource, NY)

一群数量很少的激进的启蒙思想家,包括让-雅克·卢梭,认为只有民主才足以捍卫自由。卢梭认为主权来自于人民,或

者来自于他所称为的“公共意志”，而且，他还认为，在一个严格的宪政国家中，所有的男性公民都将被召集来投票决定新的法律。他甚至拒绝民主的代议制思想，即选举代表在会议上投票表决法律，他认为代表将遵循他们自己的意志，而不是他们的选民的意志，从而变得腐化。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1762)中所认识到的，直接民主在法兰西这样的大国里是不切实际的，它有 2500 万的人口，不断地需要新的立法。在这一点上，卢梭遵从了大多数启蒙思想家的观念，他们认为民主只适合小的、贫穷的国家，而不是那些拥有大量人口和经济不断扩张的国家。虽然如此，通过将民主的概念再次引入公共讨论，卢梭及其同行扩展了欧洲的政治想象力，在下个世纪中，代议制民主通过甚至卢梭都未曾预见到的革命而遍及西欧和中欧。

启蒙思想家所提倡的详细的政治改革列表几乎无法穷尽。其中最著名的提议是改革司法程序、变更税收政策和发展一种教育体系。一个意大利人切萨雷·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1738—1794)写作了一篇关于司法酷刑的有影响的批判性评论，他认为旧制度时期通常采用的这种司法程序在榨取可靠信息上不仅是无人道的，而且是无效率的。由于为贝卡里亚的著述所深深打动，伏尔泰在法兰西领导了一次反对使用酷刑的公共运动。其他人则为赞成引入一种陪审团制度而进行辩论，启蒙运动时期有许多对全部的法律准则进行改进而使其现代化的提议，其中的一些影响了凯瑟琳大帝。税收制度得以发挥作用是因为启蒙思想家对其既不公平又无效率的大量批评。重农主义者(本章后面会讨论)强调那个时期繁重的税收制度不仅运作代价高而且不利于生产，他们提议，不论社会等级和地理位置，几

乎所有的税收都应该被搁置，只向土地拥有者征税。在普鲁士和奥地利，改革者令人瞩目地成功建立了最早期的初级国立学校体系，希望教授臣民自律，以便代替传统的法律和惩罚。

2. 宗教

也许启蒙思想家以宗教的敌人，尤其是基督教的敌人而最为人所共知。这种特性在几个方面是不准确的。第一，只有极少数启蒙思想家是无神论者，许多启蒙思想家是有传统的宗教信仰的，尤其在中欧和东欧。伏尔泰是最著名的传统宗教的嘲笑者，也是上帝的坚定信仰者，并对他所知道的几个无神论者进行了激烈的抨击。第二，大多数的启蒙思想家都认识到宗教具有一种明确的社会作用。一项对启蒙运动时期有关大众教育提议的研究表明，几乎所有这些提议都将宗教教义作为一种在人们之间维持道德和秩序的方法来进行推介。第三，一些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具有宗教的渊源。例如，虔信主义——一种德国新教运动——强调内在的精神性，在康德的道德理论发展上起到了关键作用，还有，詹森主义——一种天主教教派内部的持不同政见的运动——在法兰西帮助鼓舞了启蒙思想家反对“专制主义”。

启蒙思想家的确批判了许多传统的宗教教义和实践，犹如他们批判其他传统的东西那样。对他们来说，宗教的首要用途是产生道德，他们相信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的核心都在于金箴中所表达的那个相同的基本道德准则。宗教的其余部分——它的教义和仪式——都只不过是诱使人们遵守这种道德准则的外部包装。当然，启蒙思想家并没有逃脱所有的传统偏见，例如，伏尔泰发表了一些抵制犹太人和犹太教的可怕言论。但是，总

体来说，他们实际上劝告的是宽容所有宗教，其依据为核心道德准则的不同包装不是一种公共关注的问题。孟德斯鸠论证说，如果宗教只是因为强制才被接受，那么它还有什么价值？伏尔泰认为，一种宗教的多样性是令人欲求的，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防止其他人变得过于具有压迫性。

对启蒙思想家来说，在宗教方面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宗教真正的普遍目的，即教授基本的道德，已经被忘记了，这个或那个教派都在试图强制推行一套仪式和教义，并以武力压迫其他的教派。上百万的人因为宗教这些相对不重要的方面而死于不必要的战争，因此，批判传统的宗教仪式和教义对于重新将注意力聚集在宗教的道德核心上是必要的。当然，对于看见他们所珍爱的仪式和教义为启蒙思想家所嘲笑的传统信徒来说，这种批判是一种侮辱，是对一些他们最为珍爱的传统的攻击。这种批判甚至被看做是对所有宗教的攻击。

启蒙思想家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多样化的，但是，许多人提倡一种称为“自然神论”的宗教哲学。自然神论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使世界处于他所规定的理性的自然法则的推动之下，之后任其自行运作。很清楚，这种观点表现出了一种在传统的有关上帝的看法与新的科学之间进行调和的努力。它使许多启蒙思想家感到满意，但却很难令更为传统的信仰者满意。第一，它否认了上帝在世界事务中的连续作用，裁定神迹违背了自然法则。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严厉批判了对《圣经》中所传说的神迹的相信，由此得到启蒙思想家的广泛赞誉。他断定相信此种神迹没有任何有根据的理性原因，这样做的任何人的最好结果是成为基督教的“危险的朋友”。在他看来，宗教只能通过信仰才能被接受。第二，自然神论使祈祷成为无意义的，并几乎没有为

被压制的人提供任何慰藉,因为上帝一旦创造了世界,就不再干涉自然秩序来帮助他们。第三,自然神论缺少情感,它使宗教更像是一种理性的哲学,而不是一种能够深深打动人们内心的实践。最后,自然神论剥去了基督教的天国与地狱的观念,批评启蒙运动的人认为,这种天国与地狱的观念是使人们有道德地作为所必需的。

3."有关人的科学"

作为科学家和改革者,启蒙思想家对社会科学(当时被称为"有关人的科学")的发展产生兴趣,因为它可以成为改善社会的工具。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就是为此目的所创作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这是一本涉猎广泛的书,属于今天被称为政治社会学的领域,它根据不同的规划对社会作了分类,其中最重要的分类就是对君主政体、共和政体和专制政体的详细划分。孟德斯鸠表明,这些政体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它们的政府形式,还在于它们的经济、社会结构,以及教育体系和动力原则。他认为,君主政体靠荣誉来运作;共和政体靠美德;专制政体则靠恐怖。

启蒙思想家受到科学技术的应用可能改善人类生活条件的吸引,对经济和财政尤为感兴趣。他们的总体建议是使经济自由化,就是说,减少政府对报酬、价格和生产的控制而都由买卖双方来决定。这种解决经济问题的途径被称为自由放任主义,意思是"让它自行其是"。在法兰西,最著名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派是由弗朗索瓦·德·魁奈(François de Quesnay,1694—1774)所领导的重农主义者("重农主义"意指"依自然而统治")。由于相信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来源,重农主义者主张谷物在国内

不受阻碍地流通，以此作为提高总产量的方式。他们声称，允许抬高价格会刺激生产，产量就会增加，谷物价格将最终回落，供给会变得更加平稳。

许多类似的思想由苏格兰思想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所发展，他的著作《国富论》于 1776 年出版，是 18 世纪独一无二的最有影响的经济学理论著作（实际上除经济学之外，该著作还涉及了其他许多问题）。斯密不接受重农主义者的观念，即农业是财富的唯一创造者，他转而更多地强调劳动的创造力量。但是，斯密确实赞成这样的观点，即政府应该让市场决定生产哪些产品以及价格是多少。他认为，在自由市场中，一只“看不见的手”鼓励个体进行经济性的生产，那些能正确判断买方欲求、以最具竞争力的价格生产出商品的人会得到利润上的奖励。斯密抨击了“重商主义”政策，这一政策号召政府干预市场的决定，他相信市场是消费者欲求的更好裁判，是生产的更有效的刺激物。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富人利用斯密的思想反对政府部门的任何膨胀。实际上，斯密并不是坚定的自由放任主义或富人的辩护者。他对生产者不断要求政府给予特殊垄断和其他特权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认为这些生产者很可能不会允许真正的自由市场的建立。而且，斯密认识到文明国家的政府承担着许多市场不能满足的社会义务，其中包括政府有责任提供可支付得起的教育。

四、开明的绝对主义

开明的绝对主义，或者如它有时被称为的“开明专制”，是某些专制统治者所采用的一种规划，用来在他们各自的国家施行启蒙运动的原则和改革。事实上，没有哪一个统治者，无论男性

文献记载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

斯密支持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工业和农业,这是基于他对人类本性的理解,他认为志向,在总体上或对大多数人来说,是至高无上的。如果不受限制,普通民众会对公共的善做出贡献,尽管这不是其主要目标。劳动分工是这一理性过程的关键。

扣针制造业是极微小的了,但它的分工往往唤起人们的注意。所以,我把它引来作为例子。一个劳动者,如果对于这职业(分工的结果,使扣针的制造成为一种专门职业)没有受过相当训练,又不知怎样使用这职业上的机械(使这种机械有发明的可能的,恐怕也是分工的结果),那么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要做20枚,当然是绝不可能的了。但按照现在经营的方法,不但这种作业全部已经成为专门职业,而且这种职业分成若干部门,其中有大多数也同样成为专门职业。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两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18种操作,分有18个专门工人担任。固然,有时一人也兼任两三种。我见过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用10个工人,因此在这一个工厂中,有几个工人担任两三种操作。像这样一个小工厂的工人,虽很穷困,他们的必要机械设备,虽很简陋,但他们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针12磅。以每磅中等针有4000枚计,这10个工人每日就可成针48,000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4800枚。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

习一种特殊业务，那么，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 20 枚针，说不定一天连 1 枚针也制造不出来……

每一个精明户主的座右铭是，决不试图在家里做那些制作成本比买它还要贵的东西。裁缝不会制造自己的鞋子，而是从鞋匠那里购买它们。鞋匠不会试图制作自己的衣服，而是雇用一个裁缝……在每一个私有家庭的管理中精打细算的事情却愚蠢地很少出现在大的王国的管理中。如果外国能够为我们提供比我们自己生产它还要廉价的商品，最好用我们某种工业品向这个国家买下这些商品。

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

这种倾向，是不是一种不能进一步分析的本然性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是理性和言语能力的必然结果，这不属于我们现在研究的范围。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亦为人类所特有，在其他各种动物中是找不到的。其他各种动物，似乎都不知道这种或其他任何一种协约。两只猎犬同逐一兔，同时也像是一种协同动作。它们把兔逐向对手的方向，或在对手把兔逐到它那边时，加以拦截。不过，这种协同动作，只是在某一特定时刻，它们的欲望对于同一对象的偶然的一致，而并不是契约的结果。我们从未见过甲乙两犬公平审慎地交换骨头，也从未见过一种动物，以姿势或自然呼声，向其他动物示意说：这为我有，那为你有，我愿意以此易彼。一个动物，如果想由一个人或其他动物取得某物，除博得授予者的欢心外，不

能有别种说服手段。小犬要得食,就向母犬百般献媚;家狗要得食,就做出种种娇态,来唤起食桌上主人的注意。我们人类,对于同胞,有时也采取这种手段。如果他没有别的适当方法,叫同胞满足他的意愿,他会以种种卑劣阿谀的行为,博取对方的厚意。不过这种办法,只能偶而为之,想应用到一切场合,却为时间所不许。一个人尽毕生之力,亦难博得几个人的好感,而他在文明社会中,随时有取得多数人的协作和援助的必要。别的动物,一达到壮年期,几乎全都能够独立,自然状态下,不需要其他动物的援助。但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社会上,除乞丐外,没有一个人愿意全然靠别人的恩惠过活。而且,就连乞丐,也不能一味依赖别人。诚然,乞丐生活资料的供给,全部出自善人的慈悲。虽然这种道义归根到底给乞丐提供了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但没有也不可能随时随刻给他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他的大部分临时需要和其他人一样,也是通过契约、交换和买卖而得到供给的。他把一个人给他的金钱,拿去购买食物,把另一个人给他的旧衣,拿去交换更合身的旧衣,或交换一些食料

和寄宿的地方,或者,先把旧衣换成货币,再用货币购买自己需要的食品、衣服和住所……

资本增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侈与妄为……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不是勤劳。诚然,未有节俭以前,须先有勤劳,节俭所积蓄的物,都是由勤劳得来。但是若只有勤劳,无节俭,有所得而无所贮,资本决不能加大……

所以,无论我们根据明白合理的说法,说构成一国真实财富与收入的,是一国劳动和土地的年产物的价值,或是依随通俗的偏见,说构成一国真实财富与收入的,是国内流通的贵金属量——总之,无论就哪一个观点说,奢侈都是公众的敌人,节俭都是社会的恩人……

幸而就大国的情形说,个人的奢侈妄为,不能有多大影响。另一部分人的俭朴慎重,总够补偿这一部分人的奢侈妄为而有余……

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这三个义务虽很重要,但都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绝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

Adam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37), pp. 4—5, 13—14, 321, 324, 651.

文献记载

洛克的知识理论

在有关个人生活最重要的构成性影响——遗传或环境——和理解的最重要工具——信仰或理性——的古老争论中,约翰·洛克正好为我们留下了关于环境和理性的讨论。

那么让我们假设头脑是……一张白纸,全无特性,没有任何思想。它是如何得到供给的呢?它那巨大的贮存物来自于何处?哪种人类复杂而无限的想象力以一种近乎无穷的变化出现在那里?它从何处得到理性和知识的素材?我用一个词来回答就是经验……我们的观察,这种观察或者是关于外部可感觉的目标,或者是关于我们头脑的内部运作,并且,是为我们自己所感知和反思,它就是供给我们的理解以所有思考资料的东西。这两样就是知识的源泉,我们所有的思想都来自或自然的来自于那里,而迸发出来。

John Locke,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in *The English Philosophers from Bacon to Mill*, ed. Edwin A. Burtt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39), p. 248.

或女性,使自己完全束缚于启蒙思想家的规划,所有的开明的绝对主义者都采用了对启蒙运动团体有所冲击的"专制"行为。虽然如此,当今大多数的历史学家还是认为,开明的绝对主义者在行事的时候,至少对启蒙运动的规划有着某种考虑,他们与启蒙思想家的交往也不只是为自己的落后政策装点门面。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任何一个由开明的绝对主义者所统治的国家,

在18世纪末如法兰西那样陷入革命的狂潮之中。因此，也许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开明的改革的确帮助他们巩固了统治。①

1. 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

在18世纪所有的统治者当中，腓特烈二世，一位大帝，从1740年到1786年身为普鲁士的国王，是与启蒙运动最为合拍的人。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反对他的父亲腓特烈·威廉一世的练兵方法。他是启蒙思想家著作的专心阅读者，与他们通信，并把伏尔泰作为领年金者带到他在波茨坦——在柏林附近——的宫殿里住了一段时间。

腓特烈指挥外交和军事事务时，狡猾而诡诈。他写道："扩充原则是每个政府的基本法则。"* 腓特烈大帝被视为将军、外交家和普鲁士行政部门的主管者，他是能干和成功的。但是，即便是开明的，他显然仍是一个专制君主。

腓特烈比任何重农主义者都做了更多的事情来发展普鲁士的农业。他从西欧引入了苜蓿、马铃薯、作物轮作制和铁犁。他排干了较低的奥德河谷的沼泽，开发西里西亚和其他地区的农田，并将主要来自于德意志其他区域的30万移民定居在新的土地上。在经历了七年战争的蹂躏之后，腓特烈给予农民工具、原料和种子以修复他们被毁的农庄。然而，腓特烈仇视自由放任主义的信条。他的重商主义促进了普鲁士工业的增长，特别是军需的纺织品和金属制品，但也使他的臣民背负了巨大的税赋。

---

① 本段译文正文除第二段，全部来自[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下册），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出版社，2005年。——译注

* Quoted in G. Ritter, *Frederick the Great: A Historical Profi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 7.

历史写真

“现代历史”的开始

确定现代历史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其实只是一个方便性的问题。现代历史所涉及的,是我们今天似乎更为熟悉的活动和习俗的表现,而不是我们更为陌生的某些非常古老的习俗。思考一下这类变化的范围吧。在文艺复兴时期,占星术是一门被认可的学问,它将人类的行为看做由天体所控制的,这一观念威胁到自由意志的教义,成为宗教反对它的主要原因,这种反对削弱了它的重要性,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在1586年对其表示了谴责。瘟疫给人口构成带来了巨大改变,它将两段重要时期彼此划分开来:1347年到1348年的黑死病和1575年到1577年在威尼斯爆发的大规模瘟疫。两个或其中任何一个事件都可以成为科学、医学或环境的分水岭,这取决于所问的问题。

社会历史学家在奴隶制变化的性质中发现了重要意义。直到约1450年,奴隶通常被用作国内的奴仆,任何种族的人都可能成为奴隶。在奥斯曼帝国的发展切断了非欧洲奴隶的通常来源,以及新世界的种植园经济产生了对大规模奴隶劳动力的需求之后,奴隶制开始变化,到17世纪一般只限于一个种族。

气候历史学家指出了1500年到1800年之间的关键性变化,以及对森林和农业土地的过度开发所导致的斯堪的纳维亚环境危机。还有其他的历史学家注意到文艺复兴时期对个人主义越来越多的强调,而另一些历史学家则在中世纪时期,无论是征服者威廉那里还是彼得·阿伯拉尔(Peter Abelard)

那里，都发现了同样多的个人主义。普遍的个体理论并不必然适合于整个社会，精英群体可以为自身而强调个人主义，但却压制较低阶级中的个人主义。“荣誉”含义的转变也有助于时期的划分，尽管可能无法就这种转变发生的时间达成一致。在中世纪，荣誉与来世相连。现代人主张某人的功绩在有生之年为人所认可（如路易十四为人所重视）以及死后也为人所纪念的重要性，这期间的转变反映在文学、画像、政治修辞和墓碑上。商业方式、银行业、征税、工业和经济体的清晰变化一般也会将时期划分开，尽管这些变化是渐进的。现代历史时期的基本确定可能开始于对环境、妇女地位，或者一种科学发现——当其被后世重新解释时呈现出新的重要性——的某种态度，这取决于人们的观察视角。

腓特烈的宗教和社会政策将理性时代最为理性的部分与旧制度最少开明的部分结合在一起。腓特烈大帝是一个自然神论的信仰者，以宗教宽容为自豪。当耶稣会士被从天主教国家驱逐出来时，他邀请他们到主要信仰路德教的普鲁士来避难。他自夸如果穆斯林想要到他的首都定居的话，他会在那里建造一座清真寺。然而，腓特烈断言犹太人“对国家是无用的”，他对犹太臣民征收特别税，并试图将他们从各种职业和行政事务中排除出去。

腓特烈通过司法改革为普鲁士人做出巨大贡献，这一改革将法院从政治压力下解放出来。他终止了将上诉从普通法院移交给大学教师团的不正常习俗，取而代之以一套固定的受理上诉的法院体系。他坚持得自于诉讼人的赏金应该放在一个公共基金中，每个法官只应该从中取得他那份公平的份额，以作为对

其不足薪金的补充，从而减少了贿赂法官行为的发生。

然而，同一个腓特烈却用中世纪的眼光来看待社会等级制度的优点。尽管他废除了王室领地上的农奴制，但是，除了1773年禁止在东普鲁士买卖无地农奴外，总的来看他几乎没做什么来解除农奴制的镣铐。当他给予农民以物质援助和催促他们变得有文化的时候，他的目的是功利主义的。农民的学习不会超过只具备初级读写能力的水平，否则，他们可能变得不满。他也对中产阶级抱以轻蔑的态度。七年战争结束之时，他强迫军队中的所有中产阶级官员辞去职务。商人和专业人士被免除服兵役，但要负担重税，甚至受到优待的容克阶级都未能逃脱腓特烈的官僚绝对主义。尽管他只任命容克阶级的成员作为军队的军官，但却阻止他们结婚，从而减少了潜在的寡妇——国家将支付其抚恤金——数量。

许多历史学家表示，腓特烈所谓的开明只是一种宣传手段，是一种用这个时代的知识外衣掩盖其赤裸的绝对主义的企图。更公平地说，腓特烈支持两种常常是相互冲突的哲学，即霍亨索伦家族的斯巴达传统和启蒙运动的人道原则。前者的严酷寓意阻止他分享后者对人类本性和潜能的乐观估计。就其普遍的宗教宽容和对法院程序与刑法的改革来讲，腓特烈是一个开明的专制君主，但是，他也同样致力于增强普鲁士王权的中央集权制。

2. 哈布斯堡王室（1740—1792）

腓特烈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的决定性胜利，暴露了哈布斯堡王朝帝国脆弱的基础。女皇玛丽亚·特蕾西亚（1740—1780年在位）尽管不十分熟悉启蒙思想家，但相信改革的必要，

并常常将她所憎恨但却成功的对手腓特烈二世的制度作为她效仿的典范。女皇增加税收,特别是贵族阶级的税收,削弱地方贵族集会以加强中央政府,建立了中央行政管理的各部门。她还对农民被迫付出的劳动服务和税收总量设置了最高限度,从而向最终废除农奴制迈出了第一步。尽管本身是虔诚的信徒,她还是对教会征收了较重的税,没收了修道士的财产,并在教皇于 1773 年解散耶稣会时,夺取了他们的财产。但是,她禁止卢梭和伏尔泰的著作进入她的王国,甚至禁止天主教禁书的发行。正是她的长子,约瑟夫二世,开始了使人联想到开明专制君主的主要改革。

约瑟夫(1765—1790 年在位)在 1765 年成为皇帝,在他的母亲于 1780 年去世之前,一直与其母进行联合统治。在玛丽亚·特蕾西亚生前他受到阻挠和限制,在其母死后这位不耐烦的皇帝一下子活跃起来。在其单独统治(1780—1790)的十年中,从维也纳发布了 11,000 条法律和 6000 条法令。

加尔文教徒、路德教徒和东正教基督徒第一次获得了完全的宽容。皇帝采取措施终止了犹太人居住区,免除了他们的特别税,撤销了佩戴象征劣等性的黄布条的要求。在另一方面,约瑟夫继续他母亲的行动,加强国家对教会的控制。他鼓励他所认为的天主教有益于社会的事情,而残忍地对待他所断定的天主教多余或有害的事情。于是,他建立了上百座新教堂,而同时减少了宗教假日的数量。他称修道士为“每个国家中最危险和无用的臣民”,查禁了 700 座修道院和女修道院。政府出售或出租了被查禁设施的土地,将收入用来扶持医院。

与腓特烈大帝不同,约瑟夫相信大众教育和社会平等。他的政府为初等学校提供教师和教科书。奥地利竟然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学龄儿童上了学。维也纳的每个人,无论身份高低,都被

邀请来参观普拉特公园，这是首都的一个大型公共公园。新的奥地利法典遵从了贝卡里亚的建议，取消了死刑和大多数的酷刑，规定了法律面前的平等。贵族罪犯如平民一样，被判处戴上颈手枷，之后，清扫维也纳的街道。

约瑟夫对农民的政策标志了他平等主义的最高点。他使农奴获得自由，取消了他们对庄园主的大部分义务，并剥夺了领主所拥有的对农民实行制裁的传统权利。他还在试行了土地单一税，这是一种具有革命性的革新，因为贵族的庄园将与农民的农田在同样的基础上来缴税。这些变化也对匈牙利人的特权给予了特别的打击。

然而，约瑟夫的经济和政治政策经常遵循着绝对主义的道路。在经济上，他实行重商主义，特别表现在高额保护性关税的设立和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严密监督。在政治上，他任命平民担任政府的高级职位。他还试图结束他所统治的非德语领地的自治权，特别是比利时、波希米亚和匈牙利。

约瑟夫的举措引来越来越多的反对。虔诚的农民几乎对他试图改善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做法视而不见，而抱怨他对古老宗教习俗的干预。贵族强烈抗议他的平等主义立法，贵族对试行的单一税的反对非常激烈，致使他不得不在发布法令一个月后撤回法令。匈牙利和比利时爆发了公开的叛乱，反对他集中权力的努力，迫使他确认他们的自治自由。

在对外政策上，他雄心勃勃的计划也破产了。奥地利支持了俄国分解土耳其的计划，却仅仅获得了巴尔干半岛的一块狭小地带。约瑟夫还试图并吞属于邻近的南德意志邦国巴伐利亚的领土。在那里，统治者的去世开始了又一次王位继承的争吵。但是，腓特烈大帝决定遏制哈布斯堡王室力量在德意志的任何

增长。在18世纪70年代晚期半心半意的“马铃薯战争”中，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抢夺食物上，约瑟夫仅仅保住了一块极小的巴伐利亚遗产。

约瑟夫死时，确信自己遵循了正确的行动方针，但认为自己一事无成。事实上，他的方针对他人的感受太不敏感。但是，他在十年中所做的尝试比腓特烈在近半个世纪里所做的尝试还要多，而且，约瑟夫的尝试并非都归于失败。尽管他的一些主要改革在其去世后不久就被废止了，如农奴制的废除，但他的其他改革还是保留了下来。

保留下来的改革得益于约瑟夫的继任者——他的弟弟利奥波德二世（1790—1792年在位）——的抚慰政策，就其自身来说，这位继任者是一位开明的专制君主。像托斯卡纳大公（1765—1790）一样，他改善了他所统治的意大利公国的行政管理。他还引入了经济和司法改革。不像他的哥哥，利奥波德积极地支持他的臣民参与国家事务。

3. 西班牙、葡萄牙和瑞典(1759—1792)

作为西班牙国王（1759—1788年在位），查理三世积极地推进其父菲利普五世所开始的进步政策。尽管查理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强制耶稣会士离开西班牙。他削弱了贵族的权威，扩大了国王的权威，使西班牙更接近于一种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他约束了大牧羊场主的特权。为了给经济带来新的活力，他进行灌溉工程，开垦荒地，并建设新的公路、运河、纺织厂和银行。在查理三世统治期间，西班牙的对外贸易增加了5倍。然而，他的继任者遗弃了他的许多政策。



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1746—1828)展示了身着狩猎服的西班牙的查理三世(1716—1788)。戈雅寻求分析由社会地位所反映出的人物性格,但他在通过油画暗示人类邪恶能力方面却逐渐变得不再那么敏锐。在王室宫廷生活期间,查理四世后期的腐败使他开始醒悟,他的作品进行了一次野蛮的转型。可以将这幅狩猎画像与凡·戴克所绘的英格兰查理一世相对比(第25页)。(Scala/Art Resource, NY)

在葡萄牙，庞巴尔(Pombal)大侯爵塞巴斯蒂昂·德·卡瓦略(Sebastião de Carvalno，1699—1782)是国王约瑟夫一世的首席大臣，他凭借快速和优异的判断力重建了1755年毁灭性地震之后的里斯本(Lisbon)，为自己赢得了名望。葡萄牙经济严重依赖殖民地的收入，特别是巴西，以及在大不列颠销售波尔图葡萄酒和购买工业产品。庞巴尔努力扩大经济基础，扶植地方工业，促进谷物生产的增长。为了削弱教权主义的控制，他在1759年驱逐了耶稣会士，推进宗教宽容。为了削弱贵族，他抨击他们的遗产继承权。但是，庞巴尔的做法是高压式的，当约瑟夫一世在1777年去世的时候，庞巴尔失去了权力，他曾在早些年监禁了上千名涉嫌参与贵族阴谋的人，而现在监狱把他们都释放了。

同样长期使用高压手段的是瑞典仁慈的专制君主古斯塔夫三世(1771—1792年在位)，腓特烈大帝的外甥。他决心不受贵族派系的钳制，这些派系自查理七世去世后便控制着瑞典。

某个晚上，他转移开歌剧院里瑞典派系领导人的注意力，他的士兵发动了一次政变，使他恢复了王室权威，消除了派系问题。在经济和宗教方面，他的开明远胜于他在普鲁士的叔叔，因为他解决了国内和对外贸易的障碍，并将宽容推及到犹太人和非路德教的基督徒。然而，他被成功冲昏了头脑。当国王变得越来越专断的时候，贵族决定恢复他们过去的权力。1792年，古斯塔夫在组织一个攻击法国大革命的君主联盟时被刺杀。

4. 开明专制的局限

开明专制为继承问题所削弱。只要君主凭借出生的偶然事

实登上王位,就无法阻止不开明的或无能的君主继承开明的和有能力的君主的王位。即使开明的专制君主中最差的人,也应该由于改革了旧制度的一些不良特性而得到赞扬。但是,即使其中最优秀的人也没有冲击开明与专制之间的巧妙平衡。约瑟夫二世在决定实行理性时代彻底的改革上表现得过于教条,过于顽固。庞巴尔和古斯塔夫三世则过于专断。腓特烈大帝,由于受到巩固王位的困扰,使容克地主阶级的力量建立起来,他们对启蒙运动是敌视的。而在俄国,彼得大帝去世后的事件又为我们上了一课,让我们知道了将理性原则施用于政治现实的困难性。

五、俄国(1725—1825)

俄国有两位君主可以算做开明的专制君主:大帝凯瑟琳二世(1762—1796 年在位)和她的孙子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 年在位)。从彼得大帝去世到凯瑟琳继位的 37 年间,这个专制国家没有一位有力的领导者,王位 7 次易手。与这些年间一个个的统治者相比更为重要的是俄国争取权力的社会群体和运作中的社会进程。彼得建立的近卫团开始在一系列的宫廷覆灭中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服役的贵族不再受到沙皇的制约,开始占据了优势。

1. 贵族和农奴(1730—1762)

1730 年,乡绅开始将自己从彼得使他们所处的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到了 1762 年,除非贵族希望服役,否则他们不必这

样做，同时，贵族地主对农奴的权威得到了加强。贵族地主成为征收人头税的政府代理人。农奴不再能够通过应召入伍来获得自由，没有主人给予的书面许可文件也不能从事贸易或购买土地。

我们需要记住在历史上贵族只有通过服役，才能获得土地和农奴，这样才会理解贵族从服军役的义务上解放出来的革命性质。如今，他们可以保有土地和农奴而不必履行义务。然而，当服役是强制性的时候，它受到憎恨，而它具有可选择性的时候，却成为流行的时尚。除了在国家任职和对农奴严厉的控制，俄国贵族几乎没有什么真正可做的事情。

在 18 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间，外部影响持续侵袭着俄国贵族。德国的影响让位于法国，伴随着法语的流行，法国文化也风靡起来。法式风格的服饰为男人和女人所效仿，并且，一些绅士声称，与一个不会讲法语的女人发生爱情，那是不可能的。一个确切的事实是，贵族和农民不再说同样的语言。

2. 凯瑟琳大帝(1762—1796)

凯瑟琳成长于德意志的一个小宫廷之中，还是一个年轻姑娘时就移居圣·彼得堡，与她所厌恶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她被迫通过充斥于俄国首都的阴谋诡计择路而行。凯瑟琳尤为看重使西方领袖人物对她和她统治下的俄国状况具有好感。当狄德罗在 1773 年游览俄国时，他说他认为凯瑟琳有着布鲁图的精神和克莉奥佩特拉的魅力。伏尔泰置身于俄国之外，但接受了凯瑟琳的恩惠，作为回报，他称其为“北极星”和“欧洲的女恩人”。

凯瑟琳也许愿意革新俄国的状况，但是，作为一个女人、一

名外国人和一位篡位者(她的王位得自于一个废黜和谋杀她的丈夫彼得三世的阴谋),她不能按照喜好行事。由于依赖于贵族的好感——正如她所做的那样——来进行统治,所以,她无法干涉农奴制。她不得不通过赠与大量的国家土地来奖赏她的支持者,这些土地上居住着国家几十万的农民,他们如今变为可以被出售的私有农奴。

然而,一旦王位得到牢固地确立,凯瑟琳就决定召集一个委员会将俄国的法律编撰成法典,这是自1649年以来的第一次。在顾问的协助下,凯瑟琳本人用了三年时间为代表编写了《规程》,其中充满了来自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和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的抽象论点。参加委员会的564名代表是由中央政府机构和俄国除农奴之外的各社会阶级所选举出的。每名代表都有责任提交反映其周围的人的不满与要求的书面材料。

各阶级的代表都渴望伸张本阶级的权利:自由农民想要拥有农奴;市民想要农奴,并想成为被允许经商的唯一阶级;贵族想要经商,并想确认其拥有农奴的专有权利。会议召开了203次,时间超过了一年半,得到的都是些无结果的争论,凯瑟琳在1768年终止了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委员会是20世纪初期之前沙皇将俄国人民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咨询的最后一次努力。

1773年,叶米里扬·普加乔夫(Yemelyan Pugachev,卒于1775年)鼓动哥萨克人起来反抗凯瑟琳取消他们的专有特权。普加乔夫冒充凯瑟琳已被谋害的丈夫彼得三世,并向参加其军队的农奴许诺,给他们以自由和土地。他横扫了俄国东南部的广阔地带,并向莫斯科进军。如同17世纪的骚乱一样,普加乔夫的叛乱揭示了俄国国内强烈不满的存在。

凯瑟琳采取了行动。她重组了地方政府(1775年),将之前

的 20 个省变为 50 个省。这样,她用大量的小省份替代了少量的不易控制的大省份。每个省份包括大约 30 万到 40 万的居民。虽然 1775 年的改革给予贵族以大量的省级官位,但也使他们处于中央政府的严密管理之下。叛乱被残酷地镇压了。

在 1785 年的一份特许状中,贵族再次被免除了军役和税收,并确保了对农奴和地产的绝对控制。同年一份给市民的特许状透露出凯瑟琳对极少量但正在增加的城市中产阶级的赞同,并确立了自治市的自治原则,尽管它依旧只是一纸空文,因为俄国城市的统治系统仍维持着严格的阶级差别。而对于农奴,没有颁布任何特许状。

3. 保罗(1796—1801 年在位)和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 年在位)

1796 年凯瑟琳的儿子保罗在 42 岁的时候继承了她的王位。他做事的动力似乎主要来自于一种取消他母亲所取得的成果的愿望。他放逐了她的一些亲信,释放了她的许多囚犯。然而,保罗的行为令人难以预料。一方面,他在圣·彼得堡强制实行严格的宵禁令,并禁止活页乐谱的输入;另一方面,他又在 1797 年的法令中阻止了星期日进行劳动的需求。

也许对于保罗最为致命的是他对贵族所实行的刚性政策。他恢复了贵族必须履行的服役义务,并消减了他们在省里的权力。贵族被迫为公共建筑支付账单,并为他们的土地交纳新税,他们还要为犯罪行为遭受肉刑。保罗想要在军队的军官中培养一种对其下属的责任感。而近卫团憎恨他的计划,由于近卫兵的密谋策划,导致保罗被谋杀和亚历山大在 1801 年的继位。

由于受到一名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瑞士家庭教师的教育,

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 年在位)吸收了许多 18 世纪的新式学说。然而,自由主义原则在俄国的实行将直接挑战最强大的社会势力,而且,还要求沙皇放弃自己所拥有的一些权力。亚历山大妥协了,最后并没有实行多少。他的确倡议过一项产生了一种新式自由农民——已经被主人给予自由的农奴——的法律,并规定如果所有者给予整个村庄的农奴以自由,他也必须将他们耕种的土地赠与他们。然而,这种温和的动议依赖于所有者的自愿合作,几百万的农奴中,只有不到 4 万人因此获得自由。

迈克尔·斯佩兰斯基(Michael Speransky,1772—1839)是亚历山大的首席顾问。他是一位俄国牧师的儿子,有才智,接受过良好教育,并本着良心做事。斯佩兰斯基草拟了一部宪法,这部宪法本可以使俄国成为有限君主制国家。一系列地方选举产生的议会将最终导致一个国民议会——杜马的诞生,杜马将不得不批准沙皇提议的任何法律,并将成为俄国国会。由于这将极大地有利于贵族并排除了农奴,所以亚历山大拒绝执行他曾委任设计的方案。于是,一个国家顾问委员会成立,负责为沙皇提供建议,但是,由于其中的成员都由沙皇来任命和解职,沙皇也不必被迫接受建议,所以,结果只是提高了帝国的效率而没有限制皇帝的权威。各部门的重组进一步提高了效率,各部门的责任第一次被明确地宣布出来,消除了交叠现象。

在亚历山大统治的最后十年间,即 1815 年到 1825 年之间,宫廷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艾力克斯·阿拉克契耶夫(Alexsey Arakcheev,1769—1834),他是一位有能力和残忍的官员,他改革了军队,并建立了一个令人憎恨的"军事殖民地"体系,征募整个行政区的人口到驻扎在那里的兵团服役。当没有训练或不作

战的时候,这些士兵将去耕种他们的田地,他们的整个生活经常被他们军官的奇思异想所支配。到亚历山大统治的末期,几乎40万士兵生活在这些残酷的军营里。

尽管亚历山大没有给俄国带来任何重要的改革,但作为"开明的沙皇",他的统治的确超出了俄国本身。1815年波兰得到部分重建,他成为它的国王,他为波兰人制定了一部现代的宪法,波兰人仍旧保有自己的军队和官员,并可以自由使用自己的语言。他在1809年从瑞典取得芬兰并将其吞并之后,允许芬兰人保留自己的法律准则和芬兰在瑞典长期统治时期所引入的地方政府系统。

4. 对外政策(1725—1796)

从彼得大帝去世到凯瑟琳去世期间,俄国的对外政策始终是寻求对瑞典、波兰和土耳其进行扩张的传统目标。但是,俄国发现这些目标逐渐将其与中欧和西欧的国家牵连在一起。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中(1733—1735),俄国军队与奥地利军队结成同盟。之后,俄国人和奥地利人在1735年到1739年的一场反对土耳其人的新的战争中又成为同盟者。尽管俄国人成功地侵入克里米亚(Crimea),但他们所获得的领土只限于亚述海。奥地利人在入侵多瑙河各公国时并没有与俄国人合作,清楚地表明他们不喜欢俄国人向哈布斯堡王室所统治的边境地带推进。而彼得大帝的德籍孙子(未来的彼得三世)被指定为继承人,以及对其父是一名普鲁士将军的德籍凯瑟琳的选择,都表明了德国这一反奥地利势力的影响。

俄国人仍旧保持着对奥地利的忠诚,在七年战争中与普鲁士人作战。俄国军队侵入东普鲁士,并在1760年进入柏林。曾

经是普鲁士人的彼得三世在1762年初的即位导致俄国人改变战线,迅速加入普鲁士人,反对奥地利人和法国人。当后来即位的凯瑟琳撤回俄国军队时,俄国被排斥于1763年的和平会议之外。

在对外政策上,凯瑟琳积极并不择手段地寻求俄国的传统目标。当波兰王位出现空位的时候,凯瑟琳确保她的前任情人斯坦尼斯拉斯·波尼亚托夫斯基(Stanislas Poniatowski)当选成为斯坦尼斯拉斯二世(1764—1795年在位)。腓特烈大帝后来在一场为天主教国家波兰的路德教和东正教少数派争取权利的战役中与凯瑟琳联合在一起。被外国干涉所触怒的一派贵族得到了法兰西和奥地利的援助,法兰西和奥地利运用计谋迫使土耳其与俄国开战,以便转移凯瑟琳在波兰上的注意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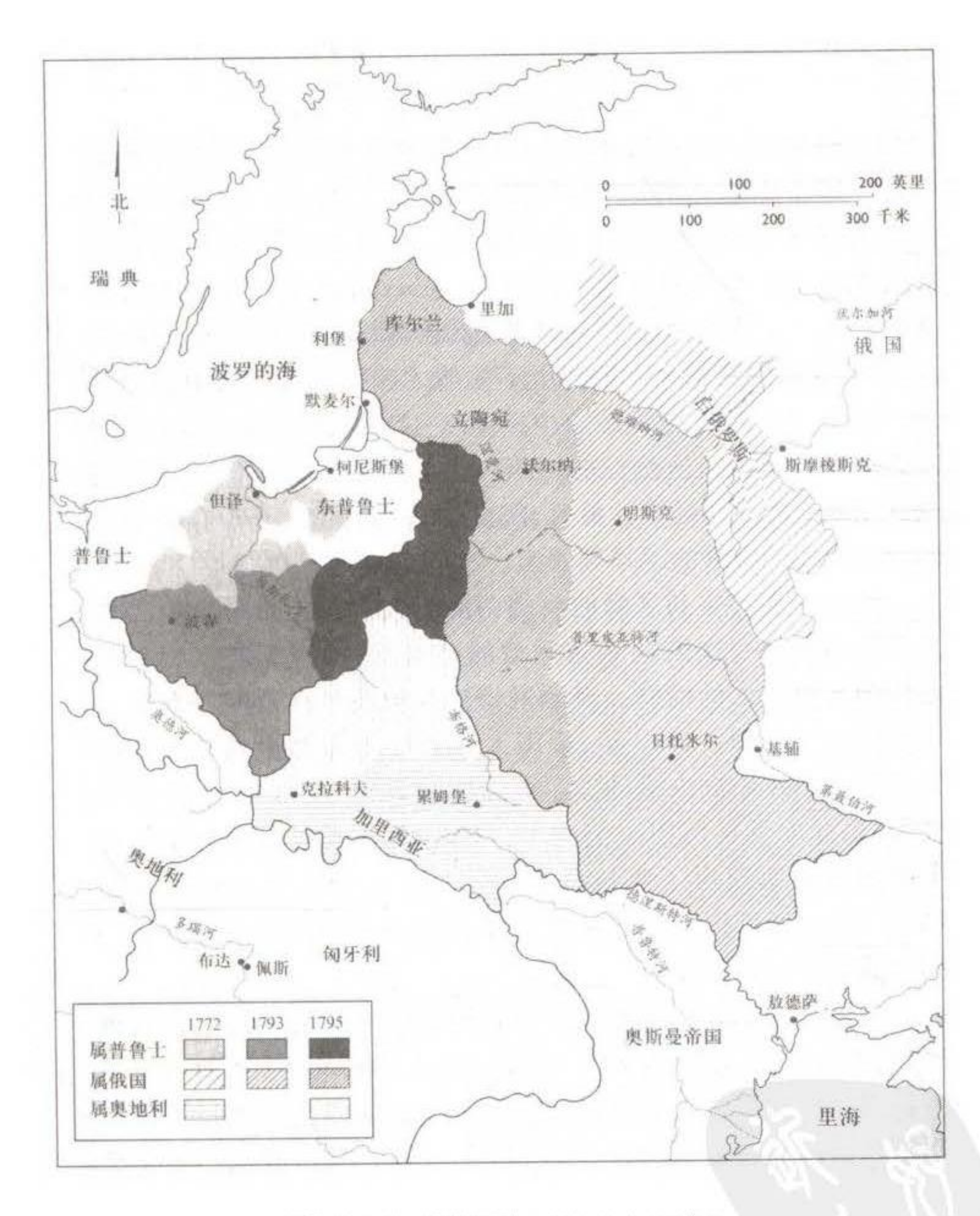
在俄土战争中(1768—1774),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驶进地中海,在爱琴海(1770年)摧毁了土耳其舰队。正当俄国人与土耳其人商议和约条款的时候,腓特烈大帝断定,如果不迅速行动的话,俄国对土耳其的胜利也许会导致俄国夺取波兰的大部分领土。于是他安排了对波兰的第一次瓜分(1772年),波兰要丧失三分之一的领土和一半的人口,分给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俄国得到一个具有实质价值的地区,后来成为白俄罗斯(Belorussia/White Russia)。两年之后,在库丘克—凯纳基(Kutchuk Kainardji)条约中,凯瑟琳并吞了之前土耳其在黑海海岸扩张所得的大量领土。克里米亚被从奥斯曼帝国分离出来,在1783年被俄国吞并。凯瑟琳还使俄国长期拥有的利益得到公认,那就是在黑海航行的自由和通过博斯普鲁斯(Bosporus)海峡与达达尼尔(Dardanelles)海峡的权利。

现在,凯瑟琳开始梦想从欧洲驱逐土耳其,复兴俄国保护下

的拜占庭帝国。她将较小的孙子命名为君士坦丁,并用讲希腊语的保姆来训练他的语言。她还意图建立达契亚(Dacia)王国("罗马尼亚"的罗马名称)。经过筹备,凯瑟琳于1783年在新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的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建立了一个海军基地。为了实现这些宏伟的计划,凯瑟琳设法得到奥地利的赞同,并用船载着约瑟夫二世游历不久前才获得的俄国西南部的领地。然而,在第二次俄土战争中(1787—1791),凯瑟琳的奥地利盟友再次提供的援助依然微弱,并且,不久便卷入与俄国在苏丹的欧洲领地上的利益冲突。最后,凯瑟琳只得满足于获得存留下来的沿黑海北部海岸的土耳其领土。

凯瑟琳生前参与了对波兰的两次更大规模的瓜分。第二次瓜分的出现是一次波兰立宪运动的结果,运动得到与俄国利益相悖的普鲁士人的支持。凯瑟琳借口维护波兰既定秩序和阻止革命而插手干预。1793年,俄国人和普鲁士人都得到了大片的波兰领土。在一次未成的波兰革命之后,第三次瓜分于1795年开始,由此波兰从地图上消失了。这一次奥地利加入到了另两个强国中来而获得了克拉科夫(Krakow),普鲁士得到了华沙(Warsaw),而俄国收获了立陶宛(Lithuania)以及其他的波罗的海和波兰东部的领土。

凯瑟琳的惊人成就导致上百万憎恨俄国人的人被迁移到俄国,其中有波兰人、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和鞑靼人,从而留下了一份不稳定和不安全的遗产。它也意味着俄国已经毁掉了波兰和鞑靼诸国这一有利的缓冲带,如今与它的潜在敌人——普鲁士和奥地利使用着共同的边界。



对波兰的瓜分(1772年、1793年、1795年)

六、乔治三世和美国独立

尽管凯瑟琳大帝没能将理性时代的思想应用于实际，但是，她的名字还是经常出现在开明专制君主的名录上。另一个名字有时也被加入到这个名录中，他就是乔治三世，大不列颠的国王(1760—1820年在位)。乔治三世设法从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辉格党寡头政治集团那里夺得了对下院的控制，并通过恩惠和贿赂维持着这种控制。乔治是一个善良的人，并献身于他的家族，但作为一个君主，他是固执的、目光短浅的，从长远看来也是不成功的。起初对于他来说，利用辉格党中的派系争斗是容易的，策动威廉·皮特在1761年下野，使他的私人顾问比特(Bute,1713—1792)勋爵成为内阁首脑。然而，比特和国王发现一件困难的事情，就是无法为他们没能在结束七年战争的《巴黎和约》上从法兰西夺得盛产蔗糖的西印度群岛一事找到正当的理由。下院批准了条约，但乔治辞掉了比特。

最刺耳的批评来自于一位下院议员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1727—1797)。威尔克斯在他的报纸《北不列颠人》上对条约的抨击激怒了国王。为了平息王室的愤怒，下院下令烧掉带有冒犯言论的那一期报纸。后来，威尔克斯又三次竞选议员，但每次下院都在王室的压力下把他的选举丢在一边。当威尔克斯在1774年最终再次当选的时候，他成为一个大众英雄。

一个更明智的国王本会重新思考他的方针，但是，乔治三世并未放松其同时控制议会和内阁的决心。在七年的时间里(1763—1770)，内阁是短命的、不稳固的，之后乔治最终发现了一个可以填补比特位置和听从国王吩咐的人，诺斯(North)伯

爵,他掌管内阁直到 1782 年。在诺斯任职期间,王室对内政的干涉起初表现得强硬,后来变得犹豫不决,到最后当面对一次反抗时就崩溃了。

1. 美国人反抗的背景(1760—1776)

殖民地与不列颠之间的不和在七年战争之后开始变得严重,这时不列颠开始更加直接和频繁地干涉殖民地的事务。到 1763 年,尽管殖民地议会的行动仍旧要受制于王室任命的总督或国王本人的否决权,但殖民地已经变得习惯于管理自己的事务了。1763 年,在加拿大和阿利根尼山脉(Allegheny Mountains)西部所获得的辽阔领土,增加了不列颠有利可图的开拓机会,也同时增加了管理和防御的责任。当庞蒂亚克(Pontiac,约 1720—1769 年)领导的印第安人起义威胁到俄亥俄河谷和五大湖地区的边境军事基地之时,殖民地的预备役部队没能采取有效的行动,于是不列颠正规军介入进来。持续的威胁促使王室在 1763 年 10 月宣布,禁止“我们所有亲爱的臣民”居住在阿利根尼山脉最高点一线以西的区域。然而,对于居住在沿海殖民地的英王陛下的“亲爱臣民”来说,这一声明似乎是有意设计来将他们排除于西部的富饶土地之外。

殖民地甚至更加强烈地抱怨议会企图提高北美税收的做法。不列颠政府具有非常有力的理由来增加殖民地的税收:在七年战争期间,国债几乎翻倍;殖民地不愿意征募士兵和提高自己的税收,对不列颠的纳税人来说,已经增加了战争费用,现在,母国还面临着保护边境的持续开支。议员们认为,美国人必定会接受征收更高税额议案的合理性。

然而,那恰恰是美国人所不容许的。第一项新的税收措施是1764年的《蔗糖法案》(*Sugar Act*),它使东海岸的商人感到惊慌,因为海关官员竟然着手对磨拉石、蔗糖和其他进口物征税。由于进口税不得不通过殖民地不足的货币储备来支付,这对殖民地经济造成了威胁。第二项税收措施是1765年的《印花税法案》(*Stamp Act*),强行对各类商业项目进行征税,包括合法票据和商业票据、酒精饮料许可证、扑克牌赌博、掷骰子赌博、报纸、日历和大学学位。这些税收进一步耗尽了货币储备。

税收措施激起了一场重要争论。"新世界"愤怒的商人联合抵制所有的进口物,而不是交税。1765年10月,来自9个殖民地的代表在纽约城集会,召开了印花税法大会。大会抗议新税带有"一种颠覆殖民者权利与自由的明显倾向",并宣布了无代表则不纳税的原则。不列颠在实际问题上做出了让步,但没有在原则上屈服。那些几乎被美国人对英国商品的联合抵制弄得破产的伦敦商人发出了呼吁,呼吁导致《印花税法案》在1765年被废除。然而,在1766年,议会宣布了一项《公告》,宣称国王和议会完全可以制定有关殖民地的此类法律。

不列颠在之后的十年间,坚决地坚持《公告》(*Declaratory Act*)所声明的原则,而殖民地的激进派则坚决地重复着他们对于无代表而纳税的反对。议会再次试图提高税收,这次是通过汤申德(Townshend)税(1767年)对殖民地进口的茶叶、纸张、涂料和铅征税。费城、纽约和波士顿的商人再次组织了联合抵制。1770年,诺斯伯爵的内阁撤销了汤申德税,但保留了对每英磅茶叶征收三美分的关税。三年后,英属东印度公司试图在北美销售过剩的茶叶,使包括了关税的东印度茶叶的零售价格远远低于殖民者走私进来的荷兰茶叶的零售价格,希望由此克服美

国人对可恨的关税的反对。结果导致了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1773 年 12 月 16 日,在码头上旁观的人群发出了欢呼声,因为一批在走私茶叶上有着大规模风险投资的波士顿人伪装成美洲土著人,登上三艘东印度公司的轮船,将成箱价值数千英镑的茶叶倒入海中。

不列颠用武力来回答挑衅,殖民者则用反抗来对付武力。《魁北克法案》(*Quebec Act*,1774)将阿利根尼山脉以西的土地并入加拿大,从而锁上了殖民地边界向西扩展的大门。《不可容忍法案》(*Intolerable Acts*,1774)——如此称谓是由于全体殖民者认为它是不可容忍的——停止了波士顿港的贸易,并延缓马萨诸塞州的选举。1775 年 4 月,马萨诸塞州的农民在莱克星敦(Lexington)和康科德(Concord)打响了独立战争的第一枪。1776 年 7 月 4 日,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的代表在费城正式宣布 14 个美洲大陆殖民地中的 13 个脱离大不列颠而独立。

2. 革命的含义

对母国来说,北美革命不仅仅意味着 13 个殖民地的脱离。它使不列颠卷入到一场小规模的世界战争之中,这场战争危及不列颠的海外统治,并削弱了国王乔治三世在国内的权力和威望。在北美爆发的最关键性的战役出现在战争的早期,也就是约翰·伯戈因(John Burgoyne,1722—1792)将军所率领的英国军队于 1777 年在萨拉托加的投降。伯戈因的投降使法国人意识到,对美国殖民者的支持会给他们带来一个绝好的机会来报复 1763 年的羞辱。法兰西于 1778 年参战,不久便获得西班牙

的加盟，并最终得到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援助或友好的中立。

法国的干涉为最终的胜利准备了条件。1783 年在巴黎所签订的和约中，不列颠承认了前殖民地的独立。它将 1763 年获得的佛罗里达以及地中海上具有战略意义的梅诺卡（Menorca）岛归还给西班牙。但是，不列颠保留了西班牙曾经也希望收复的直布罗陀，而且，只割让了小块的领土给法兰西。

在战争的前几年，英国公众是强烈反美的，但是，当美国的反抗力量变得明显的时候，舆论倾向改变了。英国管理不善的例子堆积如山，而大多数的欧洲国家都支持反叛的殖民地。到 1780 年，乔治三世和他的政策已十分不受欢迎，以致下院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国王的影响已经得到增加，并还在增加，而应该被减小了。"1782 年，诺斯伯爵下台。第二年，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1759—1806）获得首相之职，他是七年战争中英雄人物皮特的儿子。随着皮特的到来，不列颠政治的控制权从国王那里转移出来，又回到职业政治家的手中。

对殖民地革命的支持决不是全体一致的。许多富裕的殖民者，包括南方的种植园主和宾夕法尼亚的贵格派教徒，在战争中或者支持母国；或者采取中立的立场。纽约为乔治三世补充的新兵比为乔治・华盛顿所补充的还要多。然而，革命情绪在弗吉尼亚、新英格兰以及一些惯于对已有权威进行置疑的社会群体中异常高涨，这些社会群体包括了许多生活在边境的商人和拓荒者，还有众多因反对旧世界而来到新世界的宗教团体。

文献记载

印花税法大会维护地方代表的权利

1765年10月,印花税法大会在纽约城召集并宣布:

陛下在这些殖民地的忠诚臣民被给予天生于大不列颠王国的臣民所享有的全部权利和自由。

除非征得他们自己的同意,这种同意由他们本人或他们自己的代表来授予,否则不能将任何税收强加于他们身上,这对于任何一个人的自由都是不可分离的必要条件,这也是英吉利人毫无疑问的权利。

这些殖民地的人民没有,从他们的地方情况来说也无法在大不列颠的下院中得到代表。

这些殖民地的唯一代表是他们自己在当地选出的人,除非通过他们各自的立法机构,否则没有赋税曾经或能够依据宪法强加于他们身上。

From *Documents of American History*, 9th ed., ed. Henry S. Commager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Inc., 1973), p. 58.

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们所创作的草案的核心是政府的执行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相分离。其中的每个政府分支都有权力制约其他两个。美利坚合众国的国父们不仅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而且从最初13个州的宪法和英国先例中寻求指导。合众国宪法(1791年)开头的10个修正案主要来自于英

国 1689 年的《权利法案》，它们保证了宗教自由、出版自由和其他基本自由。

七、对启蒙运动的挑战

启蒙思想家希望人们在理性被指明时能够理解它，希望人们放弃数个世纪以来形成的习俗，并依照自然法修正他们的行为。但是，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在深谋熟虑中却倾向于忽略人性难以预料的复杂性。一位较次要的启蒙思想家德·马布利(de Mably，1709—1785)神甫触及到了这个关键问题，他问道："那么社会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吗？"大多数启蒙思想家及其追随者认为是这样的，他们将物理科学中所使用的数学方法施用于难以预料的人类。例如，重农主义者试图将人类经济活动的复杂性简化为几个简单的农业法则。

然而，几个直言不讳的批评者有着不同的看法。意大利哲学家乔瓦尼·维柯(Giovanni Vico，1668—1744)在 1725 年出版了《新科学》(*Scienza Nuova*)，其中没有将国家看做为一台服从于自然法则的机器，而是将其视为一个有机体，它具有由其自身本性所强加的生长、成熟和衰败的模式。一位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通过承认他在为其他国家的繁荣而祈祷，戏剧化地表现出他对重商主义的反对和对自由国际贸易的拥护。但是，他所具有的深刻的怀疑主义和带有腐蚀性的常识使他很快就结束了对自然和理性的哲学诉求。例如，对休谟来说，正义的法则不是不变的，而是随着环境而变化的，在紧急情况下，可能完全屈从于"需要和自我保存这类更强烈的动机。在船只失事后，不顾及从前的财产限制而抓住一个



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关于波士顿"血腥大屠杀"的绘画。(Courtesy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人所能抓住的任何安全工具或设备,是犯了什么罪吗?"*

* David Hume, *Enquiries Concerning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1751, ed. L. A. Selby-Bigge, 3rd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5), p. 186.

在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大学(University of Königsberg)讲授哲学的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挑起了对形而上学标准的争论。尽管康德支持启蒙运动的许多学说,但他相信一种能够最后触及上帝的更高层次的实在。他把更高世界的永恒真理称为本体(noumena,来自于意为“思想之事”的希腊词语),相对于通过感觉来体验的物质世界的现象。康德所相信的本体王国的知识,我们要通过理性才能理解。然而,这个理性不是启蒙运动所使用的那个词,也不是常识,而是直觉。康德理性的最高表达就是“绝对规则”。这是存在于由上帝注入的良心之中的道德法则。康德对理性的重新定义和对良心的复兴例证了正在兴起的哲学回应,这一回应是与启蒙运动的占优势地位的理性主义相悖的。就连耶稣会士也反对将人看做是一台机器。

1. 虔信派教徒和卫理公会派教徒

在另一方面,大众的反应是一种由德意志虔信派教徒开始的福音复兴。虔信派教徒宣称宗教信仰来自于内心,而不是大脑,上帝远远不仅是一个钟表匠,也不仅仅是一个世界机器的远程创造者。尼古拉斯·亲岑道夫(Nikolaus Zinzendorf,1700—1760)伯爵是虔信派的主要领袖之一,也是摩拉维亚兄弟会(Moravian Brethren)的创立者,他根据基督教原则建立了一个共同体原型。摩拉维亚教徒移居到美洲,在宾夕法尼亚的伯利恒(Bethlehem)建立了一块殖民地,有助于形成宾夕法尼亚的德国人所享有的节俭、辛勤劳作和严肃生活的名声。

在英格兰,任英国国教牧师的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起先强调宗教信仰的仪式方面,但后来他发现自己的宗教信仰消失了。虔信派使卫斯理改变信仰,他相信自己将通过内心的信念而发现信仰。在50多年的时间里,卫斯理致力于同别人分享他的发现,他的布道遍及不列颠群岛,出现在教堂、农场、煤矿的矿坑口,甚至监狱。当卫斯理去世的时候,他的宗教运动已经吸引了10万多信徒,由于他们循规蹈矩地献身于虔敬,简朴的衣着和生活,故称"卫理公教派"或"循道宗"。尽管卫斯理总是认为自己是一名英国国教教徒,但卫理公会派教徒最终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组织。这一新教派的信徒几乎全部分布在较低的阶级和中产阶级之中,以及那些寻求无法在自然神论和英国国教中找到宗教激情和安慰的人们中间。

虽然卫理公会派教徒的信仰与启蒙运动的信念大相径庭,但他们也致力于改善社会状况。

在启蒙思想家拥护公共改革的地方,卫理公会派教徒支持私人慈善事业;在启蒙思想家抨击罪恶来源的地方,卫理公会派教徒把这些罪恶接受为上帝计划的一部分,并设法减轻罪恶的症状。他们开始鼓动反对酗酒、奴隶贸易,以及残暴地对待囚犯、精神病患者和病人。卫斯理为煤矿工人的孩子建立了学校,并为穷人开设了诊疗所。卫理公会派教徒的成功部分是由于他们的社会方案,部分是由于卫斯理和他能干的同仁的吸引力。在美洲,卫理公会教派的传教士在弗朗西斯·阿斯伯里(Francis Asbury,1745—1816)的有力领导下表现活跃。以卫斯理命名的学院的数量和以阿斯伯里命名的教堂与街道的数量证明了卫理公会派在北美社会历史上的重要性。

2. 文学和艺术：浪漫主义的开端

这个世纪文学上的里程碑既包括法国启蒙思想家和英国奥古斯都时代的古典著作，也包括在现实主义描述和“感性”（即情感生活）描述方面的新尝试。在英格兰，文学的奥古斯都时代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它宣称它以拥有一群能与曾经活跃于罗马奥古斯都皇帝时期的维吉尔（Vergil）、贺拉斯（Horace）和奥维德（Ovid）等人相比的天才而自豪。

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是奥古斯都时代最伟大的人，一个悲观主义和有时沮丧的天才。在他的伟大著作《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1726）中，对科学努力的露骨和强烈的讽刺性描写。就贵族和有理性的马所作的令人震惊的对比，以及粗野和令人生厌的人形兽，都被认为是对人类行为具有理性的轻易假定进行抨击。

更具有古典特征的是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1788）和约翰逊博士的《字典》（*Dictionary*）。吉本（1737—1794）借助于历史对基督教狂热主义进行持续的抨击，同时以教师那样平铺直叙的文体阐明了他有关衰落的理论。词典编撰者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在其《字典》的前言中表达了对时代的另一种关注：

> 当我对我所从事的事情进行初次审视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言语丰富但无序，充满活力但无规则。每当我要转变看法的时候，就会有困惑要得到解决，混乱要得到规范。

> 选择要从无尽的变化中做出,而没有任何既定的选择原则;杂质要被检定出来,但没有一种固定的纯度测试;表达方式,无论是被否定的,还是被接受的,都没有得到任何有古典声望或公认权威的作家的投票赞成。*

与此同时,小说的快速发展极大地增加了更具现实性和情感性的读物的流行。

两部最早的新式小说是由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创作的《鲁宾逊漂流记》(1719 年)和《摩尔·弗兰德斯》(1722 年)。两部作品都远离了古典主义文雅和严肃的感觉。现实主义在 18 世纪中叶两部著名的小说中也表现的很明显:在《罗德里克·蓝登》(1748 年)中,托比亚斯·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t,1721—1771)描述了在英国海军生活的真实情景,表现了其中的残忍和辛酸。由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07—1754)创作的,在 1749 年出版的《汤姆·琼斯》,是第一部真正伟大的社会小说,对伦敦贫民窟的无赖以及放纵不羁、酗酒的乡绅有着令人信服的生动描写。

菲尔丁也喜欢嘲弄性地模仿塞缪尔·理查德森(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的情感小说。后者创作了三部巨幅的长篇小说,都以男女主人公所写的书信为叙述形式。一部是《克拉丽莎》(1748 年),用 2400 页描述了克拉丽莎的不幸。她的爱人是个无赖,她贪婪的亲戚一直在谋划取得她的财产。凭借其所有极端的情感主义和说教,理查德森对情绪和良心的描写使正在增加的喜好读书的公众确信,他的长篇小说为在英国小说

---

* Samuel Johnson,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William Stralan, 1755), p. 4.

和公共讨论中建立道德保证的传统做出了很多贡献。

在法兰西，情感性小说的流行得自于安托万·弗朗索瓦·普雷沃斯特(Antoine François Prévost)脍炙人口的《曼侬·莱斯科特》(1731年)。书中讲述了一个被打发到路易斯安那殖民地的年轻女人的冒险经历。在风格和语气上十分近似于理查德森的是卢梭的长篇小说《新爱丽丝》(1761年)，它对爱情与责任的冲突进行了描写。越来越多的读者转向此类小说来寻求对道德问题，特别是性问题的指导，而不是去教堂。

在德意志，最重要的文学作品是莱辛(Lessing)的戏剧和与"狂飙突进"(Sturm und Drang)运动相联系的作家的大量作品。莱辛(1729—1781)将理查德森式的情感，以及法国喜剧的含泪感伤与明智地遵循常识和宽容结合在一起。在《智者纳旦》(1779年)中，他戏剧化地表现了自然神论的信仰：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一种普世宗教的表现形式。

对渴望、挫折和绝望等情绪的描写显示了"狂飙突进"时期最为成功作品的特点。一部短篇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1774年)使年轻的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一夜成名。拿破仑声称读过此书7遍，每次读到主人公因为他所爱的女人已经出嫁而自杀时，就泪如雨下。浪漫主义运动在18世纪结束之时横扫欧洲，自我哀怜和自我毁灭的主题是其中的突出内容。理性是同启蒙运动相联系的路标，而这些精湛的情感艺术和文学与对理性的强势坚持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个世纪的古典主义更强烈地影响着艺术。吉本的历史、学者和考古学家的研究，以及1748年对完好保存于维苏威火山灰烬下的罗马庞培废墟的发现，都将人们对古老事物的兴趣提

升到非常的高度。对启蒙运动的学者来说,希腊和罗马神殿的平衡与对称有效地表现了建筑中的自然法则。建筑师凭借伟大的艺术才能和多样的变化,使古典模式适应了现实的条件。

在绘画上,新古典主义有一位杰出的代表,乔舒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1723—1792)爵士,他是皇家学院的院长。乔舒亚爵士告诉学院,美取决于"始终如一的、永恒的和不变的自然法则,"而这要"通过理性来探查,通过学习来知晓。"这是英国肖像画的黄金时代,是雷诺兹、托马斯·根兹伯罗(Thomas Gainsborough,1737—1788)、乔治·罗姆奈(George Romney,1734—1802)和托马斯·劳伦斯(Thomas Lawrence,1769—1830)爵士的时代。但它同时也是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1697—1764)的时代,他创造了一个欣赏雕版画的大众市场,这些雕版画是他从几千幅有关伦敦罪恶的仿制品、图示的布道之中制作出来的,其中有《时尚婚姻》、《浪子生涯》、《妓女生涯》和《金酒小巷》。

在法兰西,被称做洛可可式的装饰风格在路易十五统治时期流行起来。除了更光亮、更轻快、更精致和优美,它甚至比巴洛克式更加奇幻,它热衷于运用源自奇异摇摆式的构造和贝壳似的造型的主旨观念。这种风格抓住了这个时期的社会仪态,优雅而又肤浅,精细而又陈旧;最好时愉快有趣,最坏时华丽造作。

与此同时,将在浪漫主义时期盛名远播的三种艺术风格已经开始流行了,即对东方的、自然的和哥特式风尚的欣赏。洛可可式对外来物的兴趣使中国的东西成为时尚,其中有中国的壁纸,托马斯·奇彭代尔(Thomas Chippendale,约1718—1779年)的"中国"家具,以及被称做中国艺术风格的物品,即精致的

瓷器作品或画卷。18 世纪的花园布满了宝塔和尖塔。

但音乐是 18 世纪的艺术女王。一位德国的唱诗班指挥，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精通困难的赋格曲艺术，这是一种复杂的轮唱形式，其中每个声部依次开始主旋律，同时其他声部重复它并进一步展开它。巴赫谱写了赋格曲和许多管风琴的曲目；他为小型管弦乐队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包括《勃兰登堡协奏曲》，连续发声乐器在其中得到了显示潜力的机会。他的宗教作品包括许多大合唱，如《B 小调弥撒曲》，以及两部有关耶稣受难的宏大合唱配乐。

巴赫平静的地方生活与其同胞乔治·腓特烈·韩德尔(George Frederick Handel,1685—1759)的动荡的国际生涯形成强烈的对照。韩德尔在伦敦的大部分成年时光都被用来努力运作一个歌剧团。他写了 40 多部歌剧，并将源自《圣经》的主题运用于《弥赛亚》和其他有力的清唱剧，这些清唱剧是为大型合唱队所准备的，且面对的是大规模的听众。

尽管巴赫和韩德尔创作了许多器乐组曲和协奏曲，但直到这个世纪的后半期，管弦乐才真正地走到前台。新的乐器被发明出来，著名的是钢琴，它极大地扩展了大键琴的有限音域。新的器乐形式也被发展出来，如奏鸣曲和交响乐，这主要归功于一位奥地利人，弗朗茨·约瑟夫·海顿(Franz Joseph Haydn,1732—1809)。海顿写作了 50 多首奏鸣曲形式的钢琴曲，其中两个相对的主旋律依次开始，逐步展开，交织，重复，最终在结尾(意大利语为“尾部”)成为和谐音。海顿还为管弦乐队改编了奏鸣曲，将奏鸣曲移植到意大利歌剧序曲上，开启了最初的交响乐运动。

尽管如此，这个世纪早期的歌剧里程碑仍是约翰·盖伊

(John Gay,1685—1732)的《乞丐歌剧》(1728年),一部和谐悦耳的作品,讽刺了伦敦的黑社会。后来,德国人克里斯托夫·格鲁克(Christoph Gluck,1714—1787)使歌剧成为得到良好制作的音乐剧,而不仅仅是展示发声技巧的工具。他遵循古老的习俗,从古典神话中获取男女主角,但他努力给予这些人物以新的生命力。

歌剧、交响乐、协奏曲和室内乐在另一位奥地利人的作品里都达到了高潮,他就是沃尔夫冈·阿马迪乌斯·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当莫扎特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开始开发他的天赋,用马车载着他走遍欧洲,炫耀他在大键琴上的精湛技巧和令人惊异的作曲天分。他一生劳累过度,生命后期负债累累,在35岁死去时已经是个靠救济过活的人。然而,他青年时期的早成稳定地造就了成熟的天才,他奇妙的技巧和多才多艺从未超越这个时期。

启蒙运动也同时展现了女作家的兴盛,特别是在社会问题的写作方面。她们是废奴运动的领导者,还作为沙龙的女主人扮演着重要角色,作家在沙龙里聚集在一起讨论时事,并为新的宗教运动奠定了基础。浪漫爱情和婚姻的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一纸婚约,还意味着生活的伴侣,它改变了人们对家庭的态度。早期女权主义作家的先驱是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她反对穿着和行为方面的社会习俗,她穿着裤子,支持穷苦人,并早年离家。作为随笔作家和小说家,她提倡性自由,公开谈论妇女的性欲,并将妇女与奴隶进行对比。她的《为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1792)一书的出版,通常被当作现代女权运动的开始。然而,她的著作也许被忘记了,因为她似乎过于激进和令人震惊

了:她未婚生子,与一位主要的无政府主义者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1756—1836)公开地生活在一起,使英国社会感到反感。直到19世纪末,她才被重新发现。

八、本章小结

18世纪法国文化的领导力是卓越的。18世纪启蒙思想家或知识分子的关键概念是理性、自然法和进步。启蒙思想家在人类施用理性的能力上表现出了乐观主义,他们在有关政府和人类心理的观念上借鉴了约翰·洛克的思想。在狄德罗的指导之下,启蒙思想家创作了三十三卷的《百科全书》,推动了进步和理性观点的发展,揭露了迷信和无知,并根据自然法和科学公开抨击了不平等。

弗朗索瓦·魁奈和亚当·斯密总结了那些被称为重农主义者的启蒙思想家的经济原理。重农主义者的自由放任主义规划,或者说成是"让自然按其本身的程序来运行",与传统的重商主义学说发生碰撞。

在司法和教育方面,启蒙思想家寻求基于理性和自然法的改革。他们支持宗教宽容,抨击迷信。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表示信仰上帝,但反对不宽容,并发展了自然神论者的学说。

像许多其他的启蒙思想家一样,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年)中表达了对英国的政府观念的羡慕。在《社会契约论》(1762年)中,让-雅克·卢梭提出了公意的理论,以协调个人需要和政府制度。从此以后,卢梭的思想构成了激进政治学说的基础。

这段时期开明的专制君主表现出一种对启蒙思想和绝对君

主制的混合状态。腓特烈大帝阅读了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并促进了农业中的重农主义思想。但是,他反对自由放任主义思想。在宗教和社会政策方面,他创立了一定程度的宗教宽容,并支持司法改革,但却不采取行动来减少社会的不平等。

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西班牙的查理三世,以及葡萄牙和瑞典的统治者开始着手开明的改革。然而,这些开明统治者的继任者没有继续他们的规划。

在俄国,凯瑟琳是一个喜欢改革思想的绝对独裁者。她试图依据开明的思想编撰法典,重组地方政府,并引进某些市政改革。但是,在凯瑟琳统治之下,随着贵族对奴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权威,农奴制加强了。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吸收了开明的思想,但犹豫不决,尽管有着良好的意图,却几乎一事无成。俄国继续采取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凯瑟琳吞并了克里米亚,并参与瓜分波兰。

在不列颠,顽固和短视的乔治三世试图重新维护王室特权。在七年战争之后,一次决裂分割开了不列颠和它的北美殖民地。殖民者对不列颠企图提高北美殖民地税收的反抗,导致了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的发布。

凭借法国的帮助,殖民者赢得了独立,在1783年的《巴黎和约》中得到承认。美洲殖民者的成功反抗削弱了乔治三世的权力和声望。《独立宣言》诉诸洛克描述的自然法则,而新的《合众国宪法》反映了孟德斯鸠的权力分立思想。

启蒙思想家没有考虑到人性的复杂性。他们对自然法则和理性的诉诸没有改善国家的状况。大卫·休谟和伊曼纽尔·康德表现出对理性主义的哲学反思。德国虔信派和英格兰的卫理公会教派运动显示了大众对启蒙运动的反思。

一种新的小说类型出现在丹尼尔·笛福的著作和亨利·菲尔丁的社会小说中。在德意志，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体现了“狂飙突进”运动的挫折。新古典主义影响了艺术的发展，但是，对东方、自然和哥特式风格逐渐增强的鉴赏力预示了浪漫主义时代的来临。



第四章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

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相对的政治稳定之后，18 世纪 80、90 年代的欧洲激荡着革命运动的浪潮。大多数的革命运动波及范围有限，并在短期内就失败了，但从长远来看，它们的确促进了欧洲政治体系的根本性变化。在 19 世纪，欧洲不得不应对民主制的到来、法律面前平等性的扩大和从未如此现实的人民革命的可能性。现代政治的关键词汇在这个时期成形。正如“自由”、“平等”、“公民”、“爱国者”、“国家”、“权利”和“宪法”一样，“革命”也获得了新的含义。

这场革命浪潮的原因有许多，它们在每个国家都有些不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和美国革命加在政府身上的战争财政负担。尽管较富裕的经济状况和在这段时期猛增的国家借款缓解了由此带来的冲击，但政府最终还是被迫将十分沉重的税收负担强加于市民身上，从而招致了广泛的愤恨。不列颠就是最好的例证。在 1790 年，不列颠的国债是 1707 年的 15 倍，但即使如此，政府也不得不将每年的

税赋从大约500万英镑增加到1800万英镑，以弥补其不断攀升的军费开支。在18世纪晚期新的政治形势下，革命成为对此最可能的反应。所以，尽管不列颠在国内设法避免了国家的崩溃和革命，但是，当它在1763年之后试图迫使殖民地交付更多的税赋时，却避免不了13个北美殖民地的反抗。

几个因素导致了这场对18世纪晚期税收增加的革命性反应。

首先是较大量的、较富有的中产阶级的出现，他们缺少为贵族阶级和其他特权等级所享有的财政和其他特权。尽管大多数富有的中产阶级想要加入这些等级而不是摧毁它，但当征税问题出现时，愤恨的情绪注定会爆发。因此，多数的革命领导者都带有中产阶级的职业背景，这并不意外。在过去，农民对税收进行了反抗，但他们缺少应对政权制度全面改变的方法和方案。与之相比，中产阶级具有财富、组织、交流技巧和带来真正革命的远见。结果形成了通信委员会、最初的政党结构和民兵组织来制定革命的议程，通常都伴随着暴力的使用。

其次，启蒙思想家和他们的拥护者已经揭露了旧体系中需要修复的大量裂痕。作为改革者，启蒙思想家不支持革命。但是，他们的工作所产生的影响则至少使旧制度看起来是无效率的，更严重的则是使它成为完全不合理的。启蒙运动不仅指明了旧体系的缺陷，而且唤起了可能对其进行纠正的希望，从而使全面革命看起来成为可行之事。

再次，上升的识字率和由于书籍和报纸的发行而膨胀的印刷业，为"公共舆论"提供了新的表现方式。特别是持异议者，拥有了新的工具来发出不满的强烈呼声。他们尤为巧妙地通过提出"专制"威胁已经迫近来煽动一种"危机"感，这种威胁最确定的征兆就是国家强加的更沉重的税收负担。

最后,虽然当地情形支配着革命的议程,但革命是具有蔓延性的。美国革命为欧洲人树立了一个学习和效仿的有力典范,首先是因为它成功了,再者是因为它被洛克的普遍"自然权利"的理论证明是正当的,这一理论经过调整可以使几乎任何地方的要求合法化。根据洛克的理论,政府的唯一目的是保护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这些权利是所有人从上帝和自然那里享有的礼物。如果一个政府不能充分保护这些权利或侵犯它们,它可以被合法地取代。基于这一理论,许多国家的多种不满都可以找到理由,那就是对自然权利的侵害,其中最严重的要属增加税收。一般而言,它表现出对财产权的侵犯和对自由的威胁。法国大革命一经开始,革命就被赋予了一种更深层次的推动力,特别是当法国军队向中欧挺进的时候。

在欧洲,最早见证革命运动形成的地方是荷兰联省共和国和奥属尼德兰。在联省共和国,18 世纪 80 年代出现了一场荷兰人的"爱国"运动,它要求一个更加民主的政府和不那么亲英国的对外政策,而与奥兰治统治家族发生冲突。运动设法建立了一个由法国政府支持的民兵组织,但是,由英国人资助的普鲁士国王在当时进行了军事干涉,轻易地镇压了爱国者们,于是这次革命便被扼杀了。在奥属尼德兰,到 1789 年,一支起义联盟也是以争取"自由"为名,设法驱逐了奥地利军队。但是,由于为内部的分裂所削弱,这次起义瓦解了,奥地利人在 1790 年重返尼德兰。到那时为止,已经变得明显的是:没有斗争,就没有革命事业的成功。

一、法国大革命

毫无疑问,欧洲最具影响力的革命是法国大革命,它也是所有革命中最激进的一个。正如这个时期的许多革命,它的直接

起因是财政问题。在 18 世纪 80 年代后期，法国政府面临破产，它设法做一些事情来补救。然而，这样做却触发了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革命发生的原因经过激烈的争论。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大革命是社会张力的结果，而其他人主张危机在本质上主要是政治性的。在过去的 25 年里，第二种观点成为普遍的看法。即便如此，许多社会力量还是在大革命一开始的时候就帮助促进了它的进程，使得研究法国政治体系和法国社会都成为解释大革命成因和历史的必要条件。

1. 18 世纪后期的法国政府

在 18 世纪末垮掉的法国政府(the French state)并不至于到了被推翻的地步。问题始于最高层。路易十五(1710—1774)并不是一个愚钝或不负责任的统治者，但他冷漠、不坦率，还经常优柔寡断。许多法国民众，还有外国人，都认为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顺应法国民族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他许多情妇的要求，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德·蓬巴杜夫人(1721—1764)。当路易十五于 1774 年去世时，他的声望已经处于低谷。法国人民非但不哀悼他的去世，还以大量侮辱性的笑话来庆祝。他的继任者路易十六(1754—1793)被寄予厚望，法国人民希望他能重整旗鼓，使暗淡的法兰西形象重现光彩。但是，路易十六未让人感受到任何的实力和领导力。他不擅长社交，明显的头脑迟钝，在结婚的七年中不能与他的妻子保持正常的性关系，他的无能使得他在公众的眼里是软弱的，并成为粗鄙幽默的靶子。更糟糕的是，他还被普遍地认为被他的出生于奥地利的妻子玛丽·安托尼特(Marie Antoinette，1755—1793)所控制着。尽管她起初为人所羡慕，但这个王后很快就获得了无情、性变态的名声(其中

大多是冤枉的),代表了遭人憎恨的外国势力,她的不受欢迎不可避免地祸及路易十六。几乎一个世纪,国王们似乎是其女人们的没有骨气的傀儡,这对于像法兰西这样的绝对主义政体是尤为具有政治破坏性的,因为国王是整个国家的象征。然而,国王的软弱也是法兰西落入一种“专制主义”的另一种迹象,因为可以设想一个国王能够更容易地被秘密利益群体所操控,这些利益群体以牺牲民族为代价来寻求他们自己的好处。

政府崩溃的另一个因素是法兰西国际地位的下降。七年战争的结果对法兰西来说是毁灭性的,因为它使法兰西损失了大部分的海外帝国。许多谴责都指向法兰西与其夙敌奥地利在1756年所签订的盟约,但这个政权拒绝放弃这个不受欢迎的协议。相反,它用未来路易十六与玛丽·安托尼特的婚姻巩固了这个协议。在路易十六统治期间(1774—1792),仅有一次对外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即法兰西帮助13个美国殖民地获得了他们的独立,并使他们共同的敌人不列颠流了血。但这次胜利依然没有扭转全面的外交衰落。支持美国革命使法兰西担负了大量无法偿还的债务,使得法兰西很难在其他地方采取有效行动。更糟糕的是,法兰西前后有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在东欧攫取权力,这扰乱了法兰西拼命想要维持的稳定,而稳定的维持是为了保住正逐渐减少的与不列颠作战的资源。当1787年俄国和奥地利与法国外交的老伙伴奥斯曼帝国开战的时候,法国人的反应是微不足道的,从而表明了法国衰落的程度。另一个耻辱是同一年荷兰人爱国运动的失败,这次运动也宣布了法兰西没有能力来保护它的外国同盟。对于一个以自己是“世界第一强国”为骄傲的国家,这的确是一个拙劣的表演,法国人民显然将法国国外机会的丧失视为旧制度失败的主要标志。

在国内，这个政权也失去了控制力。在18世纪50年代早期，对詹森主义和战争所需附加税的斗争再次爆发，并在1771年废除议会时达到高潮，作为回应，洪水般的小册子——多数为詹森主义者所鼓励——涌现出来，这些小册子公开抨击所谓的“专制主义”的到来。部分是为了重获民意的支持，路易十六在1774年成为国王后不久便恢复了议会，直到法国大革命的前夕，国王与议会的关系已经得到改善。但是，对于王权的范围和性质的争论几乎从未停止，“专制主义”的指责继续充斥于其他问题之中，如国家的新闻审查制度和陈旧的司法体系。这个时候已经有了一些改革试验：军事现代化了，新教徒获得了有限的宽容。但是，改革的步伐跟不上被启蒙运动所激起的高度期望。

最紧迫的问题是财政问题。美国革命使已经上升至20多亿里弗的债务又多出了10多亿里弗。结果，国家的信用等级下降得如此之低，以致于贷方对这个君主国的贷款开出10%的异常高的利息要价，最后政府甚至以这个异常的比率也很难确保贷款。（由于较大的可信度，英国政府仅仅支付3%到4%的贷款利息，极大地降低了每年支付巨额债务利息的花费）法国政府被迫在预算上划拨越来越多的钱来偿还利息，这又迫使政府增加税收以补偿开支。早在1774年，一位赞成改革的部长，也是一位与重农主义者关系密切的启蒙思想家——杜尔哥——曾经试图通过扩展经济、增加税入的方式，来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扩展经济的关键之处是消除国家对谷物贸易的控制和排除同业公会。但是，他的试验被一次短期的饥荒破坏了，仅仅两年之后，杜尔哥即被免职，因为他毫不掩饰的个人野心使他疏远了国王和其他的部长。

杜尔哥之后，一位瑞士银行家雅克·内克(Jacques Necker,

1732—1804)成为首席财政官。内克意图通过征税和财政部方面的改革来增强国家金融机构的工作效率,从而改善国家的财政状况。同时,内克被迫继续大量举债,但是,他希望通过说服贷方相信政府财政状况良好来以较低的利息吸收贷款。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内克在1781年公布了一份骗人的乐观的国家财政报告。作为一种使"公共舆论"站到君主制这边来的努力,这份文件迅速畅销起来,因为,无论这份报告有多大程度的虚假成分,它还是使法国人民第一次看到了国家财政的全貌。其他的部长被这种暴露他们所认为的国家秘密的行为所震惊。许多内克的对手阴谋策划而促使他在1781年被解职,他的大部分改革被继任者所取消。

1783年,查理·亚历山大·德·加隆(Charles Alexandre de Calonne,1734—1802)成为首席财政官。加隆最初设法通过追加国家开支刺激经济增长。但是,这个政策使得已经膨胀的债务又增加了许多,于是到1786年,他改变了方向,以另一种形式提出了杜尔哥的计划。其主要措施包括取消对谷物贸易的控制;实行一种普遍的土地税来代替其他税;召集"贵族会议"(Assembly of Notables,由国王亲自挑选的议员)以使他的提议生效和批准新的贷款。加隆的计划得到国王的支持,1787年初会议召开。几乎没有什么人意识到,法国大革命的序幕将从此拉开。

2. 法国的经济和社会

在18世纪,法兰西如其他的国家一样,仍旧是一个民族,在国家内法定的特权将国民分成单独和不平等的群体,很少有消除这些特权的公开要求。但是,启蒙运动已经使特权比从前缺

少了正当性，启蒙思想家要求所有的社会制度都要证明自己的有效性，从而迫使法国贵族阶级明显地处于守势。君主制也加速败坏了特权的声誉，它将贵族身份变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而不是一种对功绩的奖赏，从而使特权丧失了古老的声望。加之，政府通过侵蚀与贵族身份相伴的免税权来扩大政府的税收基础，使得人们更容易设想出没有特权运作的国家。法国大革命最终完全压制了特权，推行普遍权利。

维护特权的势微与恶化社会状况的其他发展相互作用，其中最显著的就是经济扩展的不均衡。人口数量从 1715 年的大约 2300 万人增加到 1789 年的 2800 万，从而刺激了许多部门的生产。对谷物的需求上涨得最为猛烈，但使生活舒适的用品——从内衣裤到医疗设备——和增加饮食兴趣的商品——从糖到咖啡——的市场也在增长。殖民地贸易经历了最快的增加，在 18 世纪增长了 1000%。在制造业方面也有大的增长。然而，新的财富并未惠及每个人。与对外贸易和新商品制造有关的各经济部门在 1730 年到 1770 年这段时期通常运作良好，但其他部门则不那么景气。圈地使英格兰成为一个拥有大型的、有效率的农场的国家，而法兰西却保留了大量的小农场，且贫穷的无地农民数量在上升。薪酬的增加跟不上物价的上涨，贫富差距扩大，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不满。而且，到 18 世纪 70 年代，整个经济图景都暗淡下来。1786 年的英法条约降低了进口货物的关税，在至关重要的纺织业中导致了普遍的失业和苦难，因为英国商品的生产成本更低。

在这种不平衡的经济扩张之中，以 18 世纪的人口比重来衡量，中产阶级的数量扩大了 1 或 2 倍，尽管人口总量仅仅增加了大约三分之一。许多中产阶级希望将他们的财富转变成贵族身

份。事实是,在法兰西的确比在英格兰更容易爬升进贵族阶级,主要是因为在法兰西一个人可以花大价钱购买一个官职,这个官职会授予整个家族不超过 20 年的贵族身份。由于较老的贵族家族的自然消失和可用金钱购买爵位,到 1789 年的时候,法国没有几个贵族家族能够合法地声称已经享有贵族身份超过两个世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情形招致了更多的愤恨而不是满足:贵族们愤恨授爵之事过于容易,且新来者的加入削弱了贵族头衔的声望,中产阶级们愤恨授爵仍旧耗费太长时间并过于昂贵。在教育、投资、见解,甚至社会背景方面,贵族阶级与中产阶级变得越来越相似,这使得贵族的特权看起来不公平和专断。

农民也认识到,在许多方面,法定的特权体系与他们的利益相抵触。尽管我们不清楚在 18 世纪期间封地应付款(依据惯例付给领主的款额)的数量是否在逐渐增加,但领主毫无疑问地在征收应付款上变得更加有效率,甚至当农民收获很少或一无所获的时候也是如此。农民也许更加关注王室的税收,但他们逐渐变得憎恶恢复这些陈旧权利的企图。在若干例子中,农民甚至将他们的领主带上法庭,来阻止领主重新征收已多年不收取的封地应付款。在这件事情上,农民得到了有力的同盟者的帮助。对"封建主义"无效率和不公平的源源不绝的抨击出自于重农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之笔。其中某些抨击是为君主所资助的,君主希望减少或消除封地应付款,从而自己可以从农民身上榨取的更多。指控国王"专制"的作家们调转了枪口,为政府做事,他们论证说封地应付款是领主的中世纪"封建"遗迹,应予以废除。法国大革命前夕,国王在其统治中废除了违反自然法的农奴制残余,这的确树立了一个典范。旧秩序再一次受到了谴责,这种谴责甚至来自于它的那些著名的代言人,如果旧制度崩

溃，他们所拥有的大部分也都将失去。

仅仅由于这些社会紧张状况的本身，法国大革命是不可能爆发的，一个比较英明的君主制本来是可能避免政府财政崩溃的。但显然，法兰西延误了一些重大的结构改革，一旦国家危机突发成为政治革命，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从妇女的地位到政府的社会角色——也随之出现，从而使革命还要承担重建国家的责任。

3. 革命的爆发

1787 年初，在国王的支持下，贵族会议被召集来考虑加隆所提出的一整套财政建议。与加隆和路易十六的期望相反，会议拒绝了征收新税的提议。尽管会议的确批准了加隆计划的其他部分，包括解除对谷物贸易的管制，但这不足以解决财政危机。由于完全不被信任，加隆被会议中反对派的一个领导者洛梅尼·德·布里安(Loménie de Brienne，1724—1794)所取代，布里安很快地提出了一个与加隆计划相似的计划。而会议依然拒绝批准这一计划，导致会议在 1787 年 5 月被解散。布里安被留下来设法与议会敲订协议，后者的批准在政治上是必需的。但是，议会拒绝同意布里安的提议，坚持只有召开一个三级会议(一个被废止的会议，会议的代表选自整个王国的三个等级)才可以批准这些提议。君主政体起初拒绝同意这个要求，在 1788 年 5 月废除了议会，并设立了一个新的法院系统。结果遭到举国源源不断的抗议，这些抗议被视为是“专制”遭到蚕食的清晰标志。经历了一个夏天的强烈不满之后，君主政体在 1788 年 8 月变得温和了，主要是因为它那时在事实上破产了。国王解雇了布里安，重新召回内克担任首席财政部长，并同意召集三级会

议开会。这一重大决定使人们感到了安慰和喜悦。

但是,三级会议的召集仅仅是开始了一场新的争论,即关于投票程序的争论。在1614年最后一次的三级会议上,三个等级(教士、贵族、平民)的代表分开投票,所有等级不得不批准放在他们面前的提议。然而,这次,人们希望一个当时似乎是统一的国家的代表应聚集在一个大型会议上。在9月,巴黎议会否决了这个想法。由于相信保持习惯才能防止国王操纵即将召开的会议,它建议各等级分开投票。对于许多平民领袖(或第三等级)以及他们的同盟者来说,这个决定是一个信号,意味着特权秩序中的某些成员正在密谋控制三级会议。作为反应,许多小册子开始泛滥开来,指控贵族和教士背弃了反对"专制"的共同阵线。一些小册子的作者,最有名的是伊曼纽尔·西哀士(Emmanuel Sieyès,1748—1836)神甫,当时甚至宣称贵族应该不再被认为是"国家"的部分,国家在西哀士看来仅仅包括第三等级。尽管1788年12月君主政体允许第三等级将其原有代表数量增加一倍,但这个决定仍没有解决所有的代表是在一个大型会议上投票,还是按等级分开投票的问题。1789年初的环境充满了混乱、恐惧和猜疑,国家在近两个世纪中第一次选举代表,并起草表达不满的列表来指导投票。

最后的麻烦是天气。冰雹和干旱减少了1788年小麦的收成。1788年到1789年的冬天十分寒冷,以至于巴黎的塞纳河全部结冰,使得船运——运送大宗货物的通常方式——的谷物和面粉无法到达。巴黎人饥寒交迫,聚集于市政府提供的篝火周围。到了1789年的春季,面包的价格几乎翻倍,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面包是主食,工人一般要花费几乎一半的工资来购买家庭所需的面包。如今,他们面临着只为了面包就不得

不掏出几乎全部工资的前景。

法兰西在过去经受过多次的恶劣天气和可怜的收成而没有发生革命，然而，这一次，经济上的艰难是最后的一根稻草。饥饿的农民乞讨、借用和偷盗，侵入大领主的禁猎区偷猎并攻击他们的狩猎监督官。巴黎人对肉类和面包的关注通过 1789 年 4 月在雷维朗(Réveillon)企业中的暴乱迸发出来，雷维朗是一个富有的壁纸制造业者，传闻他意图削减工人的工资。

选举代表的方式帮助了改革的拥护者。在法兰西的每个行政区，第三等级间接地做出选择，他们在公共集会上选出选举人，然后由这些选举人选出代表。由于这种程序有利于口齿伶俐者，所以，中产阶级律师和政府管理者赢得了对平民代表团的控制。第三等级的改革派代表在第二等级中发现了一些支持者，在第一等级中发现了更多，不满的较贫穷的教士在第一等级中拥有一个巨大的代表团。

1789 年 5 月 5 日三级会议召开，当君主政体没有在会议上对财政危机提出任何连贯的解决方案并拒绝解决投票争论的时候，这一政体便立即失去了主动权。在几个星期的争论之后，第三等级于 6 月 17 日集会，投票决定将自身转变为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并邀请其他等级的代表参加，这是一个像三级会议一样不迎合国王喜好的公共机构。当发现议事厅因为准备王室的演讲而被锁起来的时候，第三等级的代表就在一个室内网球场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他们于 6 月 20 日在以“网球场宣誓”而闻名的誓言中发誓，直到法兰西拥有一部新宪法，否则决不解散。尽管国王最终在 6 月 27 日同意以一个大团体为单位进行投票，但显然事件正在脱离他的控制，改革在迅速地转变为革命。



这幅玛丽·安托尼特及其孩子在凡尔赛宫的讨人欢喜的画像,无意间反映出王室对法国的许多问题的孤陋寡闻。艺术家伊丽莎白·维热-勒不伦(Elisabeth Vigée-Lebrun,1755—1842)是一个一流的宫廷画家,那时她强调优雅感对王室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大革命之后,她移居意大利,然后又移居到俄罗斯。今天,这幅画悬挂于凡尔赛宫。(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Art Resource, NY)

二、君主制的解体

国民议会刚刚致力于工作，新一波的暴乱就遍及了法兰西，国王的地位遭到进一步的削弱。1789 年夏季，经济窘境变得更为严重。失业增加，面包至少在下一次收成之前，似乎很可能仍旧短缺和昂贵。与此同时，平民担心国王和特权阶级会企图发动一次反革命。7 月初，大量集结起来的军队出现在巴黎地区，国王声称是为了维持秩序和保护国民议会。但是，巴黎人怀疑路易正在计划强迫国民议会解散。在路易辞去雅克・内克之后，怀疑变成为确信。

1. 平民起义(1789 年 7 月到 10 月)

对内克的免职立即引起反响。7 月 12 日和 13 日，巴黎选举人组成了一个新的市政府和一支新的民兵组织，国民自卫队，它们都效忠于国民议会。巴黎在铸造武器，成为革命的先导。人群在街头来回走动，要求更廉价的面包并展示内克身着黑衣的半身画像。7 月 14 日，他们闯入政府建筑物内搜寻武器。他们在大型军用医院荣军院里发现了一个军械库，并希望在城市东部的一个监狱堡垒——巴士底狱里找到另一个。

一支数百人的武装团体对巴士底狱进行了猛烈攻击，杀死了部分守军，自己也遭受了许多伤亡。旧制度的辩护者所坚持的那个传说，即参与攻击的人只不过是群“乌合之众”或“暴徒”，是不真实的。在这次事件之后的某个时候，一份正式的参加者名单被编辑出来，名单表明大多数参加者是附近的商人和技工，特别是木工。巴士底狱的陷落有着巨大的象征性意义。尽管只

有 7 个囚犯得到释放,但被唤起的人民已经表明了他们能够做些什么事。占领巴士底狱以及之后对它的破坏极大地保证了旧制度的毁灭,1789 年 7 月,暴乱席卷了整个法兰西。所以,7 月 14 日,成为伟大的法国国庆日,类似于美国 7 月 4 日的国庆日。

期间,许多乡村正在经历着大恐慌,这是民众错觉的异常发作。谣言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即“歹徒们”要来了,他们是贵族的雇员,会破坏成熟的庄稼,迫使国民议会保持现状。实际上,并没有成帮的歹徒,只是偶然有些饥饿的雇农,还有时是些试图偷取食物的征粮的国民自卫队士兵。但是,在若干地区,农民变得狂暴,他们抓起锄头和干草叉以及任何像是武器的东西,致使许多贵族被迫逃跑并最后移民。农民们攻击城堡,闯入其他的建筑物内,这些建筑物藏有谷物,或者藏着能证明征收庄园应付款为合法的令人痛恨的文件。一些贵族自愿地交出农民们想要的东西,其他贵族看到他们的谷仓和档案文件被烧掉,少数贵族遭受了私刑。

在 10 月的日子里,这一骚乱之年的最后危机,再次展示了路易十六的软弱无能和其被唤起的国民的力量。1789 年的收成还算好,但干旱阻碍了水磨将小麦磨成面粉。所以,当秋季临近的时候,巴黎人仍旧排着队等待面包,仍旧充满怀疑地注意着驻扎在巴黎附近的王室军队。有关王后在凡尔赛宫行为的流言进一步激怒了他们。玛丽·安托尼特在王室官员的宴会上装扮得非常惹人注目,双手搂着王位继承人,摆出一副她的母亲玛丽亚·特蕾西亚在 18 世纪 40 年代为了赢得匈牙利人的支持曾经使用过的样子。她被指责,当听说人民没有面包时,冷漠地谈论说“让他们去吃蛋糕”。这段传言是伪造的,但是,它在活跃的以抨击王后为乐的新的巴黎报纸上反复被提到。



这幅同时期的作品表现了1789年10月卖鱼妇和其他妇女向凡尔赛行进的情景。(New York Public Library Picture Collection)

高潮在10月5日来临，一支由集市妇女和卖鱼妇、穿着整洁的杂货商，甚至还有中产阶级的“戴帽子的女士”所组成的队伍，冒雨从巴黎向凡尔赛行进，她们以此要求得到面包。她们破坏了国民议会，并进入了宫殿，如果玛丽·安托尼特没有和国王逃难，也许会被她们动用私刑。第二天妇女们结队回到巴黎，同时护送王室家族去蒂伊尔里宫(Tuileries Palace)居住。更重要的是，国民议会也搬到了巴黎。

2. 缔造新制度

新制度的轮廓在10月份之前就已经开始成形了。大恐慌

促使国民议会在法律上废除了实际上农民在破坏的那些东西。1789年8月4日晚,代表们投票决定依照收入比例向王国的所有居民征税,公共开支也平等地由所有人负担。教士放弃了什一税,第二等级的自由主义少数派放弃了贵族的禁猎区、庄园应付款和球场。国民议会废除了农奴制残余,禁止司法交易或司法公职的买卖,并颁布"所有市民,不论出身之别,都可以拥有一切教士、国民、军队的职务和尊严"。旧制度实际上已经消亡。

三个星期之后的8月26日,国民议会通过了一篇《人权宣言》。"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它宣称"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它称财产权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称自由是在"法律规定"的限制内的"各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宣言》声明"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并进一步指出"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是没有法规的社会。"*

《人权宣言》反映出中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态度,尽管它也吸引了许多贵族。它坚持财产权的神圣,它宣告"实用性是社会差别的唯一根据",由此暗示一些社会差别将会存在。它使启蒙思想家的关键语句——自然权利、公共意志和权力分立——得以具体化。国民议会的陈述犹如启蒙运动理想的回声。然而,正如随后的大革命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它没有找到借以将这些理想转变为现实的方案。

国民议会的经济立法为此提供了一个合适的例子。对平等征税理论的信任不能解决紧迫的财政问题,因为由代表决定征

---

* Quoted in Georges Lefèbvre, *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R. R. Palmer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221—223.

史海钩沉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89年)

全文：

组成国民议会之法国人代表认为，无视、遗忘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所以决定把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阐明于庄严的宣言之中，以便本宣言可以经常呈现在社会各个成员之前，使他们不断地想到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以便立法权的决议和行政权的决定能随时和整个政治机构的目标两相比较，从而能更加受到他们的尊重；以便公民们今后以简单而无可争辩的原则为根据的那些要求能确保宪法与全体幸福之维护。

因此，国民议会在上帝面前并在他的庇护之下确认并宣布下述的人与公民的权利：

1. 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只有在公共利用上面才显出社会上的差别。

2. 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3. 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

4. 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各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

5. 法律仅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得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

规定的行为。

6.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去参与法律的制定。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施行保护或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故他们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一切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

7.除非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并按照法律所指示的手续,不得控告、逮捕或拘留任何人。凡动议、发布、执行或令人执行专断命令者应受处罚;但根据法律而被传唤或被扣押的公民应当立即服从;抗拒则构成犯罪。

8.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法前已经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处罚任何人。

9.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以前应被推定为无罪,即使认为必须予以逮捕,但为扣留其人身所不需要的各种残酷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10.意见的发表只要不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意见、甚至信教的意见而遭受干涉。

11.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担责任。

12.人权的保障需要有武装的力量;因此,这种力量是为了全体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此种力量的受任人的个人利益而设立的。

13.为了武装力量的维持和行政管理的支出,公共赋税就成为必不可少的;赋税应在全体公民之间按其能力作平等的分摊。

14. 所有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由其代表来确定赋税的必要性，自由地加以认可，注意其用途，决定税额、税率、客体、征收方式和时期。

15. 社会有权要求机关公务人员报告其工作。

16. 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

17. 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①

As presented and translated in Isaac Kramnick, ed., *The Portable Enlightenment Reade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5), pp. 466—468.

收的新的和合理的土地税无法征收。收税员在旧制度的全面清除中消失了，农民如今认为他们不欠政府任何东西。法国政府再次举债，直到它的信用被用尽，然后，绝望的国民议会命令没收教会的土地(1789 年 11 月)。

政府因此获得至少价值 20 亿里弗的资产。以这些资产为担保，政府发行了纸币，以便偿还债务，这样暂时缓解了财政危机。不幸的是，大革命重复了约翰·劳在密西西比投机泡沫之时所犯的错误：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当国家卖掉了成批的没收来的土地，也就是说，当国家减少了稳定纸币的担保的时候，它便被认为毁掉了同样数量的纸币。但是，不减少纸币发行

① 全文引自：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年。——译注

量的诱惑实在是大得无法抗拒,结果导致通货膨胀。纸币日益失去坚挺的支持,开始贬值,到1795年,纸币已不值面值的5%。

国家以拍卖的方式出售了从教会和贵族流亡者(已经离开国家的贵族)那里没收的财产。一些农民因此有机会扩大财产而从中获利,许多资产阶级也尽可能地买进土地,不时作为短期投机生意之用。然而,穷人和无地者却一无所获,因为他们买不起,而国民议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帮助他们。国民议会遵循自由放任主义,废除了法兰西国内的同业行会、贸易关税和通行税。由于认为若干纯粹的劳工组织是对经济自由的非自然限制,议会也废除了它们。1791年6月,在罢工爆发之后,国民议会通过了《列·霞白利法》(*Loi de Chapelier*),禁止罢工,禁止成立工会和许多行会。

3. 改革教会

因为禁止什一税和没收教会财产使教会丧失了收入来源,国民议会同意供给教士薪水。新的安排使法国教会处于政府经常性的管理之下。国民议会对修道士宣誓的禁止,或对一些修道院和女修道院的清理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因为其中的许多设施已经破烂不堪,但是,对修道院外的教士的身份进行立法却引起了骚乱。

《神职人员民事组织法》(*the 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1790年6月)重新规划了法兰西教会的地图。它将主教辖区减少了三分之一还多,使保留下来的主教教区与新的民政单元相对应。它将主教和牧师转换成公职人员,由政府付酬金并由主教教区或分教区的全体人员选举产生。一个新的主教需要宣誓

忠诚于国家。

这些规定与的罗马教会——作为独立的教会君主国——的传统背道而驰。教皇自然公开抨击《民事组织法》,当国民议会随后要求每个法国神职人员都特别宣誓支持《民事组织法》的时候,只有少数主教和不到一半的牧师宣了誓。于是,在大革命的领导者和一大部分的人口之间产生了裂痕。从路易十六到卑微的农民,以及天主教徒,与拒绝立誓效忠的教士——对拒绝进行特别宣誓的教士的称呼——结成联盟。反革命如今有了一个提出抗议的理由。

1789 年的夏天之后,惊慌的高级教士和贵族逃出法兰西,留下了更多的地产,这些地产都被没收。许多流亡者集聚在德意志的莱茵兰,密谋得到奥地利和俄国支持的反革命活动。国王对《神职人员民事组织法》的疑虑促使他企图加入法德边境流亡者的行动,这是国王的一次灾难性的尝试。1791 年 6 月,在新宪法完成的前三个月,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尼特化装成男仆和女家庭教师离开了蒂伊尔里。但在路上,一个地方官员认出了路易,警报提前发出,一支军队的分遣队强迫王室一行人经历了一次炎热、满是尘土和沮丧的旅程,返回了巴黎。在逃跑流产之后,革命者将路易十六看作一个潜在的叛国者,严密地将其看守在蒂伊尔里。

4. 革命文化

法国大革命产生了一种新的共和国文化,这种文化在形式和主题上反映了这个时代日益出现的更加民主的政治。审查制度的瓦解意味着几乎任何书刊都能够合法地出版。在大革命的

史海钩沉

法国大革命中的女权

奥琳普·德·古兹(Olympe de Gouges,1748—1793)是一位女性革命领袖。她是屠夫的女儿,是一个演员,她相信女性像男性一样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1791 年,她宣讲了她的《女权宣言》,并在之后的两年间要求革命政府依此行事。1793 年 11 月,国民公会(the National Convention)担心她的女权主义要求会导致失去一些革命的支持者而对革命造成威胁,于是决定关闭巴黎所有革命的女性俱乐部,并指控她犯有叛国罪。她被查明有罪,推上了断头台。

下面是《宣言》中所提出的前十条基本权利:

1. 在权利方面,女性生来是且始终是与男性平等的。只有在公共效用上才会发现社会差别。

2. 所有政治联合的目的都在于维护女性和男性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安全和最重要的反抗压迫权。

3. 整个主权的本原寄托于国民,国民就是女性和男性的联合体: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示授予的权力。

4. 自由和正义是指物归其主,因此,对行使女性自然权利的唯一限制就是男性行使的终身专制,这些限制必须通过自然法则和理性法则予以改革。

5. 自然法则和理性法则禁止一切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凡未被这些英明和神圣的法则所禁止的事情都不能遭禁止,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要求的事情。

6. 法律应该是公共意志的表现。所有女性和男性公民都应该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参与法律的制订。法律应该对于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在法律上，所有的女性和男性公民都是平等的，按其能力平等地被赋予荣誉、地位和公职，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

7. 女性也无例外，只有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才能控告、逮捕和拘留她。女性如男性一样，遵守此严格的法律。

8. 法律只应施以那些严格和绝对必要的刑罚，一个人只可以根据其犯法前就已制定和公布的法律进行处罚，该法律也适用于女性。

9. 一旦一个女性被宣布有罪，法律应被严格执行。

10. 任何人都不得因其基本的信条而受到阻碍。一个女性有权登上断头台，也有权登上演讲台，只要她的行为未威胁法定的公共秩序。*

---

* Olympe de gouges, *La Nation à la Reine*: *Les Droits de la Femme* (Paris: Momoro, 1791), as translated by and quoted in *The Global Experience*: *Readings in World History since 1500*, 2nd ed., ed. Philip F. Riley et al.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92), pp. 94—95.

早期岁月里，国家充满了几百种新报纸和几千种小册子，它们反映了从极左（激进的革命者）到极右（坚决的反革命者）的政治见解。这些出版物经常被用作政治生涯的跳板，所以，许多著名的革命领袖也是报刊撰稿人，这并不令人意外。革命者利用新的不受管制的印刷业来争论时事和丑化敌人，有时是以粗俗的方

式表达出来的。在蓄意冒犯文雅感的努力中，激进的雅克·埃贝尔（Jacques Hébert，1757—1794）用猥亵的语言使他的具有广泛知识性、受到大众欢迎的刊物《杜切斯尼神甫》变得尖刻。玛丽·安托尼特是他喜爱的攻击目标之一。这位不受欢迎的王后也遭到其他许多作家的诋毁，其中一些人色情地描写她所谓的性变态。

对于革命的节日，如攻占巴士底狱的周年纪念日，语调和味道则截然不同。众多的自由雕像、各种仪式、瀑布似的喷泉、爱国舞蹈、激动人心的音乐和生动的演讲是这些节日的特征，有好几万的观众参加，目的是提高革命意识和对普通公民进行公民教育。这些节日依赖丰富的象征手法，把重建的国家与自然的纯净融为一体，寻求提供君主制和教会古老象征的替代物。尽管基督教元素在早期的节日里的确显著地出现过，但随着大革命变得更加激进，这些元素逐渐消失了。

其他政治活动的聚集地点包括政治俱乐部，在大革命初期，这种俱乐部几乎在一夜之间遍及全国。在其他的活动中，这些俱乐部引导对突出的政治问题的争论，向当局报告可疑的行为，在有关事务上游说国民议会和地方政府。其中最成功的是与激进的左翼共和党人雅各宾派联合的俱乐部。到 1791 年，雅各宾派建立了 400 多个这样的俱乐部，最初只允许有财产的人加入这些俱乐部，随着成员资格的降低，俱乐部数目在随后的两年间增加到 1000 多个。除了雅各宾派之外，俱乐部是具有更加专门化议程的群体。在它们之中，有 60 多个女性政治社团，这些社团十分活跃，直到 1793 年晚期被恐怖统治所关闭，那是一段革命者以越来越怀疑的眼光来看待女性政治活动的时期。

5. 1791 年宪法

国民议会所完成的主要任务就是 1791 年宪法。旧制度下复杂的省级单元十分混乱，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民议会将法兰西的领土分为差不多同样大小的 83 个省。各省再分成区，或者称为“行政区”，行政区再细分成公社，即自治区。在公社和省内，选出举产生的委员会和官员享有很大的自治权利。

宪法设立了独立的、经由选举的司法系统，以此代替旧制度的大理院和其他法院。它将立法权授予单独的经选举产生的立法院。尽管国王仍旧领导着行政部门，但他的行动如今需要部长们的核定。部长们反过来只对国王负责，而不对立法机关负责，虽然他们还是主要处于议会制或内阁制政府之下。尽管国王拥有否决权，但否决权只是暂停性的，最多能够阻碍立法 4 年的时间。新宪法赋予法兰西一套统一的法规，它宣布婚姻是一种民事契约，而不是宗教誓言，并承诺免费的公共教育。

虽然 1791 年宪法距离大众政府和实现人民主权与社会平等的口号还有一段长路，但却终止了充分民主的完全缺乏。它创造了两种公民类型，即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并限制了选举那些男性公民——每年所缴纳的税收至少相当于本地区非技术工人三天的工资——的权利。消极公民在数量上大约是男性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享有法律的完全保护，但没有选举权。而且，新的立法机关经间接选举选出。积极公民投票选举选举人，要求选举人是拥有大量财产的人，由他们最后选举代表。

6. 立法议会

10 月 1 日,在新宪法下被选出的第一个且唯一的立法议会开始审议活动。尽管中间派拥有最多的席位,* 虽然中间派占据最多的席位,但没有一个党派能够在新的议会上占有多数。由于中间派的席位处在议会大厅的最低处,所以中间派的代表得到了平原派或沼泽派的贬义别名。能干的左派政治家不久赢得了平原派的选票,这些政治家听从雅各宾派的一个当时被称为吉伦特派的松散组织的领导。

他们的主要发言人是雅克·布里索(Jacques Brissot, 1754—1793)。他是一名有抱负的律师、报刊撰稿人和改革目标的拥护者。由于对法兰西国内外形势的恐慌,出自一种爱国心,吉伦特派走到了一起。

因此,吉伦特派擅长于热情的民族主义演讲。他们将革命的法兰西描述成反动密谋所蓄意造成的受害者,密谋由流亡者所策划,在国内得到拒绝立誓效忠的教士和王室家族的资助,在国外受到玛丽·安托尼特的兄长、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二世领导下的君主同盟的鼓动。利奥波德在 1792 年 3 月暴死,他的缺少经验和谨慎的儿子弗朗西斯二世(1792—1835 年在位)即位,奥地利所受到的威胁增大。4 月 20 日,立法议会对奥地利宣战。在之后的 23 年间,这场战争都在继续,只是有几次短暂的和平间隔。

---

* 大多数欧洲大陆的议会所遵循的惯例是,当议会主席面向大会之时,右派坐在他的右面,左派坐在他的左面,中间派位于左派与右派之间。如此,左的通常用法是指激进的党派,右的通常用法是指保守的党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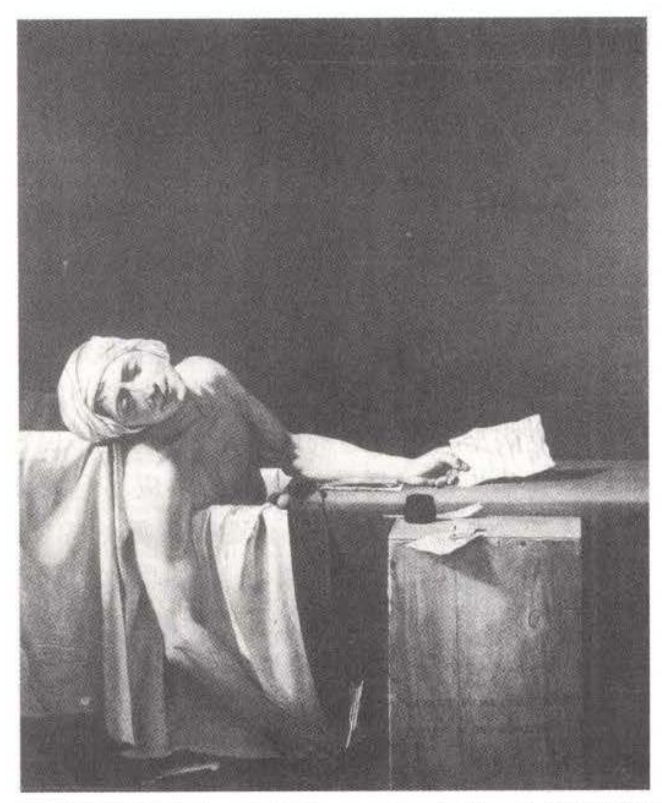
战争在开始的时候，对法兰西十分不利。普鲁士不久加入了奥地利，而且，后方的士气低落，原因在于路易因为吉伦特派部长提议驱逐拒绝立誓效忠的教士而解雇了他们，并任命了更加保守的接替者。在7月的时候，士气开始高涨，特别是伴随着庆祝攻占巴士底狱三周年大型庆典的到来。巴黎挤满了各省开赴前线的国民自卫队士兵，而且，来自马赛的分遣队还将一首爱国赞美歌带入首都，此歌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国歌。

经过1792年的初夏，巴黎的雅各宾派已经策划好了一场暴动。他们赢得了令人生畏的追随者的支持，这些追随者有军队的新兵、国民自卫队士兵和普通的巴黎市民，这些市民已被纸币的贬值、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高价与供应不足所激怒。城市的48个分区一个接一个地处在了雅各宾派的控制之下。8月9日到10日的夜间暴动达到高潮，正式的市政当局被从巴黎的市政厅中驱逐出去，雅各宾派成立了一个新的和非法的公社。

市政革命产生了直接与极为重要的结果。8月10日清晨，有国民自卫队士兵参加的新公社的军队攻击了蒂伊尔里，并屠杀了国王的瑞士卫队，王室家族此时已经逃到立法议会避难。由于大多数的右派和平原派代表的缺席，议会投票通过决议，从公职中中止国王一职，监禁王室亲属，并安排选举一个制宪会议。直到这个新的机构能够集会之前，政府由一个临时部门管理。该部门的职位大部分都为吉伦特派所占据，但其中的强有力者是乔治·丹东（Georges Danton，1759—1794），一个激进的和罕见的雄辩家。

三、第一共和国

8月10日到9月21日，会议召开的这几个星期是一段极其



这幅由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绘制的具有戏剧性和象征性的《马拉之死》(1793年),悬挂于布鲁塞尔的皇家美术馆。大卫在作品中运用了古典艺术的传统手法,同时加入了一种戏剧性的现实主义感。布局的细节增加了布景的叙述性。马拉是大卫的朋友,他被看成是被出卖的英雄。马拉躺在浴盆中,被一个政敌夏洛特·科黛(Charlotte Corday,1769—1793)刺杀,科黛被允许进入马拉的浴室是因为要送交一封信,死去的马拉手里还拿着这封信。(Erich Lessing/Atr Resource, NY)

紧张的时期。仅在8月份,纸币就贬值了40%。由简·保罗·马拉(Jean Paul Marat,1743—1793)——一位遭受过苦难的瑞

士医生，后来成为了报刊撰稿人——所领导的雅各宾派宣传员不断鼓动巴黎人民的激情。当普鲁士的军队已经侵入法兰西东南部的消息传来时，激动的情绪甚至更加高涨。在紧急关头，丹东——这位司法部长，因为鞭策爱国者要“大胆、更大胆、总是大胆”而赢得了不朽的名声。

在巴黎，大胆以“九月大屠杀”的方式表现出来。由于正规治安当局的垮台，假想的卖国者和敌方代理人遭到大批的杀害。从 9 月 2 日开始的 5 天时间，暴徒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每次停留他们就设立临时法庭，实行即时处决。无论是新的巴黎公社，还是国家部门都无法阻止歇斯底里的杀人浪潮。受害者的数量超过 1000 人，其中包括普通的罪犯和妓女，还有贵族与拒绝立誓效忠的教士，对于被指控的叛国罪，他们往往是无辜的。“九月大屠杀”预示着恐怖的到来。

9 月 20 日，法国取得一个很小的胜利，被夸大称为“瓦尔米奇迹”，这次胜利阻挡了敌军向巴黎的进发。1792 年晚期，法国在比利时、萨伏依和莱茵兰接连取得更加稳固的胜利。然后，形势再次转向，秋季胜利所得被一扫而光。到 1793 年夏季，半败的法兰西面对着一个几乎包括了欧洲每个主要强国的敌对联盟。一种挥之不去的危急气氛笼罩着制宪会议。

1. 吉伦特派和山岳派(1792—1793)

理论上，1792 年国民公会(National Convention)代表的选举标志着法兰西政治民主化的开端。几乎每个男性公民都被邀请到投票站来投票。然而，实际上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潜在选民投了票，其余的要么放弃了投票，或者由于被雅各宾派俱乐部

的监督人员驱赶而离开了投票站,雅各宾派永远警惕着“反革命分子”。从人数上来说,中间派(或者说平原派)在国民公会中占支配地位,但犹如在立法议会中的情形一样,尽管平原派当时赞成共和国,却在政治上犹豫不决。靠近右派的吉伦特派与组成左派的山岳派(因其代表坐于会议厅的高处而得名)之间有着密切联系。

1792 年 9 月 21 日,吉伦特派和山岳派联合宣布法兰西为共和国。吉伦特派希望在革命立法方面有一个考虑的时间。他们还保护省份的利益,以防止巴黎可能进行的侵犯。所以,吉伦特派支持的是一种大的联邦制。用革命的词汇来说,意指地方分权和一个受到许多监察和制衡所限的国民政府。一些细目在德·孔多塞(de Condorcet)侯爵于 1793 年早期所完成的宪法草案中被提了出来:行政部门与立法机关将彼此独立并分开选举;选举结果将与代表比例相协调;法律制定服从大众的公民投票;而且,投票者可以罢免不合适的官员。但是,山岳派的领导者公开抨击联邦制,支持一种全能型的中央政府。

山岳派的主要代言人是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1758—1794)。这位严肃的年轻律师看上去不像是一个革命者。他把头发梳理得油光整齐,穿着旧制度时的过膝马裤。然而,罗伯斯庇尔是一个政治极端主义者,他的演说是以一种新信仰的语言所作的世俗布道。显而易见的是,罗伯斯庇尔确信自己知道公共意愿,并相信公共意愿要求的是一个美德共和国。如果法国人不愿以一种自由和有德性的方式行动起来,那么正如卢梭建议的那样,他们将被“强迫享有自由”。

罗伯斯庇尔和美德共和国成功了。山岳派在国民公会中战胜了吉伦特派。经过了 100 个小时的连续投票,第一步开始迈

出，国民公会宣布国王，即“公民路易·卡佩”，犯有叛国罪，没有多少余地的判处他斩立决。1793 年 1 月 21 日，路易十六勇敢地死去。

在 2 月份，公会拒绝了孔多塞的宪法草案，并对不列颠、西班牙和荷兰宣战。法兰西如今面临着一个可怕的敌对联盟，其中包括奥地利和普鲁士。在 3 月份，法国军队在低地国家遭受到了一系列的失败。这些失败大部分要归咎于军队的将军们。之前，德·拉法耶特(de Lafayette，1757—1834)侯爵，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和北方军的指挥官。当他的政治抱负由于更加激进派别的崛起而受挫之时，在 1792 年 8 月叛逃普鲁士，自从他的叛逃之后，将军们的忠诚性就已动摇。如今，新的叛逃引起了革命者的注意。1793 年 4 月，拉法耶特的替代者，查理-弗朗索瓦·杜木里埃(Charles-François Dumouriez，1739—1823)，被揭露正在密谋进军巴黎，推翻革命政府。事实是，他弃职逃到奥地利，这构成了一股冲击波，加深了举国上下对反革命阴谋的恐惧。

马拉当时响亮地抨击许多吉伦特派人是卖国者，吉伦特派的代表则通过号召弹劾马拉来予以还击，马拉被带到特别审判委员会前，但成功地被判无罪。7 月，马拉在自己的浴室中被一位握有一把屠夫的匕首的年轻女子夏洛特·科黛(Charlotte Corday)所暗杀，她被说服，确信自己是现代的圣女贞德，被召唤来将法兰西从雅各宾派的激进主义中拯救出来。

然而，到那时候，吉伦特派已经被彻底战胜了。面对失业、高物价以及食物、肥皂和其他必需品的短缺，他们除了更加自由放任之外，几乎束手无策。巴黎各界，或者各选区，都要求控制物价和调拨食品，他们也迫切要求从雅各宾派俱乐部和国民公

会中驱逐吉伦特派。最后,在 1793 年 6 月 2 日,一大群来自各界的武装的过激分子,循着 1792 年 8 月的先例,涌入议会大厅,强行逮捕了 29 名吉伦特派代表。在这些武装的巴黎人的支持下,山岳派胁迫平原派,于是国民公会将被逮捕的吉伦特派代表送上了断头台。恐怖统治开始了。

2. 恐怖统治(1793—1794)

民主制的拥护者如今是如何将独裁强加给了法兰西?让我们看一下罗伯斯庇尔的解释:

> 为了建立和巩固民主,为了实现宪法的和平统治,我们必须首先完成自由对暴政的战争……我们必须消灭共和国在国内外的敌人,否则我们就将毁灭。
>
> 如果美德在和平时期是民主政府的支柱,那么,在革命时期,民主政府必须依靠美德和恐怖……恐怖就意味着正义,它迅捷、严格和不可动摇;它是美德的散发……有人说恐怖是专制政府的支柱……革命政府是自由对暴政的专制。*

国民公会正式投票通过了由山岳派起草的民主宪法,给予全体成年男子选举权,并将不受吉伦特派主张的监察和制衡限制的最高权力给予一个单独的立法院。1793 年宪法是为绝大多数人所同意的,但它的实施被推迟,而从未生效。

* *Le Moniteur Universel*, February 7, 1794. Our translation。

实际上,恐怖政府是以一个12人组成的公安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为中心,委员会的成员包括罗伯斯庇尔和其他大多来自山岳派的坚定支持者。尽管公安委员会名义上对国民公会负责,但它是作为一种战时内阁来行动的。委员会从未处于一个单独成员的控制之下,它的确作为一个由"12个人统治"的委员会来运作。第二委员会,一般治安委员会(Committee of General Security),负责监督警察的活动,并将可疑的共和国敌人移交给新的革命法庭(Revolutionary Tribunal)。

山岳派废弃了1791年宪法所开创的许多地方的自治。它也稳步地削减了巴黎各界所擅取的特权。地方上的雅各宾派俱乐部肃清了由一些被认为是政治上不可靠的成员所组成的部门和公所。特别地方法院辅助革命法庭进行令人生畏的工作。为了使法兰西地方政府听从命令,山岳派派出了信任的"肩负使命的代表"。

罗伯斯庇尔要求的"迅捷、严厉和不可动摇的正义"以一种越来越专断的方式实施着。为了给予政府一种自主权,国民公会通过一项以含糊语言表达的"嫌疑犯法",它不加区分地对许多行为判处刑罚,而且,在定罪上最终允许政治考虑凌驾于证据事实和法律之上。死于恐怖统治的受害者数量仍未确定。在天主教的旺代(Vendée)西区,政府强力镇压了一场猛烈的反革命叛乱,死亡人数可能在25万人以上。在别处,据估计有3到4万人被砍头、枪决、溺死、绞死和在狱中被虐待而死。在最易受到恐怖统治伤害的人中,有以前的贵族、教士和旧制度那些惹人注目的代表们,还包括被怀疑滥用了她们的影响的杰出女性。因此,被废黜的王后,玛丽·安托尼特,作为叛国者受到审判并在1793年10月16日被送了上断头台,她确实曾与她的奥地利亲戚通信并进行策划,以使自己摆脱愈发令人绝望的处境。此

后不久,路易十五的在性欲和金融上都是声名狼藉的情妇之一,珍宁·杜巴丽(Jeanine Dubarry)夫人,也受到审判并被处死。虽然她们案例通常更少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在恐怖统治时期大多数被处死的人都是平民,他们由于不充分的爱国行为、政治报复,或者由于坏运气,而被挂上了反革命分子的牌子,就像那些无疑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的人一样。

战时的歇斯底里有助于解释恐怖统治时期的暴行,也激发了一种非常实用的爱国主义。军队吸收了所有 18 岁与 25 岁之间的未婚男子和鳏夫。在巴黎,建立了几百个户外炼铁厂来制造武器。1793 年结束之时,共和国的军队已经将外国军队驱逐出法国领土。

战争形势所发生的新的转机不仅仅归功于雅各宾派。共和国的军事胜利部分地反映了在旧制度行将结束的几年间,军队所进行的改进;这些胜利还更多地来自于反法同盟的虚弱。然而,如果没有允许第三等级的人们成为政府官员的新的民主精神,胜利的取得几乎是不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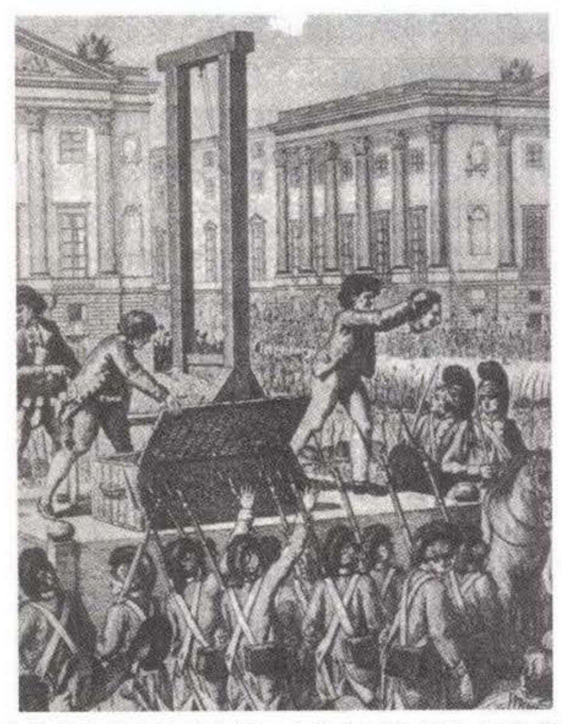
全体动员要求同等的经济牺牲。为了对付通货膨胀和供应不足,恐怖统治发布了"最高限额"的立法,对价格和工资设置了封顶线。在理论上,工资被保持在最多可比 1790 年的工资水平高出 50%,价格被设定在不得比 1790 年的价格水平高出 33%。政府定量配给肉类和面包,禁止使用比较昂贵的白面,引导所有爱国者都食用同样的面包,也就是一种几乎是全麦的面包。最后,在 1794 年早期,国民公会通过了《风月法令》(*Laws of Ventôse*),此名称来自于新的革命历上冬季的第三个月。法令批准没收流亡者和共和国敌人的剩余财产,并建议将其分给无地的法国公民。

政府对工资实行最高限额的尝试激怒了巴黎工人。尽管在价格上的"最高限额"暂时阻止了纸币的贬值，但许多物价管制的商品只有在黑市上才能买到，甚至政府也不得不光顾这些黑市。而且，《风月法令》所允许的财产再分配从未被执行。

恐怖统治在激烈的社会和文化改革上展现了它最具革命性的一面。国民公会废除了殖民地的奴隶制（虽然十年之后被拿破仑再次采用）。在国内，服饰、艺术、娱乐、日历、宗教，一切都改变了，因为美德共和国不会容忍任何带有旧制度味道的东西。甚至传统的称呼方式，"先生"和"女士"，都变成了"公民"和"女公民"。国民公会还引入了公制体系，以便更能与理性时代保持同步。一个专门委员会根据十进制系统而不是习惯上的任意累积，设计了新的度量衡。

有时，传统的力量对抗着恐怖统治，后者努力摧毁旧的宗教，但从未成功地通过立法程序创立一种新的信仰。许多教会都关闭了，转变成军营或管理部门。一些雅各宾派分子发动了一场"去基督教化"的运动，试图使基督教徒变成启蒙思想家，使他们的教会变成"理性的殿堂"。然而，罗伯斯庇尔不喜欢对理性的崇拜，他相信美德共和国应该承认一个道德的终极创造者。国民公会因此在 1794 年 5 月颁布，"法国人民认可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朽。"

罗伯斯庇尔的法兰西所要求的是对责任的超常热爱和对苦难与流血的毫无人性的冷漠。1794 年的上半年，罗伯斯庇尔无情地加紧恐怖统治，甚至公安委员会和一般治安委员会的成员都开始害怕他们会是下一个受害者。第二年（也就是 1794 年 6 月 10 日）牧月 22 日的法令极大地扩大了由革命法庭惩处的"人民敌人"的定义，人民敌人包括："那些已经设法贬损国民公会之



断头台是恐怖统治的象征。人群在下面观看,囚犯被斩首,他们的人头被举起示众。受欢迎的雕版画被卖给不能亲眼看到处决场面的镇民,从而使他们能够记住画中的场面。在这幅插图中,路易十六被处死,他的头被正式地向集合在一起的革命军队展示。(New York Public Library Picture Collection)

人……已经设法阻碍巴黎物品供应之人……造成沮丧之人……误导舆论、道德败坏之人,"以及"那些指控公共部门而借此帮助革命敌人、折磨爱国者或压迫人民之人。"*

---

* From *A Documentary Surve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 J. H. Stewart (New York: Macmillan, 1951), pp. 528—529.

文献记载

国王之死

许多人亲眼见证了法国大革命中发生的事件。当然,英国人感兴趣地注视着它的毁灭之路。下面就是一位这样的亲历者所作的记事(无疑会带有某些偏见)。亨利·艾塞克斯·艾兹沃斯·德·芬蒙特(Henry Essex Edgeworth de Finmont,1745—1807)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去巴黎担当住在首都的爱尔兰人的精神导师,并成为路易十六的忏悔牧师。

马车如此安静地驶向路易十五广场(现在的协和广场),在预留好的巨大空地中央停了下来,旁边就是断头台:空地四周都是大炮,再往外边,目力所及都是武装的民众……国王刚下马车,就有三个卫兵围住他,想脱下他的衣服,但他高贵地制止了他们.他自己脱去衣服,解开围巾,敞开衬衫,并整理了一下。国王坚毅的面容使卫兵们一阵惊慌失措,接着他们又恢复了粗鲁的举止。卫兵再次围住国王,想抓住他的手。国王抽回他的手说:"你们要干什么?""把你绑上",可怜的人回答说。国王带着愤怒的神情说:"捆绑我,不!我决不允许那样做!做你被命令做的事,但你决不能捆绑我……"

许多鼓励行刑者的声音同时响起。在用暴力抓住了诸位国王中最高洁的一位的时候,他们似乎使自己恢复了活力,他们将国王拖到断头台的斧头下面,一下子从其身体上切下了他的头。整个过程很快完成。其中最年轻的似乎 18 岁左右样子的卫兵立即抓起了国王被砍下来的头,在断头台上转圈走着,向人们展示着,他用最残暴和粗野的举止陪衬着这个凶暴的仪

式。起初,全场都是一片可怕的寂静,最后,响起了一些"共和国万岁!"的呼喊声。喊声逐渐高涨,不到10分钟,这一呼喊声经过千百次的重复,变成了全体民众的叫喊声,每个人的帽子都被抛向空中。

From *English Witness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 J. M. Thomps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38), pp. 230—231.

如此,在国民公会和两个有权力的委员会中,罗伯斯庇尔开始失去他的追随者。他的支持者中越来越多的人赞成温和的做法,并认为法国在战争中不断获得的胜利要求的是更少的,而不是更多的恐怖。热月9日(或1794年7月27日)是决定性的日子,"打倒暴君"的呼喊和议会主席拒绝给予罗伯斯庇尔以议会席位,阻止了他对国民公会进行演说的努力。国民公会命令逮捕他,第二天,他走上了断头台。

为什么罗伯斯庇尔的倒台如此之快?因为他由于他曾经创造的大好形势而失去了控制。他是一个相信政治社会必须保障人类自然权利的理想主义者,他也相信上帝保护被压迫者并惩罚压迫他们的人。他曾断定,暂时悬置他所相信的制度是必要的,目的是为了打碎传统强加的镣铐,及时恢复按其信仰的原则而进行的生活。所以,他设法去系统地摧毁所出现的每一个反对他的派别。但是,他所提起的对另一些像他一样被认为是理想主义的人的控告,以及由他的追随者所评定的即时正义,使他自己党派中的反对派感到愤怒和恐惧。他们联合起来进行抵抗,既是为了保卫他们感到他已经抛弃了的原则,也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生命。

3. 热月政变和督政府(1794—1799)

热月政变(Thermidorean Reaction)的领导者(他们中的许多人之前都是雅各宾派的成员),或者说,趋向于温和的行动,那时摧毁了恐怖统治的机器。他们解散了革命法庭,取消了肩负使命的代表,并剥夺了公安委员会和一般治安委员会的不受约束的权威。他们关闭了巴黎的雅各宾派俱乐部,邀请幸存的吉伦特派代表参加国民公会,恢复了他们原来的席位。他们允许教士举行弥撒,虽然在国家的监督之下,也没有国家的财政支持,但迈出了复原天主教的第一步。

不过,不稳定性、人身的不安全感、阶级和等级仇恨到那时为止还普遍存在。在巴黎,留着长发的年轻的中产阶级称自己为纨绔子弟(阔气的年轻人),他们穿着得如同花花公子并带着长手杖到处走动,这正是他们过去常常攻击不可信的雅各派分子的样子。他们组织破坏了马拉的半身像,并强行从墓地移除了马拉的遗骸。热月领导者取消了恐怖统治时期的经济立法,导致了剧烈的通胀。由于不再受到"最高限额"的抑制,一些食物的价格上涨到 1790 年水平的 100 倍,纸币贬值的非常厉害,商业买卖拒绝收取它们。大众所遭受的苦难比恐怖时期的还要沉重。绝望的、半饥饿的巴黎人在 1795 年期间举行了数次反对热月党人的示威,强烈要求面包和更低的物价。

热月政变以 1795 年宪法的通过——国民公会最后的重要举动——而告终。热月党人既想保留共和国,又想保证有产阶级的统治。新宪法因此否决了国民中四分之一最贫穷者的被选举权,要求公职候选人要拥有大量的财产。它设立了两个立法

院:五百人院和元老院。经五百人院提名后,元老院从中选择了5个人,组成了负责行政的督政府,在其他方面,督政府几乎完全独立于立法院。

1795年宪法表明大革命最激进的阶段已经过去。但在宪法开始运作的前三个星期,巴黎突发了更多的麻烦。反革命叛乱在葡月(1795年10月5日)屠杀中被扑灭,部分是被年轻的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所驱散,他命令军队忠诚于热月党人控制的国民公会。督政府统治的第一个冬天(1795—1796),由于通货膨胀、食物的长期短缺和极度的寒冷,法兰西民众遭受到革命时期最剧烈的痛苦。从那之后,形势得到稳步改善,这要归功于好的收成和督政府对经济问题的有力应对。

新政权征收了高额的保护性关税,既是对英格兰的一种战争举措,也是对法国商业的优惠。为了再次应付商业压力,新政权毁掉了印刷纸币的金属板,并在1797年使纸币退出流通。硬货币的恢复要求从紧的政府经济,这正是督政府着手做的。税收的收取变得更加有效率,而且法兰西享有由战争胜利所带来的大量战利品。督政府通过拒付三分之二的债款而减轻了国债上的重负,并给予原来的货币单位里弗以新的和持久的名称——法郎。

督政府轻易地镇压了无经验的(和被出卖的)平等派密谋,密谋的发起者是弗朗索瓦·格拉古斯·巴贝夫(François Gracchus Babeuf,1760—1797)。作为第一个现代的共产主义者,他在社会主义者的教义中流传了下来。然而,在复辟君主制和恢复雅各宾派恐怖主义的两个极端之间把握一条谨慎的中间路线上,督政府经历了非常巨大的困难。1795年宪法再三地被违反,当督政府的执政官与立法院发生冲突之时,各方都设法根

据自己的利益来改变政治平衡。立法院在任期结束之前解除了执政官的职务，而执政官则拒绝承认正式选出的立法院议员拥有席位。由于害怕政权的崩溃，不满的政客和忧虑的稳健派开始采取行动，争取获得日益成功的军队的帮助。结果导致了1799 年的雾月（也就是 10 月）政变和拿破仑的独裁。

四、拿破仑和法兰西

直到 1792 年，凯瑟琳大帝还预言 1 万士兵足以扑灭法兰西的“可恶篝火”。1792 年春季爆发的战争很快就使这样的幻想破灭了。几乎所有的欧洲强国最后都参加了进来，而且，战争的范围也远远超出了欧洲。到战争进行了一年之时，荷兰、西班牙和大不列颠加入了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阵营。到 1794 年，法国人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1795 年法国军队占领了比利时、荷兰和莱茵兰。

法国成功的一个原因是国民公会对国家资源的有力动员。这种动员使法兰西到 1794 年春季总共有空前的 100 万人参了军。另一个原因在于第一次反法同盟的脆弱性，它缺少第一流的指挥官。而且，1793 年和 1795 年对波兰的瓜分大大地帮助了法国人，因为俄国置身于战争之外而极大地分散了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注意力。到 1795 年，相互的不信任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普鲁士人因为害怕自己遭到名义上的同盟者奥地利人的攻击，而不敢攻击法国人。

普鲁士是同盟中第一个进行讲和的成员国。在《巴塞尔条约》（*Treaty of Basel*，1795）中，普鲁士将莱茵河以西的霍亨索伦王室分散的地产让与了法兰西。西班牙不久退出了同盟，它

将圣多明各(今天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岛上的西边部分让与法兰西,荷兰也是如此。除了比利时和莱茵兰,法兰西还吞并了萨伏依和尼斯,从而将其东南边界延伸到了阿尔卑斯山脉的顶峰。然而,这些战利品使大革命的理想落空。在 1792 年向奥地利宣战之时,法兰西曾发誓支持 1791 年宪法的许诺:决不进行征服性的战争。这将"不是一场国家对国家的战争,而是自由人民抵抗国王非正义侵略的正当防卫"。但是,第一共和国胜利之军却拉近了国家对国家作战的日子,这时其他欧洲国家将援引"自由人民反对非正义侵略的正当防卫"的说法,只不过侵略的发起者不是国王,而是革命的法兰西。

1. 波拿巴的崛起

到 1795 年结束的时候,只有不列颠和奥地利仍正式与法兰西处于交战之中。为了领导对意大利北部哈布斯堡王室军队的进攻,法国督政府挑选了一名年轻的将军,此人有点像一个启蒙思想家和革命者,也有点像一个残忍的、野心勃勃的冒险者。他是 1769 年出生在科西嘉岛(Corsica)的拿破仑·波拿巴。他出生前不久,法国人刚刚从热那亚获得了那块地中海岛屿,在整个一生中,他都对家族怀有一种强烈的忠诚,并对公共事务带有一种本质上反法国的观点。

还是一个 9 岁的孩子时,拿破仑就开始参加了法兰西的军事学校,尽管他那时用法语方式来拼写他的名字,还是被他的一些同辈的军校学生责骂为外国人。他沉迷于研究卢梭,梦想有一天他可以将科西嘉岛从法国的控制中解放出来。

文献记载

拿破仑集结军队

在意大利战役中，年仅20多岁的少将波拿巴在1年之内就将奥地利人赶出了据点，并使他们提出签订和约的请求。他表现出一种非凡的能力，能在他的对手巩固防御之前迅速打击和突袭他们。对于宣传和公共关系，他也表现出一种天赋，正如这段来自战役早期阶段的公告所表明的那样：

士兵们！在两个星期之内，你们已经赢得了6次胜利；你们已经使15,000人做了俘虏；你们已经杀伤10,000多人。

你们之前丧失了一切，但你们现在已经实现了一切。你们赢得了没有大炮的战役，越过了没有桥梁的河流，完成了没有鞋的强行军，进行了没有白兰地酒和通常也没有面包的露营。只有共和国的那些为共同目标走到一起的人们，只有为自由而战的士兵们，才能够忍受你们已经忍受的事情。

你们都强烈地渴望承载法国人民的荣誉；渴望羞辱胆敢企图对我们束以镣铐的骄傲的国王们；渴望回到你们村庄，自豪地说："我就在击败意大利的胜利的军队之中。"

朋友们，我向你们许诺那场胜利。但有一个你们必须发誓履行的条件：尊重你们正在拯救的人民；抑制可怕的掠夺。

意大利的人民，法国军队是来打碎你们的锁链的，对此抱以信心，你们的财产、宗教和习惯将被尊重。

Abridged from *Le Moniteur Universel*, May 17, 1796. Our translation.

当大革命爆发时,这位年轻的炮兵军官帮助推翻了科西嘉岛的旧制度,然后回到法兰西重新开始他的军事生涯。他在1793年12月负责指挥炮兵,当时国民公会的军队重新夺回了地中海上的土伦港,这一港口在那年的早些时候曾落入了英国人之手。在热月政变之后,作为一个可疑的"恐怖主义者",他前途暗淡,满足于巴黎的一份文书工作。在葡月叛乱中,他有效地援救了热月党人控制的国民公会。他娶了约瑟芬·德·波哈奈丝(Josephine de Beauharnais)为妻,约瑟芬是一个寡妇,与督政府的统治圈子有着密切的关系。约瑟芬的关系与拿破仑的才干相结合使拿破仑在1796年获得了在意大利的指挥权。

在结束意大利战役的《坎波福米亚条约》(*Treaty of Campo Formio*,1797)中,奥地利承认失去比利时,并认可拿破仑在意大利西北部建立的两个傀儡国家:利古里亚共和国(the Ligurian Republic,热那亚)和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the Cisalpine Republic,前奥属伦巴底领土)。作为回报,哈布斯堡王室得到意大利的威尼斯共和国领土。

只有不列颠仍旧与法兰西作战。拿破仑决定通过马耳他和埃及对其进行间接的攻击,埃及是奥斯曼帝国一个半独立的侯国。他邀请了100多名考古学家、地理学家和其他学者与大军同行,以便有助于创立埃及学研究。拿破仑的专家在埃及建立了法国文化的前哨,法国文化在那里延续到了20世纪。然而,从军事角度来看,战役失败了。在躲开了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1758—1805)指挥的英国地中海舰队后,拿破仑于1798年7月登陆埃及,并打败了在当地进行统治的马穆鲁克王朝(Mamluks),这是一个寡头政体。之后,灾难突然降临。1798年8月1日,纳尔森发现法国舰队停泊在埃及海岸的阿布

基尔海湾(Abukir Bay),并在舰长们起锚之前摧毁了这支舰队。纳尔森的胜利使法国人丧失了给养和援军。在近东进行了一年徒劳的战役之后,拿破仑在1799年8月突然离开埃及,返回法兰西。

拿破仑发现在法兰西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政治行动的形势已经成熟,因为督政府被雅各宾主义的强力复活所震动。立法院中的几百个代表属于自由与平等之友社(Society of the Friends of Liberty and Equality),其本质上是过去的雅各宾俱乐部。在他们的影响之下,立法院在1799年颁布了一个从富人那里强行贷款的法令,并通过了《人质法》,它谋划以报复流亡者在法兰西的亲属相威胁,使他们停止反对督政府的阴谋。

在国外,督政府已经以古典名称新建了4个附属共和国:巴达维亚(荷兰)、海尔维第(瑞士)、罗马和帕耳瑟诺佩(那不勒斯)。但是,法国帝国主义的这种新的成功激起了第二次反法同盟的形成,同盟以不列颠、奥地利和俄国为首。沙皇保罗一世(1796—1801年在位)是马耳他骑士团(Knights of Malta)的首领,该骑士团曾被拿破仑从马耳他岛总部驱逐出去。在1799年的战役中,俄国军队在意大利和瑞士作战,俄国将军亚历山大·苏沃洛夫(Alexander Suvorov,1729—1800)多次打败法国人,成为西欧的英雄人物。到1799年8月的时候,法国人已经被逐出了意大利。

在这一背景下,拿破仑从埃及返回并受到热烈的欢迎。不久,他就开始策划推翻督政府,5位执政官中有2位是他的同谋。1799年11月9日和10日(革命历的雾月18日和19日),阴谋开始实行。不是同谋的3个执政官辞职,两个立法院任命拿破仑为巴黎军事指挥官。随后,他毫不遮掩地劝说立法院将

起草新宪法的任务委托给剩下的2个执政官和他自己，忠于拿破仑的一支部队驱逐了敌对代表。

2. 执政府和帝国

共和八年宪法是革命的法兰西第四次试图提供一份成文的政府文书，此前有1791年、1793年和1795年宪法。这份新文件设立了一个非常强大的行政部门——执政府(the Consulate)。虽然这个行政部门由三个执政组成，但作为第一执政的拿破仑只留给另两个执政以名义上的权力。四个分立的机构参与立法：国务院(Council of State)提议法案；护民院(Tribunate)进行讨论但不投票表决；立法团(Legislative Corps)投票表决但不讨论；参议院(Senate)有权投票表决立法。四个机构的全部成员或者由第一执政任命，或者由间接选举选出，选举程序十分复杂，波拿巴拥有充足的机会操纵候选者。这一体制的核心是国务院，其中的职员由波拿巴亲选的人员充任，国务院既是内阁，也是最高行政法院。余下的三个机构只是意在用来通过第一执政所颁布的任何法令。即使如此，它们还是有时难以驾驭，护民院令拿破仑十分恼怒，以致他最终在1807年废除了它。

与此同时，拿破仑逐步地增加了自己的权威。1802年，拿破仑说服立法机构的成员使自己成为终身的第一执政，拥有指定继任者和随意修宪的权力。法兰西如今除了名称又再次完全是君主制的了。1804年，拿破仑促使参议院宣布"共和国政府被委托给一个皇帝。"12月2日，一场盛大的加冕礼在巴黎的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举行。教皇授予皇帝皇位，但小心地避免遵循查理大帝的范例，皇冠由拿破仑放在了自己的头上。

每次拿破仑朝着非共和主义的方向修改宪法，他都做出共和主义的姿态，将改变提交给选民。每次的结果都是压倒性的赞成：在 1799 年到 1800 年间，有 3,011,107 票支持拿破仑和共和八年宪法，1562 票反对；在 1803 年，有 3,568,885 票支持拿破仑和终身执政，8374 票反对；在 1804 年，有 3,572,329 票支持拿破仑和帝国，2579 票反对。尽管投票者受到大量的官方压力，而且，被宣布的结果中也许有些是被事先决定好的，但法兰西的大多数人都毋庸置疑地支持拿破仑。拿破仑的军事胜利诉诸于他们正在上升的民族主义，他在国内的稳定政策保证他们能够抵制进一步的革命危机和变化。

各种不同政治背景的人如今都可以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行政部门供职。拿破仑一点也不关心他的下属是回国的流亡者，还是来自于雅各宾派，只要他们有才能就可以。除此以外，他们各种各样的出身也加深了一种印象：狭隘的宗派主义已经死亡，帝国建立在一个广泛的政治基础之上。拿破仑给予官员的待遇优厚，并对高职位者提供额外的好处。随着帝国的建立，他授予了数以十计的公爵和数以百计的伯爵和男爵。他奖赏突出的将军以元帅军衔，奖赏其他军官以荣誉勋章，还给这些人支付年金。拿破仑评论说："贵族制总是存在的，在贵族阶级内摧毁了它，它就转移到富有和强大的中产阶级家族。"

3. 法律和司法

拿破仑复苏了旧制度的某些魅力，但不是其显著的不平等。他的法律规则汇编《拿破仑法典》(*the Code Napoléon*，1804—1810)宣布所有人不论等级和财富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它将

按照自己的选择来从业和信教的权利延伸至所有的人。它给予法兰西一套启蒙思想家曾经要求而革命政府无法系统阐述的专一连贯的法律体系。

然而,《拿破仑法典》没有完整体现启蒙运动的司法改革规划。它偏爱国家利益胜过个人权利,它允许在审讯程序中使用某种拷问。法官由皇帝任命;陪审员由行政长官选出。虽然拿破仑确认了经过相互同意准许离婚的革命立法,但法典取消了保护妻子、未成年人和私生子的其他革命法律,并恢复了家庭中男子在法律上的优越地位。它还恢复了法国殖民地上的奴隶制。

含混性也使拿破仑对公民自由的态度模糊不清。尽管他自傲于欢迎前政治异端分子进入他的政府,但他的宽大始终出于私利,而非出自对自由的基本信念。如果通过安抚没有达到目的,他就会使用武力。在西部各区县里,保王党人的起义持续不断,1800 年他屠杀了那些拒绝他给予的特赦的叛乱者。1804 年,由于一个波旁王室的亲王被认为是君主主义阴谋家所选择的登上法兰西王位的人,他便从中立的德意志巴登邦国绑架了这个亲王。尽管拿破仑立即发现这个亲王是无辜的,但还是处死了他。

4. 宗教和教育

拿破仑在宗教信仰上的决定通常会染上政治考虑的色彩。由于法国天主教徒讨厌大革命的反教权主义,拿破仑就设法通过与罗马做出和解来安抚他们。与教皇庇护七世(1800—1823)商议达成的宗教协定(与梵蒂冈签订的一份条约)在 1802 年被

认可，实现了这一和解。尽管它仅仅取消了《神职人员民事组织法》中最可憎的方面，但法国政府同意终止对主教和教士进行普选。主教将由政府提名，然后由教皇授予圣职，教士将由主教任命。但是，通过宣布天主教是"绝大多数法国人"的信仰，而不是宣布天主教为国教，宗教协定含蓄地容许对新教徒和犹太教徒的宽容，二者都要接受国家管委会的监督。

最后，宗教协定使法兰西的教会活动要服从于国家的"治安条例"。法国政府将对教皇训令的公布、神学院的建立、教义问答手册的内容以及许多其他细节进行监督。尽管如此，反教权主义者还是反对这个宗教协定，拿破仑用尽了一切影响来使执政府的立法机构批准了这个协定。

于是，宗教协定使教会成为法国政府的一个监管区。尽管它招致反教权主义者的怨恨，但却安抚了许多天主教徒，到1905年为止它一直有效。然而，宗教协定并没有给法兰西和梵蒂冈之间带来完全的和平。当庇护七世拒绝了拿破仑提出的使教皇国成为法国的一个附属国的时候，这位"新凯撒"就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之间适当地划分权威的问题给他上了一课。庇护作为一个囚犯在意大利北部，而后又在法兰西度过了拿破仑统治的最后几年。

大革命和拿破仑还使教会失去了对教育的垄断。1791年宪法已经许诺在法兰西建立一套公立学校体系。热月党人控制的国民公会在法兰西的每个省都建立了一个"中心学校"，向学生提供相对低费用的高质量的中等教育。拿破仑在1802年废弃了这些中心学校，以较少数量的公立中等学校取而代之，这种中等学校只对能够支付学费或获得国家奖学金的相对少数的学生开放。学生穿着制服，进行军事训练，课程也是为爱国教育的

目标服务。拿破仑几乎完全忽视了初等学校教育,然而,他的确促进了世俗学校的建设。19 世纪的法兰西,教会与国家在教育方面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5. 经济

对于一个决心增进国家统一的皇帝,政治目标也会支配着他的经济规划。法国农民想要不受约束地享有在 1789 年所获得的新的自由。拿破仑几乎没有干扰他们,除了增加军队的征兵数量。他继续实行督政府时期的硬货币政策,但不像督政府,他平衡了预算,这部分归功于他在战争中所获得的战利品。他极大地提高了收税者的效率和诚实度,并建立了半官方的法兰西银行(1800 年)来担当政府的财政代理。他加强了对罢工和工会的控制,强迫每个工人都要携带一个小册子——实际上是一个记录了工人的工作和一般信誉的身份证。虽然港口城市遭受到海外贸易下降的打击,但众多的战争契约与补助金通常使就业和利润维持在高水平。然而,随着连续不断的战争,拿破仑发现维持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满意度变得日益困难,港口城市的人口也遭受着极度的痛苦。除了向被征服的国家征兵和征税,他不得不从农民阶级中选拔更多的士兵,并提高已经不受欢迎的盐税、酒税和烟草税。

总之,拿破仑只是口头上支持共和国,而暗中破坏共和制度。他利用行政长官来强化中央集权的权威,他还鄙斥自由言论。但是,拿破仑是一个开明的专制君主。他的法律规范和某些教育改革会使启蒙思想家感到高兴。他结束了国内冲突,而没有牺牲 1789 年和随后几年所实现的土地重新分配和法律面

前的平等。拿破仑放弃了某些革命政策，修改了其他一些政策，对另一些政策进行了完善，他对大革命进行了调整，而不是整个毁掉它。

五、拿破仑和欧洲

对许多法兰西人来说，在法国的历史上，拿破仑曾经是，也仍旧是最杰出的统治者。另一方面，对许多欧洲人来说，拿破仑是一个强迫推行法国的控制和改革的外国人。拿破仑的法兰西成功地缔造了一个巨大和普遍稳定的帝国，只不过这是以激起其他欧洲国家的仇恨为代价的。

1. 战争(1800—1807)

当拿破仑再次走向战场时，他已经赤裸裸地使执政府开始独立运作。第二次反法同盟正在变得支离破碎。俄国的沙皇保罗对意大利的兴趣使不列颠和奥地利警觉，不列颠保有马耳他冒犯了沙皇保罗，因为沙皇骑士团的总部在那里。于是，沙皇联络普鲁士、瑞典和丹麦组成了波罗的海武装中立同盟(Baltic League of Armed Neutrality)与不列颠相对抗。沙皇甚至打算与法兰西一起将英国人赶出印度，这个计划当他于1801年被谋杀时破产了，但被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一世继承了。纳尔森炮轰哥本哈根港口的丹麦舰队，侵犯了丹麦的中立地位，同年，波罗的海同盟解体。拿破仑在意大利击败了奥地利人，并议定了《吕内维尔条约》(*Treaty of Lunéville*，1801)，据此奥地利承认法国在意大利重设的附属国，并同意法兰西插手重画德意志地图。

《吕内维尔条约》之后,不列颠再次被留下与法兰西孤军作战。然而,英国纳税人想要减轻他们沉重的负担,英国商人渴望重新开始与大陆市场的贸易,这一市场自 1793 年就部分地对他们关闭了。尽管不列颠无法抑制拿破仑在欧洲的扩张,但到 1801 年,它已经完全接近于赢得了殖民地和海上的战争。英国人已经占领了前荷兰和西班牙的殖民地,纳尔森的舰队已经将法国人从埃及和马耳他赶了出去。英国内阁确信它拥有一个有力的谈判形势,可以从拿破仑那里获得有利的条款。但在《亚眠和约》(*Peace of Amiens*,1802)中,英国人许诺交出他们征服的部分殖民地土地,却没有获得任何回报。法国人既没有向英国的出口货物重新开放大陆,也没有放弃比利时。

单边的《亚眠和约》在法兰西和不列颠世界范围的争斗中只提供了一年的休战期。拿破仑不久就实行了一项更加严厉的关税法令,从而刺激了英国的出口商们,而且,由于西班牙在 1800 年将海地和辽阔的路易斯安那领土归还了法兰西,拿破仑雄心勃勃地筹划在那里建立一个殖民帝国,这危害了英国在加勒比海的利益。在海地,黑人对执政府重新实行奴隶制的努力进行反抗。黑人在奴隶出身的弗朗索瓦-杜桑·卢维图尔(Francois-Toussaint L'Ouverture,约 1744—1803 年)和让-雅克·德萨林(Jean-Jacques Dessalines,约 1758—1806 年)的带领下所进行的顽强抵抗,以及黄热病的发作,给法国军队造成了极大的伤亡,并迫使拿破仑放弃了美洲计划。1803 年,他将全部的路易斯安那领土以 8 千万法郎(约 1.6 千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美国。

当路易斯安那的买卖完成之时,法兰西和不列颠再次陷入战争。从 1803 年到 1805 年,拿破仑一直积极地准备入侵英格兰。他在多弗尔海峡(Straits of Dover)的法国这边集结了 10 万



这幅由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创作的富有浪漫气息的拿破仑画像,展现了拿破仑在忙于其著名的《拿破仑法典》的工作直到清晨(注意他后面的时钟)之后所做的短暂休息。他似乎正在超越自己所要求的工作到"早晨两点的勇气"。他佩戴着荣誉勋章(他在1802年所创立)和将军肩章。看到这幅讨好的画像之时,拿破仑对大卫说:"你已了解我了。在夜里我为了国民的福利而工作,在白天我为了他们的荣誉而工作。"(Photograph ©2002 Board of Trustees,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Sammuel H. Kress Collection)

多人的军队和1000艘驳船。1805年,他派遣海军上将皮埃尔·德·维尔纳夫(Pierre de Villeneuve,1763—1806)和法国舰队到

西印度群岛去引诱英国舰队离开欧洲。当纳尔森还在搜索加勒比海，寻找法国舰队的时候，维尔纳夫将潜回欧洲配合法国侵略军渡过英吉利海峡。

维尔纳夫却没有给纳尔森犯错误的机会。回到欧洲海域之后，他驶进了一个友好的西班牙港口，而不是按照拿破仑命令的那样，直接前往英吉利海峡。纳尔森在西班牙西南角的特拉法尔加海角（Cape Trafalgar）外与法西联合舰队交战（1805 年 10 月）。他失去了性命，但之前，他已摧毁了敌人的一半舰船而自己没有损失一艘舰船。特拉法尔加会战使英国获得了无可置疑的海上控制权，毁灭了法国穿越海峡入侵英国的希望。

到特拉法尔加海战之时，奥地利和俄国已经与不列颠联手，组成了第三次反法同盟。奥地利特别对拿破仑的尝试提高了警惕。拿破仑的这一尝试促进了对德意志政治地图的大范围修改，废除了 100 多个德意志城邦和小的教会公国。这种再调整的主要受惠者是南德意志国家，拿破仑显然打算将这些国家组合成一个由法兰西控制的政治集团，抵制奥地利和普鲁士。

拿破仑在其生涯里最耀眼的战役中，击溃了结成同盟的大陆国家。在乌尔姆，他抓获了 3 万奥地利人，他们没有等待他们的俄国盟友就向西移动。他在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村附近与俄军主力和余下的奥地利军队相遇。这个胜券在握的战役（1805 年 12 月 2 日）正适合庆祝拿破仑加冕皇帝一周年。拿破仑秘密而极其机动与迅速地调来援军，使得他的敌人十分吃惊，敌人的伤亡比拿破仑自己的多 3 倍。在此月之内，他迫使哈布斯堡王室的皇帝，弗兰西斯二世，签署了羞辱性的《普莱斯堡条约》（*Treaty of Pressburg*），《条约》将奥地利的蒂罗尔（Tyrol）给予了巴伐利亚，将威尼西亚（Venetia）给予了作为拿破仑傀儡

的意大利王国。

一个甚至更加残酷的命运等待着普鲁士人,由于拿破仑反复干涉德意志事务,他们自1795年之后首次被卷入战争。1806年10月,法国人在耶拿(Jena)和阿尔斯泰特(Auerstädt)的一对相似战役中粉碎了普鲁士的主力兵团,占领了柏林。但是,拿破仑推迟了对普鲁士的最后解决,直到他于1807年6月在弗里德兰(Friedland)击败了大陆上剩下的唯一敌人——俄国。

即使拿破仑对抗第三次反法同盟的一大串胜利部分得自于其敌人的错误,法国军队也是当时欧洲最富有经验和最令人惧怕的军队。新兵通过征兵来供给,从而为拿破仑指挥的军队平均每年提供8.5万人,他们被分成小批派到老兵的分队中,很快变得坚强起来。法国军官的提升基于能力,而不是资历或势力,总体上,军官们更关注保持他们的士兵的士气,而不是实行严格的纪律。拿破仑很少冒险交战,除非他的军队在数量上与敌人的相等,然后,他便把一切押在出奇制胜上。但是,即使他那似乎无敌的法国军队也有缺陷。医疗服务是低下的,所以,战役中的大多数死亡都来自于疾病或治疗不当的伤口。薪水低且不定期发放,供给也没有规律,因为法国的政策是人和马尽可能地靠当地供给。

当拿破仑在"中立的土地"上,即停在提尔西特(Tilsit)的涅曼河(Niemen River)的木筏之上,也是在东普鲁士和俄国之间的边境上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会面的时候,他的事业达到了顶点。1807年7月,两个皇帝在那里草拟了一份在他们之间分割欧洲的条约。亚历山大承认法兰西在中、西欧的霸权,作为回报,俄国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得到可靠的认可。拿破仑向俄国保证,如果奥斯曼帝国被瓜分,俄国可以从中分享对其的掠夺。他对战败的沙皇没有任何领土要求,只要求一个许诺:停止与不列

颠的贸易,并加入反对它的战争。

当两个皇帝在木筏上进行磋商时,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1797—1840 年在位)紧张地在涅曼河河岸之上来回踱步。他有很好的理由感觉紧张,因为提尔西特几乎占去了他的一半领土。普鲁士的波兰省建立了一个新的傀儡国家,华沙(Warsaw)大公国。易北河以西的普鲁士领土依拿破仑的意愿进行安排。

于是,整个欧洲被分成三个部分:一是法兰西帝国,包括法兰西固有的领土和 1789 年以来所吞并的土地;二是附属国,许多都由拿破仑的亲戚统治着;三是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由于战败而被迫成为法兰西的同盟国。仍旧处于拿破仑体系之外的仅有的强国是不列颠、土耳其和瑞典。

在中欧,拿破仑颁布法令,进一步减少德意志邦国的数量,并在 1806 年促使神圣罗马帝国正式解体。在位的哈布斯堡王室弗朗西斯二世如今称自己为奥地利皇帝。为了替代消失的帝国,拿破仑建立了莱茵联邦(Confederation of the Rhine),除了奥地利和普鲁士,联邦几乎包括了每一个德意志邦国。在联邦的中心,拿破仑为其兄弟杰罗姆(Jerome)开拓了威斯特伐利亚王国,王国合并了在提尔西特夺取的易北河以西的普鲁士土地。

拿破仑渴望给予他的创造以尊严和永久性。他的兄弟和姻亲将会坐上王位,这还不够,他自己必须建立一个王朝,必须有后嗣,到那时为止,15 年无子女的婚姻使他不能实现这个想法。于是,他与约瑟芬离了婚,在 1810 年娶了哈布斯堡王室弗朗西斯二世的女儿玛丽·路易丝(Marie Louise)。玛丽及时地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罗马王”,但注定了永远不能统治罗马或其他任何地方。

2. 欧洲大陆体系

没有哪个地方能比欧洲大陆体系更明显地体现出拿破仑的帝国主义。这是一个管制整个欧洲经济的尝试。它有一个双重目标:增强法兰西的出口贸易和削弱英国的出口贸易。拿破仑在1806年11月发布柏林敕令,禁止与不列颠群岛的所有贸易和对不列颠商品的所有商业买卖。法令命令逮捕欧洲大陆上的所有不列颠人,并没收他们的财产。不列颠则要求希望与法兰西进行贸易的中立国船只必须首先进入不列颠港口并交纳关税,以此作为报复。拿破仑用米兰敕令予以回击(1807年12月),命令扣押所有遵照新的不列颠政策的中立国船只。中立国被夹在中间,进退两难,正如中立国经常所处的境地。两条敕令有效地造成了欧洲大陆的封锁。

拿破仑的附属国和同盟国不得不支持欧洲大陆体系,或者说,蒙受由此带来的后果。在拿破仑看来,荷兰所有得到支持的"反法"活动中,最恶劣的就是容许荷兰人走私英国违禁品。皇帝还希望附属国能够对法国的工业繁荣提供必要的支持。

欧洲大陆体系几乎完全失败了。只有少量的法国工业从中受益,例如,对从西印度群岛进口蔗糖的禁止,促进了国内糖用甜菜的栽培。但是,海外贸易的下降使得波尔多和法国的其他大西洋港口变得萧条,而且,获得如棉花之类的原材料越来越困难,导致了大范围的失业和一连串的破产。由于法国在欧洲大陆的新市场无法弥补过去的海外市场的损失,所以,从1805年到1813年,法国出口贸易值下降了三分之一还多。

欧洲大陆体系没有使不列颠崩溃,尽管它的确使英国人面

临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英国出口贸易的国外市场变得不可预测。食品进口减少,价格急剧上升,工资却是滞后的。因为囤积,钱币十分短缺,其铸造数量不足以满足要求。农场和工厂工人的状况十分糟糕。但是,不列颠安然度过了动荡时期。更多的土地开始被耕种。当金属货币难以获得的时候,工厂主就临时准备替代品支付给他们的工人。出口商不仅在美洲、奥斯曼帝国和亚洲发展了获利丰厚的新市场,还走私货物给欧洲大陆上的老主顾。拿破仑缺少抓捕海上走私的海军力量,而且,他缺少一班廉政的海关监察员来控制港口的违禁品。

欧洲大陆体系招致了中立的强国和拿破仑的同盟国的抱怨。法国根据米兰敕令的条款,扣押了欧洲港口的美国商船,使得法美关系处于危险的紧张状态。但英国的限制也给美国人以沉重的压力。英国借口美国海员是皇家海军的逃跑者,对其强行征用,并谋划从加拿大向美国扩张,导致了 1812 年到 1814 年英美之间的一场非决定性的和小规模的战争。

3. 半岛战争(1808—1813)

在欧洲,大陆体系的政治和军事结果在拿破仑的历史上形成了一段决定性和灾难性的时期,这段时期开始于 1807 年,在这一年,这位皇帝决定将欧洲大陆体系强加于不列颠的传统盟国葡萄牙。葡萄牙人的远征军为拿破仑提供了一个军事占领邻国西班牙的借口。1808 年,他推翻了西班牙的王室家族,使他的兄弟约瑟夫成为他的西班牙傀儡国王。但拿破仑所采取的每一项措施都违背了西班牙人的习惯,并冒犯了西班牙人的自尊,其中包括外国国王的登位、欧洲大陆体系的试行、对宗教裁判所

的压制、贵族与教士特权的减少。马德里的居民在 1808 年 5 月 2 日起来反抗。

尽管马德里的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了，但半岛战争（以伊比利亚半岛而得名）却迅速发展起来。西班牙人使用了埋伏、对水源投毒和其他游击战方式，试图从市民中辨别出战士已经变得不可能。与此同时，不列颠派来支援西班牙人的远征军得到巧妙地指挥和充足的给养。拿破仑将 30 多万人的军队投入作战，但是，他的对手在 1812 年占据了上风，这时他却不明智地派出其中的部分军队去入侵俄国。

4. 德意志民族的觉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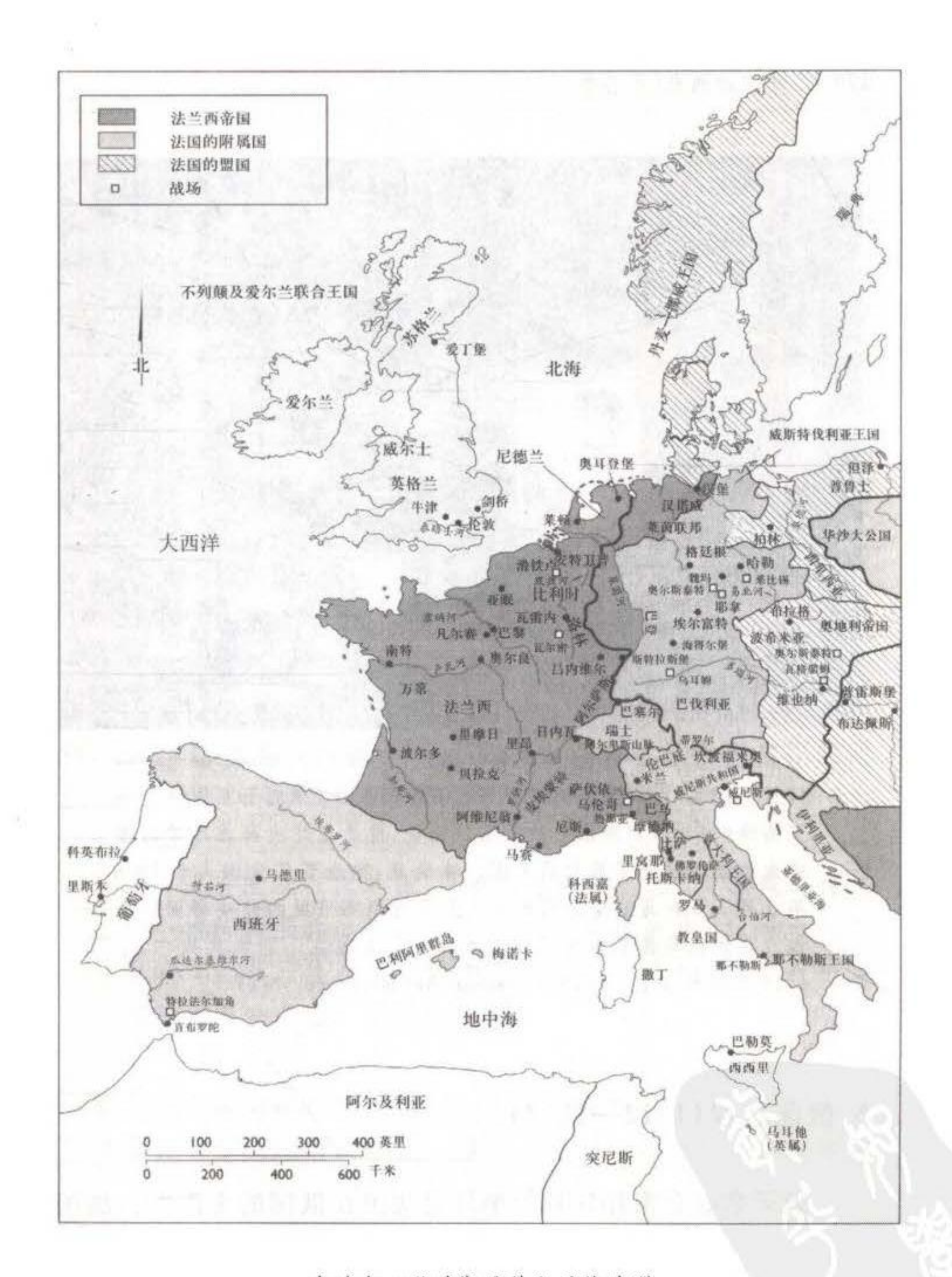
德意志的知识分子发动了一场运动来抵制法国语言和文化在他们分裂的国土上所具有的巨大影响。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和他的弟弟威尔海姆（Wilhelm，1786—1859）不仅贡献了他们脍炙人口的《童话集》（1812—1815 年出版），还贡献了用来证明德意志语言优越性的研究。哲学家费希特（J. G. Fichte，1762—1814）在柏林发表了高度爱国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Addresses to the German People*，1807—1808），宣称德语是原始语言，即语言的源头。费希特还说到，德国人本身是原始部落，即最古老和最具伦理性的民族。

甚至当奥地利人再次于 1809 年与法兰西交战时，新的德意志意识就已经开始变得明显了。尽管新的精神使奥地利人有了更佳的表现，但他们还是在瓦格拉姆（Wagram，1809）被勉强击败了，12 年中第四次屈服于一份由拿破仑支配的和约。《申布伦条约》（*Treaty of Schönbrunn*，1809）剥夺了奥地利在亚得里

亚海的海岸线,并将其波兰的加利西亚领土分配给了华沙大公国。弗朗西斯二世将他的女儿献出,与拿破仑成婚,而且,他的战败的国家被迫成为法兰西的同盟。德意志复兴的领导权转移到了普鲁士身上。

自从 1786 年腓特烈大帝去世之后,普鲁士的行政管理一直处于低迷时期,耶拿和提尔西特的冲突震惊了普鲁士而使其从这样的时期中摆脱出来。柏林大学吸引了费希特和其他倡导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人,在那里他们开始详细阐述有关一个新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理论。有才能的将军和政治家——大多都是非普鲁士人——开始上台掌权。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Gerhard von Scharnhorst,1755—1813)将军领导着一批官员,以更民主的原则重组了军队并提高了军队的效率。拿破仑强加于普鲁士的限制是士兵数量不得超过 4.2 万人,这个最大数量被一个简单的设计给规避了:在一个正当的短期强化训练之后,新兵就被归入预备队,然后引入另一批士兵。到 1813 年,普鲁士受过训练、能够作战的士兵已经超过了 15 万。

普鲁士社会和行政管理的重组受到了来自于莱茵兰的富有才能的开明贵族卡尔·斯坦(Karl von und zum Stein,1757—1831)男爵的激发。斯坦通过允许村镇和城市某种自治来赢得中产阶级的支持。他同意给予犹太人某些公民权。为了提升农民阶级的地位,他于 1807 年 10 月倡议了一个在普鲁士废除农奴制的法令。然而,这个法令并没有使容克集团崩溃,也没有为解放的农奴提供土地。于是,许多解放的农奴像散工一样,度日艰难。法令没有终止容克地主对其农民行使司法上的封建权利。斯坦和其他人仅仅消除了旧制度最恶劣的弊端,而留下了它在传统上所依赖的权威,即国王、军队和容克一族。



拿破仑一世时期及其之后的欧洲



西班牙画家弗朗西斯科·德·戈雅(Francisco de Goya, 1746—1828)对战争的受害者怀有最深的同情,而对王室则没有半点的怜悯,包括对西班牙的王室。据说,他是在处决西班牙爱国者的血泊之中绘制了最初的草图。在这里,他表现了法国人于1808年5月3日在马德里对西班牙人实行近距离平射的处决场面。这幅油画挂在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里。戈雅在不断的反战中,于1814年创作了它。(Erich Lessing/Art Resource, NY)

5. 俄国战役(1812—1813)

毁灭拿破仑宏伟计划的事件是法国在俄国的大溃败。法国在1807年之后的举动很快使沙皇亚历山大意识到,拿破仑不是在履行提尔西特协定,而是在侵入俄国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当

亚历山大和拿破仑于 1808 年在德意志的埃尔福特(Erfurt)镇再次会晤的时候,他们没能达成任何共识。在亚历山大看来,法国 1809 年在奥地利所得增强了法国统治巴尔干半岛的令人不快的预期,加利西亚从奥地利向华沙大公国的转让暗示了这个拿破仑的附庸可能下一步就会寻求吞并俄国在瓜分波兰中的所得。同时,拿破仑坚持不懈地迫使亚历山大服从欧洲大陆体系的努力,使亚历山大越来越感到愤怒。这些不满导致了沙皇和皇帝之间关系的破裂,并造成了 1812 年初夏法国人对俄国的入侵。

为了入侵俄国,拿破仑集结了近 70 万人,其中的大部分人都是被迫入伍的士兵,只有大约半数的人是法国人。为如此遥远的战争提供给养的供给系统差不多很快就中断了,俄国人的焦土政策使士兵很难靠土地来维持生活,马匹也不可能获得草料,致使许多士兵的结局只能是被消灭。当军队向东进军的时候,拿破仑的一个副官报告道:

> 没有发现任何居民,没有抓到任何俘虏,没有找到任何一个掉队的士兵。我们位于俄国居民区的中心,但我们却像一只处在一片汪洋大海中央的没有罗盘的船,对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拿破仑本来希望速战速决,但是,9 月的波罗底诺(Borodino)会战并没有一个决定性的结果。拿破仑进入了莫斯科,在被烧焦

---

* Armand Augustin Louis, Marquis de Caulaincourt, *With Napoleon in Russia: The Memoirs of General de Caulaincourt, Duke of Vicenza* (New york: Morrow, 1935), p. 62.

的城市中停留了五个星期,直到10月19日。期间,他徒劳地希望能够强迫沙皇亚历山大同意他的要求。但是,俄国人的顽强、士兵的斑疹伤寒病、冬季的来临,以及供给的短缺迫使拿破仑开始了一场噩梦般的撤退。营养不良,缺少衣物和避身处,没有医疗救助,撤退的士兵遭受着可怕的状况。不到四分之一的士兵在从莫斯科的撤退中活了下来,其余的人有的成为战俘,有的死于伤患、饥饿或疾病,还有的被冻死。冬天这个将军击败了拿破仑。

6. 拿破仑的垮台(1813—1815)

英国人在特拉法尔加海战和欧洲大陆体系的经济战场上,第一个成功地抵抗了拿破仑。然后,出现了西班牙的抵抗,接着是俄国的。到了1813年,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都参加了对抗法国人的最后的同盟。拿破仑集结了一支新的军队,但他无法如此容易地弥补在俄国损失的装备。1813年10月,他失利于"多国会战"(Battle of the Nations),又在德意志的莱比锡作战,最终被迫撤回了法兰西。军队中的德意志部队正在逃跑,莱茵联邦瓦解了,意大利的支持也越来越靠不住,拿破仑所具有的神秘感也被摧毁了。到1814年4月,组织良好的同盟军队占领了巴黎。皇帝在国内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动荡和阴谋,当他的元帅们拒绝继续作战的时候,他退位了。拿破仑被放逐到距意大利西海岸有一定距离的厄尔巴岛,成为那里的统治者。

获胜的同盟国政治家们聚集在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上草拟和约的条款。以路易十六的弟弟路易十八为代表的波旁王室回到了法兰西。当意识到无法完整地恢复旧制度

的时候，新国王发布了《1814年宪章》，建立了立宪君主制。随后，拿破仑在1815年3月1日做出了最后一次令人震惊的事情：他在法兰西的地中海海岸登陆了。

3月20日，拿破仑重返巴黎，从这一天开始的100天，法国皇帝又诞生了。皇帝再一次振作了法国人民的精神，他许诺一个带有真实的议会和选举的真正的自由制度。然而，他永远也没有机会来表明他的许诺是否是诚恳的。6月18日，英国人在亚瑟·威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爵士即威灵顿(Wellington)公爵(1769—1852)的指挥下，普鲁士人在哈布格德·冯·布吕歇尔(Gebhard von Blücher，1742—1819)将军的统帅下，在布鲁塞尔附近的滑铁卢给予拿破仑以决定性的打击。拿破仑再次遭到流放，这次被放逐到遥远的南大西洋上的英国圣·赫拉拿(St. Helena)岛。他在那里于1821年5月5日去世，也许死于砒霜中毒。然而，波拿巴主义并未随他而去。一个拿破仑神话兴起了，这个皇帝的过失和失败都被掩饰起来，他被刻画为自由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斗士，从而为另一个拿破仑在1848年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六、结论

法国大革命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它有时模糊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的欧洲国家在18世纪90年代期间并没有经历全面的革命。实际上，尽管法国大革命通过武力强行将一些进步的改革推行到国外，例如，对一些犹太人区的解放，但由于大革命将改革与法国的征服联系起来，它也耽搁了许多国家更为重要的重建时间。1815年之后，革命浪潮被一股有力的

反动浪潮所承继，甚至在一些地区，如俄国，民主革命也没有对已有制度构成任何重要的威胁。在君主复辟期间和之后的一段时期，保守派将受咒骂的"雅各宾派"标签牢牢地贴在改革的支持者身上，由此甚至能够阻止最温和的改革。

即使几乎像所有的大跃进一样，紧随法国大革命其后的就是反方向的作用力，它还是对那时的旧制度做了十分巨大的改变，以至于1815年之后，所有国王的骑兵和步兵都不能再次将旧制度有效地恢复过来，旧制度的情形就如同童话中的矮胖子(Humpty Dumpty)①一样，最终是要毁灭的。当然，在19世纪欧洲的大部分地方，贵族的确重新获得了特权和行使着不成比例的权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成长中的中产阶级利用工业革命创造的新财富，冲进了社会和国家的上层时，贵族特权——特别是在西欧——逐渐消亡了。也许没有法国大革命，这种发展最终也会发生。但至少法国大革命促进了这一过程，它为一个依法建立的体系与社会提供了最初的运作模型，在这样的合法体系与社会中，公民初步地享有了平等的合法权利，并依据启蒙运动的理想而参与创建新国家的计划。受到法国大革命鼓舞的其他努力不久就将伴随着更大的成功跟随而至，从而促成了更大范围的"民族主义"的兴起，其规模远远超过了当时民族主义的风行地域。

大革命在更大范围促进的另一个进程是民主政治。在18世纪，甚至像卢梭那样激进的人都认为，在西欧那些较大的、商业发达的国家中君主制是唯一可行的政府形式。法国革命者拒绝接受这个判断，他们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实施了欧洲首次的

① "Humpty Dumpty"其实是指一个胖得无敌的男人，因为太胖，每天就只能坐在墙头，然后某天摔死了……——译者

民主实验。在回顾中清晰可见的是，这个实验除了它的失败之处，更开启了通向其他实验的大门。因此，到 19 世纪 30 年代，开明的贵族，如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断定欧洲民主政体的到来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结果，他的同时代人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面对和接受。到 19 世纪末，民主及其实现手段，如宪法、权利法案、政党等等，是欧洲大多数政治体系的共同固定构成。简言之，法国大革命是通往大众政治时代的首次重要突破。

最后，法国大革命给世界带来了最具影响力的革命模式。尽管它有一些先驱者，如清教徒革命和美国革命，但法国大革命在根除旧制度和创立彻底的新制度上的努力具有强得多的系统性（美利坚民族也是新的，但它继续严重地依赖于英国法的程序）。习俗这块蛋糕破碎得如此具有爆炸性，它的强度又是如此猛烈，以致一些保守的历史学家认为，法国大革命与其说是 20 世纪自由民主制的先驱者，还不如说是 20 世纪极权主义统治的先行人。在不否认相似性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认清关键的不同之处。也许最重要的不同在于，法国革命者将他们的目标设定为通过举行投票来确保个人自由，不论现实的结果是多么的不完美。这是一个遭到极左和极右的极权主义统治者嘲笑的目标。

在 19 世纪，鉴于工业化所带来的新机会与新威胁，“自由”的定义被再三地更改。法国革命者留给激进的后来者的教训是，在当今世界，只要拒绝给予“自由”（无论如何理解它），大众革命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本应预见到这一前景，这种前景很难使那些在 1648 年希望能设法抑制无秩序状态的人感到舒服，甚至对于那些寻求使旧制度自由化的 18 世

纪的“进步分子”来说，它也不是完全令人愉快的。无论是多么无意识留下的，但这就是他们留下的遗产，它再次证明了，即使是人民造就了历史，人民也不能使历史确切地如其所愿。

七、本章小结

多年的财政管理不善导致了引发法国大革命的严重财政危机。优柔寡断、顽固不化的路易十六不能适应势不可挡的改革需要。第三等级占人口的97%以上，他们拥有一些地产，但农村的贫困是广泛的，而且，这个等级承担着沉重的税赋。不满普遍存在于城市的工人当中。中产阶级促使这种不满集中于特权等级，并号召消灭旧制度的陋习，特别是征税上的不平等。

负债累累的君主制面临紧迫的财政状况，国王被迫召开三级会议。1788年到1789年冬天的恶劣天气和可怜的收成，导致了进行剧烈变革的要求。当三级会议召开的时候，第三等级成功地在程序上对抗了国王，将三级会议转变为国民议会，由国民议会负责起草宪法。

平民起义进一步推动了大革命向前的步伐。国民议会废弃了旧制度的弊端，并在1789年8月发表了《人权宣言》，体现出启蒙运动的理想。

到1791年，国民议会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并基于分权原则建立了政府。法国流亡者和路易十六的活动，以及1792年战争的爆发，在温和派和极端派之间造成了隔阂。在巴黎，雅各宾派领导了一场市政革命，导致君主制被废除。

1793年，一个民主制的拥护者罗伯斯庇尔在法兰西实行独裁。在恐怖统治期间，2万人遭到杀害。通过提倡全体动员和

经济牺牲,罗伯斯庇尔和公安委员会组织起了一股将外国侵略者赶出法兰西的力量。

过度的恐怖统治使罗伯斯庇尔在 1794 年 7 月倒台。一部新的 1795 年宪法建立了督政府,确保了有产阶级的统治。

1799 年,拿破仑谋划了一次政变:结束了督政府的统治,建立了执政府。拿破仑在 1802 年成为首个终身执政官,并在 1804 年称帝。他迅速集中了帝国的行政管理权,并任命有才能的部长们就职。

《拿破仑法典》既包含了某些旧制度的思想,也体现了革命原则,如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

在宗教方面,拿破仑通过 1802 年的宗教协定与教会达成和解。教育从属于国家,公立学校被建立来培养行政管理者。拿破仑建立了法兰西银行,并改善了征税状况。

在欧洲,拿破仑缔造了一个辽阔的帝国。他迫使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接受了和平条款,只剩下不列颠与法兰西继续作战了。法兰西帝国可分成三个部分:法兰西及其所吞并的领土;法国的附属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在德意志,拿破仑正式解散了神圣罗马帝国,并建立了莱茵联邦。

拿破仑努力发动的对不列颠的经济战争事与愿违,伤害了法兰西,也与中立的强国发生了对抗。1808 年之后,西班牙和普鲁士的民族主义运动威胁着法兰西帝国。

当拿破仑 1812 年的俄国战役以其伟大军队的惨败而告终之时,欧洲各国组成了一个新的同盟,主导了拿破仑的垮台。1814 年,波旁王室复辟。然而,拿破仑神话就如同自由、平等和博爱的革命目标一样,将继续缠扰着法兰西。

大事年表

1648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
1649—1660	英格兰的空位期
1651	霍布斯:《利维坦》
1660—1685	英格兰查理二世的统治
1661—1715	法兰西路易十四的个人统治
1665—1700	西班牙查理二世的统治
1687	牛顿:《数学原理》
1682—1725	俄国彼得大帝的统治
1685	在法兰西废除了《南特敕令》
1685—1750	德意志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1685—1759	乔治·腓特烈·韩德尔在德意志和英格兰
1688—1689	英格兰的“光荣革命”
1689	英格兰的《权利法案》
1689—1702	英格兰威廉和玛丽的统治
1689—1697	奥古斯堡联盟战争
1690	洛克:《政府论下篇》

1697—1718	瑞典查理七世的统治
1700—1721	北方大战
1701	英格兰的《王位继承法》
1701—1714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1701—1746	西班牙菲利普五世的统治
1702—1714	大不列颠安妮的统治
1711—1740	神圣罗马帝国查理六世的统治
1713	《乌德勒支条约》
1713	《克雷芒通谕》
1713—1740	普鲁士腓特烈·威廉一世的统治
1714—1727	大不列颠乔治一世的统治
1715—1774	法兰西路易十五的统治
1715—1723	法兰西奥尔良公爵的摄政统治
1718—1720	法兰西约翰·劳的王室银行
1720	大不列颠"南海投机泡沫"
1721—1745	大不列颠罗伯特·沃波尔的行政机关
1726—1743	法兰西枢机主教弗勒里的行政机关
1727—1760	大不列颠乔治二世的统治
1733—1738	波兰王位继承战争
1740—1786	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的统治
1740—1780	玛丽亚·特蕾西亚在奥地利领土上的统治
1740—1748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1745—1764	法兰西德·蓬巴杜夫人的"统治"
1748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1751	狄德罗和达兰贝尔:《百科全书》(第一卷)
1751	塞缪尔·约翰逊:《字典》

1755—1756	外交革命
1756—1763	“七年战争”
1756—1791	德意志的沃尔夫冈·阿马迪乌斯·莫扎特
1759	伏尔泰:《老实人》
1760—1820	大不列颠乔治三世的统治
1762—1796	俄国凯瑟琳大帝的统治
1762	卢梭:《社会契约论》
1765—1790	神圣罗马帝国约瑟夫二世的统治
1770—1826	德意志的路德维希·冯·贝多芬
1771—1774	法兰西大理院解散
1772	第一次瓜分波兰
1774—1792	法兰西路易十六的统治
1774	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
1775—1783	美国革命
1776	斯密:《国富论》
1781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1787	法兰西贵族会议
1788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1789	法兰西三级会议和攻陷巴士底狱
1789—1797	美国乔治·华盛顿总统任期
1790—1792	神圣罗马帝国利奥波德二世的统治
1791	法兰西立法议会
1792—1806	神圣罗马帝国弗朗西斯二世的统治
1792—1797	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
1792—1795	法兰西国民公会
1793	第二次瓜分波兰

1793—1794	法兰西的恐怖统治——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尼特被处决
1795—1799	法兰西督政府
1795	第三次瓜分波兰
1799	波拿巴政变
1799—1804	法兰西执政府
1799—1802	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
1801—1825	俄国亚历山大一世的统治
1804—1814	法兰西第一帝国
1805—1807	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①
1808—1813	半岛战争
1812—1813	俄国战役
1814	拿破仑第一次遭放逐
1815	百日统治和滑铁卢之战

① 英文版误写为“War of the Second Coalition”，翻译时做了纠正。——译者

中英文词汇对照表

A

Abelard, Peter	彼得·阿伯拉尔
Abolitionist movement	废奴运动
Absolute monarchy	绝对君主制
Abukir Bay	阿布基尔海湾
Active citizen	积极公民
Act of Settlement	《王位继承法》
Addresses to the German People	《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
Adriatic sea	亚得里亚海
Advice to a Daughter	《给妇女的建议》
Aegean Sea	爱琴海
Africa	非洲
Age of Reason	理性时代
Age of the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时期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农业革命

Agriculture	农业
Aix-la-Chapelle, Peace of	《亚琛和约》
Alexander I, Czar of Russia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Alexis, Czarevitch of Russia	俄国沙皇长子亚历克西斯
Alexis I, Czar of Russia	俄国沙皇亚历克西斯一世
Allegheny Mountains	阿利根尼山脉
Alsace	阿尔萨斯
American colonies	美洲殖民地
American Revolution	美国革命
Amiens, Peace of	《亚眠和约》
The Anatomy Lesson of Dr. Tulp (Painting)	《蒂尔普教授的解剖课》
Anglicanism	英国国教
Anglo-American War	英美战争
Anglo-Dutch War	英荷战争
Anne, Queen of England	英格兰女王安妮
Anne of Austria, queen mother	母后奥地利的安妮
Appalachian Mountains	阿巴拉契亚山脉
Arakcheev, Count Alexsey	艾力克斯·阿拉克契耶夫伯爵
Architecture	建筑
Areopagitica	《论出版自由》
Aristocracy/nobility	贵族
Army	军队
Arrondissement	行政区
Art of good living	富足生活的艺术
Art	艺术
Asbury, Francis	弗朗西斯·阿斯伯里
Asiento	《贩卖黑奴合同》
Assembly of Notables	贵族会议
Assignat	纸币
Atheism	无神论

Auerstädt, battle of　阿尔斯泰特战役
Augustan Age　奥古斯都时代
Augustus, Emperor of Rome　罗马皇帝奥古斯都
Augustus III, King of Poland　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三世
Austerlitz　奥斯特里茨
Austria　奥地利
Austrian Netherlands　奥属尼德兰
Austro-Turkish War　奥地利—土耳其战争
Azov (port)　亚述(港)

B

Babeuf, François Gracchus　弗朗索瓦·格拉古斯·巴贝夫
Bach, Johann Sebastian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Bacon, Francis　弗朗西斯·培根
Baden　巴登
Balearic Islands　巴利阿里群岛
Balkans　巴尔干
Baltic fleet　波罗的海舰队
Baltic League of Armed Neutrality　波罗的海武装中立同盟
Baltic region　波罗的海地区
Bank of England　英格兰银行
Bank of France　法兰西银行
Bank　银行
Baroque era　巴洛克时代
Barrier fortress　边界要塞
Bastille, storming of　攻占巴士底狱
Batavian Republic　巴达维亚共和国
"Battle of the Books"　"书战"
Battle of the Nations　多国会战
Bavaria　巴伐利亚

Beauharnais, Josephine de	约瑟芬·德·波哈奈丝
Beccaria, Cesare	切萨雷·贝卡里亚
Beggar's Opera	《乞丐歌剧》
Belgium	比利时
Belorussia	白俄罗斯
Benevolence	善行
Berlin	柏林
Berlin Decree	柏林敕令
Bernini, Gian	杰安·贝尼尼
Bethlehem,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
Bill of Rights	《权利法案》
Black Death	黑死病
Black Hole of Calcutta	加尔各答黑洞
Black Sea	黑海
Blackstone, William	威廉·布莱克斯通
Blank slate theory of the mind	意识白板理论
Blenheim, battle of	布伦亨战役
Blücher, Gebhard von	哈布格德·冯·布吕歇尔
Blue laws	《蓝法》
Board of Trade	同业公会
Bohemia	波希米亚
Boileau, Nicholas	尼古拉斯·波瓦洛
Bonaparte, Jerome	杰罗姆·波拿巴
Bonaparte, Joseph	约瑟夫·波拿巴
Bonaparte, Josephine	约瑟芬·波拿巴
Bonaparte, Napoleon	拿破仑·波拿巴
Bonds, government	政府公债
Bordeaux (port)	波尔多(港)
Borodino, battle of	波罗底诺会战
Bosporus	博斯普鲁斯海峡

Bosse, Abraham	亚伯拉罕·伯斯
Bossuet, Bishop Jacques	雅克士·波舒哀主教
Boston Tea Party	波士顿倾茶事件
Boucher, François	弗朗索瓦·布歇
Bourbon dynasty	波旁王朝
Bourgeois Gentilhomme, Le	《贵人迷》
Bourgeoisie	中产阶级
Boyar	世袭贵族
Boycott	联合抵制
Boyne, battle of the	博恩战役
Brandenburg	勃兰登堡
Brandenburg Concertos	《勃兰登堡协奏曲》
Brazil	巴西
Brienne, Loménie de	洛梅尼·德·布里安
Brissot, Jacques	雅克·布里索
Brumaire, coup d'état	雾月政变
Bureaucracy	官僚制
Burgess	自由民
Burgoyne, John	约翰·伯戈因
Bute, Lord	比特勋爵
Byron, Lord	拜伦勋爵
Byzantine Empire	拜占庭帝国

C

Cabinet system	内阁体系
Calculating machine	计算机
Calcutta	加尔各答
Calonne, Charles Alexandre de	查理·亚历山大·德·加隆
Calvin, John	约翰·加尔文
Calvinism	加尔文主义

Cameralism	卡麦拉主义
Campo Formio, Treaty of	《坎波福米亚条约》
Canada	加拿大
Canal du Midi	南运河
Canaletto, Giovanni Antonio	乔凡尼·安东尼奥·卡纳莱托
Canal	运河
Candide	《老实人》
Cape La Hogue	拉霍格角
Capet, Hugh	休·卡佩
Cape Trafalgar	特拉法尔加海角
Capital punishment	死刑
Caribbean	加勒比海
Carlovitz, Peace of	《卡罗维茨和约》
Cartesian opposites	笛卡尔哲学中的对立物
Castrati	阉人
Categorical imperative	绝对命令
Catherine I, Empress of Russia	俄国女皇凯瑟琳一世
Catherine II, Empress of Russia	俄国女皇凯瑟琳二世
Catholic Index	天主教禁书
Catholicism	天主教
Cavalier	骑士
Censorship	审查制度
Census	人口普查
Centralized nation state	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
Century of genius	天才的世纪
Chamber music	室内乐
Chambers of reunion(France)	和解议院(法国)
Champaigne, Philippe de	菲利普·德·尚帕涅
Charcoal	木炭
Charlemagne	查理大帝

Charles, "Bonnie" Prince 漂亮王子查理
Charles I, King of England 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
Charles II, King of England 英格兰国王查理二世
Charles II, King of Spain 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
Charles III, King of Spain 西班牙国王查理三世
Charles IV, Emperor of Austria 奥地利皇帝查理四世
Charles VI, Emperor of Austria 奥地利皇帝查理六世
Charles VII, King of Bavaria 巴伐利亚国王查理七世
Charles XII, King of Sweden 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
Charter of 1814 《1814年宪章》
Child labor 童工
Child mortality rates 儿童死亡率
Chinese style of decorating 中国装饰风格
Chinoiserie 中国装饰风格
Chippendale, Thomas 托马斯·奇彭代尔
Chocolate 巧克力
Chronometer 航海表
Church 教堂
Churchill, John(Duke of Marlborough) (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
Cisalpine Republic 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
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 《神职人员民事组织法》
Civil death 剥夺公民权终身
Civilization 文明
Civil liberty 公民自由
Civil right 公民权
Civil service 公务部门
Clarissa Harlowe(Richardson) 《克拉丽莎》(理查德森)
Classicism 古典主义
Clergy 教士
Cleves-Mark 克莱沃-马克

Clive, Robert	罗伯特·克莱夫
Clover	苜蓿
Coal	煤
Cocoa	可可粉
Code Napoléon	《拿破仑法典》
Coffeehouse	咖啡馆
Coin	硬币
Coke	焦炭
Coke, Sir Edward	爱德华·柯克爵士
Colbert, Jean Baptist	浸礼派教徒简·考伯特
Collegiate system	学院体系
Colonialism	殖民主义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英国法释义》
Committees of Correspondence	通信委员会
Commoner	平民
Common law	《普通法》
Commonwealth of England	英格兰共和国
Commune	公社
Compagnie des Indies	法属印度公司
Concerto	协奏曲
Concord	康科德
Concordat	宗教协定
Condillac, Abbé de	德·孔狄亚克神甫
Condorcet, Marquis de	德·孔多塞侯爵
Confederation of the Rhine	莱茵联邦
Congregationalism	公理会
Congress of Vienna	维也纳会议
Congreve, William	威廉·康格里夫
Conservatory	音乐学校
Conspiracy of Equals	平等派密谋

Constantine 君士坦丁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制宪会议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立宪君主制
Constitution 宪法
Consulate 领事
Continental Congress 大陆会议
Continental system 大陆体系
Contraception 避孕
Contract theory of government 政府契约理论
Cooper, Samuel 塞缪尔·库珀
Copyright 版权
Corday, Charlotte 夏洛特·科黛
Corneille, Pierre 皮埃尔·高乃依
Corsica 科西嘉岛
Cossack 哥萨克人
Cotton 棉花
Council of Five Hundred 五百人院
Council of State 国务院
Council of Trent 特兰托公会议
Counter-Reformation 反宗教改革
Counter-Revolution 反革命
Court of Exchequer 财政法院
Crimea 克里米亚
Crimes and Punishments 《论犯罪与刑罚》
Critical faculty 批判能力
Cromwell, Oliver 奥利弗·克伦威尔
Cromwell, Richard 理查德·克伦威尔
Cromwellian Settlement 克伦威尔式和解
Crop rotation 轮作制

Culloden	卡伦顿

D

Dacia	达契亚
Danton, Georges	乔治·丹东
Danube River	多瑙河
Darby family	达比家族
Dardanelles	达达尼尔海峡
David, Jacques-Louis	雅克-路易·大卫
De-Christianization campaign	去基督教化运动
Decimal system	公制体系
Declaration of Gallican Liberties	《高卢自由权宣言》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独立宣言》
Declaration of Indulgence	《宽赦宣言》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人权宣言》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女权宣言》
Declaratory Act	《公告》
Defoe, Daniel	丹尼尔·笛福
Deism	自然神论
Democracy	民主
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	民主代议制
Denmark	丹麦
Descartes, René	勒内·笛卡尔
Despotism	专制
Dessalines, Jean-jacques	让-雅克·德萨林
Devil cult	魔鬼仪式
Dictionary	字典
Diderot, Denis	丹尼斯·狄德罗
Dido and Aeneas	《黛多与埃涅厄斯》
Diet	议会

Diggers	掘地派
Diplomatic Revolution	外交革命
Directory	督政府
Dissenter	反对者
Divine-right monarchy	神权君主制
Divorce law	《离婚法》
Dominican Republic	多米尼加共和国
Dresden	德累斯顿
Drill-planting	畦植
Dryden,John	约翰·德莱顿
Dubarry,Madame Jeanine	珍宁·杜巴丽夫人
Duels,outlawing of	禁止私人决斗
Duma	杜马
Dumouriez,Charles-François	查理-弗朗索瓦·杜木里埃
Dupleix,Joseph	约瑟夫·杜普莱克斯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荷兰东印度公司
Dutch Patriot movement	荷兰爱国运动
Dutch United Provinces	荷兰联合省

E

East Anglia	东英吉利亚
East Florida	东佛罗里达
East Prussia	东普鲁士
Economic revolutions	经济革命
Economics	经济
Edgar,Thomas	托马斯·埃德伽
Edict of Nantes	《南特敕令》
Education	教育
Egypt	埃及
Egyptology	埃及古物学

Elba	厄尔巴岛
Elbe River	易北河
Elders	元老院
Elector of Bavaria	巴伐利亚选侯
Elector of Brandenburg	勃兰登堡选侯
Elizabeth, Empress of Russia	俄国女皇伊丽莎白
Elizabeth I, Queen of England	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一世
Elizabethan *Poor Law*	伊丽莎白的《济贫法》
Enclosure system	圈地体系
Encyclopédie	《百科全书》
England	英格兰
English Civil War	英国内战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英属东印度公司
English Revolution	英国革命
Enlightened absolutism	开明绝对主义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
Equality bread	同样的面包
Erfurt	埃尔福特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人类理解论》
Estates General	三级会议
Eugene, Prince of Savoy	萨伏依的尤金亲王

F

Fables	《寓言集》
Factory	工厂
Fairy Tales	《童话集》
Family life	家庭生活
Family-state compact	《家国契约》
Famine	饥荒
Farnese, Elizabeth	伊丽莎白·凡尼斯

Father Duchesne (journal)	《杜切斯尼神甫》(刊物)
Federalism	联邦制
Fëdor Romanov,Czar of Russia	俄国沙皇费尔多·罗曼诺夫
Fehrbellin	菲尔贝林
Fertility rate	出生率
Feudal dues	封地应付款
Feudalism	封建主义
Fichte,J. G.	费希特
Fielding,Henry	亨利·菲尔丁
Fifth Monarchy advocates	第五王国派
Filmer,Robert	罗伯特·菲尔麦
Finland	芬兰
Finmont,Henry Essex	亨利·艾塞克斯·艾兹沃斯·
Edgeworth de	德·芬蒙特
First Day	第一日
First estate	第一等级
Fleury, Cardinal	枢机主教弗勒里
Florence	佛罗伦萨
Florida	佛罗里达
Flying shuttle	飞梭
Fontaine,Jean de la	让·德·拉封丹
Food riots	食品骚乱
Foreign policy	外交政策
Fort Duquesne	杜克斯尼堡
Fox,George	乔治·福克斯
Franc	法兰克
France	法兰西
Franche Comté(Free Country of Burgundy)	法兰斯—孔太(勃艮第自由伯国)
Francis, Duke of Lorraine	洛林公国大公弗朗西斯
Francis I,Holy Roman Emperor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西斯一世

Francis II,Emperor of Austria	奥地利皇帝弗朗西斯二世
Frederick I,King of Prussia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
Frederick II,King of Prussia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
Frederick of the Palatinate, "Winter King" of Bohemia	波希米亚的"冬季之王"、帕拉廷的腓特烈
Frederick William,Great Elector of Prussia	普鲁士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
Frederick William I,King of Prussia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
Frederick William III,King of Prussia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
Free churchman	自由教士
French Academy	法兰西学院
French and Indian War	法国和印第安战争
French East Company	法属东印度公司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
Friedland	弗里德兰
Fronde	投石党
Fugue	赋格曲

G

Gainsborough,Thomas	托马斯·根兹伯罗
Galicia	加里西亚
Gallicanism	高卢主义
Gay,John	约翰·盖伊
Gazette de France	《法国公报》
General Security Committee	一般治安委员会
General will	公共意志
Geneva	日内瓦
Genoa	热那亚
Gentry	士绅
George I, King of England	英格兰国王乔治一世
George II, King of England	英格兰国王乔治二世

George III, King of England 英格兰国王乔治三世
Germany 德意志
Gibbon, Edward 爱德华·吉本
Gibraltar 直布罗陀
Gilded youth 阔气的年轻人
Gin Lane 《金酒小巷》
Girondins 吉伦特派
Glorious Revolution 光荣革命
Gluck, Christoph 克里斯托夫·格鲁克
Gobelins tapestry enterprise 哥白林壁饰挂毯企业
Godwin, William 威廉·戈德温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Golden Rule 金箴
Gouges, Olympe de 奥琳普·德·古兹
Goya, Francisco de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
Grain riots 粮食骚乱
Grand Alliance 大同盟
Grand Remonstrance 《大抗议书》
Grand siècle, Le 伟大的世纪
Great Britain 大不列颠
Great Fear 大恐慌
Great Lakes 五大湖
Great Northern War 大北方战争
Great Protestation 《大声明》
Greenwich mean time 格林尼治平均时间
Grimm, Jacob 雅各布·格林
Grimm, Wilhelm 威尔海姆·格林
Guild 行会
Gulf of Mexico 墨西哥湾
Gulliver's Travels 《格列佛游记》

Gustavus III, King of Sweden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
Guyon, Jeanne Marie	珍妮·玛丽·盖恩

H

Habsburg dynasty	哈布斯堡王朝
Haiti	海地
Hals, Frans	弗朗斯·哈尔斯
Hampden, John	约翰·汉普登
Hampton Court	汉普顿宫
Handel, George Frederick	乔治·腓特烈·韩德尔
Hand loom	手织机
Hanover dynasty	汉诺威王朝
Hargreaves, James	詹姆斯·哈格里夫斯
Harlot's Progress, The	《妓女生涯》
Harpsichord	大键琴
Haydn, Franz Joseph	弗朗茨·约瑟夫·海顿
Head tax	人头税
Hébert, Jacques	雅克·埃贝尔
Helvetian Republic	海尔维第共和国
Henrietta Maria, princess of France	法兰西公主亨莉埃塔·玛丽亚
Henry IV, King of France	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
Heresy	异端
Hessian	黑森人
High baroque	巴洛克盛世
High Church Anglicanism	英国国教高教会派
High culture	高雅文化
Highlander	高地地区的人
Highway	大路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罗马帝国衰亡史》

Hobbes, Thomas	托马斯·霍布斯
Hogarth, William	威廉·贺加斯
Hohenzollern dynasty	霍亨索伦王朝
Holland	荷兰
Holy Directing Synod	神圣引领会议
Holy Roman Empire	神圣罗马帝国
Horace	贺拉斯
Horse-hoeing	马拉耕耘机
Hôtel des Invalides	荣军院
Houdon, Jean Antoine	让·安东尼·乌东
House of Commons	下院
House of Lords	上院
Hudson Bay	哈得孙湾
Huguenot	胡格诺教派
Hume, David	大卫·休谟
Hungary	匈牙利
Hutchinson, Rober	罗勃·哈钦森

I

Illegitimacy rate	私生子率
Illiteracy	文盲
Immigrant	移民
Import duty	进口税
Independents of Congregationalist	公理会教徒中的独立派
India	印度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
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Infant mortality rate	婴儿死亡率
Ingria	因格里亚

Inheritance right	继承权
Inquisition	宗教裁判所
Instruction to the delegates of Russia	给俄国代表的《规程》
Instrument of Government	《政府约法》
Insurance firm	保险公司
Intendant	监督官
Interregnum	空位期
Intolerable Acts	《不可容忍法案》
Invisible hand	看不见的手
Ireland	爱尔兰
Iron	铁
Iron plow	铁犁
Ironsides	铁甲军
Islam	伊斯兰教
Italy	意大利
Ivan, Czar of Russia	俄国沙皇伊凡

J

Jacobins	雅各宾派
Jacobite	詹姆斯党人
Jamaica	牙买加
James I, King of England	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
James II, King of England	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
Janissary	禁卫军
Jansen, Cornelius	科尼利厄斯·詹森
Jansenism	詹森主义
Jaspers, Karl	卡尔·雅斯贝尔斯
Jena, battle of	耶拿战役
Jenkins, Robert	罗伯特·詹金斯
Jesuit	耶稣会士

Jeunesse dorée 纨绔子弟
Jew 犹太人
Johnson, Samuel 塞缪尔·约翰逊
Joint-stock company 股份公司
Joseph II, Holy Roman Emperor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
Judicial reform 司法改革
Junker 容克
Jury system 陪审团制度
Justices of the peace 治安法官

K

Kant, Immanuel 伊曼纽尔·康德
Kaunitz, Prince von 冯·考尼茨亲王
King William's War 国王威廉的战争
Knights of Malta 马耳他骑士团
Knights of the shire 郡选议员
Krakow 克拉科夫
Kremlin 克里姆林宫
Kutchuk Kainardji, Treaty of 《库丘克—凯纳基条约》

L

Labor union 工会
Lafayette, Marquis de 德·拉法耶特侯爵
Laissez faire philosophy 自由放任主义哲学
Landlord 领主
Land tax 土地税
La Rochelle 拉罗切利
La Salle, Sieur 拉萨尔爵士
La Tour, Georges de 乔治·德·拉图尔
Laud, William 威廉·劳德

Law, John	约翰・劳
Law of Hostages	《人质法》
Law of 22 Prairial, Year II	革命年第二年牧月 22 日的法令
Lawrence, Sir Thomas	托马斯・劳伦斯爵士
Laws of Ventôse	《风月法令》
League of Augsburg	奥古斯堡联盟
Leeland	里兰
Legion of Honor	荣誉勋章
Legislative Assembly	立法议会
Legislative Corps	立法团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戈特弗里德・威尔海姆・莱布尼兹
Leipzig	莱比锡
Le Nôtre, André	安德列・勒・诺特
Leonardo da Vinci	列昂纳多・达・芬奇
Leopold II, Emperor of Austria	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二世
Lessing, Gotthold	戈特霍尔德・莱辛
Leszcynski, Stanislas	斯坦尼斯拉斯・勒泽克赞斯基
Le Tellier, Michel	米歇尔・勒・泰利埃
Letters Concerning Toleration	《论宗教宽容书简》
LeVau, Louis	路易・勒沃
Leveler	平均主义者
Leviathan	《利维坦》
Lexington	莱克星敦
Liberty	自由
Liberum veto	自由否决权
Ligurian Republic	利古里亚共和国
Liquor tax	酒税
Lit de justice	公平之榻
Literacy	有文化
Literature	文学

Lithuania	立陶宛
Livonia	利沃尼亚
Livre	里弗
Livret	小册子
Lloyd, Edward	爱德华·劳埃德
Lloyd's of London	伦敦的劳埃德
Locke, John	约翰·洛克
Loi de Chapelier	《列·霞白利法》
Lombardy	伦巴底
London	伦敦
London Society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the Arts, Manufacturers, and Commerce	伦敦艺术、制造与商业促进会
Long Parliament	长期议会
Lorraine	洛林
Louisburg	路易斯堡
Louisiana	路易斯安娜
Louis XIII, King of France	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三
Louis XIV, King of France	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
Louis XV, King of France	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五
Louis XVI, King of France	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六
Louis XVIII, King of France	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八
Louvois, Marquis de	德·卢夫瓦侯爵
Low Church Anglicanism	英国国教低教会派
Lully, Jean-Baptiste	让-巴蒂斯特·卢利
Lunéville, Treaty of	《吕内维尔条约》
Lutheranism	路德教
Lycées	公立中等学校

M

Mably, Abbé de	德·马布利神甫
Machiavelli, Niccolò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
Madras	马德拉斯
Madrid	马德里
Magistrate	地方行政官
Magyars	马札尔人
Maids of Honor	《宫娥》
Maintenon, Madame de	德·曼特农夫人
Malplaquet, battle of	马尔普拉奎特战役
Malta	马耳他
Malthusian crisis	马尔萨斯危机
Mamluks	马穆鲁克王朝
Manon Lescaut	《曼依·莱斯科特》
Manorial dues	庄园应付款
Marat, Jean Paul	简·保罗·马拉
Maria Theresa, Queen of Hungary and Bohemia	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女皇玛丽亚·特蕾西亚
Marie, Queen of France	法兰西王后玛丽
Marie Antoinette, Queen of France	法兰西王后玛丽·安托尼特
Marie-Louise, Empress of France	法兰西皇后玛丽-路易丝
Maritime insurance	海上保险
Maritime trade	海上贸易
Marriage à la Mode	《时尚婚姻》
Marseilles	马赛
Marshall, George	乔治·马歇尔
Marston Moor, battle of	马斯顿荒原战役
Martinet, Jean	吉恩·马提奈
Mary, Queen of Scots	苏格兰王后玛丽

Mary II, Queen of England	英格兰女王玛丽二世
Mary Magdalen, cult of	玛利亚·抹大拉的礼拜
Massachusetts	马萨诸塞
Mass in B Minor	《B小调弥撒曲》
Mazarin, Jules	朱尔斯·马萨林
Mecklenburg	梅克伦堡
Medici, Marie de'	玛丽·德·梅第奇
Mediterranean Sea	地中海
Menorca	梅诺卡
Mercantilism	重商主义
Merchant marines	商船队
Mesmerism	催眠术
Messiah, The	《弥赛亚》
Metallurgy	冶金术
Methodism	卫理公会派
Metric system	公制体系
Michelangelo	米开朗基罗
Middle Ages	中世纪
Middle class	中产阶级
Milan	米兰
Milan Decree	米兰敕令
Military colonies	军事殖民地
Millenarian	千年论者
Milton, John	约翰·弥尔顿
Minorca	梅诺卡岛
Mississippi	密西西比
Mississippi Bubble	密西西比投机泡沫
Mississippi Company	密西西比公司
Modern history, beginning of	现代史开端
Moldavia	摩尔达维亚

Molière	莫里哀
Moll Flanders	《摩尔·弗兰德斯》
Monarchy	君主制
Monastery	修道院
Monck,George	乔治·蒙克
Moneylending	放债
Monmouth,Duke of	蒙默思郡公爵
Monopoly	垄断
Montesquieu,Baron de	德·孟德斯鸠男爵
Monteverdi,Claudio	克劳迪奥·蒙特威尔第
Montreal	蒙特利尔
Moravian Brethren	摩拉维亚兄弟会
Moscow	莫斯科
Mozart,Wolfgang Amadeus	沃尔夫冈·阿马迪乌斯·莫扎特
Munich	慕尼黑
Municipal revolution	市政革命
Municipal self-government	市政自治

N

Nantes	南特
Naples	那不勒斯
Napoleonic War	拿破仑战争
Narbonne	纳尔榜
Narva	纳尔瓦
Naseby, battle of	纳斯比战役
Nathan the Wise	《智者纳旦》
National Assembly	国民议会
National/central banks	国家或中央银行
National Convention(French)	国民公会(法国)
National debt	国债

National Guard	国民自卫队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Native American	美洲土著人
Natural law	自然法
Natural order	自然秩序
Natural rights	自然权利
Navy	海军
Navigation	航海
Navigation Act	《航海条例》
Nawab of Bengal	孟加拉行政长官
Necker, Jacques	雅克・内克
Nelson, Horatio	霍雷肖・纳尔逊
Neoclassicism	新古典主义
Netherlands	尼德兰
New Amsterdam	新阿姆斯特丹
New England	新英格兰
Newfoundland	纽芬兰
New Model Army	新模范军
New Orleans	新奥尔良
New Regime	新制度
Newspaper	报纸
Newton, Isaac	艾萨克・牛顿
Newtonian model of solar system	牛顿的太阳系模型
New York	纽约
Niemen River	涅曼河
Night Watch, The	《夜巡》
Nijmegen, treaties of	尼木维根条约
Nineteen Propositions	十九条建议
Nobility	贵族
Noble savage	高尚的野蛮人

Nobles of the robe	穿袍贵族
Nobles of the sword	佩剑贵族
Noncomformist	不顺从者
North, Lord	诺斯伯爵
North Africa	北非
North Briton	《北大不列颠人》
Notre Dame Cathedral	巴黎圣母院大教堂
Noumena	本体
Nouvelle Héloïse, La	《新爱丽丝》
Nova scotia	新斯科舍
Nystadt	尼斯塔德

O

Oder River	奥德河
Oder Valley	奥德河流域
Ohio Valley	俄亥俄河流域
Old Believers	旧礼仪派
Old Regime	旧制度
Opera	歌剧
Orchestral music	管弦乐
Orléans, Duke d'	奥尔良公爵
Ottoman Empire	奥斯曼帝国
Ovid	奥维德

P

Pain d'égalité	同样的面包
Palais Royal, Le	《王宫》
Palatinate	帕拉提纳特
Panama	巴拿马
Papacy	教皇制度

Papal states	教皇国
Paper money	纸币
Paradise Lost	《失乐园》
Paris	巴黎
Paris, Peace of	《巴黎和约》
Parish	教区
Parlement	大理院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议会民主制
Parliamentary supremacy	议会至上
Parliament	议会
Parma	巴马
Parthenopean Republic	帕尔瑟诺佩共和国
Pascal, Blaise	布莱斯・帕斯卡
Passarowitz, Treaty of	《帕萨洛维茨条约》
Passive citizen	消极公民
Patriarcha	《父权制》
Patriarch of Moscow	莫斯科总主教
Patronage system	委任制
Paul I, Czar of Russia	俄国沙皇保罗一世
Peace of Carlovitz	《卡罗维茨和约》
Peasantry	农民阶级
Peasant uprising	农民起义
Peninsular War	半岛战争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
Pennsylvania Dutch	宾夕法尼亚的德国人
Pensées	《默想录》
Persian Letters, The	《波斯人信札》
Peter I, Czar of Russia	俄国沙皇彼得一世
Peter III, Czar of Russia	俄国沙皇彼得三世
Petition of Right	《权利请愿书》

Phenomena	现象
Philadelphia	费城
Philip II, King of Spain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
Philip IV, King of Spain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
Philip V, King of Spain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五世
Philosophes	启蒙思想家
Physiocrat	重农主义者
Piano	钢琴
Piedmont-Savoy	皮埃蒙特-萨伏依
Pietism	虔信派
Pillory	颈手枷
Pitt, William	威廉・皮特
Pitt, William the Younger	小威廉・皮特
Pittsburgh	匹兹堡
Pius VII, Pope	教皇庇护七世
Plague	瘟疫
Plains of Abraham	亚伯拉罕平原会战
Pocket borough	口袋镇
Poland	波兰
Polish West Prussia	波兰统治的西普鲁士
Poll tax	人头税
Poltava, battle of	波尔塔瓦战役
Pombal, Marques de	庞巴尔大侯爵
Pomerania	波美拉尼亚
Pompadour, Madame de	德・蓬巴杜夫人
Pompeii, ruins of	庞培废墟
Pontiac	庞蒂亚克
Population growth	人口增长
Poquelin, Jean Baptiste	让・巴蒂斯特・波克兰
Pornography	色情文学

Portraiture	肖像画
Port Royal	皇家港
Portugal	葡萄牙
Potato War	土豆战争
Power of dispensation	豁免权
Pragmatic Sanction	《国事诏书》
Prague	布拉格
Predestination	宿命论
Presbyterianism	长老派
Presque Isle	普雷斯克岛
Pressburg, Treaty of	《普莱斯堡条约》
Preston	普雷斯顿
Prévost, Antoine François	安托万·弗朗索瓦·普雷沃斯特
Pride, Thomas	托马斯·普赖德
Pride's Purge	普赖德清洗
Primogeniture	长子继承权
Prince, The	《君主论》
Progress	进步
Prostitution	卖淫
Protectorate	保护国
Protestantism	新教
Prussia	普鲁士
Public opinion	公共舆论
Public Safety Committee (France)	公安委员会(法国)
Pugachev, Yemelyan	叶米里扬·普加乔夫
Purcell, Henry	亨利·普塞尔
Puritanism	清教
Pyrenees, Treaty of the	《比利牛斯条约》

Q

Quakerism	贵格会

"Quarrel of the Ancients and Moderns"	"古今之争"
Quebec	魁北克
Quebec Act	《魁北克法案》
Quesnay, François de	弗朗索瓦·德·魁奈
Quietism	寂静主义

R

Rabelais	拉伯雷
Racine, Jean	让·拉辛
Racism	种族主义
Raison d'état	国家至上
Rake's Progress, The	《浪子生涯》
Raleigh, Sir Walter	罗利·沃尔特爵士
Rambouillet, Marquise de	朗布耶侯爵夫人
Ranter	喧骚派教徒
Rationalism	理性主义
Realism	现实主义
Reason	理性
Recession	衰退
Reformation	改革
Reign of Terror	恐怖统治
Religion	宗教
Religious Society of Friends	教友派
Religious tolerance	宗教宽容
Rembrandt Van Rijin	伦勃朗·凡·里因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
Republicanism	共和主义
Republic of letters	文学界
Republic of Virtue	美德共和国
Republic	共和国

Restoration	复辟
Restoration comedy	复辟喜剧
Restoration dramas	复辟戏剧
Réveillon	雷维朗
Revere, Paul	保罗·里维尔
Revolutionary movement	革命运动
Revolutionary Tribunal	革命法庭
Reynolds, Sir Joshua	乔舒亚·雷诺兹爵士
Rhineland	莱茵兰
Rhine River	莱茵河
Rhine valley	莱茵河流域
Richardson, Samuel	塞缪尔·理查德森
Richelieu, Cardinal	枢机主教黎塞留
Rigaud, Hyacinthe	亚森特·里戈
Right	权利
Robespierre, Maximilien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
Robinson Crusoe	《鲁宾逊漂流记》
Rochefoucauld, Duc de la	德·拉罗什福柯公爵
Rock of Gibraltar	直布罗陀巨岩
Rococo style	洛可可风格
Roderick Random	《罗德里克·蓝登》
Roman Republic	罗马共和国
Romanticism	浪漫主义
Rome	罗马
Romney, George	乔治·罗姆奈
Rotten borough	腐败的自治市
Roundhead	圆颅党
Rousseau, Jean-Jacques	让-雅克·卢梭
Royal Academy	皇家学院
Royal edicts, Registration of	王室法令"登记"

Royalist	保王党
Royal Navy, British	英国皇家海军
Rubens, Peter Paul	彼得・保罗・鲁宾斯
Rump Parliament	残余议会
Ruskin, John	约翰・罗斯金
Russia	俄国
Russian compaign	俄国战役
Russian Revolution	俄国革命
Russo-Turkish War	俄土战争
Ryswick, Treaty of	《里斯维克和约》

S

Saint Domingue	圣多明克[①]
Saint Helena	圣・赫勒拿
Saint Paul's Cathedral	圣・保罗大教堂
Saint Petersburg	圣・彼得堡
Saint Peter's Church	圣・彼得大教堂
Saint-Pierre, Abbé de	德・圣-皮埃尔神甫
Salon	沙龙
Salt tax	盐税
Salutary neglect	有益的忽略
Sansculotte	过激分子
Santo Domingo	圣多明各
Saratoga	萨拉托加
Sardinia	撒丁
Savile, George	乔治・萨维尔
Savoy	萨伏依
Saxony	萨克森

① 即今天的海地。——译者

Scandinavia	斯堪的纳维亚
Scharnhorst,Gerhard von	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
Schönbrunn,Treaty of	《申布伦条约》
Sciences of man	有关人的科学
Scientific academy	科学院
Scienza Nuova	《新科学》
Scotland	苏格兰
Sebastopol	塞瓦斯托波尔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基督再临
Second Defense of the People of England	《再为英国人民申辩》
Second estate	第二等级
Second Hundred Years' War	第二个百年战争
Second Russo-Turkish War	第二次俄土战争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	《政府论下篇》
Seine River	塞纳河
Senate	参议院
Sensationalist epistemology	感觉主义认识论
Sensibility	感性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教会与国家的分离
Separation of powers	权力分立
September Massacres	九月大屠杀
Serfdom	农奴制
Seven Years' War	七年战争
Sextant	六分仪
Ship money	造船费
Short Parliament	短期议会
Sicily	西西里
Sieyès,Abbé Emmanuel	伊曼纽尔·西哀士神甫
Silesia	西里西亚
Silkworm	蚕

Sixtus V, Pope	教皇西克斯图五世
Slavery	奴隶制
Smith, Adam	亚当·斯密
Smollett, Tobias	托比亚斯·斯摩莱特
Smuggling	走私
Social class	社会阶层
Social Contract, The	《社会契约论》
Social trend	社会趋势
Society of the Friends of Liberty and Equality	自由与平等之友社
Solemn League and Convenant	《庄严盟约和圣约》
Sonata	奏鸣曲
Sophia, Regent of Russia	俄国摄政者索菲娅
Sophia of Hanover	汉诺威的索菲娅
Sorrows of Yound Werther, The	《少年维特的烦恼》
South Sea Bubble	南海投机泡沫
Spain	西班牙
Specialization of function	功能专门化
Specie	硬币
Speech, freedom of	言论自由
Speransky, Michael	迈克尔·斯佩兰斯基
Spinning jenny	珍妮纺纱机
Spinning wheel	纺纱轮
Spinoza, Baruch	巴鲁克·斯宾诺莎
Spirit of the Laws, The	《论法的精神》
Squire	乡绅
Stafford, Earl of	斯特拉福德伯爵
Stamp Act	《印花税法案》
Stamp Act Congress	印花税法大会
Stanislas II, King of Poland	波兰国王斯坦尼斯拉斯二世

Star Chamber	星法院
State of nature	自然状态
Steam engine	蒸汽机
Stein, Baron Karl von und zum	卡尔·斯坦男爵
Stettin	斯德丁
Stock exchange	证券交易所
Straits of Dover	多弗尔海峡
Strasbourg	斯特拉斯堡
Streltsi	近卫军
Stuart dynasty	斯图亚特王朝
Stuart Magna Carta	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大宪章
Sturm and Drang movement	"狂飙突进"运动
Suffrage	选举权
Sugar Act	《蔗糖法案》
Sultans	苏丹
Suvorov, Alexander	亚历山大·苏沃洛夫
Sweden	瑞典
Swift, Jonathan	乔纳森·斯威夫特
Switzerland	瑞士
Symphony	交响乐
Syndics of the Drapers' Guild, The	《布商行会的理事》

T

Tariff	关税
Tartuffe	《伪君子》
Tatar	鞑靼人
Tennis Court Oath	网球场宣誓
Textile	纺织品
Thermidorean Convention	热月的国民公会
Thermidorean Reaction	热月政变

Third estate	第三等级
Thirty Years' War	三十年战争
Thucydides	修昔底德
Tilsit	提尔西特
Tithe	什一税
Tobacco	烟草
Tocqueville, Alexis de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Tom Jones	《汤姆·琼斯》
Tory	托利党
Torture	拷问
Toulon	土伦
Toussaint-L'Ouverture, François-Dominique	弗朗索瓦-多米尼克·杜桑-卢维图尔
Townshend, Lord	汤申德勋爵
Townshend duty	汤申德税
Trafalgar, battle of	特拉法尔加会战
Tribunate	护民院
Triennial Act	《三年法案》
Truman, Harry S.	哈里·S. 杜鲁门
Tudor dynasty	都铎王朝
Tuileries Palace	蒂伊尔里宫
Tull, Jethro	杰斯罗·塔尔
Turgot, Anne-Robert-Jacques	安妮-罗伯特-雅克士·杜尔哥
Turkey	土耳其
Turnip	芜菁
Tuscany	托斯卡纳
Twelve Who Ruled	十二人统治
Tyrol	蒂罗尔

U

Ukraine	乌克兰

Ulm	乌尔姆
Ulster	阿尔斯特
Uniform code of law	统一的法规
Unigenitus	《克雷芒通谕》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大不列颠联合王国
United States	美国
Universal rights	普遍权利
Universal suffrage	普选权
University of Berlin	柏林大学
University of Königsberg	哥尼斯堡大学
Urban society	城市社会
Urban VIII, Pope	教皇乌尔班八世
Utrecht, treaties of	《乌德勒支条约》

V

Valmy, miracle of	瓦尔米奇迹
Van Dyck, Sir Anthony	安东尼・凡・戴克爵士
Vatican	梵蒂冈
Vauban, Marshal de	马歇尔・德・沃邦
Velásquez, Diego	蒂埃哥・委拉斯开兹
Venality system	受贿体系
Vendémiaire, massacre of	葡月屠杀
Venetia	威尼斯地区
Venice	威尼斯
Vergil	维吉尔
Versailles Palace	凡尔赛宫
Vesuvius	维苏威山
Vico, Giovanni	乔瓦尼・维柯
Vienna	维也纳
Vigée-Lebrun, Elisabeth	伊丽莎白・维热-勒不伦

Villeneuve, Pierre de	皮埃尔·德·维尔纳夫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为女权辩护》
Virginia	弗吉尼亚
Voltaire	伏尔泰

W

Wagram	瓦格拉姆
Walpole, Robert	罗伯特·沃波尔
Waltham Black Act	《沃尔瑟姆管制法令》
Ward, Ned	内得·沃德
War of Jenkins's Ear	詹金斯耳朵之战
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War of the League of Augsburg	奥古斯堡联盟战争
War of the Polish Succession	波兰王位继承战争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Warsaw	华沙
Washington, George	乔治·华盛顿
Waterloo, battle of	滑铁卢战役
Watt, James	詹姆斯·瓦特
Wealth of Nations, The	《国富论》
Wealthy Shopkeeper	《富有的店主》
Weights and measures	度量衡
Wellesley, Sir Arthur	亚瑟·威尔斯利爵士
Wentworth, Thomas	托马斯·温特沃斯
Wesley, John	约翰·卫斯理
West Florida	西佛罗里达
West Indies	西印度群岛
Westminster Abbey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Westphalia	威斯特伐利亚
Westphalia, Peace of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Y

Z

EUROPE
1648-1815